

目录

[中文版序言 15](#_Toc54606381)

[中文版自序 17](#_Toc54606382)

[序言 一千封信 18](#_Toc54606383)

[一 亂世情緣 22](#_Toc54606384)

[二 從納粹集中營到蘇聯勞改營 33](#_Toc54606385)

[三 高墻內外的守望 42](#_Toc54606386)

[四 信是托命的船 52](#_Toc54606387)

[五 秘密信使網絡 65](#_Toc54606388)

[六 歷盡艱險的秘會 75](#_Toc54606389)

[七 再次冒險相會 90](#_Toc54606390)

[八 三進虎穴探監 106](#_Toc54606391)

[九 同是天涯淪落人 114](#_Toc54606392)

[十 勞改營的衰落 126](#_Toc54606393)

[十一 出獄在即的籌劃 138](#_Toc54606394)

[十二 終成眷屬 151](#_Toc54606395)

[尾聲歷史的見證 158](#_Toc54606396)

[鳴謝 165](#_Toc54606397)

[“紀念碑”按語 167](#_Toc54606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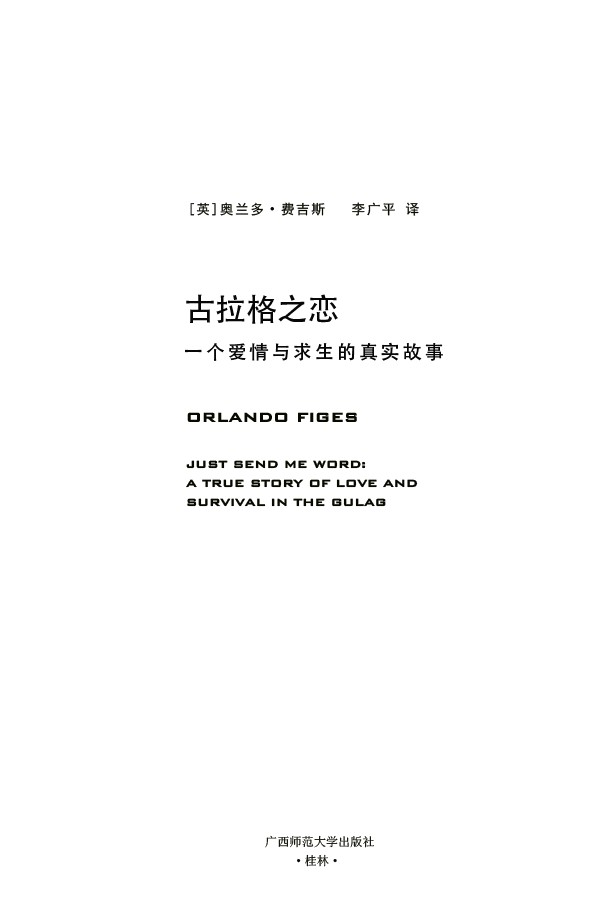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 169](#_Toc54606399)

[檔案 169](#_Toc54606400)

[訪談 169](#_Toc54606401)

[出版的著作和論文 170](#_Toc54606402)

[專有名詞對照表 172](#_Toc54606403)



JUST SEND ME WORD

by Orlando Figes

Copyright c Orlando Figes,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拉格之戀/(英)奧蘭多•費吉斯著;李廣平譯

一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8

書名原文: Just Send Me Word: A True 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

ISBN 978-7-5495-8550-2

Ⅰ.(1古…. Ⅱ.(1奧….2李…Ⅲ.①長篇小說-英國-現代Ⅳ. ①11561.4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175209號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22號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發行熱線:010-64284815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臨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華路郵政編碼:276017

開本:635mm×965mm 1/16

印張:23彩插:0.5字數:198千字

2016年8月第1版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價:64.00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為了人與書的相遇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 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導讀

一切皆在信中

許知遠

一

列夫決定寫信給斯維塔。

有五年時間，他們沒有見面了。不要說見面，就是音信也幾乎全無。1941年7月，尚在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列夫參軍，到前線抗擊入侵的德國人。他運氣不佳，當年冬天，就被德軍俘虜。他熬過了在戰俘營的歲月，抵制了成為德軍間諜的壓力與誘惑。盟軍的勝利卻沒改變他的命運，他被視作通敵者，先是被宣判死刑，然后又減刑為十年勞改，被發往伯朝拉勞改營。

這似乎也是這個家族的不幸遭遇的延續。列夫·米申科出生于1917年1月21日，這也是一個革命之年，先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接著是布爾什維克獲取了權力，他們聲稱要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四歲時，他就目睹雙親無辜地死于混亂的內戰，他們都被視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姨媽與祖母帶大他。他也像同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樣，個人的喪失、痛苦被淹沒于革命的亢奮洪流中，列夫學習馬克思、列寧的講話，加入了共青團，成為蘇俄社會主義試驗的擁護者。

他的直率性格，經常給他招致麻煩。在1937年，就讀莫斯科大學時，他因頂撞軍訓教官，被扣上了“從事反革命托洛茨基宣傳鼓動，反對工農紅軍的指揮官”的罪名。多虧三位同學挺身而出的辯護，他才逃過劫難。

這劫難卻拉近了他與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維奇的距離。他們是物理系的同學，出了些小狀況的戀人，列夫喜歡親切地叫她斯維塔。斯維塔比列夫幸運，他的父親是一位橡膠專家，盡管對于這個新制度尚有保留，卻因技術能力在工業界而獲得暫時的安定。不知何故，或許是斯維特拉娜偶爾會發作的憂郁癥，他們在大二時的關系冷淡下來。但斯維塔聽說到列夫的麻煩，立刻回到他的身邊。他們接下來的幾年，一定是人生中最曼妙的時光，他們一起逛街、看電影，讀阿赫瑪托娃與布洛克。

直到這一切被戰爭突然中斷。莫斯科與柏林的短暫聯盟，最終在1941年破裂，列夫主動參了軍。斯維塔最后一次得到列夫的消息，很可能是列夫上前線的最后一刻，他最后來探訪，結果只見到了她的媽媽。她曾寫信給軍事當局，詢問列夫的消息，結果石沉大海，她也從列夫的奧爾加阿姨得到過“失蹤了，下落不明”的消息。

自己人的審訊遠比敵軍更難熬，斯大林的蘇聯似乎比希特勒的德國對列夫更為殘酷。對斯維塔的記憶多少幫助了列夫。在又一個嚴酷審訊之夜后，他夢見了她，看見她“穿一件白色的連衣裙，跪在地上，身邊還有一個女孩兒，也穿了一件白色連衣裙……”這個夢發生于1945年9月10日，這一天也是斯維塔二十八歲的生日，它或許是列夫潛意識中的告別，他們再不可能相見了。但他比自己想象的更幸運，他活了下來。

“斯（即斯維塔）的家人好嗎？”在給奧爾加姨媽信的結尾處，他似乎漫不經心地提到了她，叮囑姨媽，不用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他們。這是1946年6月，他已在伯朝拉呆了三個月。這個勞改營也是遍布遼闊的蘇聯疆域內的數量眾多的勞改營中的一座，它們像這個紅色帝國中散布的“群島”。自1930年代初設立以來，古拉格就成為蘇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制度將普通人變成囚徒，然后將囚徒變成奴隸勞工，以完全漠視他們基本權利的方式榨取他們的價值。

在這些群島中，伯朝拉因它的地理位置而與眾不同。它位于北極圈內，一年中有九個月處于漫長的黑夜中。列夫在其中的木材廠做工。就在他即將被重體力勞動與糟糕的營養摧毀前，他幸運地遇見了斯特列里科夫，他是木材廠的一個附屬研究實驗室的負責人，他將物理學出身的列夫調入干燥車間做技術員。新環境讓他逐漸恢復了體力，也恢復了某種信心。他本已決定不再聯系她——“這個女人，已經五年沒音訊了，還給她寫信干什么？她也許死了吧。或許是放棄了列夫，移情別戀”，即使這一切都不是，這封信也可能給她招致危險。他不再是那個年輕的物理學家，而是一個囚徒。他甚至不敢直接聯系她，試探性地給姨媽寫了封信。在接下來的一封信中則又明確地對姨媽說：“我現在是給你寫信，不是給她寫信，因為，我不想給她增添負擔。讓她平靜地生活吧，我不想給她添亂，既不想讓她回想起過去也不想讓她惦念我的現在，我想讓她無憂無慮。”

所有的擔憂隨即被證明是多余的。8月8日，收工的列夫收到了斯維塔的信。“列夫，遇事要看行為的動機，不要看行為的后果，我要是不知道這個道理，就會怪罪你了，怪你音信杳然。”她干巴巴的表達方式一點沒變，沒變的是她的熱情與思念。她袒露自己的思念之情，也簡短地匯報幾年來的生活。在結尾處，她強烈地要求繼續通信，并想給列夫郵寄包裹。

頻繁的通信持續了八年，一共有一千二百多封信。在其中，除了表達無盡的思念，也談論自己的工作、生活、朋友，看到景物、內心的感受，更有對未來生活的憧憬。斯維塔勇敢而執著，她不僅把思念寄托于紙上與未來，還要去探望列夫。距離莫斯科四千五百公里的伯朝拉不僅路途遙遠，更重要的是，僅僅作為女朋友，斯維塔是沒有資格探望列夫的，而未經許可探訪一個勞改者則是非法的，它會給她的工作、生活都帶來莫測的風險。

她做到了。八年中，兩個人的生活，似乎都在圍繞著這些信件與偶爾的探望展開。她等到了他重獲自由。兩人結婚，生下兩個孩子。他們的生命也延續得足夠長，不僅挺過了嚴酷的斯大林時代，也目睹了蘇聯的解體，穿越到了普京時代，分別于2008年與2010年去世。

二

奧蘭多·費吉斯在2007年的“紀念碑”組織，看到這些信件時，被它的規模與連續性驚呆了。這也是矢志于收集斯大林時代檔案的“紀念碑”組織成立以來收到的最大一宗私人檔案。

費吉斯正在進行《耳語者》的寫作，他要探究在恐怖、壓抑的斯大林時代，普通俄國人的內心世界。這些信件則變成他的下一個寫作計劃。在很多人談論了古拉格群島之后，這些信件成為這一歷史事件最私人化的記錄。

出生于1959年的費吉斯或許是這一代人中最好的俄國歷史學者。比起蘇聯作家們，這位英國歷史學家多了旁觀者的全局、清晰；比起英文世界蘇聯題材的歷史作家，他寫得更好，更有一種對他人痛苦的敏感性。他對俄國歷史的描述，偶爾讓人想起史景遷對中國的書寫，他們都是非凡的敘事者。

在他的筆下，我看到一個輝煌的俄國文明，如何迅速地被摧毀，變得野蠻化，也看到狂熱的意識形態如何造就扭曲的世界，更有普通人在面對巨大恐懼時的應對之道。

而在這本書中，你可以看到愛與信念是如何保護滋養一個人，不僅幫他度過最痛苦的時光，也是瓦解看似堅不可摧的極權制度的過程。

它也呈現了極權系統的復雜性，即使在充滿了謊言、背叛的環境中，這對戀人仍遇到了熱心的幫助者，協助他們寄送信件、安排會面。所有的日常行為，都變得驚心動魄，也意義非凡。即使他們二人身受如此苦難，也對蘇聯保持著復雜的情感，似乎也為這個國家取得的成就歡呼，卻不愿意將自己的困難與這些成就聯系在一起思考，思考它們的一致性與矛盾性。“夜里好像全城都被它照亮了，非常漂亮”，她在信中描述莫斯科大學主樓的輝煌，似乎沒意識到它也是古拉格的奴隸勞工們所建造的。列夫則在觀看一部關于連接伏爾加河與頓河的運河建造（它同樣由古拉格勞工所建）的紀錄片時，感慨地說：“人類的智慧真不簡單，把成千上萬個想法轉化成了摸得著看得見的奇跡……我沒有別的想法，只覺得非常自豪，非常欽佩。”

可能正是這種思考的斷裂，保護了他們，使得他們免于陷入精神分裂的痛苦。他們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兩個人的愛情上，愛情成了他們的避風港，躲避外界的動蕩與嚴寒。他們也都傾力于眼前的目標上，他們的兒子尼基塔回憶說：“我爸不給我們講古拉格的暴行，但是他愛給我們講遇事應該怎么辦，應該有什么樣的指導原則，以勞改營里的真人真事為例，給我們現身說法。首先，永遠不要自嘆命苦……第二個原則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只是臨時的暫住，都要做長久打算，就仿佛要在那里永久定居似的。”這種實用主義精神，幫他度過了難關。這或許也正是蘇聯時代的一個普通人最重要的生存智慧，一個螺絲釘的智慧。

這本書也讓我想起自己的經歷。大約二十年前，我在風入松書店第一次看到了《古拉格群島》，厚厚的三卷本，令人生畏，卻無意翻閱。不管是書中的內容，還是作者索爾仁尼琴，都引不起我的太多興趣。與這套書排列在一起的，還有一套中國知識分子文叢，關于反右運動、牛棚生涯，同樣的，我也沒有半點興趣。那時，我想這些往事與我有何關系，更何況它是殘酷、丑陋、令人不安的往事。那時我正沉浸于擁抱一個新時代的熱望之中——這個新時代由互聯網、全球化所驅動。這個新時代的哲學是，拋棄過去，直線向前。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固執地相信，古拉格群島，就是一個分散的島群，它位于蘇聯的某一個入海口附近，該離西伯利亞不遠吧。

我忘記了是怎樣逐漸克服掉這種知識與情感上雙重無知的，或許與歷史的殘酷因素再次浮現有關。也是在這樣逐漸覺醒的意識中，我開始對俄國歷史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興趣：它怎樣從一個沙皇專制掉入革命的浪潮，當它擺脫烏托邦、享受暫時的自由之后，又怎樣回到一種新型的威權之中；在這戲劇性的歷史起落中，個人是如何應對這一切的。

我逐漸意識到，這些殘酷記憶不會自動消失，倘若它們得不到正視與清理，常會以另一種形式重演。更重要的是，這些殘酷與掙扎，也正是我們自我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幫我們確立什么是美好、崇高、善良、自由，什么才是最值得追逐的東西。

在書中，有一個有趣的、可能被忽略的描述。在伯朝拉勞改營火車站旁，布滿了破爛的小胡同，很多中國移民聚集于此，人稱“上海”。這些中國人是怎樣移居到這塊嚴寒之地，又怎樣面對這場蘇聯社會主義試驗的，一定是個非凡的、被遺忘的故事。這個“上海”也提醒我們，中國發生的相應歷史，我們的那些右派改造農場……

古拉格不僅是發生于某個特定時刻與地點的人道災難，也是一種人類社會普遍的遭遇。很可惜，除去少數作家，比如楊顯惠、高爾泰的記錄，我們從未知曉中國的普通知識分子是怎樣度過這些歲月，我們從未知曉我們的列夫與斯維塔的故事。

         Wahrlich, keiner ist weise,

Der nicht das Dunkel kennt.

Truly, no one is wise,

That does not know the darkness.

不認識黑暗，必不能明達。

——赫爾曼·黑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

        L'absurde ne libere jamais

mais ne fait qu'enchainer.

The absurd dves not liberate; it  binds.

荒謬的東西絕不會帶來解放，

它只會帶來禁錮。

——阿爾貝·加繆( Albert camus,1913-1960)

黑茫茫，無盡的離愁，

在你心頭，也在我的心頭。

何必流淚，快伸過來你的手，

答應我，你還會來我的夢里游。

你我就像兩座高高的山頭，

天各一方，無法聚首。

只愿你，午夜前后，

撥開滿天星斗，

給我送來你的問候。

            ——阿赫瑪托娃《夢里》（1946）

# 中文版序言

本書作者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教授，任教于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在當今的英語世界里，研究現代俄國的歷史學者人才濟濟，而費吉斯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俄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文學藝術，還是政治經濟，他都爛熟于心，無人能出其右。他著述頗豐，第一本書《農民俄羅斯，內戰》（Peasant Russia，Civil War：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f，1991）講的是1917—1921年間革命與內戰時期的俄國農民；接著出版了《一個民族的悲劇》（A People’s Tragedy：The Kussian KevoJufion，1891-1924，1996），洋洋灑灑一千頁，將俄國革命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娓娓道來。《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2002）和盤托出林林總總的俄國文化，條分縷析，引經據典，足見作者之飽學。2007年出版《耳語者》（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ialin's Russia，2014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中譯本），斯大林時期蘇聯的私人生活躍然紙上，歷歷在目。《克里米亞戰爭》（Crimea：The Lasf Crusade，2010）講述19世紀中葉的俄國，與英、法、奧斯曼帝國開戰，結果戰敗受辱，改變了現代俄國歷史的進程。兩年后，他相繼出版了本書《古拉格之戀》（Just Send Me Word：A True 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2012）和一部現代俄國簡史《革命的俄國，1891—1991》（Revolutionary Russia，1891-1991:A Pelican introduction，2014）。

他的這些著作，語言優美，通俗易懂，“普通讀者”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迄今已經譯成了多種語言，風行全世界。欣聞《古拉格之戀》即將出版中文版，以饗漢語世界，不禁為之驚艷雀躍。

本人畢生治蘇俄歷史，對費吉斯教授的著作非常贊賞，希望他的所有作品都能夠譯成中文，相信他的書一定都會像《耳語者》和《古拉格之戀》一樣，令中國讀者愛不釋手。

本書詳細生動地描寫了斯大林時期生存的艱難。斯維特拉娜·伊萬諾娃和列夫·米申科這一對非凡的情侶，他們由相遇到相戀，后來被濁世拆散，遠隔千山萬水，但人散心不散，長相守望。

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專制統治，建立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內戰隨即爆發，數百萬人喪生，米申科的家人也死于非命。1920年代中葉有過短短幾年，相對還比較平靜。不料，1920年代晚期，斯大林掀起了“自上而下的革命”，這一革就革了十年。為了加快工業化，當局把大量資源用作資本投資，卻令人民勒緊褲帶。

與此同時，斯大林一邊推行農業“集體化”，一邊剝奪“富農”財產，可是農業生產還是上不去。這種“推行加剝奪”，隨即發生了1932—1933年間的大饑荒，再一次奪去了數百萬蘇聯人的生命。后來，好歹算把饑荒挨了過去，不料隨之而來的是斯大林大恐怖。根據蘇聯官方統計，1937—1938年的大恐怖時期，一百三十多萬人遭到逮捕，其中六十八萬多人被扣上“人民的敵人”的帽子而被槍斃，占被捕人數的一半以上。

列夫·米申科和斯維特拉娜·伊萬諾娃就是出生在此時此地。列夫·米申科二十歲那年，正在莫斯科大學上學，因為批評軍訓教官欺侮下屬而被誣告，說他從事“托洛茨基反革命宣傳鼓動”。多虧同學們挺身而出，仗義勇為，不怕被開除學籍，甘冒生命危險，為他開脫，他才得以幸免于難。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嚇住，但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幸運地活下來。

也正是在1930年代，斯大林牢牢地控制了“外蒙”，并且緊緊管控了中國的新疆。斯大林也把那里大批無辜的人打成國家的敵人。

說來奇怪，讀費吉斯教授這本書，我們得知，列夫和斯維塔，雖然身經斯大林時代的種種事件，卻仍然忠于蘇聯政府。他們年輕，想象不出世界上還有別樣的人間。在斯大林的統治下，年輕人更容易被他說動，所以斯維塔和列夫當時都是蘇聯共青團團員。

1939年，斯大林大恐怖剛過去，全國驚魂未定。那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不光彩的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密約。按照這個密約，蘇聯先是占領了波蘭東部，繼而出兵芬蘭，后又兼并了波羅的海三國和比薩拉比亞地區（Bessarabia）。可是斯大林萬萬沒想到，希特勒欺騙了他。1941年6月，納粹德國進攻蘇聯，蘇聯猝不及防，一潰千里。列夫·米申科熱愛祖國，報名參戰，可是不久即被敵人俘虜，戰爭期間一直被關押在德國。戰后，愛國者列夫也像無數蘇聯戰俘一樣，立刻被蘇聯抓了起來，被控犯了叛國罪，判處死刑。好在又一次福星高照，死刑減為十年勞改，他被押回蘇聯勞改營服刑。

列夫服刑的勞改營在俄羅斯邊遠的蠻荒之地，冰天雪地，絕望無助。幸有勇敢的人們慨然相助，這一對戀人得以繞過看守檢查，秘密通信。1946年到1954年，列夫和斯維塔彼此寫了一千二百多封信。這些信件竟然奇跡般保存了下來。費吉斯教授以這些寶貴的信件為素材，進一步釆訪了列夫和斯維塔及其家人朋友，并且參考檔案史料，終于把書中兩位主人公的遭遇栩栩如生地寫了出來。這本書是一個愛情故事，文情并茂，讀來令人戚戚然。但是這本書遠遠超出了卿卿我我的兒女情長，它向世人證明：人性、人的尊嚴、正義感、忠誠、勇敢，是摧毀不了的。

黑宮廣昭[1](#__1)①

2015年5月于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 中文版自序

很榮幸、很高興，我的書現在又有了中國讀者。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讀者大眾能看到我的書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好不春風得意，但也有點兒誠惶誠恐。但愿這本書能給大家帶來些許啟示。

《古拉格之戀》是譯成中文的第二本拙著。第一本書《耳語者》，是一部口述歷史，講的是斯大林時期家庭和私人生活。寫《耳語者》時收集材料，無意中發現了本書的素材，所以，本書是《耳語者》引出來的。

蘇聯勞改營，又稱古拉格，它像一張大網，鋪天蓋地，籠罩在蘇聯各地。一千八百多萬人被關進了勞改營里。這一千八百多萬人，人人都有親屬，父母、妻子、丈夫、孩子，他們全都受到株連，人生也都被毀了。

本書是一個愛情故事，發生在蘇聯勞改營。主人公是兩個非同尋常的莫斯科青年，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列夫·格列勃維奇·米申科，他的女友斯維特拉娜·阿列山德羅芙娜·伊萬諾娃。1941年爆發偉大的衛國戰爭，戰爭把他倆拆散了。1945年，列夫回到蘇聯控制區后馬上就被抓了起來，直接押送到蘇聯極北地區的伯朝拉勞改營勞改。在他被關押的漫長歲月里，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等他回來，自始至終給他寫信，給了他愛和道義的力量，使他得以活下來。從1946年到1954年，在好心人的幫助下，他倆得以秘密通信。一封封信被偷偷帶出勞改營寄給他的女友，又把他女友的來信偷偷帶進來交給列夫。前后八年多，積攢下大批信件，本書就是根據這些信寫成的。

這些信是俄羅斯“紀念碑”歷史教育與人權組織發現的。當時，為了寫《耳語者》，我正在“紀念碑”幫助下釆錄口述歷史。一看到這些信，我就馬上意識到，這些信極具史料價值，意義非常重大。果然這是一個百年不遇的驚世發現。列夫的信是古拉格日常生活的實時記錄，現有的史料，都沒有這么全。從斯維特拉娜的信中可以看出來，蘇聯人民都知道古拉格就在身旁，只是嘴上不說，但勞改營的鐵絲網擋不住他們的同情心，隔不斷他們的正義感，大家紛紛伸出援手，幫助里面受難的人。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愛情故事，它也寫出了強權之下人類團結互助、善良仁愛、堅韌不拔、掙扎求生的精神。

# 序言 一千封信

“紀念碑”[2](#__2)[1]莫斯科辦事處熙熙攘攘，正忙著接待四方來客，有普通公眾，也有來查找歷史資料的研究人員。2007年秋天，我曾經來過這里，當時，是去歷史研究部拜訪那里的同行的。此刻，三個舊行李箱剛剛送來，堵在門口，影響通行，外面的人要進來很不方便。他們見我對這幾個行李箱很好奇，就對我說，箱子里裝的是私人檔案材料，是“紀念碑”成立二十年來，外界捐贈的最大一宗。

捐贈者是一對夫婦，姓米申科（Mishchenko），男的名叫列夫（Lev），女的叫斯維特拉娜（Svetlana）。這對夫婦是1930年代上大學時認識的，1941一1945年的戰爭把他倆拆散了。后來列夫被捕，關押在勞改營里。人人都對我說，他倆的愛情故事非常不一般，感人至深。

我打開那個最大的行李箱，不禁一怔，眼前出現了從未見過的景象：里面有好幾千封信，一捆一捆的，整齊緊密地碼放在一起，有用細繩捆的，有用橡皮筋捆的。除了信，還有記事本、日記、文件、照片等。第三個行李箱最小，棕色，膠合板做的，鑲著皮邊，上面有三個金屬鎖，一按啪的一聲就開了。這個箱子里的史料最為珍貴。里面究竟有多少封信，我們也不清楚，或許有兩千封吧，只知道箱子的重量（三十七公斤）。箱子里都是列夫和斯維特拉娜彼此寫的情書，是列夫被囚禁在伯朝拉（Pechora）勞改營時他倆互相寫給對方的。伯朝拉是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勞改營，在蘇聯的極北地區。第1封信是斯維特拉娜寫的，時間是1946年7月，最后一封是列夫寫的，寫于1954年7月。他倆一周至少通信兩次。歷來發現的古拉格囚犯信件，屬這批信數量最多，遠超以往發現的任何信件。但是，這些信件的驚人之處，不僅是量大，而且均未經當局審查、刪改。這些信，都是通過秘密渠道遞送的，有的是從勞改營里偷偷帶出，有的是從外面偷偷送入。幫列夫送信的，都是好心人，特別同情他，有工人，也有官員，他們志愿為他當信使。民間傳說的古拉格故事多極了，其中也有偷偷幫人捎信的。但是誰都沒承想，他倆秘密通信的數量會有這么大。

信，一封封緊緊地塞在箱子里，我得把手指頭插進去才能把第1封信夾出來。這封信是斯維特拉娜寫給列夫的。收信人地址很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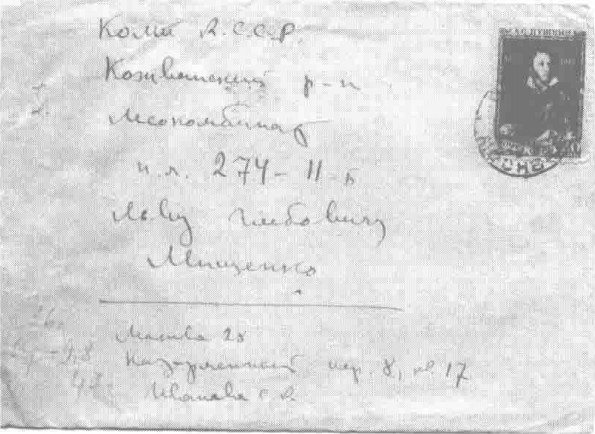
科米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科日瓦地區

木材廠勞改營274-IIb

列夫·格列勃維奇·米申科 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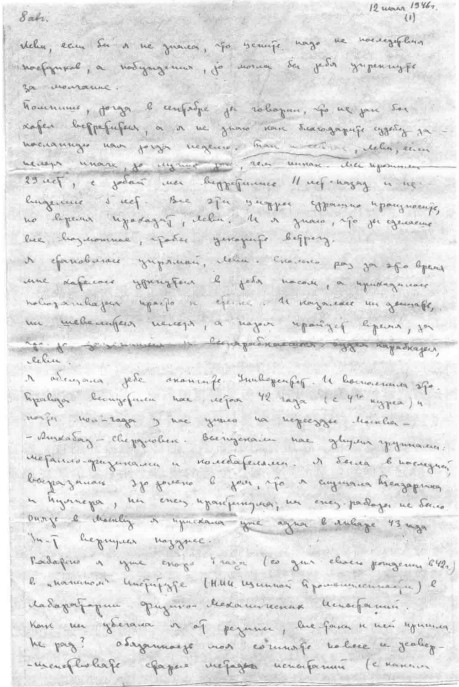
斯維特拉娜的信，紙頁都發黃了，我用手一拿，就碎了。她的蠅頭小字，不太好認。我讀了起來：“見信如晤，不知應該給你寫點兒什么。寫我想你？你心里明知道啊。我覺得我是生活在時間之外，我仿佛在等待著，等待我的人生真正開始的那一天，現在好像只是一個插曲而已。我不論做什么都像只是在打發時間似的。”我又從那同一捆信里抽出另一封，是列夫寫的：“你曾經問過，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還是沒希望才容易活下去。任何希望我都喚不起來，但沒有希望，我心里倒很平靜。”他倆在信里交談，我在傾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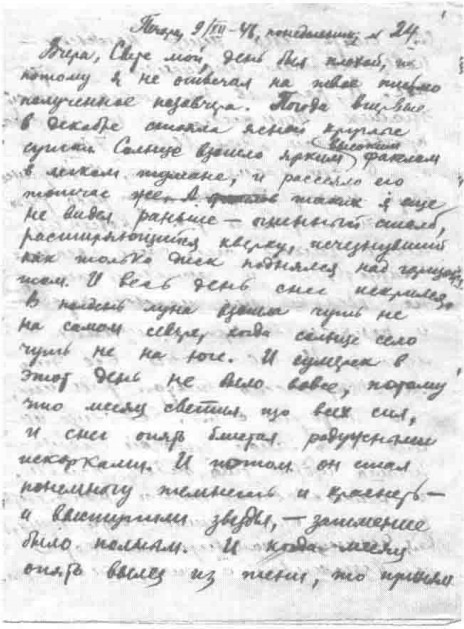
斯維特拉娜寫給列夫的書信信封

我翻閱著這些信，越往下看，心情越激動。列夫的信里寫了勞改營的詳情。古拉格的日常生活終將大白于天下，而對當時古拉格日常生活場景的唯一重要記錄就是這些信件了。當年的囚犯們出版了很多勞改營回憶錄，但都比不上這些信，這些信是在鐵絲網里頭寫成的，卻沒有被當局審查過。列夫的信寫給他唯一的讀者，寫的是親身經歷和感受。這些信，時間跨度許多年，越是后來的信，披露的勞改營情況越多。列夫在勞改營里煎熬著，斯維特拉娜的信是為了給他鼓勁，好讓他有個依靠，讓他有個希望，但是我很快就意識到，她的這些信，字里行間也講述了她自己的心路歷程，她奮力呵護著對他的愛慕，呵護著這愛情的火焰，讓它繼續燃燒而不熄滅。

斯大林的勞改營里關押了大約兩千萬人，大多是男性。他們受盡了非人的折磨。一般來說，囚犯一個月可以寫一封信、收一封信，但是他們的所有通信都要經過當局審查。每一封信，警察都要先看。有警察看，信里就沒法卿卿我我了。一旦判刑十年、八年的，與外界的關系幾乎都斷了，維持不下去：到頭來，囚犯們失去了女友、妻子、丈夫，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列夫和斯維特拉娜是唯一的例外。他們居然還能夠保持通信，甚至還非法幽會過，如此違背古拉格的刑律可是重罪，一旦被發現會受到嚴懲。更不簡單的是，他倆竟然把每一封“抵萬金”的情書都完好地保存了下來，這是他倆愛情故事的記錄啊！



1946年，斯維特拉娜的第1封信



1946年，列夫的第24封信

那個最小的箱子里裝的信，一數竟然有一千三百來封。這些信需要花兩年時間才能打字謄寫完畢。信里隱語很多，不容易破譯。暗語、細情、縮寫比比皆是，弄不清楚這些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這些信件就是本書的文獻基礎。除此之外，我還參閱了其他兩個箱子里的豐富史料，詳盡釆訪了列夫和斯維特拉娜本人，以及他倆的親屬和好友，看了伯朝拉勞改營其他囚犯寫的資料，并且到伯朝拉鎮里轉了轉，釆訪了當地的居民，還查閱了勞改營保存的檔案。

# 一 亂世情緣

莫斯科大學的院子里綠樹成蔭，一大群學生在院子里等著點名，好進去考試，這是入學考試。是列夫先看到斯維特拉娜的，他一眼就看到她了。斯維特拉娜和列夫的一個朋友正站在物理系門口。那朋友招手叫列夫過來，向他介紹斯維特拉娜，說這是他的中學同學。他們寒暄了幾句，這時物理系的門開了。大家聚集到樓梯上，他們也走了過去。樓梯口對著一個大廳，入學考試就在大廳里進行。

那天可不是一見鐘情：他倆都說不是。列夫非常小心，可不敢貿然愛上人家。但是斯維特拉娜已經吸引了他的注意。她中等個兒，苗條的身材，棕色的頭發，高顴骨，尖下頦，一雙湛藍的眼睛，閃爍著憂傷的聰慧。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是全蘇聯最好的物理系，1935年9月，只錄取了六名女生，她是其中之一。列夫和另外三十名男生也被錄取了。斯維特拉娜身穿一件深色的羊毛襯衫，灰色的短裙，腳上穿一雙黑色絨面料的鞋。上中學那會兒，她就是這身打扮。周圍都是男生，斯維特拉娜很顯眼。她說話的聲音非常好聽（后來她成為莫斯科大學合唱團成員），再加上長得漂亮，亭亭玉立，又活潑歡快，所以大家都喜歡她。斯維特拉娜偶爾也和男生有交往。大家都知道她嘴尖舌巧。仰慕她的男生著實不少，可她只對列夫情有獨鐘，覺得他與眾不同，最為可人。列夫個子不高，也沒有運動員的身材，居然比她還矮點兒，不像一般同齡的小伙子那么對自己的英俊有自信。翻看列夫當時的所有照片，穿的總是那件舊襯衣，最上面的紐扣扣上了，卻不戴領帶，這是俄羅斯風格。從外表看，列夫還像個少年，不像成年人。但是列夫長得和顏悅色，藍色的眼睛含著柔情，嘴唇豐滿，像個小姑娘似的。

第一學期，列夫就開始管她叫斯維塔（Sveta）[3](#__3)[1]了。他倆經常見面，上課的時候也坐在一起，在圖書館彼此點頭致意。他倆游走于這些含苞待放的未來的物理學家、工程師之間。大家同在大學食堂吃飯，同在圖書館門口附近的學生俱樂部聚會，有的是來抽口煙，有的只是活動一下身體，聊聊天。

后來，列夫和斯維塔常常跟一群朋友出去看劇、看電影。散場后，列夫陪她走回家，走的路線很浪漫，從普希金廣場沿著花園大道一直走到波克洛夫兵營（Pokrovsky Barracks）。斯維塔的家就在波克洛夫兵營旁邊。這是情侶們晚上散步的地方。盡管1917年以后有些地區的性行為解放了，但在1930年代的學生圈里，談戀愛的風俗還是浪漫的騎士風度占上風。在莫斯科大學，談情說愛十分認真，非常純潔。通常，在晚上，兩人告別朋友們之后，男方開始陪女方走回家，這時候，戀愛就算正式開始了。散步是說悄悄話的好時機，互相給對方背幾句鐘愛的詩句。大家都用背詩來談情說愛，風俗就是這樣。待走到她家門口，吻別的時候到了。這可是一個天賜良機，可以趁機親吻。

列夫知道，喜歡斯維塔的不止他一人。他常看見她和格奧爾基·利亞科夫（就是這位朋友把他介紹給斯維塔的）在克里姆林宮圍墻下面的亞歷山大花園里一起徜徉。列夫有話憋在心里，想問格奧爾基，又不好意思開口：他和斯維塔到底什么關系？但有一天，格奧爾基說：“斯維特拉娜是個可愛的姑娘，但是很聰明，太聰明了。”一聽他這個口氣，列夫就明白了，格奧爾基準是被她的秀外慧中給懾服了。沒過多久，列夫也看出來，斯維塔有時情緒不穩定，心情不好，愛挑別人的刺兒，遇到有人不如自己聰明伶俐，就顯得缺乏耐心。



斯維特拉娜



列夫

漸漸地，列夫和斯維塔的關系越走越近。列夫回憶說，是一種“深切的同情心”把他倆連在一起。七十多年后，列夫坐在家中的客廳里，想起那第一次情感的契合，笑了。他仔細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說：“當時我們不是頭腦一熱就愛上了，而是因為志同道合，彼此之間有一種深刻的、永恒的親和力。”

最后他倆的關系終于發展為戀情：“當時，大家都知道斯維特拉娜是我的女友，因為，別人，我誰都不去找。”有一天，他倆都明白了是在相愛。那是一天下午，他倆在斯維塔家附近散步，那條街叫作軍營胡同，是一個住宅區，非常安靜。斯維塔忽然拉起他的手，說：“咱們往那邊兒走吧，我給你介紹兩個朋友。”于是，他倆去見斯維塔小學時代的好朋友：一個是伊琳娜·克勞澤（Irina Krauze），正在外語學院上學，法語專業；另一個叫亞歷山德拉·切爾諾莫爾迪克[Alelcsandra Chernomordik：昵稱“舒拉”（Shura），也叫“舒爾卡”]，是學醫的。列夫明白，斯維塔把小時候的朋友介紹給他認識，這說明信任他，對他有感情。

不久，列夫接到邀請，到斯維塔家里做客。斯維塔的姓是伊萬諾娃。她家有一套獨門獨戶的房子，兩個大房間，一個廚房。這在斯大林的蘇聯可是前所未聞的奢侈。一般都是一套房子里住好幾家，每家住一個房間，廚房和廁所都是幾家共用。斯維塔和妹妹塔尼婭（Tanya），還有父母，一共四個人合住一個房間。房間里有一張沙發，晚上拉出來就是床，她們姐倆就睡這個沙發床。她哥哥雅羅斯拉夫（Yaloslav），昵稱“亞拉”（Yam），和妻子葉蓮娜（Elena）住另一個房間，屋里有一個大衣柜，還有一個書柜，書柜有玻璃拉門。屋子那邊還放著一架三角鋼琴。全家人都會彈鋼琴。天花板很高，家具古色古香。在這無產階級的首都，伊萬諾娃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島。

斯維塔的父親，亞歷山大·阿列克謝維奇，大高個兒，留著胡子，五十四五歲的樣子，頭發花白了，眼神憂傷而體貼。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1902年在喀山大學上學時就參加了革命運動，被學校開除，被捕入獄，后來又上了圣彼得堡大學物理系，師從俄國杰出化學家謝爾蓋·列別捷夫（Sergei Lebedev）。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們共同研制出合成橡膠。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組織蘇聯橡膠生產，起了主導作用。但是1921年他退黨了，官方說他是健康原因，實際上是他看到布爾什維克專制，感到幻滅了。在接下來的十年里，他兩次出差去西歐，每次時間都很長。1930年他攜全家搬到了莫斯科。當時正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高峰期，蘇聯大張旗鼓地推行工業化。斯大林的第一次大恐怖浪潮正席卷全國，矛頭直指“資產階級專家”。亞歷山大很多老朋友、老同事都被抓了，硬說他們是“間諜”、“破壞分子”，槍斃的槍斃，勞改的勞改。亞歷山大出過國，這可是政治問題，隨時會被揪出來問罪，但他總算活了下來，繼續為蘇聯的工業事業工作，還升為樹脂研究所副所長。在這個知識分子家庭，全家都重視技術，于是孩子長大以后都學理工科：哥哥亞拉上莫斯科機械制造學院，妹妹塔尼婭學的是氣象，斯維塔則進了物理系。

亞歷山大歡迎列夫來家里做客。列夫是學理科的，亞歷山大很高興他來。斯維塔的母親，名叫阿娜斯塔西婭·葉羅菲耶芙娜，不那么問寒問暖的，話也不多。她五十多歲，體態豐滿，慢條斯理的，手有毛病，怕人看見，戴著手套。斯維塔的母親是俄語教師，在莫斯科經濟學院工作，看她舉手投足的樣子，肯定是個嚴厲的老師。她動不動就瞇起眼睛，透過寬邊眼鏡打量列卡起來。有很長時間，列夫很怕她。但是他倆大一這一學年快結束時，發生了一件事，一切都隨著變了樣。有一次上課，斯維塔沒來，就借了列夫的課堂筆記來看。第一次考試前夕，列夫來拿筆記。阿娜斯塔西婭對他說，他的筆記記得非常好。話不多，是個小小的表揚吧，可對列夫來說，這是個意外的驚喜。列夫一聽，她話音這么溫柔，這說明她已接受了自己，她可是斯維塔家的管事的啊。列夫回憶說：“當時，我覺得這等于給我發了通行證似的，可以進她家門啦。于是我來得更勤了，也不再靦腆了。”考完了試，在1936年那個漫長炎熱的夏天，列夫每天晚上都來找斯維塔，帶她去索科爾尼基公園，教她騎自行車。

列夫得到斯維塔家人的接受，這是他倆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夫自己的家人都沒了。他1917年1月21日生于莫斯科，出生沒幾天，世界就天翻地覆：二月革命爆發了，世道一下子全變了，簡直是萬劫不復。他媽媽，名叫瓦連京娜·阿列克謝耶芙娜（Vdentina Alekseevna），是一個外省小官吏的女兒，父母年紀輕輕就都沒了，她是由莫斯科兩個姨媽拉扯大的，后來在莫斯科一所學校當老師時認識了列夫的父親。他爸名叫格列勃·費多羅維奇·米申科（Gleb Fedorovich Mishchenko），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畢業，當時正在鐵道學院學工程學。米申科是個烏克蘭姓。格列勃的父親，名叫費多爾（Fedor），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基輔大學語言學教授，翻譯家，他把很多古希臘文獻譯成了俄文。十月革命后，列夫的父母把家搬到西伯利亞一個小鎮，在托波爾斯克地區，那個鎮名叫博遼佐沃。格列勃當過鐵路工程師，做工程勘探的時候來過這里，所以熟悉這個地方。博遼佐沃這一帶，18世紀以來就是一個流放地，距離布爾什維克政權很遠，又地處相對富裕的農業地區，所以是躲避內戰（1917—1921）的好地方，可以先待在這里，等內戰打完再回去。內戰一打起來，莫斯科全城恐怖，經濟也崩潰了。他們找到了一個農家，租了個房間，全家人和瓦連京娜的姨媽都住在這里。那個農家子女很多。格列勃找到一個工作：當學校老師，兼職做氣象員；瓦連京娜也當老師。列夫是他姨姥（他母親的姨媽）撫養大的，他姨姥名叫莉季婭·康斯坦丁諾芙娜（Lydia Konstantinovna），列夫管她叫“姥姥”。她給列夫講過很多童話故事，還教他背誦基督教的主禱文，列夫一輩子都沒有忘。

1919年秋天，博遼佐沃來了布爾什維克。他們一來就抓人，凡是懷疑給“白軍”做過事的，全都抓了起來，說是“資產階級”人質。白軍是反革命軍隊，內戰時期曾占領過這個地區。有一天，布爾什維克把列夫的父母抓走了。當時，列夫四歲，跟他“姥姥”一起去當地的監獄，探視爸爸媽媽。他爸，格列勃，被關在一個大牢房里，與九個囚犯關在一起。獄卒沒阻攔列夫，放他到牢房里，挨著他爸坐著。獄卒持槍站在門口。列夫問爸爸：“那個叔叔是獵人么？”爸爸答道：“叔叔在保衛咱們呢。”列夫和姥姥在一個單人牢房里見到了媽媽。他去看媽媽看了兩次。最后那次，媽媽給他一碗拌了糖的酸奶，這是用獄中做苦工掙的錢買的。她給他買酸奶吃，他這次來就別有一番“美味”在心頭。

過了不久，姥姥帶列夫去醫院，看到媽媽奄奄一息。媽媽胸口中了槍，很可能是獄卒開槍打的。列夫站在病房門口，忽然一個護士從身邊走過，手里拿一個奇怪的紅色東西，一跳一跳的。列夫看了很害怕，不敢進病房。姥姥叫他進去和母親告別，但他還是在門口站著，沒進去，只望著姥姥走進去，徑直走到床邊，吻了吻媽媽的額頭。

葬禮在鎮上的大教堂里舉行。列夫是和姥姥一起去的。棺材開著，沒蓋蓋兒。他太矮了，夠不著棺材沿，看不到里面媽媽的臉，于是就坐在一個高高的凳子上，往里瞅。但是在棺材后面，他看見一個個彩色圣像的臉上都被涂上了一塊油漆。在燭光中，他認出圣母像，正好在棺材頭的上方。至今他記憶猶新，當時他覺得圣母的臉就像她媽媽的臉一樣。列夫的爸爸被臨時從獄中放出來參加葬禮，有一個獄卒跟著。爸爸出現在身邊。列夫聽見一個女人說：“他是來告別的。”列夫的爸爸在棺材旁邊站了一會兒，就被獄卒帶走了。后來，列夫走到教堂外面的墓地，到媽媽的墳上去看過。新挖出來的土，一杯黑土，周圍都是雪，墳包上有人立了一個木頭的十字架。

幾天以后，列夫的姥姥又帶他來到那個教堂，參加第二個葬禮。這次有十個棺材，一個挨一個擺成一排，擺在圣像前。每個棺材里躺著一個被布爾什維克殺害的人。其中就有列夫的爸爸。他牢房里的難友一定都是同時被槍殺的。他們被埋在哪兒了，現在不得而知。

1921年夏，天氣大旱，俄國農村到處都在鬧饑荒。列夫和姥姥回到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暫時叫停了階級斗爭，暫時不反“資產階級”了。莫斯科劫后余生的中產階級，現在又可以謀個生計，掙口飯吃了。列夫的姥姥在莫斯科的列弗爾托沃區（Lefortovo）當過二十年的助產士，那個區住著很多小商小販。姥姥帶著列夫搬到那里，寄居在一個遠房親戚家里。她祖孫兩人在房間的一角住了一年：屋里掛著簾子，簾子后面放著一張大人床，一個嬰兒床，他倆就住在那兒。姥姥白天出去做零活，給人做護理。1922年，“卡佳姨媽”（AumKatya，瓦連京娜的妹妹）將列夫接到家里。她和第二任丈夫住的房子在格拉諾夫街（Granovsky Street），離克里姆林宮很近。房子不是獨門獨戶那種，而是和鄰居共用廚房和廁所。列夫在那里一直住到1924年，然后搬到媽媽的另一個姨媽住的房子里。媽媽的這個姨媽名叫伊麗莎白·康斯坦丁諾芙娜（Elizaveta Konstantinovna），從前在一個女子高中當校長。她那房子在小尼基塔街（Malaia Nikitskaia Street）。列夫回憶說：“卡佳姨媽差不多天天都來看我們，所以我是在不斷有女性熏陶和照顧的環境中長大的。”

這三個女人自己都沒有孩子，她們的關愛并沒有彌補列夫的喪母之痛，但是在列夫心中培養出對所有女性的尊敬，甚至崇敬。除了她們母親般的愛，列夫還得到他父母三個最親密友人的道義支持和物質援助，他們都定期給姥姥寄錢：列夫的教母是一位醫生，住在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謝爾蓋·勒熱夫金，即“塞爾尤扎叔叔”，他是莫斯科大學的聲學教授；還有尼基塔·梅利尼科夫（NikitaMelhikov），即“尼基塔叔叔”，他是一位老孟什維克[4](#__4)[1]、工程師、教師，精通好幾門外語，列夫管他叫“第二個父親”。

列夫上的，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學校，坐落在大尼基塔街上。這所學校從前是一所女子高中（1918年蘇俄廢除了單一性別的學校）。校舍是一棟19世紀古典風格的樓房，分東西兩翼。列夫來這里上學的時候，學校的風氣仍然保有知識分子的氣質。很多教職員工1917年前已經任教多年了。列夫的德文老師從前是學校的校長；教幼兒班的老師是一位著名的烏克蘭作曲家的表妹；他的俄文老師是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親戚。但是，到了30年代初期，在列夫十多歲的時候，這所學校的課程變了樣，改為技工學校，側重工程學，和莫斯科好幾家工廠掛鉤。工業技術員常來學校講課，講的都是實用科目、怎么做實驗什么的，培養孩子們將來到工廠當學徒。

斯維塔的學校在烏佐夫胡同（Vuzovsky Lane），距離列夫的學校不遠。假設他倆當時遇見了，彼此的印象會怎樣呢？他倆的家庭背景大不相同：列夫來自莫斯科中產階級的舊世界，他的教養受到姥姥的東正教價值觀念的熏陶。而斯維塔呢，她出身于技術知識分子家庭，那是一個革新派的世界。但是，他倆的很多基本價值觀念都相同，志趣也一樣，真是志同道合。拿他們那個年齡來說，他倆都很成熟，嚴肅認真，聰明伶例，能獨立思考，以開放的心態吸收新知識，遇事總愛尋根究底。他倆的世界觀是通過親身經歷自然形成的，不是官方宣傳培養出來的，也不是社會習俗的模子澆鑄出來的。有了這種獨立的精神，日后果然獲益匪淺。斯維塔1949年寫了一封信，回想她十一歲時是什么樣，那時蘇聯學校里反宗教運動正處于高潮：

回想起來，當時我好像比學校里其他孩子更成熟……那個時候，我非常擔心上帝和宗教的問題。我們的鄰居都信教。亞拉常常拿鄰居的小孩尋開心。但是，我挺身而出，幫他們說話，維護宗教自由嘛。上帝的問題，我是解決了。我的結論是：第一，沒有上帝，我們還是理解不了什么永恒啊、創世紀啊這些事情；第二，說不需要上帝，那是因為沒明白上帝的真諦（相信上帝，可能就會需要上帝了）。

列夫和斯維塔，到了他們這個年齡，都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并且責任感極強。斯維塔的這種氣質是伊萬諾娃家的家風培養出來的，在家里，妹妹塔尼婭由她來負責照管，還要做很多家務。列夫是為經濟條件所迫，不得不自己打工掙錢上學，來貼補姥姥微薄的退休金。

1932年，列夫剛剛十五歲，就打工上夜班。修建莫斯科第一條地鐵線（從高爾基公園到索科爾尼基公園）的時候，他也參加了。他的工作是丈量地鐵線長度，要穿街過巷地測量，后來他又加入了挖掘隊。挖掘隊大多是農民工。那年頭，農民工大批涌進莫斯科，為的是躲避家鄉的布爾什維克，要是不來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就會強迫他們加入集體農莊。第二年夏天，列夫聽說了集體化造成的可怕后果。有一次，他在養兔場當清潔工，認識了一個工友，這人剛從餓殍載道的烏克蘭鄉下來到這里。這個人寫詩，詩句非常悲傷，“村里的房子空了，一家家都沒人住了，一具具尸體堆在籬笆后面”。這些詩句感人肺腑，列夫受到強烈震撼。詩的主題駭人聽聞，列夫不以為然。他問那個工人：“為什么你編出這么可怕的場景啊？”那人回答說：“這可不是編的。我老家就是這樣啊，現在正在鬧饑荒。活人連埋死人的勁兒都沒有了。”列夫聽了嚇了一跳。列夫以前從未質疑過蘇維埃政權，也沒有質疑過蘇聯的政策。他是蘇聯共青團員，相信黨。但這位工人的話在他心中播下了懷疑的種子。那年晚些時候，生物老師組織了一趟學生遠足，那人是個布爾什維克積極分子。列夫隨大家來到莫斯科郊外一個集體農莊。那個老師挑了一個棄屋當劇場，叫人上演了一出話劇《斗爭害人蟲》。這個房子原來是村里牧師的家，村里搞集體化的時候把他全家攆出去了。屋子里還有牧師被燒掉的書剩下的殘頁，其中有一本古希臘文圣經。列夫的爺爺會古希臘文，但是蘇維埃政權一來，就派不上用場了。

1935年，列夫上大學那年，他和姥姥（當時八十二歲）住在莫斯科西北部的列寧格勒大街，住的房子是幾家合住的那種，幾家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這套房子里有一個房間是他那古怪的“奧爾加姨媽”（Aunt Olga）[5](#__5)[1]住的，她和她丈夫住在那個屋里。列夫和姥姥住的房間很小、很暗：這邊靠墻放一張單人床，是列夫的床，那邊放一個大衣箱，箱子旁邊放了一把椅子，姥姥身子睡在箱子上，把腳放在椅子上，這么一湊合，箱子和椅子接上就成了姥姥的床。窗前放了一張桌子，列夫床的上方是一個玻璃門柜子，柜里裝著列夫的一整套化學實驗器皿，還有他的書，主要是數學書和物理書，也有幾本俄國古典文學作品。斯維塔來訪時，他倆就坐在列夫的床沿兒上交談。奧爾加姨媽那一雙滴溜溜圓的小眼睛總盯著他倆在走廊里的舉動。她這個人信教，去教堂風雨無阻，卻很不贊成斯維塔來串門，于是她就對列夫明講，說她懷疑他倆有私情。列夫就說：“斯維塔是我大學同學，僅此而已。”但是奧爾加不信，她常常站在列夫門口，偷聽里面有什么動靜。她要抓“證據”。

列夫和斯維塔真正能夠自由的地方是在鄉下。每年夏天，斯維塔全家都住在鮑里斯科沃一個租來的鄉間大宅里。鮑里斯科沃是伊斯特拉河上的一個村落，在莫斯科西北七十公里處。列夫常去拜訪他們，有時是從莫斯科騎自行車去，有時是坐火車去，火車坐到馬尼希諾，下火車再走一小時就到鮑里斯科沃了。列夫和斯維塔常常整天都在樹林里，躺在河岸上，讀詩。等到暮色四合的時候，列夫不得不動身去趕最后一班火車回莫斯科，或者跨上自行車，長途騎回來。

1936年7月31日，列夫坐火車過來。那天熱浪滾滾，他在馬尼希諾下車后開始步行，走得汗流浹背。斯維塔家還在前面，他決定先在鮑里斯科沃附近的河里游一會兒泳。他把衣服脫了，只剩下褲衩，一個猛子扎進水里。可憐他水性不好，雖然盡力靠著岸邊游，無奈河水湍急，把他沖走了，漸漸沉入水中浮不上來。正在這時，列夫瞅見岸上有個漁夫，就大聲向他呼救：“救命啊，要淹死啦！”那漁夫原地不動。列夫又沉了下去，第二次浮上來的時候又大聲呼救，卻又沉入水中。列夫沒勁兒了，自己是救不了自己了。他想，距離斯維塔住的房子這么近，死在這里多么愚蠢！這時，他失去了知覺，昏了過去。蘇醒以后，坐在岸上，發現那個漁夫就在旁邊。列夫上氣不接下氣，光顧喘氣了。救他的那個人，列夫還沒顧得上細看。那人當時正站在他身后，列夫訓斥那個漁夫為什么不跳下去救他。列夫還沒來得及請教那人姓甚名誰，沒來得及好好道謝，人家就走了。列夫和斯維塔一家人待了一天，晚上，列夫動身去火車站。斯維塔和妹妹塔尼婭來送他。前面就是村口了，斯維塔和塔尼婭向他告別，目送他向村里的火車站走去。列夫進了村里，碰巧遇見了救他的那個人。他一眼就認出來了。有個老先生和那人在一塊兒，還有兩個女的。列夫向那人表示感謝，請教尊姓大名。那老先生答道：“我是辛佐夫教授，這是我的女婿，別斯帕洛夫（Bespalov）工程師。這兩位女士，一位是我妻子，一位是他妻子。”列夫再一次向他們道謝，然后走進火車站。火車站里正在播放圣桑的名曲《引子與回旋隨想曲》（Introduction and Rondo Capriccioso）。列夫聽著大衛·奧伊斯特拉赫[100](#__100)[1]優美的小提琴獨奏，深感自己還能活著，實屬不易，激動得不能自已。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比以前更加熱烈，更加生動。他得救了！他愛著斯維特拉娜！他在這音樂聲中聽出了自己的喜悅。

人生有各種各樣的喜悅，但飄忽不定，說沒就沒。1935年，斯大林宣布生活“越來越好，越來越快樂”，將來會買到更多的消費品、伏特加、魚子醬，會有更多的舞廳、更多歡快的電影，讓人民笑口常開，使他們對光輝燦爛的未來繼續充滿信心。建成共產主義，光明的未來就到了。可是，與此同時，斯大林的政治警察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正在制定大逮捕的名單。

1937—1938年的大恐怖時期，至少有一百三十萬人被打成“人民的敵人”，遭到逮捕，其中半數以上后來都被槍斃了。如此精心策劃的大規模謀殺，目的何在，誰都不知道——是因為斯大林疑神疑鬼，看誰都像仇敵，要把潛在的敵人都滅絕，還是要把“社會異己分子”斬盡殺絕。最有可能的是，當時國際局勢緊張，他想，一旦爆發戰爭，那些“不可靠分子”會乘機滋事，不如先下手為強，斬草除根。大恐怖彌漫社會每個角落，殃及生活所有領域，舉國噤聲，道路以目。一夜之間，鄰居、同事、朋友、親戚都可能被扣上“間諜”的大帽子，或被打成“法西斯分子”。

蘇聯物理學界尤其脆弱，原因有兩個：第一，物理學可以用于實戰，對軍事很重要；第二，在意識形態上，物理學界分成兩派。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是意識形態兩派爭論的中心。一派是才華橫溢的年輕研究人員，例如，尤里·魯梅爾（Yury Rumer）和鮑里斯·蓋森（Boris Gessen）。他們擁護愛因斯坦、波爾和海森堡的物理學。另一派是一些老教師，他們譴責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說那是“唯心主義”，與馬列主義“科學”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水火不相容。政治一插進來，意識形態分歧就更嚴重了。唯物主義這一派指控量子力學派“不愛國”（潛臺詞就是“間諜”），因為他們受了西方科學的影響，還到國外去過。1936年8月，列夫和斯維塔馬上就要上大二的時候，蓋森被逮捕了，罪名是參加“反革命恐怖組織”。后來，他被槍斃了。1937年，魯梅爾被莫斯科大學開除了。

官方要求學生提高警惕。學生一旦有家人被捕，對親人必須檢舉揭發，同學當中的共青團團員就斗他，要求學校開除他的大學學籍。其他各系有很多學生都被開除了。物理系開除的沒那么多，物理系學生很抱團。1937年出了一件事，正是因為有大家護著，列夫才沒遭殃。

莫斯科大學全日制學生都得參加軍訓，并加入后備役，戰時就要開赴前線。物理系學生受訓，訓練他們將來當步兵指揮官。軍訓在兩個夏令營地進行，那兒離弗拉基米爾很近。1937年7月，第一個軍訓營的主要教官剛剛升為副團長。這個團都是學生，但不是大學生。這個教官有個愛好，專挑這些物理學精英狠狠訓練，強迫他們先跑二百米，然后再正步走二百米，跑了走，走了跑，沒完沒了，他在那里幸災樂禍地看著。有權有勢就欺負人，列夫可看不下去，非說不可，讓他不吱聲，那是辦不到的。他秉性就是這樣。列夫終于大聲說道：“什么指揮官，都成了白癡！”他聲音很大，就是要讓教官聽見。教官遂向當局舉報列夫。事情捅到了莫斯科軍區師黨委。師黨委下令開除列夫的共青團團籍，罪名是“從事反革命托洛茨基宣傳鼓動，反對工農紅軍的指揮隊伍”。9月份開學，列夫回到莫斯科大學。他擔心此事未完，還會有進一步的后果，于是吁請師黨委收回成命，不要開除他的團籍。他被叫到軍區總部，師黨委聽取了他對事情的陳述，取消了開除，處分變成“嚴厲警告”，說他的“行為有違共青團員稱號”。列夫終于逃脫了懲罰，很幸運。他后來得知，多虧物理系三位朋友挺身而出，勇敢地向師黨委寫了一封信為他開脫，并在信上簽上了各自的名字。系里的同學都非常喜歡列夫，所以他們甘愿冒這個險為列夫辯護。他們出來為列夫說話，容易引火燒身，有可能自己反倒被抓起來，因為在當局眼中，三人已經構成“組織”了。

就是因為這件事，列夫和斯維塔才最終走到一起。他們大二這一年關系有點兒冷淡，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面了。是斯維塔先了斷關系，她突然就不聯系朋友中的同學了。因為什么，列夫也不知道。從夏天開始，他倆本來是天天見面的，斯維塔還向列夫要了照片呢。那時，很多朋友都在辦婚禮。列夫一定也想和她馬上成婚吧。就在這時，斯維塔躲開了，連個招呼都沒打。回想這個時期，斯維塔說都是因為她當時“心情不好”：都怪這個抑郁癥，此后多年未愈，一直折磨著她。后來，斯維塔寫信告訴列夫說：“我多次責備自己，真不該壞了咱倆的好事，給你造成很多痛苦，我當時竟然做出那樣的傻事，真是莫名其妙。”

斯維塔一看列夫遇到麻煩，立刻回到他身邊。接下來的三年里，他倆形影不離了。早晨，斯維塔上學的路上會有列夫來接她。斯維塔放學時，列夫會在門口等她，帶她一起去逛列寧格勒大街，給她做飯，或者和她一塊兒去看劇、看電影，然后再陪她走回家。在他倆的關系中，詩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他倆常常一起讀詩，互相寄贈詩，介紹沒讀過的詩。阿赫瑪托娃和勃洛克是斯維塔鐘愛的詩人，但她也喜歡葉蓮娜·雷溫娜（Elena Ryvina）的詩。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街上漫步的時候，她就給列夫背誦了雷溫娜的詩：

你香煙的火光先暗下去，又亮起來。

我們沿著羅西[6](#__6)[1]大街走著，

路燈白白地亮著。

難得一見，時間又太短暫，

好像剛一邁步，一眨眼，

又要說再見，

親愛的建筑師，

你這條街，怎么這么短？

有時，列夫工作到很晚，沒空來看她，于是夜里就來她家門前走一走，有一次，留下了一張便條：

斯維塔！我來看你了，看你怎么樣，別忘了明天是29號，在我們的老地方見啊。今天我就不闖進你家了，因為天色已晚：十一點半。你家有兩個窗戶已經熄燈了。還有兩個窗戶，燈光也調暗了。我來會把大家吵醒的，嚇他們一跳。有空來找我啊。向你媽媽問好，向塔尼婭問好。

1940年1月，列夫的姥姥去世了。在瓦甘卡公墓下葬那天，斯維塔陪伴在列夫身旁。

2月份，列夫被聘為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FIAN）的技術助理。他還沒畢業，在上大學最后一年，但物理系的一個朋友納烏姆·格里高洛夫（Naum Grigorov）剛進這個研究所就向所里推薦他。進研究所是個好機會，可以馬上開始做科研了。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是用彼得·列別捷夫（Pyotr Lebedev）的名字命名的。列別捷夫是俄國物理學家。物體反射光，也吸收光。這光線所施加的壓力，是他最先測量出來的。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列夫參與的宇宙射線項目，也是一個最前沿的研究課題。列夫白天學習，晚上常常在實驗室上晚班。斯維塔常在圖書館待到很晚，然后步行三公里的路，從物理系走到米烏斯克廣場，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就坐落于此。她總是坐在院子里一個長凳上等列夫，列夫一般是在八點鐘左右出現，然后陪她一起走到她家。

有一次在實驗室，列夫太累了，不知不覺睡著了，過了九點鐘才醒來。斯維塔還坐在長凳上等他呢。列夫告訴她剛才睡著了，她笑了起來。

那年夏天，列夫去高加索，上厄爾布魯士山（Mount Elbrus）作科學考察。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在山上有一個研究基地。這個基地距離宇宙射線進入地球大氣層的進入點比較近。列夫他們小組可以在這里近距離研究宇宙射線的效應。列夫在基地待了三個月。他給斯維塔寫信說：“昨天我們爬上山來，很快到達我們住的地方。我感覺好極了，食欲大增，特能吃，有許多難忘的經歷。”與此同時，大學放暑假，斯維塔暑假期間在列寧圖書館用功。當時列寧圖書館正在擴建，是一座現代混凝土大樓，離克里姆林宮不遠。她給列夫寫信說：“知道么，現在這個圖書館前面，有一個漂亮的廣場，種滿了灌木叢和花。我生日，誰給我獻花呀？”列夫定于9月1日從高加索回來，那時離斯維塔二十三歲生日還有十天。她每年過生日，列夫都給她送花。過生日之前這些天，她只好將就著看信了：

親愛的列夫：

我今天一到家首先就想問，有沒有我的信。但是大家借你的話題拿我尋開心。所以，我就假裝等的是伊琳娜的明信片。可是，塔尼婭故意加重語氣說，沒有伊琳娜的明信片啊。我一聽就明白了，肯定是你來了什么東西，于是我就跟著她，從一個房間跟到另一個房間（我們家房間的門還是都敞開著，所以各個房間隨便逛，愛逛多久，就逛多久），懇求她把你的信給我。后來還是媽媽可憐我，把信給我了。

1940年8月3日



1940年，列夫在厄爾布魯士山上

斯維塔給列夫寫信，告訴他自己的近況。圖書館邀請斯維塔來館里工作，是一份固定工作，不是臨時工。

他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我熟悉各個房間的布局，熟悉房間里的書柜、書架……期刊我也了如指掌。因為我懂羅馬字母，所以任何期刊的月份、年份、期刊名、價格，我都能看明白，任何語言的期刊都沒問題，除了中文……我的腦袋，雖然不敢說是最優秀的，但肯定不是徒有其表……薇拉·伊萬諾芙娜說，一年以后，就讓我當組長。如果想在圖書館干一輩子，那么現在就是圖書館職業生涯的好開端啦。但我不想一輩子都待在那里，所以……星期一我就告訴他們：我不干。

列夫，別擔心我的身體。我怎么告訴過你來著？有什么身體就有什么心情，還是有什么心情就有什么身體？不管怎么說，從我的字體，你就可以看出來，我很平靜，無憂無慮，也就是說，我什么病都沒有，好人兒一個。媽媽說，我有肺結核。她的根據是我體重減輕了。但是，你知道，我吃的那些東西，體重不減輕才怪呢，我什么別的癥狀都沒有。

1941年6月，列夫本來定于要和研究所的同事第二次上厄爾布魯士山作考察的。6月22日星期天上午，他們考察隊都在所里，正在為出發做最后的準備。列夫興致勃勃，心情特別好。他剛剛通過大學最后的考試。系里給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委員會告訴他，研究所宇宙射線項目的研究，只選了四個學生，他是其中之一。這時，斯維塔已經回到物理系，落了一年的課程，還得補習一年才能畢業。這太好了，他倆可以在一起，會很快樂。還剩下最后幾件設備要帶走，列夫和同事正在打包，忽然隊長進來了，說：“咱們哪兒也別去了。聽收音機廣播了么？”那天中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有個特別廣播講話，他用顫抖的聲音宣布：“今天凌晨四點，德國軍隊進犯我國，攻打我國很多邊境地區，轟炸我國城市：日托米爾（Zhitomir，在烏克蘭中西部）、基輔、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克里米亞半島西南岸海港城市）、考納斯（Kaunas，立陶宛中南部城市），還有其他地方。”

德軍攻勢凌厲，勢如破竹，蘇軍猝不及防，毫無準備。斯大林事先已經接到情報，德國準備入侵蘇聯，但他沒理睬。蘇軍防線全線崩潰，亂成一團。德軍入侵部隊，打前鋒的是十九個裝甲師、十五個摩托化步兵師。德軍沒費吹灰之力就把蘇軍打得落花流水。開戰的第一天上午，蘇聯空軍就損失了一千二百多架飛機，大多是還在地面停機坪趴著就被德軍轟炸機炸毀了。在幾個小時之內，德軍特種部隊就已經深人到蘇聯內地。他們切斷電話線，占領橋梁，為主攻戰役做準備。

那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共青團委在大禮堂召開會議，一致通過決議，動員全體學生保衛祖國。人人都想報名。到了6月底，有一千多名師生報名參加了第八志愿炮兵師，其中有五十來個人是物理系的。列夫即是其中之一。7月6日，他在集合點給斯維塔家寫信說：“眼下這里很亂，前景如何，很難說。只有一點比較清楚，我們會在這兒住，在這兒學習，等到征兵局命令下來，叫我們去服兵役，那時候才能轉移。”

戰爭爆發，列夫感到非常震驚。最初幾天，他無法設想戰爭會造成什么后果。他的研究、他在莫斯科的生活、他和斯維塔的關系，一切都說不定了。他一個勁兒地喃喃自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戰爭來了。”

雖然列夫自愿報名上前線，但是他很擔憂，指揮官不好干，責任重大，有點兒不敢當。由于斯大林實行腥風血雨的恐怖政策，大批蘇軍軍官被害。眼下，軍官缺得要命，像列夫這樣的新手居然被招去帶兵，叫他們率領士兵沖鋒陷陣。列夫只受過兩年軍訓就升了少尉。這意味著，有可能叫他去帶一個排的兵力，管三十個人，但是他心里沒底，對自己的戰術能力一點兒信心都沒有。最終分派下來，是讓他去指揮一個后勤供給單位，人數較少，一共有六個學生、兩個大學里的人，這兩個人年紀比學生稍大一點兒。和學生在一個連隊，他心情好多了，大家都和他一樣沒有經驗。他想，如果自己犯了什么錯，大家更容易原諒他。如果他管的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士兵，就不會那么寬容他了。

列夫這個連隊，任務就是把莫斯科倉庫里的給養運到前線，交給通訊營。他的麾下有兩個卡車司機，兩個力工，一個廚師，一個會計，一個倉庫管理員，大家都直接聽他調遣。他們開車向前線駛去，沿途看到潰亂的場景。這些景象戳穿了蘇聯報紙宣傳的謊言。莫斯科官方報道，說什么蘇聯軍隊擊退了德軍，但是列夫看到的卻是蘇軍節節敗退，落荒而逃：樹林里到處都是當兵的和老百姓，逃難的人群往東邊跑，直奔莫斯科而去，路上擠得水泄不通。死的人成千上萬。7月13日，列夫到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森林里，德軍已把斯摩棱斯克團團包圍了。

親愛的斯維塔，我們現在住在樹林里，我做的和家務活兒差不多。我的任務就是要讓這兒的每一個人都吃上飯，包括那些最高級別的軍官。這些官兒要吃什么不好好說，總是大喊大叫地要……在這兒也有好處，去倉庫的時候就相對自由了。斯維塔，你寫信，絕對寄不到這里，誰都不知道明天會在哪里。要想得到你的音訊，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我們出車送貨的時候，我來看你。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來哦。

去莫斯科時，列夫就將前線戰士的書信捎給他們的親屬；返回前線時，則為戰士們帶去家書。他去軍隊倉庫的時候，也會抽空去看斯維塔和她的家人。7月份去時沒見著斯維塔，只見到她父母。她父母給他“又拿吃的，又拿喝的”。列夫曾給斯維塔留下一封信，信里提到了她父母的盛情。9月初，他又去了一次，不料，斯維塔已經回學校去了。對列夫來說，和她家人保持聯系與和她本人在一起同樣重要，因為這使他有歸屬感。后來有一次去，斯維塔的父親給他一張紙，上面寫的是蘇聯各地四個親朋好友的地址：萬一他上前線，斯維塔全家被疏散到外地，不在莫斯科了，他可以向這些親友求助，幫助尋找斯維塔和她家人。雖然斯維塔父親沒有明說，但看著紙上寫的這些，顯然，斯維塔的父親是把他當兒子看待了。

莫斯科還能去一次。列夫知道，要想見斯維塔，這是最后的機會了，因為給養倉庫那邊已經通知他了，不會再給通訊營發給養了。列夫對司機說了聲“待會兒見”，就轉身跑出倉庫，向斯維塔家奔去。斯維塔很可能不在家，因為正是中午，但是他還是跑了過去，誰在就向誰告別。或許，斯維塔的媽媽在家，或者她妹妹在家吧。列夫敲了敲門。開門的是斯維塔的媽媽，阿娜斯塔西婭。列夫走進門廳走廊，說他在莫斯科只能待幾個小時就要上前線去了，他是來道謝的，也是來告別的。列夫不知道是應該和她吻別呢，還是不應該吻別。斯維塔的媽媽待人從來不是熱情得很，情感不怎么外露。列夫鞠了一躬，轉身向門口走去。但是，阿娜斯塔西婭叫住了他，說：“等等，讓我吻吻你。”她擁抱了列夫。列夫吻了一下她的手，就走了。

# 二 從納粹集中營到蘇聯勞改營

列夫坐上卡車，駛出了莫斯科。一共三輛車，車上裝著給養，現在給“克拉斯諾普列斯年斯克志愿師”（Krasnopresnenskaia Volunteer Division）運去。幾天前，列夫離隊外出時，這個師還占領著維亞濟馬（Viazma）呢。維亞濟馬這個地方，東有莫斯科，西有斯摩棱斯克，它在這兩地中間。列夫歸隊之后，維亞濟馬已經失守了。德軍第三、第四裝甲集團軍南北夾攻，飛機、坦克、大炮鋪天蓋地而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鉗形包圍了維亞濟馬。蘇軍猝不及防，一哄而散，躲進森林里。沒有無線電通訊，列夫所屬的那個師去向不明，他想歸隊也無能為力。沒法打聽，誰都不知道情況究竟如何，到處亂成一團。

列夫的部下開著這三輛卡車，向維亞濟馬方向駛去，希望能找到師部。天漸漸黑下來了，他們又沒有地圖。有一輛卡車壞了，動彈不了，列夫只好下車步行。森林茂密，走在林中小道上，列夫聽見前邊響起了槍炮聲。凌晨時分，忽見前邊有個村子。他那個師的殘部正與三輛德軍坦克激戰，槍炮聲響成一片。這時，那三輛德軍坦克從森林里鉆出來，開到路上來了。不一會兒，蘇軍炮兵扔下大炮，落荒而逃（炮彈打光了）。坦克慢悠悠地往前開去，一進村就用機槍掃射民房。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列夫正好在莊稼地里，只見坦克迎面開來，向身后的村子駛去。他急忙趴在地上，等坦克從身邊轟隆隆駛過，起身跑進森林里。

這時他才聞到科隆香水味：原來，一顆子彈打碎了上衣口袋里的科隆香水瓶。他隨身帶的這瓶香水是消毒用的，輕傷可以用來消毒殺菌。謝天謝地，他沒傷著。

列夫走進密林深處，只見林中有好幾百名蘇軍士兵，都是打散了掉隊的，一個個穿行在樹林里，朝同一個方向走去。列夫茫然地走著，也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他身上只有一支手槍，一把鐵鍬，背上背著一個背包。白天，他怕被德軍發現，就趴在地上，身上蒙著樹葉。到了夜里，他就往東邊走，也許是東邊吧，希望能遇到蘇軍。

一連走了三個晚上，天快亮了，這天是10月3日。列夫忽然發現，前面有個村子，可是這個村子已經被德國人占了。天一黑，他就溜走了，不敢靠近，退回到森林里，挖了一個長長的坑，躺在里面，上面蓋上樹枝偽裝起來，一會兒就睡著了。突然間一激靈，驚醒過來，感覺膝蓋下面一陣劇痛。透過樹枝的縫隙往外一看，只見一個德國兵，端著步槍。說時遲，那時快，列夫也沒多想，掏出手槍就給那人一槍。突然他后腦勺重重挨了一擊。列夫以為只有一個德國兵呢，定睛一看，原來有兩個：還有一個剛才正在用刺刀尖兒輕輕戳他，看他是死了還是活著，不料列夫舉手就是一槍，那德國兵立刻就給他腦袋上來了一下子。德國兵下了列夫的手槍，把他押回村里來。

被俘的不僅他一個人。10月份的頭一個星期，數萬名蘇軍中了埋伏，陷入德軍包圍，束手就擒。列夫被押到一個臨時戰俘營，叫“杜拉格-127”。“杜拉格”是德文Dulag的音譯[7](#__7)[1]。杜拉格臨時集中營在斯摩棱斯克郊外，原先是一個蘇軍倉庫，房子都沒有暖氣。現在關進來好幾千名蘇軍俘虜，擠得轉不過身來。列夫也和其他戰俘一樣，每天只給二百克面包。連凍帶餓，死了好幾百人，也有的是得了傷寒病死的。11月份開始，爆發了傷寒。疫病傳染快，沒幾天就病倒了一大片。但是，列夫總算活了下來。

12月初，從杜拉格-127俘虜營轉出來一撥俘虜，共二十人，轉到了卡廷（Katyn）[8](#__8)[1]附近一所特別監獄。列夫也在其中。這一撥人都是從莫斯科來的，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多是科學家、工程師。關他們的那座房子，列夫一看，估計戰前是個學校，也有可能是個小醫院。走廊兩邊各有四個大房間，每個房間里關了四十來個人，走廊頭上還有一個大房間，那是看守們住的。俘虜的待遇很不錯：有肉，有湯，還有面包，干活兒也不算累。過了三個星期，列夫和其他莫斯科難友發現，又來了幾個西裝革履的俄國人，一個個喝著伏特加。這酒是看守給他們的。有一次，其中有一個喝得醉醺醺的，酒后吐了真言，原來他們受了間諜培訓，是讓他們來當間諜的。這些人剛從蘇聯前線回來，因為工作有成，現在正受到嘉獎。幾天之后，他們動身去往卡廷了。

沒過幾天，列夫和六個莫斯科人被押到卡廷那所間諜學校。一個德軍上尉會說俄語，說是要把他們培養成間諜，再把他們派回莫斯科，給德國人收集情報。那德國人說，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免于一死，否則關在“杜拉格-127”俘虜營里，必死無疑。如果不從，就把他們送回俘虜營去！列夫暗自下定了決心，絕不為納粹做事，但他害怕，不敢在其他俘虜面前說，弄不好就會說他搞反德宣傳，懲罰必將更加嚴厲。列夫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學德語。于是，他用德語對那個上尉說：“Ich kann diese Aufgabe nicht erfullen.”（這個任務，我完成不了。）那德國人問，為什么完成不了，列夫答道：“Daserkl ich reichnachher.”（以后我再解釋。）

那個德軍上尉把他帶到另一間屋里。列夫用俄語說明個中原委：“我是俄軍軍官，不能干不利于俄軍的事，不能背叛我的同志。”那個上尉一言未發，又把列夫押回到囚室。列夫發現，囚室里還有三個人，也都是拒絕充當間諜的。如果第一個表態的是列夫，說不定德國人會說他鼓動反德。

這四個拒不合作者被押上一輛卡車。這是個敞篷車，車斗上沒有篷。車開上了公路，向斯摩棱斯克方向駛去。一個德軍看守背朝著司機坐著，一路上不停地擺弄他那支步槍。卡車拐進了森林。列夫想，一會兒要被槍斃了吧。他后來回憶說：“車開得很快，林中小道很窄。我當時尋思，他們一定是拉我們去上刑場，要槍斃我們吧。我就想，面對行刑隊，我應該怎樣表現呢？我會很鎮定么？先自殺豈不是更好？可以跳出卡車，一頭撞到樹上就行了，如果那個當兵的開了槍，那就更好了。”列夫躍躍欲試，準備跳車。可就在這個時候，列夫看到，樹林那邊有一個棚子，棚子里整整齊齊堆著大鐵桶，是汽油桶：車速慢了下來，原來是來加油的啊，并不是來槍斃他們的。那德軍上尉說的狠話果真不虛，他們四個人又被拉回到“杜拉格-127”俘虜營來了。俘虜營里的其他蘇聯囚犯，一定知道他們是從那個間諜學校回來的了，要不怎么總是不停地責罵他們呢。他們四人很抱團，互相保護，反駁那些無理的指控。

過了幾個星期之后，轉眼到了1942年2月，列夫連同一群軍官被轉到德國普魯士一個戰俘營。那個地方是一個溫泉勝地，名叫奧德河上的符騰堡（Fiirstenberg-am-Oder），離柏林八十公里。因為他們是從“杜拉格-127”來的，是傷寒病疫區，所以一來就把他們關到一個木棚子里。進去沒幾天，就有六個人得傷寒病死了。除了遭到隔離之外，這些軍官的待遇還算不錯。這個營區的條件，整體來說也很好。列夫被集中營的看守長和另外兩個軍官提審過，問他為什么德語講得這么好，又問他是不是猶太人。他們說列夫的同志都說他是。不得已，列夫背起了基督教的主禱文，他們一聽，這才相信了他不是猶太人。

4月份，列夫連同幾個蘇聯軍官一起，被送到柏林郊區一處“培訓營”（Ausbildimgslager）培訓。所謂“培訓”，其實是向他們灌輸納粹的意識形態，歐洲的德意志新秩序云云，以使他們先掌握這些“思想”，回去以后傳達給其他集中營里的蘇聯戰俘。納粹找來戰前逃離俄國的白俄給他們做宣講，這些白俄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一連聽了六個星期，不聽不行。到了5月份，這些受過“培訓”的軍官就分配到各個營區去了。列夫被編入一個勞工隊。這個勞工隊隸屬于一個德國兵工廠，名叫科普與加貝蘭兵工廠（Kopp and Gaberland munitions factory），廠址在德國奧沙茨（Oschatz）。

奧沙茨是一個龐大工業區的中心，這個工業區囊括一系列主體集中營（德文Stammlager，簡稱Stalag，意思是主體集中營）：西起萊比錫，東到德累斯頓，這一大片區域內的戰俘營都歸它管。列夫先是被分配到一個軍事審查單位當翻譯，8月份又轉到萊比錫一家工廠下屬的勞工隊。那工廠隸屬于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Hugo Schneider Aktiengesellschaft，德文縮寫為HASAG），這家公司是一個巨大的聯合企業，下面有多家兵工廠，為德國陸軍和空軍生產軍火。到了1942年夏天，這家公司轄下的集中營有好幾個，囚犯有一萬五千名之眾，哪國人都有，種族也不一樣（猶太人、波蘭人、俄國人、克羅地亞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法國人）。這些集中營分為兩大營區，一個叫“俄羅斯”營區，一個叫“法國”營區。列夫被分在法國營區，一個人住在一個儲藏室里。他被派給一個捷克人當翻譯。那捷克人名叫愛德華·赫拉迪克（Eduard Hladik）。德國人把這個捷克人派到這里來，為的是戰俘們打架的時候要他來拉架，幫大家擺平，解決糾紛。赫拉迪克，雖然母親是德國人，可他自認是捷克人。1938年德國吞并捷克之后，德國人征兵就把他征來當看守，讓他看管公司下屬各個營區的戰俘。赫拉迪克很同情戰俘們的遭遇。把這些戰俘押來做苦工，逼他們為德國勝利出力，卻又這么虐待，赫拉迪克覺得實在不合情理。在萊比錫，每當列夫隨同赫拉迪克上街的時候，作為囚犯，列夫不能在人行道上和赫拉迪克同行，他必須在馬路牙子外面的排水溝里走。如果有行人辱罵列夫，赫拉迪克總是替列夫說話：“罵人算什么能耐，人家又不能回嘴！”

赫拉迪克看出來，列夫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列夫的為人頗得主管人員的好感：或許是他心地坦誠吧，也許只是因為他會說德語，這些德國主管，聽了比較舒坦。這位捷克人把列夫當朋友看待，給他德國報紙看。按規定，報紙是不許給戰俘看的，因為報紙會精確報道戰況，報紙也不像集中營宣傳小報那樣侮辱斯拉夫人，說斯拉夫人是“亞人類”。赫拉迪克借口要帶列夫到營區外給他消毒，就把列夫帶出來，居然把他領到朋友家做客去了。他這朋友名叫埃里克·若德爾（EHcR6dd），是社會黨人，信仰社會主義，會說一點俄語。他有一臺收音機，經常收聽蘇聯廣播。偷聽蘇聯廣播，這可太危險啦，因為若德爾這層樓的下面一層就住著一個德國人，此人當過納粹沖鋒隊（Sturmabteilung，簡稱SA）的頭目。若德爾全家以上賓之禮款待列夫。列夫后來回憶說：“桌上擺滿了各種山珍海味，我們暢談很久……然后埃里克就打開收音機，我來聽莫斯科的‘最新報道’，收聽蘇聯新聞局發布的最新戰況簡報。節目的內容，我現在記不清了，但是，說來好笑，有一句話，我倒是記得清清楚楚：‘格魯吉亞釆的茶葉都收上來了。’”

后來，德國人懷疑上了赫拉迪克。有個看守檢舉了他，說他有反德行為。赫拉迪克被傳訊，納粹對他嚴加審問，后來把他送到挪威前線去了。列夫不想再給別人當翻譯了，就向集中營當局申請解職，理由是他德文水平不夠，翻譯得不準確：“我又說，宣傳工作，我也不勝任，因為我嘴笨，說服不了人家。我只是個搞自然科學的。”11月份，列夫被送回奧沙茨“科普與加貝蘭兵工廠”的勞工隊。

那年冬天，奧沙茨的情況急轉直下。干活兒時間延長了。囚犯們筋疲力盡，實在干不動了，看守就大打出手，硬逼著他們繼續干。1943年頭幾個月，勞工隊新來了一大批戰俘，大多是烏克蘭人。烏克蘭現在是德國占領區了。1930年代，斯大林在烏克蘭實行血腥的恐怖統治，大饑荒餓死很多人，當地人民對蘇維埃制度非常反感。這批戰俘到來之后，集中營管得不那么嚴了。德國人是想來收編，把這些戰俘編入“俄羅斯解放軍”。這個“俄羅斯解放軍”是一支反蘇武裝，當時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正在籌建這個部隊。弗拉索夫原是蘇聯紅軍一名將領，1942年7月被德軍俘虜，后來他說服納粹，任命他來領導一個解放運動，目的是掃除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奧沙茨有一群弗拉索夫擁護者，負責招兵。這些人大多是戰前逃到國外的白俄。列夫回憶說，他們身穿的“軍裝不知是從哪兒弄來的，但肯定不是德軍軍服”。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成員以前曾經在蘇聯軍隊里當過下級軍官。這些人為數不多。列夫覺得，這些軍官之所以加入俄羅斯解放軍，主要是為了避難。戰俘集中營慘烈異常，蘇聯戰俘“最受虐待，比任何別國的戰俘都更加無助，更加任人宰割。加入了俄羅斯解放軍，就能逃出集中營了，就不遭那份罪了”。

德國人和弗拉索夫征兵人員三番五次召見列夫，逼他參加這個軍隊，讓他進來當軍官。列夫每次都不肯就范。德國人起了疑心，盤問他在兵工廠集中營當翻譯期間都干了什么事。有一次提審，中途抽煙休息時，給德國人當翻譯的那個人，在走廊里把列夫拉到一旁，給他通風報信，說弗拉索夫他們招不到兵員，德國人懷疑都是列夫從中作梗，壞了他們的事：集中營里，唯獨列夫所在的那個勞工隊最不合作，連一個志愿兵都沒給弗拉索夫軍隊輸送過來。在那個勞工隊里，列夫是唯一的蘇軍軍官，他自然就成了懷疑對象。

列夫意識到，必須盡快逃走。他隊里另外三人也都想逃走。于是大家決定6月份出逃，因為到了6月份，莊稼快熟了，可以一路吃到波蘭。波蘭離這里一百五十公里。他們算計著，波蘭的老百姓會同情他們，給他們飯吃。他們的計劃是加入白俄羅斯的游擊隊，最終回到蘇聯去。他們積攢干面包、糖，準備路上充饑用。列夫做了一個指南針。有一個德國看守，平時愛和列夫聊天，講他家人啦，周末都去哪兒玩啦，等等。列夫向他借來一張地圖，照著畫了一份。他們甚至想法弄到了一些藥品。為了讓德國兵同意他去一趟營區的衛生所，列夫故意把手指劃破了。衛生所的大夫是一個俄國戰俘。列夫請求他給點兒消毒水、阿司匹林、繃帶。那位大夫什么也沒問，馬上就給了。

1943年6月22日夜間，正值德國入侵兩周年，這幾個囚犯動身出逃。營房的窗戶，他們事先拆掉了一部分。列夫早在車間里把兩塊鋼片磨得飛快。這會兒，他們躡手躡腳地從窗戶里爬出來，又爬上院墻，拿出鋼片，把墻頭上的鐵絲網切開一個口子，然后輕身一跳，落在了集中營圍墻外的田地里，乘著夜色，一溜煙跑進了樹林里。四個人預料，德國人一定會向東搜索，于是他們就朝北面走。他們夜間走，白天藏起來不動。他們帶的地圖太簡單，原圖是一本小學地理書上的，所以不得不一邊看著路標，一邊辨認路線。走到易北河，他們就沿河往東走。列夫害怕極了，擔心游不到對岸，不敢下水。于是，繞過德累斯頓城南，一直往東走，朝波蘭方向走去。列夫后來回想當時的情景：“當時我們帶了干糧，但沒過多久，我們拿定主意，干糧要留著，暫時不吃，先從農民家戶外地窖里偷點兒吃的充饑……起初我覺得這樣做不對，但后來還是同意了。”這四個人在路上走了三個星期，眼看就要到格爾利茨（Gddkz）了，不料，卻在波蘭邊界被兩個德國兵逮住了。他們發現路上有兩個德國兵，騎著自行車向他們這邊騎過來，心想，這兩個德國兵身上肯定會帶槍，于是大家翻身跳進路邊的溝里。可是，那兩個德國兵用手電一照，把他們幾個給照出來。列夫回憶道：“白走了這么遠，就這么被抓住，真是愚蠢。那兩個德國兵根本沒帶槍。”

假設列夫走到波蘭，再假設他也穿過德國防線，輾轉回到莫斯科，那么，他會看到什么景象呢？列夫想象不出來。蘇聯的形勢會怎樣，是否還能再見到斯維塔和她家人呢，見到的可能性有多大？這些，列夫都不得而知。自從他被德國人抓住那一刻起，就沒辦法收到俄國那邊真實可靠的消息了。到了奧沙茨，德國人給囚犯們發筆、發信紙，可是大家只能給德國占領區的人寫信。列夫給布拉格寫了一封信。有個獄中的難友失蹤了，列夫給他妻子寫了一封信，問她可有丈夫的消息。那人的妻子給列夫回了信，甚至還給他寄來了一個包裹，但是卻說，丈夫的下落，她完全打聽不到，或許列夫比她渠道多，更能打聽出來吧。

斯維塔這時也是兩眼一抹黑，列夫音訊杳然。1941年9月底那幾天，列夫沒了蹤影。從此斯維塔再未收到列夫的消息。當時一切都在未定之數。誰都不知道莫斯科能不能捱過這場浩劫。7月以來，全市遭到德國飛機密集轟炸。防空警報，一天拉響好幾次。發電站被炸了，住宅的供電、供暖都停了，只剩下燃燒的大樓把夜空照得通明。人們住在地下掩體里。死者成千上萬，確切人數誰都說不清。10月1日，斯大林下令政府疏散到伏爾加河畔的古比雪夫（Kuibyshev）。轟炸越來越猛烈，莫斯科全城風聲鶴唳，驚恐萬狀。所有商店門口都排起了長隊：為搶購食品打得頭破血流的屢見不鮮。盜賊蜂起，搶劫案件此起彼伏，大批抓人也鎮不住了。10月16日，消息終于傳到莫斯科，德軍突破蘇軍防線，占領了維亞濟馬。火車站一幕幕更是慘不忍睹，大批人群爭先恐后地往火車上擠，凡是往東開的火車，有車就上。人們發現工廠的廠長書記之類早已逃之夭夭，不禁破口大罵，說這些蘇共黨員不是好東西。工人們和警察打了起來。一家家都收拾了家當，帶著大包小裹，能坐得起什么車就上什么車，只要能出城就行。出租車司機漫天要價，莫斯科到喀山，張嘴就要兩萬盧布。

莫斯科大學是10月份撤離的。斯維塔和家人一起上路。火車上有一個學生，他就是安德烈·薩哈羅夫[9](#__9)[1]。他比列夫和斯維塔晚一年考上物理系，由于斯維塔有一段時間沒能上學，留級一年，現在和斯維塔同班了。大家落腳的第一站是穆羅姆，這個外省的古城在莫斯科東邊，距莫斯科三百公里。薩哈羅夫寄居在城里一戶人家里。這家只有母女兩人，她們乘戰亂之機，發了國難財：那女兒在商店上班，大白天就從店里往外偷糖，那個當媽的夜里就陪侍大兵，“一個接一個”。全城到處都是傷兵，都在等待疏散安置到東邊去。車站大廳里，擺滿擔架，擔架上躺著傷員，大廳里擺不下，都擺到鐵軌旁邊的雪地里去了。附近村里的農家婦女來車站賣東西，有的向傷兵兜售食物和煙草，有的是趕來找兒子或丈夫，只見她們詢問傷兵，知不知道她們的兒子、丈夫都在哪里。也有的把寫好的信放在這些傷兵手里，萬一有人到醫院查找，遇見這些傷兵不就看到信了么？

學生們從穆羅姆繼續坐火車往東走，坐到烏拉爾，再從烏拉爾南下，穿過冰凍的哈薩克大草原，坐到土庫曼“共和國”沙塵滾滾的首都阿什哈巴德（Ashkhabad）。蘇聯與伊朗的邊界離這里不遠了。物理系將在這個地方復課。從莫斯科到這里走了一個月。火車每節車廂都有一個爐子，有硬板床，能睡下四十個人。薩哈羅夫后來回憶說：“每節車廂都成了一個小社區，社區都有各自的領導。有的人口若懸河，說起來沒完，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專門制造恐慌，有的人非常能干，有的人極其能吃，有的人特別懶散，有的人異常用功。”斯維塔一定屬于既文靜又勤勉的那類。阿什哈巴德12月份就開始上課了，斯維塔必須用功，才能補上戰前落下的課。化學課、振蕩物理課，她都去上。振蕩物理這門純理論課程很難，沒有實際操作的訓練，于是她就埋頭在圖書館攻讀，一讀就是好幾個鐘頭。斯維塔還在學校食堂打工，刷盤子，供自己上學，還貼補父母。那年冬春兩季大部分時間，斯維塔都在患瘧疾，當時這種病在中亞地區很常見。她后來寫道：“我當時病得一點勁兒都沒了，連喝水都張不開嘴。”發燒很厲害，折騰得面黃肌瘦，她硬是挺著，終于熬了過來。

大學畢業后，斯維塔被分配到人民軍工委員部（即軍工部）工作。后來靠爸爸幫助，轉到樹脂工業科學研究所，當時這個研究所隸屬于赫羅姆尼克（Khromnik）—家化工企業，這里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很近。從1942年開始，斯維塔就在這個研究所內的“物理與機械測試實驗室”做工業物理方面的工作。這個研究所當時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斯維塔發現，剛去的時候，研究所不知道給她安排在哪里好。她后來的記述也透露出這一層意思：

我所在的這個實驗室很奇怪，也很陌生。我不知道先從哪里做起，不知道我的位置在何處。我怕機器，對橡肢一竅不通。于是就躲進圖書館……半天瀏覽俄文的文章和報道，半天琢磨英文。雖然在阿什哈巴德沒學過英語，我還是參加了一個英語倶樂部。那陣子真是令人振奮啊！阿什哈巴德煙塵刺鼻，從阿富汗刮來的風特別大，沙漠的風沙細如粉塵，8月份樹葉就掉了，一點兒金秋的意思都沒有。經過了這些，回過頭來再看烏拉爾，簡直是人間天堂：蒼松、白樺、蘑菇、細雨。我和全世界通信……每天都收到兩三封信，我知道很快就要回家了。

1942年蘇聯反攻后，德國的威脅沒那么嚴重了。研究所已經開始為回遷莫斯科做準備了。蘇聯紅軍急需研究所的研究技術來提升輪胎工業。1943年1月，斯維塔終于回到莫斯科家中。莫斯科，已經不像列夫和斯維塔當年上學時那樣。連年兵燹，到處是廢墟。很多大樓仍然沒通暖氣，燈光暗淡。還常常停電，一停電，更是一片漆黑。下水道漏水，食品店空空如也。斯維塔后來寫道：“1943、1944這兩年，大家過得都非常艱苦。我們都是饑寒交迫，生活在黑暗之中。”

1942年4月，斯維塔父母帶著她妹妹塔尼婭回到了莫斯科，父母親都明顯老了很多。斯維塔的媽媽阿娜斯塔西婭得了布氏桿菌病，常常犯病，一發作胃就疼，渾身無力。斯維塔的爸爸，亞歷山大，剛到六十歲，已經老態龍鐘。斯維塔回來的時候，見父母焦慮不安，心放不下來，整天牽腸掛肚；斯維塔的哥哥上了前線，一走就沒了音訊。原來，他被德軍俘虜了，關押在波羅的海的烏瑟多姆島（UsedomIsland）集中營里。1942年9月，塔尼婭[10](#__10)[1]也被征兵入伍，說是學生“志愿軍”，分配到斯大林格勒去了。這時候，亞歷山大的弟弟[名叫英諾肯季（Innokenty），即“科薩”叔叔（UncleKesha）]和弟媳兩口子也住在他們家。戰爭一打起來，他們夫妻倆就從列寧格勒跑到莫斯科，投奔哥哥來了。后來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他們有家難歸，直到1943年圍困解除之后才得以回家。

斯維塔家住的那條街，叫作軍營胡同，研究所在“積極分子大道”。斯維塔每天上班得坐電車，要坐很久才能到。她在研究所里一間破舊的實驗室工作。實驗室在三樓，窗戶正對著莫斯科東部工廠區。從窗外望去，只見一片高高的大煙囪冒著黑煙。一到這兒，斯維塔心情就低落。她常想離開這個鬼地方，到別處找個研究工作，換個外省小城也行啊，但是她“擔心和列夫斷了聯系”。莫斯科是他倆之間唯一的聯絡點，斯維塔盼望列夫早日回到莫斯科。

雖然沒有列夫的音訊，但斯維塔有充分理由確信，列夫一定還活著：1942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秘密警察來找過列夫的姨媽奧爾加，問她有沒有列夫的消息。列夫的東西都還給他留著呢。家里有人服兵役去，原有的東西都是留著的。秘密警察把列夫屋子里的東西翻了個底朝天。顯然，德軍在卡廷招收的密探，潛入蘇聯境內后被抓住了。經過審訊，一定有人供出了列夫，說起他曾經和德軍上尉用德語交談的事。內務人民委員部那幫人很可能立案偵辦，認定列夫里通外國，在莫斯科為德軍提供情報。斯維塔回京以后，秘密警察幾乎每天晚上都把她叫去，嚴加審問。他們很清楚，列夫若是在蘇聯首都，肯定會來見斯維塔的。他們放出話來，說列夫是間諜，逼斯維塔合作，幫助抓捕列夫，并且威脅她，若不配合后果會嚴重。到內務人民委員部總部盧比揚卡（Lubianka）大樓接受傳訊，令人毛骨悚然。對斯大林大恐怖年代，人們記憶猶新。但斯維塔不是輕易就能嚇住的。她要護住和列夫的這份情，于是決心直面蘇聯當局。秘密警察糾纏不休，斯維塔不勝其煩，實在忍無可忍，就對秘密警察說，請遠離我，少來煩我。斯維塔后來給列夫寫信，吐露了當時的心情：“當時真有點兒生氣，因為這些親戚（暗語，指秘密警察）動不動就來騷擾我。我就說，我們還沒成夫妻呢，等見面之后事情才能澄清：不過，見面不是見一小時，是見一輩子。”

與此同時，斯維塔給軍事當局寫信，問有沒有列夫的消息。1943年9月10日是她二十六歲生日。剛過完生日，忽然有一天，有消息來了。后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是這樣說的：

親戚們都來給我過生日。我父親在莫斯科的那個弟弟帶著全家，他列寧格勒那個弟弟和妻子，我表妹尼娜（Nina）帶著她丈夫，懷里抱著小孩都來了，一共有很多人。大家歡天喜地，一切都辦得妙極了。當然，我們舉杯，為沒能到場的人們祝福。正在這時，噩粍傳來：忽然接到一封信，說塔尼婭死了（科薩叔叔把信截下來，很長時間沒給媽媽看）。

塔尼婭因為闌尾炎死在列寧格勒一家軍隊醫院。后來又陸續傳來了各種壞消息：奧爾加姨媽接到軍事當局正式通知，列夫在前線“失蹤了，下落不明”。30年代腥風血雨大恐怖，千百萬家庭還沒緩過神來，忽然又接到這種通知，精神上受打擊、受刺激，可想而知。那幾個字（“propalbezvesti”，下落不明）什么含義都可能有啊：被敵人俘虜（根據蘇聯戰時法律，被俘等于叛國）；更糟糕的是“反水”（這可是大罪，當事人即成人民公敵）；還有“死亡，尸體下落不明”。軍人死了無數，斯維塔一定是擔心列夫遇到了最壞的情況吧。

我心里太難受、太痛苦。將來，除非有你在我身邊，否則我永遠也不過生日了。侏儒星（dwarfstar，恒星名）真是命苦，它的電子外殼都沒了，只剩下原子核了；我的胸膛也一樣空了，一樣痛苦，仿佛心都碎了，喘不上來氣似的。我一連好幾個月不跟任何人說話，哪兒也不去，讀什么都讀不進去，一回家就面壁而坐。我一天到晚，不管白天黑夜，不論哭得怎樣死去活來，痛苦一點兒都沒有減輕。

斯維塔日夜思念列夫，惦念他的安危，一肚子話無處訴說，就寄情于詩，以詩言志，把感情傾訴在詩里。她寫的詩，傳下來的卻只有兩首，其他都散佚了。第一首，時間標的是“1943年冬天”，正是在幾天前那個9月份“可怕的日子里”，她聽說了“列夫失蹤，下落不明”。她這首詩表達出失去了列夫而肝腸寸斷的心情。后來她也談到這首詩，“詩中表達的是我當時的心聲，不吐不快”：

我在門口佇立良久，

終于下定了決心，要出走。

路上鋪著一層小小的碎石，

我發現里面有個平安幸福的記號：

那是一塊馬蹄鐵，要掛在你的門口。

我把它帶來，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歡暢，

但戰爭把我們拋到兩條不同的路上，

我們不得不獨自沿著自己的路流浪。

你奮力走過了什么樣的森林？

哪個石頭上留下了你的血痕？

你那孤獨晚年的魂靈陰森森，

在我頭上游蕩，越來越嚇人。

你給我帶來了什么樣的紀念品？

久已消逝的幽夢留下苦澀的烙印？

難道你會任憑別的女人在這九月里用她那激情的話語打動你的心？

我可以信賴你么？

不信賴你，又信賴誰？

你這個少年，沒了我熟悉的模樣。

我的朋友圈越來越小了，

你們誰會陪我走到地老天荒？

第二首詩，短些，也是那年冬天寫的。斯維塔祈禱列夫平安歸來，那字里行間比頭一首詩更多了一分絕望的意味：

我不想評說你的對錯，

你已經遭遇了炮火，

死神已經多次來過。

我來是為了給你祈禱，

日夜不停為你訴說：

請圣母成全我，

保你平安，免遭災禍。

我會向蒼天為你祈福。

教我禱告的不是父母，

快樂還是悲傷都無助，

我找不到通往上帝的路。

但是，列夫并沒有死。此時此刻，他被囚禁在希特勒最嚴酷的集中營里，那是萊比錫所謂的主力集中營。每天，蘇聯戰俘在重兵押送下，從營區走到皮特勒（Pittler）兵工廠去干活。列夫1943年7月在波蘭邊境被俘后，一直關押在米赫爾貝格（Miihlberg）監獄集中營，后來又轉到這里來。皮特勒兵工廠條件十分嚴酷，相當于懲戒營。每個車間門口都有荷槍實彈的看守站崗。德國工頭腰間別著一把左輪手槍，隨時掏出來就可以開火。1943—1944年冬天，德軍在東方前線每吃一個敗仗，就要后方增加軍火補給，于是集中營這里的工作量越來越大，管得也越來越兇。戰俘體力下降，紀律松弛，生產力隨之下降，于是蓋世太保查了起來，看誰有可能鼓動戰俘造反，非把頭頭查出來不可，決心斬草除根。

列夫被提審了好幾次。1944年5月的一天，列夫等二十六人被抓，送到萊比錫最大的監獄關了起來，全都關在一個牢房里，在牢房門的旁邊有一個大便池、一個水槽。在牢里一關就是一個月，從沒放過風。7月4日這天，他們被轉移到惡名遠揚的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這個集中營離魏瑪（Weimar，德國中部城市）很近。住的破屋子有四層木板床鋪，每層床鋪很長，通著，中間沒有隔墻。人就睡在這板鋪上，一個挨一個。整個破屋子就是個隔離區，大家被關在這里。囚犯哪國人都有：法國人、波蘭人、俄國人、南斯拉夫人。每個人穿的都是印著條紋的囚服，囚服上有個標記。每個國家標記都不同，以示區別。列夫像其他俄國囚犯一樣，囚服上的標記是個紅色的三角形，上面印著一個字母R[11](#__11)[1]。

皮特勒工廠這群人，在這里隔離了一個月之后，就拆散了，分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下屬的各個分營。列夫先是被分到曼斯菲爾德（Mansfeld）兵工廠里一個強勞隊，這兒離萊比錫很近，后來又被轉到布痕瓦爾德一萬斯萊本（Buchenwald-Wansleben）。這里是一個廢棄的鹽礦，在萬斯萊本湖邊。他是9月的第一個星期到這兒的。這個鹽礦在地下四百米，納粹把鹽礦改成一系列的地下工廠，盟軍飛機轟炸也炸不著，安全。納粹要在這些工廠里把德軍飛機發動機零件組裝起來。組裝工作，就由囚犯來完成。地面有一個隧道口，直通下面這個鹽礦。當時挖隧道的囚犯里有個法國人，他記得：“地下這些房間都是挖出來的，每挖一個房間都死了好幾十人。”列夫在這兒干了七個月。納粹管得特別嚴厲，活又累，倒班，每班干十一個小時，紀律極嚴。“囚犯稍有過失，活兒沒干夠數，或者質量有什么小毛病，立刻一頓打，鞭抽二十下。那鞭子不是一般的鞭子，是一根橡膠棍，打到身上鉆心地疼，但是不留痕跡。”[12](#__12)[2]

后來的暴行就更加令人發指了。1945年4月，西方盟軍攻進了德國本土，長驅直入。納粹撤離了布痕瓦爾德一萬斯萊本。4月12日凌晨五點開始撤離，漫漫長路，沒有盡頭。沒死在井下的囚犯走出集中營，上了路。囚犯在中間走，兩邊是敞篷卡車，每輛車上坐著六名荷槍實彈的黨衛軍（SS）看守。路的左右兩邊都是開闊的農田，他們往西北方向走，向德國的德紹（Dessau）行進。當時，列夫和身邊的人都不知道這是往哪兒走，只覺得好像是又向布痕瓦爾德（其實方向正好相反）方向走去，這么說，該不是去火葬場吧！納粹以前在那兒殺害了好幾萬人，都是在那兒焚尸滅跡的。大家渾身破衣爛衫，走著走著，就有人累倒，起不來了。德國人上來就是一槍，給打死了。那個法國俘虜記得很清楚：“晚上八點的時候，隊尾忽然槍聲大作，是黨衛軍在開槍掃射。凡是身體太弱走不動的，走得慢的，都給打死了。”

列夫見勢不妙，決意盡快逃走。走在他身邊的那人，叫阿列克謝·安德烈耶夫（Aleksei Andreev），也是戰俘，原先也在皮特勒工廠干活。列夫小聲對他說：“你看前邊路右邊兒，有個什么東西在燒著。哦，是德國卡車，炸著了，正著火呢。等走到汽車邊兒上，咱們就跑。路邊就是樹林子，咱們就往樹林子里跑。看守在卡車后邊，火苗子太大，擋住了，看不著咱們。”安德烈耶夫說：“好，就這么辦。”走到了車旁，那車正冒著大火，他倆撒腿就跑，一貓腰鉆進路邊的樹叢，趴在地上，等長長的車隊陸續開過去，他倆一點點往前爬，爬到莊稼地里，挖了一個壟溝，躺進去，往身上蓋了干草，身上穿的囚服帶條紋，很顯眼，這么一蓋，外邊就看不著了。列夫很害怕，至今驚魂未定。整個戰爭期間，他都沒怎么害怕過，只有那次，真是嚇得夠嗆。

夜里，他倆鉆出來，跑進樹林里，聽見前邊響起槍炮聲。炮彈把大片森林都炸沒了。忽然，透過樹的縫隙，出現一道亮光，是探照燈。亮光旁邊，隱隱約約能看出來有幾輛美軍坦克。

黑暗中走出一個美國人，對他們喊話：“把槍扔下！”列夫用英語大聲答道：“我們沒槍。”

“干什么的？”

“我們是蘇聯軍官，從集中營逃出來的。”

列夫說，他們被關在布痕瓦爾德了，現在想回蘇聯去。那美國人把他倆帶到附近一所房子里。屋子里有五個坦克兵，他們告訴這兩個俄國人，可以和他們一起睡在地上，又把配給品拿出來和他倆一起吃。列夫在集中營天天都是面包就稀粥，一吃這配給品，味道非常鮮美，“像餐館的飯菜那么好吃”。第二天早晨，美國人把列夫和阿列克謝送到大路旁，這條路通往剛被美軍解放的小城艾斯里本[13](#__13)[1]。這幾個坦克兵說，到了那兒，美國駐軍會接待他們。

到了艾斯里本，一位美軍少校對他們盤問了一番。那少校用德語與列夫對話。他一聽列夫是學核物理的，就勸他移民美國，列夫不肯，他覺得奇怪，問道：“為什么不愿意去呢？俄國有共產制度啊，有共產制度就沒民主啊。”可以聽出來，經過戰爭，列夫的政治觀念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他回答說：“俄國沒有共產主義，聰明人還是有足夠的自由能活下去的。”列夫想避開這個話題，不想談政治。他不肯去美國過好日子的真正原因與政治無關：他只想回家，回到他愛的人身邊。他的親人都在蘇聯。列夫在心里說：“斯維特拉娜全家，奧爾加姨媽，卡佳姨媽，尼基塔叔叔，這些人都是我的親人。”他不知道，斯維塔是不是還活著，這么長時間了，是不是還在等他，但列夫知道，要跟著心里想的走。“即使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她還活著，我怎么能扔下她不管，自己一個人去美國呢？”

那位少校給了這兩個俄國人每人一張旅館代金券。美軍解救出的戰俘，拿這個代金券就可以免費住旅館。這個市的Biirgermeister（市長）原先是德國共產黨黨員，他把他倆領到一家商店，給他倆買上衣，買帽子，還給他倆訂購了全套的西裝，一切費用由市政府承擔。列夫和阿列克謝在艾斯里本住了兩個月。他倆住的房間正好對著馬丁·路德的故居，馬丁·路德就是在那里誕生的。這兩個月過得像度假，輕松愉快。艾斯里本有四個食堂，供美軍人員和被解救的戰俘用餐。在集中營里餓了這些年，列夫一頓都不落，并且每頓飯都吃四個食堂，也就是說，四個食堂都去吃一頓。“我們一天吃十二頓飯！”只有一個麻煩，那就是，四個食堂，每頓飯都必須及時趕到。吃完這個食堂，趕緊去吃下一個，吃完下一個，馬上去下下一個，所以每次不是吃一頓，而是一連吃四頓……這么狼吞虎咽地饕餮了好幾天，餓勁兒總算沒了。

5月初，美軍在艾斯里本舉行勝利大閱兵。過了不久，蘇聯紅軍的代表來了，安排被德軍俘虜過的蘇軍人員回國。6月8日，這些蘇軍人員啟程回國，美國人調來一輛敞篷卡車，上面插著蘇美兩國國旗，還掛著一個橫幅，上面寫著：“勝利凱旋，一路順風！”卡車把蘇軍人員拉到易北河畔的托爾高（Torgau），車上的人下車，渡過易北河，進入蘇聯占領區。蘇聯當局對他們，可沒有美國人那么友好，一下車就把他們關了起來。這下子，他們又成了囚犯。被遣返回來的這些蘇聯軍人，蘇聯武警把他們分成好幾撥，每撥三十人，押上了卡車，拉到魏瑪[14](#__14)[1]。到了魏瑪，他們就被關進監獄。這個監獄隸屬于蘇軍第八警衛軍軍部，由秘密警察的一個特勤別動隊管轄，這個別動隊代號是SMERSH[15](#__15)[2]，其任務是肅清給德國人做過事的蘇聯軍人。

列夫的好運到此結束。他被關進牢房。牢房里，除了他，還關著八個人。獄方把他們衣服都脫掉，進行搜身，東西全被沒收了。列夫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過去這四年來，他天天揣在衣服口袋里的一個小紙單，上面有斯維塔父親寫給他的那幾個地址。只不過是一小片紙，但這是斯維塔唯一的聯系方式啊。

白天，囚犯被強迫坐在地上，禁止躺臥，禁止睡覺。提審是在夜間進行。犯人一個個提審。一次提一個人，審問完了押回牢房，再提下一個。每次要審問三四個小時，回到牢房后趕快瞇一會兒，早晨叫醒的鈴聲又要響了。列夫被提審了一個多月。這個SMERSH特勤別動隊的辦案人員指控他通敵，為德國人通風報信。當時列夫被俘后，在卡廷和那個德國上尉說德語，被一個一同被俘的蘇聯戰俘聽到了。就是他向蘇聯當局告的密。現在，當局手里的唯一證據就是這家伙提供的。列夫說，當時是說過德語，是有這事兒，并且承認，也當過翻譯。但列夫堅定地說，從來沒當過間諜：自己做的不是媚德，而是反德。列夫太天真了，總以為說了實話就能放他回家。他相信蘇聯會伸張正義的。他不就是為了正義才去參戰的么？后來發生的事，粉碎了他這個信念。一連審問了好幾夜，審訊人員拿出一份供詞筆錄，威脅說，再不簽字，就把他拉出去槍斃。列夫還是不簽。那些人就打他。他后來回憶說：“當時我不怕死，但也有絕望的時候，擔心我愛的人們會以為我真的有罪。”

列夫常常想念斯維塔，覺得自己很可能活不到和她團聚的那一天了。1945年9月10日，這天是斯維塔二十八歲生日。列夫被審問得暈頭轉向，他絕望了，覺得再也見不到斯維塔了，只好在心里默默向她告別。

經過一夜的疲勞審訊，列夫被押回牢房。凌晨時分，列夫似睡非睡的，做了一個夢，非常清晰的夢，這是他描述的夢境：

審問過后，我在打盹。天快亮了。我做了一個夢，夢里的情景非常清楚，一點兒都不模糊，好像我正一個人往什么地方走呢。我回頭一看，看到身后站著斯維塔。她穿一件白色的連衣裙，跪在地上，身邊還有一個女孩兒，也穿了一件白色的連衣裙，斯維塔正了正連衣裙上的什么東西。夢境非常清亮，歷歷在目。就在這時，我醒了。

審訊人員硬要列夫在一份寫好的供詞上簽字，列夫怎么也不簽。他們又換了一招，騙他簽了一個認罪書。這些人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證，說軍事法庭肯定會宣布他無罪，說著，給他拿來一份審訊筆錄，叫他簽字。列夫也沒仔細核對，糊里糊涂就簽了。是主審軍官拿了一份文件給他看，說上面寫的都是列夫說的，列夫沒料到其中有詐，就信了他的話。那個軍官把聲明念給他聽，列夫一聽就簽了字。他在這張紙的底部簽的這個詞，一共十個字母，蠅頭小字，將改變他的人生軌跡。他或許是累了，或許是太天真。列夫沒想到，那個軍官給他念的，只是筆錄的一部分。而承認叛國罪那部分，沒給他讀出來。他簽的可是整個筆錄。等到開庭審判的時候，列夫才明白上了當。

1945年11月19日，蘇軍第八警衛軍的三人軍事法庭，在魏瑪宣判，根據軍法刑律第58條第1（b）款，以背叛祖國罪判處列夫死刑。緊接著又宣布，死刑減為十年勞改，遣送至蘇聯勞改總局下屬的勞改營服刑。蘇聯法官經常把死刑減為長期勞改，這樣做是為勞改營輸送勞動力，因為其實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之上的。整個審判二十分鐘了事。

12月，列夫先被轉到德國奧德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n derOder）的一座軍法監獄，然后被押上回蘇聯的囚車。囚車一輛接一輛，一字排成長龍，在蘇聯武警押送下，轔轔東去。進了蘇聯還要繼續向北，要走三個月才能到達目的地：伯朝拉勞改營。

# 三 高墻內外的守望

火車從明斯克（Minsk，白俄羅斯首都）開出來，緩緩向北駛去，車上拉的都是大隊囚車從德國運來的勞改犯。火車分幾條線路，有開往沃洛格達（Vologda）的，有開往科特拉斯（Kotlas）的，還有開往伯朝拉的。這三個地方都在北極圈附近的原始森林深處。列夫去的是伯朝拉，漫長的刑期在等著他。火車車廂是那種運牛的棚車，推拉門的兩側各安了雙層木板床。每節車廂中間有個“馬桶”，像個大粗管子敞著口，就是一個大窟窿，從車廂底板伸上來，糞便直接掉到下面的火車道上。每節車皮的設計容量原本是二十頭牛，或者十二匹馬，但是現在塞進來六十個勞改犯。車上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蘇聯軍人，曾經陷在德國占領區，情況和列夫差不多。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混在一起，不作區分。那些刑事犯都是暴徒，成幫結伙，他們很快就把那幾個小小的鑄鐵暖氣占為己有，別人不許靠近。車廂里風特別大，車廂角落里都沒有暖氣。列夫和其他人身上穿的都是夏天的單衣，大家只好依偎在一起，互相用體溫取暖。

看守每天給囚犯二百克面包，外加一點兒咸魚，基本上不給水喝。很多人都得了病，還有渴死的。已經死的和快要死的，全都被扔到車外去了。誰都想不明白，為什么看守不給大家水喝呢。古拉格明明有很多規定，長途押運囚犯要善待，既然奴隸勞工可以創造經濟價值，讓他們這么白白死去，豈不是愚蠢？可是，拿水桶下車去打水，那么重，看守們才不去呢。看來這個原因最有可能。但是這里頭還有一個殘忍的成分，之所以殘忍，是因為看守對犯人有支配權，他們用這個權力來占便宜。看守唆使刑事犯去打政治犯，叫他們偷政治犯的東西，然后給打手多發一點兒吃的，給打手水喝。看守對刑事犯說：“你們是‘我們的’人，只是‘暫時在這兒蹲一蹲’，而政治犯是‘人民的敵人’，‘就是該打’。”列夫看到刑事犯如此野蠻殘暴，非常震驚。他想，這幫東西根本不是人，是一種新的物種，厚顏無恥，蛇蝎心腸，以害人取樂。那些看守，比這些爛人強不了多少，都是一丘之貉。這群家伙，一天要到車廂里來“搜查”一兩次，命令政治犯站到一邊去，然后順手抄起東西就打：鐵棒、鐵錘、木槌、木板、木棒。他們這是給刑事犯做示范，教他們怎么欺負政治犯。有一次來搜查，列夫被打，把腎臟都打壞了，還有一次，頭部遭到狠打，耳鼓都穿孔了。

過了科特拉斯，車就慢了下來，速度和小跑差不多，時不時地還停車拋尸，有的還沒死就被扔了出去。火車道是古拉格犯人修的，質量很差，車速快了會出事。曾幾何時，這條鐵路沿線到處都是勞改營，里面人可多了，都是修鐵路的囚犯。在這運牛的車廂里，列夫的床鋪在上鋪。他蜷縮在旮旯，透過小窗戶眼往外看，一堆堆白骨清晰可見，松樹林里拉著鐵絲網，還有崗樓。車到米昆（Mikun）、伊拉耶爾（Ira-Iol）、卡緬卡（Kamenka）的時候，囚犯們被趕下車，由武裝看守押著，列隊行進到一個“衛生站”。天氣冷得滴水成冰，看守卻命令囚犯脫光衣服，淋浴消毒。凡是腿腫的，臀部爆皮、裂口的，都不許再上火車，說是癩皮病（缺維生素所致）。這些人，或許送醫，或許槍斃了。

列夫坐的這列火車，走了三個月，終于到了伯朝拉。當時是1946年3月，還沒到春天。在這個遠北地區，北極黑暗的冬天持續時間長達九個月。伯朝拉河還沒有開化，地上還有雪。囚犯們長途煎熬，現在一點兒體力都沒有了。列夫本來身強體壯，連德國集中營那么惡劣的環境都沒把他拖垮，可他現在也瘦得不行，渾身沒勁兒。很多勞改犯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了，虛弱得很，下車都很費勁，怎么爬也爬不下來。

囚犯們被帶到一個中轉站性質的收容所，這是勞改營的到達地點。收容所的營區離火車站很近，四周都用鐵絲網圍了起來，里面有三個棚子，是囚犯們睡覺的地方，有一個單獨監禁的小號（懲罰犯人用的），有一個衛生所，旁邊附設一個墓地，還有一個犯人干活的小院。大家洗了淋浴，剃了光頭，除了虱子，然后按人分組：病號（主要是癩皮病和壞血病）直接進衛生所，剩下的其他人，按照身體狀況，分別派去干各種活，加入各個作業單位。列夫被選中，派到木材廠干活。這個木材廠是伯朝拉的主要工業區，更北邊的森林里有小型勞改營，勞改林場什么的，他們那邊把林木順河漂下來，下游這邊把木頭從河里拖上岸來，做成家具，或者作為建筑材料，供鐵路沿線各個古拉格營地使用。這營地面積可不小，從科特拉斯一直到沃爾庫塔那個重要的礦區，這一大片都是勞改營。

鐵路是伯朝拉最要緊的東西。古拉格在這里墾殖，離了鐵路，可就玩兒不轉了。鐵路也是這大北邊經濟開發的關鍵。19世紀的時候，這個地區全是森林，人煙稀少，只有科米人（Komi）等散居在這一帶。1929—1930年，伯朝拉和沃爾庫塔這兩個盆地，相繼發現大量煤炭、石油和礦藏。這兒就成了蘇聯的工業戰略要地。在此之前，該國的燃料供應主要來自頓巴斯和高加索地區。但這些地區政治不穩定，軍事力量很脆弱：1918—1920年俄國內戰期間，剛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沒守住這兩個地方，被白軍及其西方盟軍占了。把沃爾庫塔蘊藏的巨大的煤炭資源開釆出來，不僅大大有助于國家工業化，而且一旦發生外敵入侵，燃料供應也會確保無虞：這遙遠的北極圈地區易守難攻。

有一陣子，蘇聯人異想天開，想把沃爾庫塔的煤用河運運出來，但是河運路線太長，繞了一個大彎，并且伯朝拉河[16](#__16)[1]及其最大支流烏薩河（River Usa）[17](#__17)[2]要一年冰封九個月。于是，1934年，他們決定修一條鐵路，把列寧格勒和科特拉斯、烏赫塔（Ukhta）、伯朝拉、沃爾庫塔全都連上（參見本書正文后面的地圖）。到了1939年，按規劃，先在這條擬建的鐵路沿線，從起點到終點，建起了勞改營和古拉格聚居地。勞改營一般都比古拉格犯人村的面積大。一切工程都是用犯人手工干的：砍伐樹木、平整土地、鋪鐵軌，都是手工操作，沒有機器，并且是二十四小時倒班。極地的黑暗，每天持續時間特別長，冬天超過二十小時，工地上只好點起篝火照明，燒的是破木板之類，全是身體虛弱的勞改犯出去撿的。身體太弱，修不了鐵路的囚犯，就被派出去撿木頭，好回來燒火。夏天一連三個月，白天晚上天都是亮的。

德國一入侵，修鐵路這件事就更加緊急了。到了1941年底，頓巴斯大部分地區都被德軍占領了。本來，蘇聯百分之五十五的煤炭都是頓巴斯出產的。1942年，德軍長驅直入高加索，眼看全蘇石油供給不保。連接沃爾庫塔的鐵路，必須盡快建成，早日通車，這是重中之重，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蘇聯當局向勞改總局的頭子們狠命施壓，命令他們務必在破紀錄的時間內將鐵路修完。到了1942年，修鐵路的勞改犯有十五萬七千人。他們晝夜不停地干活，有的睡在帳篷里，但帳篷沒有暖氣，也有的連帳篷都沒有，就睡在露天地，氣溫都在零下，冰天雪地。全體勞改犯累得一點兒勁兒都沒有了。凍死的、餓死的、病死的，每天都有好幾百人。為了加快完工，就把鐵軌直接鋪在地上，路基既不填碎石穩定，也不用沙子加固。遇到湖泊沼澤就繞過去，根本不做必要的填土奠基，有的甚至干脆把鐵軌鋪到冰面上（至于建橋，以后再說）。由于鐵軌鋪設得不直，有的地方還起伏不平，暗藏很多危險，所以火車經常翻車，一翻車就抓人，說他們搞“破壞”。伯朝拉河上有一座橋，伯朝拉在上游，科日瓦（Kozhva）在下游。施工的時候，趕工趕得特別急，橋的大梁本來應該用鋼鐵的，但是沒有，就用木頭臨時對付。結果，1942年通車的時候，車速不敢超過每小時五公里，否則抖動得太厲害，火車隨時有墜河的危險。不管怎么說，沃爾庫塔的煤，最后總算是運了出來，運到蘇聯各個城市、各個工業廠礦——1945年的時候，每月達到二十萬噸。

伯朝拉發展成了這個地區的主要工業樞紐。這個城鎮位于鐵路和伯朝拉河交匯處，自然而然成了古拉格的木材加工、鐵路維修和造船工業的中心。伯朝拉是1937年才開始建的，當初只是一個勞改營定居點，一個破破爛爛的小鎮。到了1946年列夫來的時候，人口有一萬人，有的是勞改犯，有的不是（參見本書正文后面的地圖）。火車站附近有一片貧民窟，小胡同彎彎曲曲的，一個個小破房臟兮兮的。這里的市容有點兒像“亞洲”，中國移民都住到了這一帶，所以人稱“上海”。伯朝拉主要是火車站到木材廠這一片地方。木材廠是個木材工業聯合體，自成一個工業區，三面圍著鐵絲網，一面是河岸。列夫每天去木材廠干活，都是從那個臨時營地列隊出發，走“蘇維埃大街”。一路上，兩邊有看守押著，手里都牽著狼狗。木材廠的大門在“三八大街”盡頭。這條“蘇維埃大街”是主要大道，卻不是柏油馬路，而是一條土路，挺寬，路面上鋪的是木板。這里，街上都沒有路燈，只有監獄四周瞭望塔上的探照燈晃來晃去。路上基本沒有小轎車，也沒有摩托車，只有馬，勞改營的頭頭到各處去都是騎馬。房子都不是石頭砌的，全是木頭房子，房子一半臥在地面下，這樣比較能避風，北冰洋吹來的寒風太大，受不了。屋內都沒有衛生間（只有勞改營的看守長家里才有衛生間）。誰家都沒有自來水，只有水井，井上都蓋了個小房子。冬季特別長，氣溫經常降到零下四十五度，在井上蓋個房子，可以防凍，防止井水凍成冰。這里沒什么商店，只在“上海”那一帶有個小郵局（兼賣伏特加）。

列夫走進木材廠的大門，就進了這個工業區。這里是今后十年關押他的監獄。這地方很大，呈長方形，方圓有一個村子那么大，一共五十二公頃，周圍是鐵絲網高墻，四角有崗樓，居高臨下，上面有探照燈。大約有五十棟房子，大多是“臨時的木結構”，建得沒有規劃，也沒好好選址，橫七豎八，好像是隨便亂建的。廠區內有各種加工車間，一個干燥車間，好幾個木材庫、制材車間、馬廄、食堂，還有一個看守和非服刑人員俱樂部。此外，還有幾棟平房，半臥到地下，還有一個洗衣房。廠區設有消防隊，救火車是一架馬車。消防隊有一條輕軌小鐵道，還有單獨的住宿區。列夫看到，前邊快到河邊的地方，有個紅磚砌的大煙囪。那是發電站的煙囪，俯瞰著這個勞改營。

木材廠的制成品（家具、住宅用預制構件）都在火車的裝貨區裝上火車運走。列夫他們這隊勞改犯就在這里清點人數。清點完之后齊步走，走進工業區內的一個特別監禁區域，周圍又是一層鐵絲網。他們被帶到“第二聚居地”，這第二聚居地也叫“生產隊”。

第二村有十個棚屋，里面住了八百個勞改犯。所有的棚屋都一個模樣：一長溜木頭平房，里面有兩排雙層硬板床鋪，每層住兩個人（古拉格方言里，這種床鋪叫“臥鋪”，因為很像火車臥鋪）。兩排床鋪中間的過道上，放著桌子、板凳，還有燒木頭的爐子。天棚上吊著四十度的燈泡，燈光昏暗發黃。床墊和枕頭，里面填的都是木頭刨花。列夫住的屋子有一個好處，總是暖和和的，因為看守允許犯人把碎木頭帶回來生火取暖。房門晚上也不上鎖，犯人可以自由進出（廁所在戶外）。但有一條，犯人不許靠近鐵絲網，靠近馬上擊斃。

列夫在屋子盡頭靠窗的地方挑了個下鋪。這個房子是勞改營里最老的。與列夫的床鋪隔不遠，有個政治犯，年紀很輕，是烏克蘭人，家住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Lvov），只見他身材瘦小，面部表情卻很豐富，兩個眼睛特別有神。他名叫柳波米爾·德爾列茨基（LiubomirTedetsky），昵稱“柳布卡”。后來，他成了列夫最寶貴的朋友，列夫非常喜歡他天資聰明，有內秀，又善解人意，欣賞他的詩人氣質，最愛聽他說話——伶牙俐齒，妙語連珠。德爾列茨基已經進來六年了，所以能幫上忙，他幫列夫安頓下來。1939年，蘇聯侵入利沃夫[18](#__18)[1]，不久他就被捕了，當時他才十八歲。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秘密警察搜查他家，發現一張地圖，一個指南針，還有一個背包（德爾列茨基喜歡徒步旅行），于是以此為據，給他扣了一個帽子，硬說他是德國間諜。可憐他屈打成招，被判了死刑，在基輔監獄里蹲了兩個月，就等著拉出去槍決了。不料，后來宣布減刑，死刑改為十年勞改。德爾列茨基被押往伯朝拉的途中，幾乎死在了火車上。到了勞改營，他被編入強勞隊，到岸邊撿柴火、碎木頭，用手推車推到五百米高的山上的發電廠，再將這些木頭扔進蒸汽機里燃燒發電，向整個木材廠供電。這活兒太重，德爾列茨基干不動。發電廠的司爐工看他都快累死了，可憐見的，就讓他休息休息，大伙主動把他的活兒攬過來。這一休息居然休息出好運來了：電力組的組長叫維克托·齊津，他本人也是勞改犯，這會兒在發電廠碰見了德爾列茨基，見他聰明伶俐，人很好，就申請把他調到發電站來，編入他的電力組。

挨著列夫床鋪的，那人名叫阿列克謝·阿尼西莫夫，昵稱廖沙（Lyosha），也是莫斯科人，莫斯科運輸工程學院學生。他為人靦腆、文靜。列夫很喜歡這個人，給斯維塔寫信的時候，說他是個“大好人”。阿尼西莫夫是1937年被捕的，以“反蘇現行犯”被判十五年。勞改營這個“第二聚居點”大多數都是“政治犯”，情況和列夫、德爾列茨基、阿尼西莫夫差不多。很多人（準確地說，是八十三人）都是在德國占領區被俘過，一回到蘇聯就被捕了；要不就是1944一1945年蘇軍反攻德占區時大逮捕抓來的。

這個木材廠的其他囚犯聚居點，關的不是政治犯。“第一聚居點”（在工業區外邊，自成一體）住的是“特種流刑”（spetspereselentsy）的。當局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就把他們發配到勞改營來了，1946年的時候，人數在五百人左右。“第三聚居點”（在河邊）關的都是普通刑事犯和其他囚犯。當局把他們挑出來，關到這里，以示嚴懲。列夫后來在信中寫道：“第三村和我們緊挨著，管得比我們這兒嚴厲多了。”犯人違反了勞改營規定就被關到第三聚居點去，下一步就是“換地懲罰”了。1947年，第三村發生暴動。勞改營當局寫了一篇調查報告，說那里的條件“極其惡劣”。犯人連床單、被褥都沒有，飯碗都是破碗，耗子來回跑。

列夫被分配到一個普通的強勞隊，負責把河岸堆放的木材拖運到木材廠來。這個活兒是把沉重的木料往山上拖，拖到木料傳送帶上，然后用手搖的卷揚機把鋼絲繩卷起來，把木料拖運到制材車間。這個活兒非常累，腰簡直都能累斷，必須站在冰水中，站著操作，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夏天整夜都不黑天，天色大亮，蚊子特別多，人被叮咬得實在受不了。囚犯上工之前，都要先把手和臉用破布包上。

隊里人人都領到了標準的勞作服，列夫也領到了一套：帶有耳罩的帽子，大棉祅，沉重的厚棉褲，手套、冬季的鞋都是和大棉襖一樣的布料。鞋里面不帶毛[19](#__19)[1]，也沒有鞋里子，這屋子總是濕漉漉的，又不透氣，所以列夫的腳總是潮濕。

勞改營兩班倒，每班十二個小時，天不亮就上工。犯人們干活，若能完成定額，每天發六百克面包；如果完不成定額，只發四百克。為了完成每天的定額，列夫必須把六十立方米的木材（能裝滿半個屋子）從河邊拖運到木材廠。如果超額完成，能領到八百克面包，另外獎給“一個黑麥餅，有時有餡兒，有時沒餡兒。有餡兒也沒什么味兒”。每天早晨，給犯人發一碗稀粥，一杯茶，一塊糖，重十五克（用秤稱，稱得非常仔細），一塊緋魚；午飯一般是一碗圓白菜湯，里面有幾個肉丁，或一丁點魚；晚飯也是一碗粥，外加茶水。天天拖運木材，吃這種東西，堅持不了幾天就不行了。患病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木材廠這個勞改營，主營區外頭有個院子，院子里的房子原來是監獄的小號，專門用來單獨監禁犯人，現在改作衛生所，也叫醫務室。1945—1946年，勞改營一千六百名囚犯，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病了，到衛生所來看病，但是衛生所只有一個大夫。當時，有個囚犯在掘墓隊干活。據他說，衛生所后面那個墓地，每天都要埋十多個囚犯的尸體。木材拖運隊的工作環境毫無人道，連有些看守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集中營看守開黨員會議，一個看守發言數落起來：“好像犯人的死活，我們都不管，還讓他們站在冰水里，等到他們凍病了，干不了活了，就看著他們在衛生所里死去。”

列夫拖運木材干了三個月，也累得快站不起來了。他心理承受不住了。德爾列茨基后來回憶說，第一次見到列夫的時候，“好像一個農民被拖拉機壓了似的”。哪像十年前那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啊，縱身一躍就跳進伊斯特拉河游泳去了。可現在，當年的影子一點兒都沒了。

德爾列茨基叫列夫收工以后到木材干燥車間去暖和身體。列夫聽他的話，經常去。工業區內可以隨便走動，不用排隊走，也沒有看守押送。犯人上工自己去。所以，列夫上木材運輸機干活兒或者在制材車間附近干活的時候，每天收工以后，在回第二村的路上，就有時間先去干燥車間待一會兒了。回到第二聚居點，進大門的時候，要穿過警衛室，門衛負責登記，清點人數。正是有一回去干燥車間，列夫得到了貴人的救助，從此不用去干那有生命危險的活兒了。



木材廠犯人在搬運木材

干燥車間有一個附屬研究實驗室，實驗室主任名叫格奧爾基·斯特列里科夫（GeorgiiStrelkov），是個西伯利亞的老布爾什維克，參加過蘇聯內戰。他還是一位老資格的蘇聯工業管理人員，1937年被捕之前，一直擔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一家金礦聯合企業的總經理，那個金礦聯合企業隸屬于重工業人民委員部。他的案情是這樣的：他看到報道，在西伯利亞大東北邊兒的科雷馬（Kolyma）[20](#__20)[1]金礦，勞改犯們在挨餓，于是他派了兩艘船，帶著糧食補給去救濟。結果，半路上就被秘密警察截住，卸空了船上的所有糧食，卻把新的囚犯裝上了船。死多少人，秘密警察也不在乎。他們說斯特列里科夫浪費糧食，指控他搞“反革命活動”。斯特列里科夫先是被判槍斃，后來又改判死緩：押赴伯朝拉勞改營勞動改造二十五年，并剝奪通信權利。囚犯被判二十五年強勞的，一般都得干重體力活兒。但是，伯朝拉勞改營當局非常看重他的專業技術，于是就讓他來領導這個木材廠的實驗工作。他們允許斯特列里科夫獨自住在實驗室里，不必和其他囚犯一起住在破爛的宿舍里，因為整個工業區內這樣那樣的技術問題，經常都需要他到場才能解決。獄方甚至還允許他穿西裝，不用穿勞改營的囚服。

斯特列里科夫很嚴格，說一不二，但他為人善良。他在這個木材廠很有權威，救了不少囚犯。很多囚犯在拖運隊里累得快不行了，多虧他出面干預，把他們調到干燥車間或者其他車間去，才保住了命。他出面替囚犯說話，常常遭到勞改營當局的反對，給他引來不少麻煩，但他不怕。斯特列里科夫知道，古拉格的頭子們需要他。多年來，他想方設法利用了古拉格的勞改制度。1942年，這個木材廠勞改營接到古拉格主管部門的命令，叫他們趕快想辦法，把鋸末子用酵母發酵，制成動物伺料。于是，這項研究就交給斯特列里科夫來負責。經過十八個月的反復實驗，木材廠的頭頭就帶著兩罐這種神奇的飼料，來到伯朝拉勞改營的管理中心所在地阿別茲（Abez），以此慶祝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古拉格的頭子們都來了，開慶祝大會。那木材廠的頭頭名叫鮑里斯·謝洛夫（BorisSemv），也是個勞改犯。他把那兩罐飼料往那兒一放，與會代表立刻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從阿別茲回來以后，斯特列里科夫的一個助手告訴他，這兩個罐子里裝的其實都是用普通大麥加工成的面粉。

1946年，干燥車間急需具有工程專業技能的技術人員。高壓蒸汽爐烘干木材的速度太低，干燥木材供應不上，后續車間產量上不去，計劃指標完不成。內務部（MVD）大為光火，催得越來越緊，勒令他們盡快改進。（蘇聯勞改總局，歸內務人民委員部管——1946年3月，改稱內務部。）斯特列里科夫聽說列夫是學理科的，就請他到干燥車間來當技術員，把他分到蒸汽烘干室工作。列夫的工作就是把木材尚未烘干的那面翻轉過來烘干。室溫保持在攝氏七十度，所以進烘干室必須把手和臉都蓋起來，每次進來只能待幾分鐘就得出去。這個活也是體力活，也挺累，但是和拖運木材相比，對列夫來說，簡直是“天堂”一般。

自從來到伯朝拉，列夫的鞋和衣服都是濕漉漉的，現在第一次能弄干了。他全天都覺得暖和和的。看守怎么兇神惡煞他也不在乎了。蒸汽室的活兒干完以后，列夫還可以去實驗室拜訪斯特列里科夫，這對提振列夫的心情，或許是更為重要的。斯特列里科夫在實驗室里騰出一個生活區，有三十平方米大小。他在這生活區里養了一只貓，起名叫“瓦西里·特里豐內奇”（VasilyTrifonych）。他也在這里接待朋友，暢談、玩牌、下棋，和朋友一起聽音樂（他自己組裝了一臺收音機）、一起品嘗他在實驗器皿里釀制的伏特加，還一起做菜吃。那些蔬菜可是寶貴，都是他自己在窗臺木箱子里種的。他還特意把木材熏蒸器加以改造，用來給種菜的木箱保溫，這樣菜就長出來了。還有花兒呢。他做了個玻璃罩，在玻璃罩外面加溫，里面就能長出花來。木材廠的頭頭見了，一個勁兒叫好。斯特列里科夫突然冒出個奇想，提議辦個花卉農場，專門種花。那頭頭一聽，立刻就批準了。

搬到干燥車間，列夫這才有機會寫信。以前都沒法寫，這是頭一回。以前在拖運隊的時候，收工回來特別晚，又餓又冷，渾身潮濕，臟兮兮的，累得筋疲力盡，晚飯后不一會兒就熄燈了，想寫也寫不了。再說，紙和筆都沒有。轉到干燥車間以后，列夫有時間寫信了。需要什么，斯特列里科夫會給他。

曾幾何時，列夫暗自下定了決心，絕不給斯維塔寫信，也不給奧爾加寫信。斯維塔上次過生日那天，列夫徹底絕望了，覺得再也見不到斯維塔了。判了十年，被運牛的火車拉到這伯朝拉，列夫當時心如死灰，不抱任何希望了。這個女人，已經五年沒音訊了，還給她寫信千什么？她也許死了吧。或許是放棄了列夫，移情別戀，已經嫁人了吧。接到一個囚犯的來信，她會很尷尬的。話又說回來，聯系她，會給她帶來危險的，這是列夫最不愿意的。所以，列夫想好了，不想去打擾斯維塔的生活了。長年被監禁，生出了自卑感，自慚形穢。列夫覺得自己沒有權利要求她愛自己。



斯特列里科夫和他的貓在實驗室里。墻上那幅畫是伊里亞·列賓（IlyaRepin）的《伏爾加河上的纖夫》，在蘇聯時期這是沙皇壓迫的象征

后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改變了想法。可能是有斯特列里科夫陪伴，有朋友陪伴，心情好些了吧。也有可能像他后來說的，“一時意志不堅定”，沒守住防線，也想看看斯維塔到底怎么樣了。列夫不敢給斯維塔直接寫信，轉而給奧爾加（昵稱“奧利婭”）寫了一封信，請她問候斯維塔：

1946年6月2日

親愛的奧爾加姨媽！你沒想到會收到這封來信吧。我不知道你是否安然無恙。過去五年出了很多事。請原諒我給你寫信，不過，你一直都是我的親人，所以，現在請你幫我。我也想給卡佳姨媽寫信來著，可是我記不清她家的門牌號碼了。

我現在在內務部的一個勞改營里服刑，刑期十年。1945年，我被判犯了叛國罪。這事的來龍去脈，說來話長，信里說不清楚……

這里的條件很好，只是北方的氣候差點兒。只有一件事，比較難受，過去和我朝夕與共的人，我深愛的人，已經五年沒有他們的消息了。如果你給我回信，給我說說卡佳姨媽的情況，說說薇拉（奧爾加的嫂子），說說米哈伊爾（奧爾加的丈夫）；尼基塔好么？斯（即斯維塔）的家人好么？我的情況，別告訴他們。給我來信就行，給我講講他們的情況。把你知道的，都告訴我吧。

希望你一切均好。衷心祝愿你們萬事如意——你、卡佳姨媽、米哈伊爾……這么多年來，我一直都在想念你們大家。

祝萬事如意！

列夫·米申科

我的地址：

科米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伯朝拉火車站，木材廠，274/Ⅱ信箱，列夫·G.米申科

列夫于7月31日收到奧爾加的回信。當年匆匆離去，孤零零一個人掙扎在這世界上，和故人天各一方，現在終于又聯系上了！可這卻是一封傷心的信：奧爾加告訴他，戰爭期間，很多親朋好友都死去了，其中就有斯維塔的妹妹塔尼婭。但是她又說，斯維塔安然無恙。第二天，列夫又給奧爾加寫了回信：

第2封信 伯朝拉，1946年8月1日

我親愛的奧爾加姨媽，昨天，1946年7月31日，我收到了你的第一封來信。31日常常是我大喜的日子[21](#__21)[1]。接到你的信，我激動不已。信中溫暖的情誼給我帶來莫大的幸福，我不知道用什么詞才能表達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我沒指望會收到你的信，這樣的信，連想都不敢想。真高興，你還活著。但是，得知你身體不好，孤單寂寞，我很難過。我們的人生，失去的太多了，令人痛心……塔尼婭的噩耗，令人痛徹心肺。“斯”家里別人都好，這是福分啊。“斯”還活著，活得充實，活得美滿，別說我有多高興啦。我從心底里祝福她。你還和她保持聯系，這太好啦。請給我來信，講講她的情況，把你知道的都告訴我。她在哪個研究所工作？指導教師是誰？她選的是什么專業？她博士學位通過沒有？盡管天各一方，闊別至今，我對她的感情還是和過去一樣。

我現在是給你寫信，不是給她寫信，因為，我不想給她增添負擔。讓她平靜地生活吧，我不想給她添亂，既不想讓她回想起過去也不想讓她惦念我的現在，我想讓她無憂無慮。

熬到1946年初，斯維塔已經不指望能再見到列夫了。別人都從前線回來了，只有列夫沒回來。所以，斯維塔一定以為列夫已經死了，或者下落不明，再也找不著了。斯維塔一連好幾個月“睡不著覺”，“吃不下飯”，把她父母愁壞了。那時候，斯維塔“盼望列夫能有消息來，哪怕片言只語也行啊。要是有個信兒，一天云彩就都散了”。可是，時間一天天過去，斯維塔心情越來越低落，漸漸不抱任何希望了。忽然，奧爾加來信了。

斯維塔馬上提筆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1946年7月12日（Ⅰ）

列夫，遇事要看行為的動機，不要看行為的后果，我要是不知道這個道理，就會怪罪你了，怪你音信杳然。

還記得吧，那年9月，你說你不想咱倆隨隨便便地約會，而我呢，人家給了咱們一個星期的時間，讓咱們可以在一起，當時我可是謝天謝地啊。列夫，我現在和那時一樣：如果改變不了現狀，現在這樣也比音信杳然強。你我今年二十九歲了。咱們是十一年前認識的，到現在五年沒見面了。這幾個數字，屈指一算，真是讓人心痛。但是，時間的確在流逝啊，列夫。我知道，你肯定會盡量爭取咱們早日見面，不用再等五年的時間。

列夫，我越來越倔強了。過去，我總想依偎在你的懷里，你卻不在，我只有面徒四壁的份兒。好壓抑啊，簡直喘不上氣來。但是，時間一天天過去，我也振作了起來。現在這一關，咱們也能過去，列夫。

我答應過你，我一定要讀完大學。我說話算數，已經實踐了這個諾言。我們是1942年夏天畢業的，上完了大四的課程，但是遷校到外地去了將近六個月，從莫斯科遷到阿什哈巴德，又遷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

1942年，我過完生日就到爸爸的研究所（輪胎工業科學研究所『1』來工作了，在物理和機械實驗室，進來快四年了。不管我怎么想方設法避開橡膠，到頭來還是研究橡膠。高興吧？我的工作就是提出新的、更好的試驗方法（細節太多，一封信說不完，所以我一點兒一點兒給你講）。我的上司為人很好，但實際上他不是管理人員。所里有四十二個女學生。我和他一起當指導教師，指導她們寫論文什么的，但指導得很不到位。所里新開了研究生課程，第一個研究生就是我，斯維特拉娜！我考試（五六月）通過了，考得非常好，比誰考得都好，全校第一（主要因為我是學理科出身，不是因為我才華出眾）……高興吧，列夫？

我7月1日開始放假，但是學術秘書把我留了下來，要我給校刊寫完文章再走。這文章可怎么寫啊（內容是關于橡膠和合成橡膠的彈性）？我正在搜索枯腸、冥思苦想呢。媽媽和阿利卡（斯維塔的侄子）已經去鄉間別墅住了一個月了。現在這個別墅還是在伊斯特拉河邊上，不過，這回離莫斯科近了一點兒。阿利卡現在六歲了，已經學會認字了，一看大寫字母就著迷。亞拉（斯維塔的哥哥）的技能和才氣，他都繼承下來了。這孩子會畫畫，做“實驗”，很多字的發音和拼法，他都會，能背誦很多首詩。這會兒，正在做植物標本呢，還收集甲殼蟲、蒼蠅、毛毛蟲，還會唱歌呢。長得真像他姑姑！小腦袋圓溜溜的，簡直像紐扣那么圓！黃頭發，瞳孔又黑又大，但是虹膜是藍色的（他姑姑也是這樣）。去年11月亞拉回來了，在外三年，音訊皆無。現在還瘦得很呢。塔尼婭1942年5月入伍的，1943年9月2日患闌尾炎死在醫院了。我很想她，就像我想你一樣，總在想，但是我不說。當然嘍，媽媽和爸爸都老了。爸爸目前在橡肢工業部工作。媽媽忙著家務，屋里屋外地轉。布氏桿菌病把她折磨壞了……

列夫，給我寫信啊，可不可以給你寄包裹？請告知。如果可以寄，告訴我，你需要啥。要小說還是物理書？這封信，郵到你那兒越快，我收到回信也就越快。先寫到這里吧。

列夫，祝萬事如意！斯維特

8月8日，星期四，那天晚上收工后，列夫去集體宿舍，看有沒有信來，果然信到了。信封上斯維塔的筆跡，他一眼就認出來了。打開信封，里面有一張斯維塔的照片。那天夜里，列夫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沒有上床睡覺，而是在外面到處徘徊，北極地區的白夜給了他看信的光亮。第二天早晨五點半的時候，太陽已經升起整整兩個小時了。列夫坐下來寫信：

伯朝拉，1946年8月9日 第1封信

斯維塔，斯維特[22](#__22)[1]，我此時此刻的感受，你能想象得出來吧？這種情感，我不知怎么形容好，我的幸福無邊無際。8日，在我的人生里，一直是個重要的日子（你瞧，我已經成了一個宿命論者了）。昨天，我回到宿舍去看有沒有信來，看到有人收到來信，我一點兒都不嫉妒他們，因為我沒承想會收到來信。31號那天，我收到了奧爾加姨媽寄來的信，我想9月初才會有我的信吧。突然間，看到了我的姓！仿佛你的筆跡活了，要從紙上跳下來！我一連三年設法珍藏著一個小紙片兒，上面有你寫的字。那是我擁有的你的全部。后來，1944年7月3日，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大搜查，把這個紙片兒沒收了。我盼望著你還活著，將來我們一定有見面的一天。這個希望支撐著我活下去。上次你生日那天，我正在受審，非常難熬，我就想，壞了，可能見不到你了，就在心里暗暗向你告別……將來還能再見到你么？我不敢抱任何希望。實在見不著，能聽到你的音訊也行啊。能有你的音訊么？我想也沒指望了吧。

斯維塔，但愿你能想象得出，但愿你能明白，那種審訊究竟是怎么個審法！審訊不僅僅是受皮肉之苦（我沒受過皮肉之苦），而且還是靈魂的煎熬啊。你知道么，有一樣東西比死還惡劣，那就是不信任。哦，我說跑題了。我反正在心里向你告過別了。可是，沒有你，我堅持不下去了啊。過了八個月以后，我給奧爾加姨媽寫了一封信。沒抱太大希望，只是懷著僥幸的心理試試看。我向她打聽你的情況。記得1936年7月31日那個犯傻的日子，我去鮑里斯科沃看你，途中跳下伊斯特拉河游泳，差點兒淹死了，多虧被人救上岸來。時隔幾年，也是31日這一天，我又獲救啦！那天，我沒指望會收到一封這么深情的、暖人心房的慈母般的來信。其實，我根本沒指望會收到任何來信……奧爾加姨媽寫的全是你的情況。你竟然還活著！原來你還經常去看她啊！這說明，你還沒把我從記憶中抹掉。我知足了。我只想知道你的近況，不想打擾你的生活。突然之間，昨天信到了，精確地說，是今天到的，因為雖然現在是8月9日的早晨六點鐘，我一宿沒睡，到現在還沒躺下呢，所以對我來說，信是今天收到的，不是昨天，反正北極圈里只有白天，沒有黑夜。不光有你的筆跡，不光有你寫的話，還有一張照片呢！多么深情的話啊，多么非同尋常的信啊！這么多禮物都是給我的么？是給我的么？斯維塔啊，斯維特啊，我不知道怎么表達才好……

現在咱們談談別的吧。你問能不能見面……斯維塔啊，見面怕是不行。58-Ⅰ（b）是一個邪惡的數字[23](#__23)[1]。對這一點，我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向你保證，我會竭盡全力爭取縮短刑期的。

你終于能夠掌控自己的人生了，斯維塔，你很堅強，很快樂，我真為你高興。你有一個正經的工作，大家都很器重你，這太好啦。斯維塔啊，你又聰明又伶倒！得啦，得啦，別不信啊，這是外行夸獎你吶。斯維塔啊，斯維塔，你離我這么近，你是我的近人兒。雖然關山難越，相距兩千一百七十公里，但是，過去五年，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你的模樣還是像五年前一祥，沒什么變化，照片上有一種極其細微的、難以察覺的什么東西在說，你的心稍稍滄桑了一點兒，僅此而已……

你來信問起書。這幾年，我想看書，想得很厲害。什么書都弄不到，說來慚愧，這幾年讀書讀得太少了……還記得阿赫瑪托娃和勃洛克么？我渴望看普希金的書，看你最鐘愛的《石客》[24](#__24)[1]當年，我們倆在特維爾大街的路燈下攜手散步，你曾經給我背誦過這首詩，我還能記得其中幾句呢。《茶花女》也是我的最愛，每次聽到都激動不已，不管是聽人用口哨吹出來，還是聽見收音機播放……

斯維塔啊，正像你說的，這一關，我們能過去……

暫時就寫到這里吧。祝你萬事如意！什么東西也不要，就寄信吧，信、信、信！……

列夫

# 四 信是托命的船

勞改犯寄信、收信，勞改營的條條框框限制得很嚴。隨著形勢的變化，當局對這些規定也漸漸地做了一些更改。每個勞改營，雖然都是嚴格執行這些規定，但嚴格到什么程度，卻各有不同。囚犯收信可以收多少封，那要看他刑期有多長，生產定額完成得好不好了。

官方規定，在木材廠這個勞改營，每個囚犯，每個月允許收一封信，但要先經過審查。這還比其他勞改營強，那些地方，不管來多少封信，一年只許可接收四封。1946年8月1日，列夫給奧爾加姨媽寫信，信里說，不管多少來信、郵包，都能收到，“沒有限制”：

寄信、寄郵包，兩到三個星期就能到達這兒，也有的從莫斯科寄來，七八天就到了。扣留郵件檢查的時間并不長……寫信的時候，別忘了把信都按順序編上號，這樣我就可以查，看是不是都郵到了。什么都不用給我寄，要寄就寄紙和鉛筆吧。

列夫說的，不都是這么回事兒。他信里說的勞改營情況，常常是給收信人吃定心丸，怕他們擔心。事實上，給勞改營送信，一個月只來送兩三次，所以一個囚犯每次都可能收到好幾封信。但是，這樣還算相當不錯呢，比1930年代勞改營可好多了，那個時候，勞改犯一連好幾年都接不到一封信。現在檢查信件，相對來說，也不太嚴，大多是勞改營看守的妻子來干這事兒。她們見到信里有什么怪字眼，根本無關痛癢的，就用筆涂掉，這樣做做樣子，表明她們檢查了，但不是仔細通讀，沒那么嚴重。但是，犯人們不知道，所以寫信的時候都倍加小心，犯禁的話不寫。郵包和印刷品，可就不是這么簡單了，手續很復雜。給勞改營寄包裹，在蘇聯首都市內，郵局不受理，得出莫斯科，到梅季希（Mytishchi）這些外市縣去辦理郵寄。到了外市縣，包裹要檢查、登記。每次檢查、登記都得排長隊，要排好幾個小時才能排到。包裹有重量限制，不許超過八公斤。包裹到了勞改營，取包裹手續也很復雜。在木材廠這個勞改營，包裹要到內務部派駐營區辦公室去領取。辦公室的值班看守一件件把包打開，先把自己看上的東西扣下，留著自己享用，然后才把包里剩下的東西給收件人。食物、錢、暖和的衣服，一般都被看守拿去了，所以，列夫囑咐親戚朋友，包裹里不要夾寄這些東西。列夫請他們只寄書，但是寄書也要加小心，外國文學被沒收的可能性大，尤其是1917年以前出版的，更不行。列夫寫給斯維塔的第1封信就提到了這些：

如果你和奧爾加姨媽要給我寄書，一定要挑便宜的書。越是便宜的版本越好，越是破爛的書越好，丟了也沒浪費多少錢。如果給我寄外語的文學書，一定要選蘇聯出版的，不要寄古舊書店賣的外國版本。檢察人員見了會產生誤解，我也就收不到了。

8月7號，列夫的第1封信還沒郵到，斯維塔已經又給他寫信了：“我親愛的列夫，我整天都在尋思，7月12號寄出的信，你收沒收到呢。收到了沒有？”列夫那天還沒收到，第二天8號才收到。不是說了么，8號是個“重要的”日子呀。列夫的第1封信，斯維塔是23號這天收到的，那天她從鄉間別墅回來不一會兒，這封信就到了。“我也成了宿命論者了，”當天下午，斯維塔給列夫寫信：

我寫第1封信的時候，你在寫第2封信呢。但是，我第2封信寄出的時候，你才收到我的第1封信。我寫第3封信的時候，才接到你的第1封信。現在收音機正在播放《茶花女》呢！

8月11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了第2封信。他想要確保9月10號斯維塔生日之前，能及時送達。那天，列夫收到了斯維塔給他第1封信的回信，當天晚上他就寫了回信：“你的信是給我的禮物，可今天所有的禮物都應該是給你的才對呀。”

他倆談了起來，談得斷斷續續，話沒法兒一氣兒說個痛快。“你26號的來信，我今天收到了，”9月6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你26號前的兩封來信，也收到了，一封是8號的，一封是11號的，但是你21號的信，還沒收到啊。筆談不容易啊，列夫，咱們的信，走得太慢，間隔太長，一來一去，要好幾個月呢。等到你讀到我的想法，說不定你的心情已經換了一個樣呢。

除了信在路上耽擱這么久，還有別的麻煩。他倆知道，所有的信都要經過檢查的，有的話不能說，所以也就沒法兒暢所欲言了。寫得太含蓄了，對方看不懂，寫得太明白了吧，會惹麻煩的，這個尺度很難掌握。列夫第3封信里，寫到了這個“界定”的問題，他的話只能說到這個程度為止：

斯維塔啊，你知道，說到寫信，我可從來都沒有過懶得寫信。我總是在心里默默和你談話，一天二十四小時，我能和你談十六小時。你是知己，心知肚明。所以，你會明白，我不經常給你寫信，不是不想寫，而是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寫才能不超越界定的范圍。

列夫寫信，下筆之前總是打好幾天腹稿，反復斟酌，然后才下筆寫出來。沒寫完的信，他不敢放在集體宿舍里，怕別人拿去當卷煙紙，所以總是揣在衣袋里，隨身帶著。這樣，寫好的信總是褶褶巴巴的。

他的信，字里行間常有言外之意，得仔細看，里面有不少暗語，例如，“叔叔們”指的是內務部派駐營區的官員，“傘”指的是整個古拉格體系，“維生素D”指的是賄賂款[97](#__97)[1]，還有文學典故，尤其是19世紀作家果戈理和謝德林兩人諷刺作品里的典故。這些暗語所傳遞的信息都是勞改營里日常生活的種種荒謬。親戚朋友的名字，從來不寫出來，有的是用縮寫字母代替，有的是用外號代替，都把真名實姓隱藏了起來。

剛開始的時候，列夫很擔心，斯維塔收到勞改犯的來信說不定會受牽連，遭受危險的。列夫寫頭一封信就建議，他的信不要寄到斯維塔家，也不要寄到研究所，干脆寄到郵局，然后斯維塔到郵局去取。這叫“留郵局待取”[98](#__98)[1]。斯維塔回信說：“‘留郵局待取’沒必要。鄰居，我們都認識。”后來，斯維塔改變了主意，建議列夫把信封上“收信人姓名、地址”欄內空著，不要寫她的名字，“以免引起鄰居注意”。這樣，鄰居在居民小區入口處看到信箱里有信，也不會起疑心了。不過，斯維塔暫時并不隱瞞給勞改犯寫信。她全家和最親密的朋友，也都認為她做得對，沒必要隱瞞。

斯維塔寫信，措辭也很小心。她先打個草稿，修改以后再重新抄一遍，確保內心的想法都說出來，同時又沒有寫出什么會危害到列夫的話。這些信會郵到列夫手里么，斯維塔沒把握。為了保險起見，她把底稿都留了下來。寫信的紙，要么是空白紙，要么是橫格紙。她挑的全是行距最窄的。斯維塔的字體很小，幾乎辨認不出來。每頁紙都盡量寫得滿滿的。斯維塔在每封信里都夾寄了一些空白信紙，這樣，列夫回信就有信紙了。斯維塔寫信都是在夜間沒人的時候寫的。

信，我必須在家里寫，并且沒人在旁邊的時候才能寫得出來（或者大家都睡下以后）。這時候寫信，就不頭疼、不昏昏欲睡，心情才會不煩躁。這三個“不”可不是總能同時存在的。

斯維塔信里寫的全是她日常生活當中的大事小情、家人朋友的各種新聞，工作學習的種種信息。她是為列夫活著。列夫是她的人生目的，寫信是她實現人生目的的途徑。從外表看，斯維塔的語言好像缺乏浪漫的情感，干巴巴地沒多少話，這是蘇聯學技術的知識階層共同的特點，而斯維塔正是在這種知識階層的氛圍中長大的。看列夫的語言，更像他姥姥，像俄國十九世紀的紳士，滔滔不絕，有聲有色。斯維塔也承認，自己不喜歡過度流露。她是一位務實的人，雖然感情充沛，也常常表現出脈脈溫情，但她非常純樸，有啥說啥，不會沉緬于浪漫的幻想。

表白愛情的情話（不論是高尚的，還是廉價的），我聽了都像商業廣告一樣。情話都一樣，你對我說的也好，我對你說的也好，我覺得都一樣。情話說不得，會引出無盡的心病。我心里總有那句話：“付出，但不要伸手去要回報。這是打開所有心扉的鑰匙。”

別看她信里沒什么綿綿情話，那都是假象。斯維塔天天給列夫寫信。她給列夫背誦過一首詩，是薩沙·喬爾內[99](#__99)[1]寫的。她對列夫的愛，在喬爾內的詩中描寫得淋漓盡致：

如果心上人受不了困頓，決意了結，

那笨手笨腳的土狼就會找遍世界！

相愛吧，祝你們快樂地比翼雙飛。

祝你們快快綻放心中每一個花蕊。

兄弟姐妹要情同手足，

結發夫妻要舉案齊眉，

醫生護士要治病救人，

藝術大師要創造美。

但愿你，慷慨地贈給，

不要伸出顫抖的手索回：

這是一把萬能的鑰匙，

能夠打開所有的心扉。

斯維塔在信中向列夫講述她的生活情形，每封信都接著上一封信寫，寫每天上班，一路上所看到的莫斯科市容。她有一些衣服，列夫見過。信里有時也穿插一些和這些衣服有關的零星細節：

莫斯科人現在的穿戴，是剩下什么就穿什么：皮大衣或者棉襖什么的（大家早晨上班通勤時間最愛穿這些，我上班時見到不少）。工廠八點上班，研究所九點，各部委十一點……我沒有冬天的大衣了。記得我那件黑色的舊大衣吧，成了我破壞欲的犧牲品，我就愛破壞東西。兩條腿的動物都有這個愛好。由于媽媽堅持，那件大衣廢物利用，改作套裝了，還不錯，挺好看……我夏天穿的那件灰綠色上衣還挺新呢……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吧：我買的那雙鞋，一直都在穿，上哪兒去都穿，現在去研究所，天天穿它，輕巧。我們現在的活法就是這樣，活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今天先講到這兒吧。

列夫渴望收到關于莫斯科的消息。他愛聽斯維塔給他講莫斯科的情況。勞改營里有兩個莫斯科老鄉，一個叫阿尼西莫夫（Anisimov），一個格列勃·瓦西里耶夫。這位瓦西里耶夫是金屬車間的機修工，中學是在斯維塔那個中學上的，1940年的時候，他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大一剛上完就被捕了。列夫常常和他倆一起暢談莫斯科的往事，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伯朝拉，這北地的景物一片慘淡荒涼，列夫寄信的時候，恨不能鉆進信封里，隨信回到他魂牽夢繞的莫斯科：

今天灰蒙蒙的，陰云密布。秋天偷偷地、一聲不響地爬了過來，張開它那張漫天大網，把伯朝拉罩起來，罩住森林、堤上的房屋、我們這個工業區的樓房與煙囪以及那冷漠陰郁的松林……莫斯科的秋色對得起列維坦、對得起庫因芝（ArkhipKuindzhi）[25](#__25)[1]。金秋時節，黃葉飄零，干樹葉在腳下颯颯作響。如今，莫斯科顯得多么遙遠啊。但是，我想，莫斯科的一切肯定一如往昔，人和以前一樣，街上的景色也沒變。你也和過去一樣。我還能看見的，都是幻覺么，都將消失么？我可不愿這么想。我在這張紙上寫了多少憧憬啊，任由想象飛馳，沒什么邏輯可言。這不是一封信，是一捆凌亂的感情。

斯維塔描繪了一幅更加真實的圖畫來給列夫排解鄉愁。她9月10日給列夫寫了一封信：“莫斯科沒有金秋啦。莫斯科一點兒都不像你想象的那樣了。人滿為患，坐電車最難受了。人們都煩躁易怒。罵人，甚至還打架呢。地鐵總是擠得滿滿的，換車的那幾個車站最擁擠，車站都招架不了。”

斯維塔寫第1封信的時候許下諾言，以后要給他多講講自己的工作情況。后來果然講了很多。她那研究所很大，里面分各個車間和實驗室，有員工六百五十人，其中一百二十人是工程師，還有五十個研究員和技術助理，剩下的是工人：鉗工、建筑工、機修工。很多工人都攜家帶口，住在破舊的木頭房子里。那些房子本來是給橡膠實驗廠造的，戰前就有了。斯維塔所在的那個實驗室正在試驗用合成橡膠（丁鈉橡膠）做輪胎的新方法。她的工作包括很多科研和教學，還要學英語，以便及時了解西方的最新進展。她的畢業論文題目是：“橡膠的物理力學特性”。西方的最新進展要在論文里進行闡述。

斯維塔的研究包括軍事應用項目，所以被視為“國家機密”。她可以接觸到“封閉”的資料，即秘密情報，有蘇聯技術，也有西方的出版物，等等。所以，和一個囚犯保持聯系，對她有很多風險。如果被人發現給勞改犯寫信，幾乎肯定會被研究所開除，并且會涉嫌向已經定罪的“間諜”泄露國家機密而遭到逮捕。她研究所的同事當中，只有兩人知道她和列夫的關系：一個是她的密友貝拉·李普金娜（BellaLipkina），比斯維塔小三歲，和她是一個實驗室的；另一個人是她的老板，名叫米哈伊爾·濟德齊克（Mikhail Tsydzik），這個人是個化學專家，五十六七歲吧，頭發都花白了。他和斯維塔父親是老相識了。斯維塔和濟德齊克處得很好。他對斯維塔也一直很好，像父親一般保護她，行政事務都托付給斯維塔，因為他自己身體不太好。斯維塔對列夫說：“不管什么事，不管什么人，我都可以和他隨便談。”

在很多方面，斯維塔都很幸運，但是，很顯然，她的心思不在科研上：

從早晨九點到晚上六七點，一天干到晚，一刻也不休息，這可真難熬，我是親身體會到了。通常，上班的時候，事情一件接一件，教完書去指導別人做實驗，然后再去學習……學完了可以稍稍談談音樂會，談談書……可是，在這里工作就好像是在流水線上干活似的：我寫，濟德齊克念，一個女青年抄寫，還有個女青年畫圖，但是我自己還得再讀一遍，因為那兩個女青年，標點符號點得不好。弄完之后，大家在文件上簽字……給學術秘書和注冊辦公室寄去。那三篇科學方法論，就是這么趕寫出來的……關于防霜凍那篇是我的第一篇工作論文。現在，除了方法論，我們還寫了《采用撞擊破碎辦法制定全蘇國家防凍標準項目書》。向各主管單位、各審查委員會報批，很可能要花一年多的時間。我的工作就是寫高溫和低溫狀態下的彈性變化。但是，我已經煩死了，一點兒都不想做。

斯維塔日程排得滿滿的：周一和周四下班后上英語課，周二和周五有技術培訓，周三晚上有高分子聚合物的課，周六還要去上必修課“辯證唯物主義”。星期天得用配給卡去買菜（肉、蛋、糖、奶制品，全都定量供應，有時連面包也定量，像戰爭期間一樣，什么都要票），或者出城到郊外別墅周圍的小菜園里去摘蔬菜，斯維塔家人在那兒種了幾樣蔬菜。

斯維塔通過社交活動來散散心。但是，社交并不總是樂事。她和列夫在學生時代認識的人，戰爭期間很多都被打死了。她給列夫寫信說：“我不常和大學的同學見面，見面讓人傷心。”她的女性朋友大多都已經結婚有孩子了，讓斯維塔感到有一絲嫉妒。當年和列夫同去的地方，現在她獨自一個人去，快樂中隱隱地夾雜著悲傷。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今天下課以后，學術秘書提議到莫斯科河岸上去走走。這一走就走到了石橋，過了石橋，穿過亞歷山大花園，走到了地鐵列寧圖書館那一站。一路上，我很傷心。”

斯維塔盡力讓老朋友們都和列夫聯系。她知道，列夫收到大家的來信，心情會好些。第一個給列夫寫信的是亞歷山大·茲連科（AleksandirZlenko）。他是9月19日給列夫寫的信。當年，他和列夫都是戰俘，一起被關在德國萊比錫的戰俘集中營。

親愛的列夫，你好！原來你還活著吶？我不知你身體好不好，但好像你還活著啊？斯維塔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告訴我你又冒了出來，但別的什么都沒說，只把你的地址給了我，還提到什么藥來著（問她）！

列夫物理系的同學，納烏姆·格里高洛夫（NaumGrigorov），給列夫寄了一封信，信里夾了一張他兒子的照片，孩子剛出生不久。給列夫寫信，對他是個風險很大的事，因為他是黨員，還是莫斯科大學的研究員，研究亞原子物理的。然后，列夫認識最早的老朋友葉甫蓋尼·布克（EvgeniiBukk）的信到了。這布克從小學一年級就和列夫同桌，后來又同在物理研究所工作。沒過幾天，葉甫蓋尼母親也來了信。他媽媽是個演員，名叫克謝尼婭·安德烈耶娃（KseniaAndreeva）。從這封信里可以看出，戰爭快結束時，斯維塔是什么心情。當時，斯維塔絕望了，以為永遠也再見不到列夫了，愁得不怎么和葉甫蓋尼一家來往了。起初，克謝尼婭百思不得其解：

我很驚訝，很是生斯維特拉娜的氣，她突然就不來看我了，我怎么也想不通。我甚至跑到大學去找她，但是很難找啊，因為我只知道她的名，別的一概不知。我想她可能攤上什么事了吧。但是，現在我明白了，為什么當時她不來。

列夫擔心，很多朋友、很多遠親，恐怕都不想和他這個勞改犯通信了。他10月23日給斯維塔寫信說：“我很怕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來自世界上我們這個角落的問候，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接收的吧……你可能覺得自己的看法更加正確吧，那可不一定啊，恐怕你想錯了，并不是每個人的想法都像你那樣。”列夫心里有這樣的疑慮，斯維塔一聽就煩了。斯維塔在第5封信里，把列夫狠狠“訓了一通”：

現在咱們談談雨傘的事兒[26](#__26)[1]。列夫，如果有人來敲你的門，即使他和你不是很近，不管他是哪里來的，請告訴我，你會不會讓他進來啊？你當然會讓他進來啦。你憑什么把別人往壞處想，把你自己往好處想呢？我知道，你不是這么想的，但是，實際上就等于是這么想。可能是因為我有點兒被慣壞了，慣壞了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覺得，接受別人的照顧、接受別人的關心、接受別人的幫助，甚至是相當大的幫助，這也不是什么難事啊，要是我，我也不會因此就投桃報李，去報答人家。我的良心允許我接受，因為我同樣會做出這些善舉的，受益人倒不一定是同一個，也許是別人。列夫，你需要對別人好點兒，隨和點兒。有些事情，有些問題，都要這樣想才對。列夫，自高自大能誤事，自慚形穢也能誤事。原諒我坐在家里倒教訓起你來了，給你講這些普通的大道理，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11月14日，列夫寫了第16封信，做了答復。列夫心情郁悶，早憋了一肚子苦水，以前從來沒跟人說過。一看斯維塔這些話，心底里的話頓時迸發出來，一寫就是一大篇。五年的監禁使他心生疑慮，到底還有沒有人把自己當回事兒呢：

我讀了你的訓誡，斯維塔。我很難同意你的觀點。換了我是你，很可能我也會說出同樣的話，但是身在此處，會產生不同的想法，對事情的看法也會扭曲、也會太多疑，你聽了會氣得發瘋的。都怪心里的創傷太深了……會把很多事情搞顛倒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相信我的話吧？……如果五年來你什么都沒有看見，心里只記得往事，不知道過去的物（和人）是否還存在，既不知道過去的人現在生活怎樣，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活過來的，那么，你想象的情況肯定都是在無知的狀態下設想出來的。斯維塔，我的設想之所以非常糟糕，并不是因為自尊心在作怪，也不是受到了屈辱，而只是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無知是懷疑的根源。所以說，你的邏輯推論，和我的自然邏輯推論一樣，全都錯了……但是自從收到了奧爾加姨媽的來信，從那一刻起，一切都突然清晰起來。每個字都好像又活過來似的。我現在是亂寫一通，本不該寫這些的。我現在正抓耳撓腮，可是怎么撓也沒用啊。斯維塔，請原諒。

原來朋友們并沒有拋棄他啊！列夫知道以后，心情為之一爽。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轉達了老同學伊琳娜和舒拉的問候，列夫回信說：“看來，朋友們都不覺得我們的命運對他們有什么冒犯。果然，誰都不嫌棄我們，這太好啦，這真是太好啦。”

列夫知道朋友們在關心他，心中已感到溫暖。斯維塔的愛，更是他的精神支柱。列夫的人生就在這些信里頭展開了。10月份的時候，第3封信干等不來，列夫先把信寫好了：“你的兩封來信就是我的全部藏書啦，我每時每刻都帶在身上，彌補了我想念的一切：人、音樂、書。”每次收到信，他都激動不已。列夫后來對斯維塔傾訴過這種心情：

每次看到信封上寫的是我的名字，并且是你的筆體，我總是百感交集：簡直不敢相信，驚訝，喜悅，踏實。真是我的信，真是你寫的啊！這個心里話，簡直是沒必要講，那不是明擺著么？此言一出，我就開始后怕了，仔細想來，既然是明擺著不用說，那你以后給我寄空信封來可怎么辦。

列夫習慣睡覺之前把她的信拿出來讀一讀。“我得先拿毯子把腦袋蒙起來，否則，周圍那些人看到我樂不可支的樣子，會懷疑我有病，非把我抬到衛生所去不可。”

斯維塔的信給列夫帶來了希望。斯維塔生日那天，列夫收到了她的來信，說她的目的就是要給列夫帶來希望——讓他覺得世界需要他：

列夫，聽我說。你是否仍屬于生活的一部分，首先要看你是否已出局，遠離了生活。但是，才出來五年，時間太短，看著你長大的人不會認為你已經出局了，我也認為，五年太短，不能認為你已是局外人。對于大學的同學來說，對于研究所的同事來說，或許你僅僅是個回憶，但人生還是人生，你就是我的人生，因為沒有哪一天我對你不是朝思暮想。

列夫的回答是這樣的：他承認，現在他倆互換了角色。戰爭以前，是他給斯維塔一點一點兒灌輸樂觀主義，現在反過來了，是斯維塔在給他鼓勁兒。列夫心情一落千丈，“怎么也樂觀不起來”，釋放也許沒希望了，刑滿之前見上一面恐怕也沒指望了。10月15日，斯維塔的回信來了：

你說得對，我是在給你打氣兒，讓你樂觀起來。眼下，這不就是我的主要目標么？你說得對，現在的情況是更復雜了，也更困難了，我的頭疼事兒是比你少。你覺得最終的目標沒指望了。列夫，怎么能有這種想法呢，虧你怎么想的！……希望在于堅持？對，就是在于堅持！常言道，無為則無成。我理解，你現在做什么都不容易，但是，漸漸地，希望會越來越大，愿望也會越來越強的。暫時先等等，會好的。不用我說，我的生活是比你容易，比你快樂，肯定比你輕松：我有家，有藝術，有科研，有朋友。可能是薇拉·英蓓爾[27](#__27)[1]說的吧：“既然一事即可，為什么萬事操心呢！”這幾天，我就拋下萬事，只做一事。咱倆都要這樣。我別的什么都不想，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行。列夫啊，我的信，總是想提升你的心情，如果沒能做到，反而給你帶來痛苦，請原諒我。如果有時候我寫了什么胡說八道的話，那沒辦法啊，很久以前人家就給我算命了，看我的手掌紋，我的筆體，還有各種其他跡象，算命的說，我這個人是腦袋聽從心指揮。

斯維塔似乎覺得，迄今信里寫的還不足以使列夫看到希望，于是，在第18封信里，寫了下面這些話：

列夫，我一直都是相信你，什么都相信你。過去相信，這些年來都相信，現在還是相信你。確實，誰也不能為將來打保票。但即使是現在，我也對我們的未來充滿信心，雖然畫面我現在想象得不很清晰。最要緊的，是我們能夠團聚。至于別的，全都無所謂。我現在已經明智多啦，不能讓那些無關緊要的小事兒，讓那些我們掌控不了的事情壞了這個最重要之事。我注意到，你在信里又一次提到了“德行”這個概念。列夫啊，你可曾想到，我上大一那會兒，對你的德行有多生氣么？……這些年來，我多次深刻自責，悔不該壞了咱倆的好事，悔不該那么折磨你。我怎么那副德行呢，真是天曉得。或許，一直都沒有機會請你原諒，每念及此，我深自痛悔……列夫啊，不久以前，我和一個小姑娘談天，泛泛地談人生，談人生的艱難困苦什么的。她說我是最幸福的人兒，她們都沒有我幸福。她話里的意思是說，咱們倆都沒有壞咱們的好事，也沒有壞各自對方的事（至于外人誤了你的事，那是次要的）。聽她這么一說，我倒沒有反駁。確實，列夫啊，她們沒有你，所以她們不可能是“最幸福的人兒”。我不早就有言在先嗎，現在又被邏輯和辯證法證實了！人們已經多次向我證明了，有的是口頭證明，有的是用行動證明：如果一對戀人住的是破茅屋，那么，必須不漏雨、不透風，又保暖又隔熱，必須要有電、要有煤氣，這類的東西都應該具備，否則這一對兒怎么會幸福得了呢！但是，列夫啊，我可沒有喪失信心。只要我早上醒來看到你在我身邊，晚上給你講講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事，然后把你拉到面前，看著你的眼睛，只要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好一個“只要這樣”！說得輕巧，是吧？眼下，只要收到你的第10封信，我就知足啦。說一千道一萬，我只想對你說三個字：其中兩個是人稱代詞，一個是動詞（動詞的所有時態都在：過去時、現在時、將來時）[28](#__28)[1]。

列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一連想了好幾天，應該怎么回應斯維塔的愛情宣言呢。12月1日，列夫終于在發電站的機房里坐下來。他拿出一張寶貴的信紙，動筆寫第22封信。但是，搜腸刮肚，卻怎么也想不出恰當的詞兒來。

這封信不能再拖，我得動筆寫，面前擺著這張空白的信紙，我都坐了十分鐘，鋼筆尖兒幾次蘸上墨水，沒等字寫出來筆尖兒又干了。斯維塔，我都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你了，也不知道該寫些什么了，雖然我有一肚子的話要對你說，想一吐為快。都怪你，都是你那第18封信惹的禍。看完你的信，我都睡不著覺了，滿腦子都是你。

有斯維塔的愛，列夫覺得自己很幸運，覺得自己苦海得救了。雖然自己兩手空空，什么也給不了斯維塔，連出獄的希望都給不了她，但斯維塔還是對他一往情深。列夫是個勞改犯，可斯維塔不在乎，照樣愛他，并且心甘情愿地等他，列夫深深地感激斯維塔。不過，列夫內心很是不安，既有負罪感，又覺得對不起人家。他不想成為斯維塔的負擔，也不想成為任何人的負擔。正是因為如此，他最開始的時候是給奧爾加姨媽寫信，不是給斯維塔寫信，也不敢去“敲親戚朋友的門”。斯維塔心里明白。正如她對列夫說的：“自高自大能誤事，自慚形穢也能誤事。”

斯維塔不愿意列夫有自卑感，兩人經常爭論不休。斯維塔常常以憐愛之心，積攢了大包小裹給列夫寄去。不承想，惹來列夫一頓抗議，說他什么也不缺，只要斯維塔來信，寄點兒紙和筆或幾本書就夠了，還囑咐她千萬別為他浪費錢和時間。斯維塔不為所動：

至于郵包，不讓我寄可不行。眼下，唯一能給我們帶來些許滿足感的，就是這郵包了（生活中其他事情，雖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給我們帶來任何喜悅）……20日那天寄的包裹里究竟有什么東西，媽媽叫我告訴你……清單如下：一件白色襯衣，厚襪子，襯褲，毛巾，頭巾，肥皂，牙膏，牙刷，木梳，拖鞋，線，紐扣，兩聽罐頭（約重一公斤），一盒巧克力（用紙包得奇形怪狀的，但爸爸堅持要包成這樣，說是這樣就不怕老鼠啃了），紙，一本教科書，一些鉛筆、鋼筆、墨水，葡萄糖，抗壞血酸（有人不知道，其實就是維生素C）——看在上帝的面上，一定要吃啊！

列夫還是抗議。他不僅覺得自己是個負擔，而且還像小孩似的無助又無奈：

斯維塔啊，顯然，上帝或是其他什么人，正在因為你不聽我的話而懲罰我呢。你不要費心寄包裹了，叫你別寄，你就別寄……這些東西，占用了你很多時間，費了你很多體力，百分之九十我得負責——連你也否認不了了吧。你可能想不到，真讓我傷腦筋……報答你，我又無能為力……我都三十歲了，到頭來還要像孩子似的，讓人一勺一勺地喂飯，真是無奈。應該是我來照顧他們才對啊……還有什么比這更讓人上火的么？請原諒我話說得這么沖，可是我得把話講明白。

列夫說話很少這么沖，也很少要把話講得這么明白。他早期的信里，講他在勞改營的處境，話總是說得很小心，力求留給斯維塔一個正面的印象。自哀自憐可不是列夫的性格，他生性堅強。他主要不是擔心自己，而是擔心斯維塔。如果列夫詳細說出勞改營的生活狀況，恐怕斯維塔會掛念他。列夫從來沒有寫過挨凍受餓的情況，說的正相反，什么暖和啦，飯夠吃啦，等等，幾乎沒提起過看守。那幫家伙對囚犯心狠手辣，非打即罵。木材廠是勞改營，它的檔案材料里寫得明白，在列夫剛進來的頭六個月內，有好幾次，獄卒濫殺無辜。有一群看守喝醉了，開槍把一個囚犯打死了，還有的命案不是槍殺的，是用別的兇器把人打死的。這些慘案，列夫不可能不知道。勞改營里都傳開了，盡人皆知。但列夫在信里壓根兒就沒提這些。

他轉而去寫這北方萬里碧空如洗。抬頭看看藍天，心馳神往，暫時擺脫了勞改營區的壓抑。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地方他倆都能看到，那就是天空：

這里的秋天很美麗。晴空萬里，暖意融融。早晨，一抹秋涼，一抹寒意，靜心怡神，精神為之一爽。北極光和群星競相閃爍，不知哪個更亮。北極光仿佛一道明亮的惟幕，用藍紅綠三色的探照燈光織成，在天上閃光，變幻無窮，漂亮極了。感謝上帝，北極光象征著人類的幸福，輕盈，寧靜，總是令人對未來充滿憧憬，但又不可企及啊。

可惜了他倆這大好光陰，就這么白白浪費了，列夫很痛心。他在第8封信中感慨萬端：

我看著勞改營里周圍的人們，他們現在的境遇和過去多么不同。他們的精神境況變得都認不出來了。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老了也老不到這個地步啊。如果總是這個樣子，那可就壞了。記得你說過（當時你坐在桌旁，手里拿著一本書，《原理》還是《熱動力學》什么的，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是一天傍晚，桌上的燈嗡嗡地響，我站在鋼琴旁邊），人會隨著時間變的，如果不變就不是他們了……你說得對。你自己變沒變啊，小斯維塔？要我說么？好，要我說呀，我天天都見到你，你過去長得什么樣，我知道，你現在長得什么樣，我也知道，雖然你頭上的每根白發都叫我遺憾，雖然你眼角多出來的皺紋也讓我心疼，但這都是免不了的啊，長了白發，多了皺紋，絲毫不會減少我對你的感覺，只會增加你的風采。如果這就是所謂老年，那又有什么關系？你是我的整個世界，過去是，將來也永遠是。你過去的容顏怎樣，我不管，反正你將來永遠是我的斯維特，我的光明[29](#__29)[1]。

斯維塔也有同感：“這日月如流水般過去，人也在變，這倒不假。但是真會變得不如從前么？”

這，我倒不知道，列夫，我覺得，每個年齡都有好的一面。我十七歲到十九歲那會兒，最擔心年齡、擔心時光流逝。我當時覺得，我這一生不是過去一半了嗎，還是最好的前半生呀，可是一和你在一起，就再也不會想到年齡不年齡的問題。那時，我的生活很美好，似乎會一直好下去，不會有太大變化似的。過去這五年，我可能更老成了，我自己很難判斷，但是至少我還沒老（“老成”是一回事兒，“老”是另一回事兒）。其實，我關注年齡，倒也沒往深處想，只是希望不要容顏老去。我倒是想留住青春，把父母給的那點兒美麗留住——作為給你的禮物。

也就在那個時候，列夫盤算著，還剩下三千三百六十天，刑期就滿了。他每封信都數著天數，告訴斯維塔，還剩下多少天就刑滿釋放啦，就能看到她那“漸漸變白”的頭發了。監獄營區發生的事情，列夫揀主要的，對斯維塔說。每封信獄方都仔細審查過，一個字都不漏掉。那第一個秋天的重大新聞就是他從勞改營的干燥車間轉到了發電站。列夫沒受過電氣工程師的培訓，沒這方面的經驗，但獄方認為，他是學理科出身的，擺弄高壓線沒問題，夠格兒。勞改營里沒幾個工程師。勞改營管理局叫犯人干這種危險活兒，安全不安全，它才不管呢。9月2號，列夫在信中報了這個信兒：“我終于換了工作，這個活兒我比較喜歡，比原來那個強。”

我轉到電力部門來了，當鉗工。我喜歡這個工種。這兒的活兒，操作起來比那邊難度大不少，但是這里的人可強多了。我在這兒干得很開心，連星期幾都忘了。今天是2號，星期一，對吧？我得多學習學習，因為以前在工廠，我只干過裝電線，電氣安裝也干過一點，可是現在我做高架電纜。如果你見到電氣安裝手冊或者電氣工程教科書什么的，請寄給我。

列夫能轉到發電站來，多虧一位朋友幫忙。這位朋友名叫尼古拉·里列耶夫（NicolaiLileev），當年也是戰俘。列夫是在德國法蘭克福開出來的囚車上認識他的。里列耶夫剛到伯朝拉的時候，得了壞血病，病得可不輕，什么活兒也干不了，只有發電站還勉強能干。后來，里列耶夫向電工組組長推薦列夫，建議把列夫調到電力部門來。這電工組長名叫維克托·齊津，也是勞改犯人。他是1938年被捕的，判了十五年勞動改造，到伯朝拉來服刑。他原在沃洛格達一個發電廠工作，當班的時候廠里失火，就把他抓了起來。他非常懂工程，技術特好，獄方很器重他，就讓他來當電力組組長，負責木材廠這個勞改營的全部電氣維修。勞改營里，像齊津和斯特列里科夫這樣的犯人很多，有專家，也有管理人員。1946年，木材廠負責生產的負責人，有一半以上其實都是勞改犯。里列耶夫推薦得正是時候。這木材廠的生產遠遠完不成計劃。缺電問題特別嚴重：發電站供電量嚴重不足，干燥車間、制材車間以及其他車間，一半以上的需求都滿足不了；三臺發電機（以木材為燃料的蒸汽機）的裝機容量是七千千瓦，實際運行才四分之一，還常常出故障，運轉不了。火災頻發，事故不斷。一年到頭，總是缺電氣技師、工程師、機修工、化學師。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內務部決定從囚犯中多招收、培訓二百一十二名專業技師。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對于囚犯來說，能在發電站干活，那可是個美差，高人一等。按古拉格的標準來衡量，發電站的活兒特別輕巧，和拖運隊那種累斷腰的苦役比起來，簡直是霄壤之別。勞改營一般是兩班倒，一班十二個小時。發電站三班倒，一班只有八小時。勞改營管理局這么規定是為了減少事故，疲勞過度就出事故。在發電站當班也容易，平時沒什么活兒，就是查一查設備運行情況，檢修一下，所以有很多時間，可以看書、寫信、打牌、下棋、玩多米諾骨牌。發電站里總是暖融融的，司爐工和機工有一個專用淋浴室，列夫可以去洗澡，用熱水洗衣服——這可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一般都是澡堂子，常常丟衣服，水也是冷水。發電站里沒有看守，犯人上工也沒有看守押送，所以列夫和發電站的朋友們可以在工業區內自由走動。發電站旁邊的房子里住的都是刑滿釋放后自愿留下來工作的工人，叫作自愿工，列夫可以去串門兒，還可以去木材廠的倶樂部玩。俱樂部這地方，其他囚犯是不許進的，里面還放映電影，有一臺收音機（只能收聽伯朝拉勞改營廣播電臺），從附近商店還可以買伏特加喝，買煙抽；收工回去的路上，還可以順便到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看看朋友；工棚子宿舍，隨便進出，基本上沒有限制。列夫回憶說：“從工業區進到工棚子宿舍，中間要經過警衛室，只要報出姓名和囚犯編號就可以進出。一個專用案臺上放著一個記事本，值班看守會把我們出人的時間記下來。有時候，某個當官的來巡查，會收緊一點兒，但整個來說，各方面都挺松。”

1946年秋天，列夫上白班，早晨八點上工。因為他上工的時間比其他囚犯晚，所以，起床也比別人起得晚，六點起床，早晨吃早飯的時候，強勞隊的囚犯們正在火車站貨場上點名呢，看守一個個點名，大家高聲回答“到”。強勞隊很多人的干活地點，要列隊走一個小時才能到，收工后回來，還要再走一個小時。列夫上工，只要走八分鐘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列夫正在發電站值班。于是，午飯有人給他送來。上工這幾個小時，也沒什么事，只要看住機器就行了。列夫就給斯維塔寫信。10月30日，他寫道：

這一天的活兒干完了；安裝的活兒，今天沒有了，明天才有。再過一小時，來接我班兒的人就到了。機器轟鳴，自己說話都聽不見，不過，沒關系，我不在乎，習慣了。窗外，一小時以前，深藍色的暮色變成了黑夜。現在，伯朝拉一片漆黑。

發電機機房不通風（像蒸桑拿似的——又熱又有潮氣），所以信紙不容易保持干燥。但白天在發電站寫信比較容易，如果夜里在宿舍里寫，那可就難了。宿舍人聲嘈雜，比發電機機房還厲害，天棚上吊下來的燈泡，光線“太暗，發黃，桌上不放個煤油燈，根本寫不了，看不清”。

下工以后到吃晚飯、睡前點名這段時間，列夫有空。通常，這寶貴的幾個小時，他是在實驗室度過的。斯特列里科夫喜歡在實驗室款待電工組的朋友。9月2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眼下，活兒干完了。我正在享受著實驗室主任的招待呢。我坐在文化和‘科學’的環境中，周圍全是罐罐、砝碼、燒瓶、試管。四周靜悄悄的，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只有喇叭里傳來悅耳的瑪祖卡舞曲的聲音。”斯特列里科夫格外喜歡這些年輕的電工，大家也都景仰他。里列耶夫回憶說：“我們在實驗室度過的時光是有生以來最幸福的。有機會能去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我們從不放過，肯定去。有時——大家上同一個班的時候——趕上誰過生日，有什么周年紀念之類，大家還能過去聚一聚，熱鬧熱鬧呢。”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是大家的避難所，大家可以在這兒存放信，存放包裹，存放其他貴重的東西，如果放在宿舍里早就丟了，看守偷，其他囚犯也偷。勞改營條件嚴酷，單調無聊，實驗室可以給大家幾個小時放松的時間，緩解緊繃的神經。電工們去那兒喝點兒小酒，抽幾口煙，聽聽收音機播放的音樂會，玩玩牌，下下棋，看看信，也寫寫信，也有什么都不干，專門來聽斯特列里科夫說話的。斯特列里科夫“非常健談，故事講得有聲有色，沒有他不知道的事兒，凡是讀過的，他都記住了，娓娓道來，你會聽得入了迷”。列夫告訴斯維塔說：“我聽他講故事，聽得我張著大嘴，半天合不攏。”



列夫在實驗室

有六七個電工經常聚在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里。其中有一個，正是柳布卡·德爾列茨基。列夫在集體宿舍的床鋪離他的床很近。他和列夫都在發電站上白班。列夫很喜歡和這個烏克蘭青年在一起，很護著他。柳波卡已經在伯朝拉關了六年了，身體都垮了。列夫11月15日給斯維塔寫信說：“柳布卡這小伙子非常好，和別人大不一樣。”

他看上去二十四歲左右，非常聰明，有幽默感，性格開朗。在烏克蘭利沃夫上學的時候，學的是物理，又自學了電氣工程……他喜歡俄國文學。過去讀書都是波蘭文，他很懷念那會兒……他有過很多遭遇，六年來都沒敢給父母寫過信，無時無刻不在思念他們，可就是不敢寫信。為什么不敢寫，和他一聊就明白了。他是一個非常謙虛、誠實的人，絕對良家子弟。他很用功、努力。他好像徹底絕望了，以為一旦進了勞改營“再也沒有出頭之日了”。有時，我聽他講話，好像是在聽我自己講話似的。他說，我的思想邏輯性很強，但是，斯維塔啊，我遵循的邏輯只有一個，都在你的信里寫著呢。

列夫的另一個同寢室伙伴，莫斯科老鄉廖沙·阿尼西莫夫，也是斯特列里科夫圈子里的，還有那個格列勃·瓦西里耶夫也是，他和斯維特拉娜在莫斯科上的是同一所中學。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格列勃數學特好，精通詩歌，能倒背如流，大家都嘆為觀止。但他對外不張揚，只供‘內部消費’。這一點，我也很喜歡。列夫愛和格列勃一起回憶莫斯科。格列勃老婆兒子住在莫斯科，丈母娘跟她們母子倆住在一起。列夫把他的朋友一一作了介紹，詳細描述了一番。格列勃聽了，好像都認識了似的。列夫把斯維塔信中寫來的莫斯科新聞，一一講給格列勃聽，但沒怎么介紹斯維塔的情況。列夫對斯維塔是這樣解釋的：“我不能和任何人分享你。你是我的！”這伙朋友當中還有一個人，名叫奧列格·波波夫（OlegPopov），二十二歲，一半拉脫維亞血統，一半俄羅斯血統。列夫告訴斯維塔說：“奧列格這個人太好了。他說俄語有一丁點兒口音，有些字不認識，但是，聽他背生字，那可真好聽啊。”列夫“每天都和奧列格談天，有時講英語，講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都很有意義”。列夫心里有一種莫名的滿足感。他喜歡奧列格那種“天真的聰穎”，覺得他是“璞玉渾金（天然美質）”。

最后要說的，常來斯特列里科夫實驗室聚會的，還有“兩個尼古拉”：利特維年科（Litvinenko，“小尼古拉”），政治犯，二十一歲，來自基輔；里列耶夫（Lileev，“大尼古拉”），二十四歲，來自列寧格勒，向齊津推薦列夫的就是他。他也像列夫一樣，也是被秘密警察系統那個所謂“處死間諜”隊逮捕的，被捕時間是1945年，以背叛祖國罪被判刑十年。他也在德國集中營里關押過，德軍強迫他當翻譯，后來又強迫他當集中營小組長。當初，他和列夫是在法蘭克福開出的囚車上認識的，后來兩人關系特別密切。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比小尼古拉還要謙虛，也更加直爽……小尼古拉對生活更實際，總有能耐沾點兒便宜，結果，有時候就顯得不太實在——你知道的，我不喜歡不實在。”里列耶夫更加淳樸、更加直率，有時簡直是“沒有分寸了”。這個弱點，剛開始的時候，列夫并不在意，后來，天長日久，就越來越煩了。



斯特列里科夫（前中）與朋友們一起在實驗室里：列夫（前右），發電站化學工程師科農·特卡申科（前左），那“兩個尼古拉”站在他們身后（利特維年科在左，里列耶夫在右）

11月18號，列夫借用果戈理的話：“上帝啊，這世界不至于如此無聊！”[30](#__30)[1]和斯特列里科夫這伙朋友在一起，即使在伯朝拉勞改營這樣被上帝遺棄的角落，也有高興的時候。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收工以后，我去看斯特列里科夫，在實驗室待了一個小時，聽收音機播放《特轄區主管》[31](#__31)[1]。心情愉快極了……七點，我動身“回家”，幾分鐘以后，我就津津有味地默默吃著晚飯。吃完了飯，簡直像在家似的，我去蒸桑拿。請原諒，我的筆跡太潦草了。這地方白樺樹不太多，但是白樺樹綠色的樹枝還不少。廖沙·阿尼西莫夫叫我不要丟了莫斯科的風俗，硬拉我去蒸桑拿。蒸完桑拿，要喝好茶。但是尼古拉（里列耶夫）說，這風俗早過時了，不要理睬。于是，我們一起喝咖啡，頭上是雙縐燈罩，一百五十度的燈泡。（這是在他們宿舍。很遺憾，我們不住這兒，離這里有二十米遠，我們那邊兒的燈泡才四十度。燈泡亮標志著家里舒適，這里是用燈泡瓦數來衡量家的舒適度的。）你瞧，我們這些美食家——咖啡代用品，我們可受不了，必須得喝真的咖啡。鐵杯子里冒出咖啡熱帶的芳香，我們一邊聞著咖啡的香氣，一邊愉快地談論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新西伯利亞[32](#__32)[2]。喝完咖啡，九點鐘。按照當地標準已經晚了，我們就到戶外去呼吸清冽的空氣，看看天上的星星。但是，星星被云層遮住了，月亮才露出來不點兒。那邊是松林，這邊是勞改營的破宿舍，中間是羊腸小道，我們慢悠悠地走著。宿舍墻壁最近剛剛新刷了，像鄉下房子那樣抹上了灰泥，煙囪冒出煙來，窗戶眼兒里亮著黃色的燈光。十一點報時信號響了（這是叫宿舍熄燈的），這時我們才想起時間來。在五分鐘之內，我們就從想象中的莫斯科“小劇院”[33](#__33)[3]屋頂下直接進了被窩里。我們這兒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1946年的冬天來得早，給這個木材廠勞改營來了個措手不及。勞改犯人的靴子、帽子、手套、棉襖都不夠，而很多房子也已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河面早已凍上了，這一凍上，木材就缺了，因為上游的勞改營沒辦法把木頭順河漂下來了。

12月中旬，氣溫降到零下三十五度，郵遞員送信特別慢，幾乎就不送了。列夫1946年最后一封信是12月25日寄出去的，過了兩個半星期，還沒收到斯維塔的回信。列夫愁得快急死了，因為前些日子斯維塔發高燒了。“斯維塔，我掉到絕望的海洋里，快淹死了，游不上來了——沒有信來。”12月9日，列夫寫了一封信，滿以為這是新年前斯維塔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呢。這是他寫的第24封信。信里寫得很明白，列夫只有一個祝愿，就是祝斯維塔一切均好，萬事如意：“我的祝愿？祝你、祝我們，祝愿什么好呢？我只祝愿我自己收到更多的來信……如果我還可以祝愿別的什么，我就祝你新年健康、愉快，無論怎樣都無憂無慮，和朋友一塊兒過新年。”列夫打算除夕和斯特列里科夫一塊兒喝茶。斯特列里科夫最近面容憔悴，患了腸疾，動了兩次手術也沒好。25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表面上不在乎，假裝沒事兒，但是，只有那些不熟悉他的人，才會被他蒙過去，才會看不出來，他這是裝的，在硬挺啊。看他的臉色就清楚了……斯維塔，想想辦法，寄點兒什么，能治肚子疼的。”列夫就是這樣的人，總想著幫別人，自己從不張嘴要什么。

那些日子，斯維塔也是急得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她在除夕夜給列夫寫信。列夫12月9日的信，她還沒收到。斯維塔只想和列夫在信里說說話，所以，那天夜里決定待在家里，不出去了。她寫道：“過年過節沒有你，你我遠隔千山萬水，我過膩了這種日子。”

我在哪里都不開心，說實在的，除了伊琳娜，誰都沒有看出來。不過，我把阿列克[34](#__34)[1]哄得很高興——我們點亮了圣誕樹，坐在桌邊喝了節日的茶……快半夜了，阿列克剛剛睡著。他害怕睡著呢……圣誕樹真漂亮，枝繁葉茂，郁郁蔥蔥，都碰到天棚了。一個枝兒都沒干巴。亞拉在六個高枝兒頂上都掛上了銀白色的果，最上頂有一個紅星（當然嘍）。從我家列寧格勒老房子拿過來的裝飾物，我給人給了不少，裝飾他們家的圣誕樹了，但還剩下一些在這兒。圣誕樹似乎讓大人更開心（因為令人回憶過去）。阿列克更愛看奶奶眼鏡上的反光（這是哪兒來的呀？），更愛看那本ABC書，那是他收到的禮物……我和他一起玩文字游戲來著（這個詞是陰性還是陽性？是大寫字母還是小寫字母？）……我也很高興，因為我在和你筆談。這將是新年的第1封信。鐘聲已經響了，我馬上在下一封信上標上“2”。明天，我要去書店搜尋書。我有很多書等著寄出去呢，但是我不敢一次寄得太多。暫時還沒有小盒子裝書，沒有盒子，郵局拒收，不給寄……我忘了是否告訴過你，我買了一套古詩叢書，是出版社給工人子弟編的。最后，我把書里一首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詩給你抄在下面，供你欣賞：

你問我為什么愛上你？

不要盤問，不要懷疑，

不要推測，不要估計。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愛你是因為什么原因？

愛上你是因為什么優點？

我會愛你多少時間？

不要推測，也不要懷疑，

不要追問，也不要盤算。

我倒要問問你，

你到底是我的阿妹，

還是我的嬌妻？

還是一個小孩兒而已？

怎樣稱呼你，我不知曉，

怎樣定位你，我也不知道。

田野里有很多花草，

天上很多星星在閃耀。

我認也認不全，名字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愛上了你？

這個問題我既沒考慮，也沒質疑，

就是愛上了你，

就是跟著固執的感覺走，

它叫我走向哪里，我就走向哪里！

好了，列夫，暫時擱筆。新年已經接來了，該睡啦。祝一切均好。

斯維特1947年1月1日

# 五 秘密信使網絡

在勞改營系統內干活的人，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勞改犯，而是所謂掙工資的自由工人。勞改營里一直都有這類自由工人，但是戰后那些年，他們的數量多了起來，尤其是在木材拖運和土木建筑這兩個行業，最為突出：原先大批勞改犯用手工干的活兒，漸漸改用機器了。有了新機器，就得有人來操作，還要懂技術，有專業知識。于是必須招聘工人，雇來以后要付工資。到了1940年代末，各地勞改營內，建筑業的勞動力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自由工人。

這些自由工人，以前大都是勞改犯。他們服滿了刑期，沒別的地方可去，于是就原地就業了。斯大林大恐怖時期判刑八年、十年的，在戰后那些年，陸續刑滿了。這種刑滿就業的人多達好幾百萬。當局設置了各種障礙不讓他們走，很多人想離開勞改營也走不成。典型的做法是內務部不給這些人發“出營許可”，沒有這玩意兒，專業人員和合格的技術人員就出不去，只好繼續留在勞改營干活。還有的人無家可歸，家人都已經失去聯系很多年了，也有的已經在勞改營里結婚成家了。

1946年，伯朝拉木材廠這個勞改營里，有四百四十五名自由工人，大部分都是內務部雇的，有的是專業技術人員，有的是部門負責人。這些人和家屬住在一起，住址哪兒的都有——有住在監獄里頭的，也有住在監獄外邊的。監獄里專門有一個區域，是自由工人住的，距離發電站不太遠。住在外面的也在監獄里干活。他們的居住條件比勞改犯強不了多少。很多人不是住集體宿舍，就是住工棚里。集體宿舍擠得不得了，工棚也是一個單人間住七個人。1946年10月，該木材廠勞改營的黨委領導開會討論一個報告。報告里說，勞改營里自由工人的住房面積，每人只有一點八平方米。勞改營有規定，勞改犯居住面積，每人一點五平方米。所以，情況沒好多少。那些木頭平房，沒有自來水和抽水馬桶，房頂大都漏雨，所有的房子里，連最起碼的家具都沒有（而勞改營就是制造家具的）。自由工人住的這個地方，在勞改營的一個角落，非常臟亂，室外沒有照明，沒有洗澡的地方，也沒有廁所，只有一口水井。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勞改營扔的垃圾——鋸末子、樹皮、引火材——全是火災隱患，還招耗子。



當年勞改營工業區的住房，右邊遠處是發電站的煙囪。

管理勞改營，自由工人起的作用很大。但一般來說，他們比較向著勞改犯，同情他們，畢竟自己以前也是勞改犯嘛。相比之下，自由工人對內務部、對勞改營的黨領導都不怎么感冒，黨領導也都不信任他們。1945年12月，有一次開會，討論自由工人的問題。勞改營黨委書記維特洛夫同志就說：“我們周圍都是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過去都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志愿隊伍[35](#__35)[1]的宣傳動員工作。”

自由工人和勞改犯打成一片，勞改營當局看在眼里，放心不下。勞改營分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由工人的居住區、勞改營管理機關、機關食堂、俱樂部會所和商店；另一部分是工業廠區。這兩個區域之間沒有真正的隔離帶。列夫他們這些囚犯，當班的時候，可以在工業區內自由走動，沒有看守跟著。1949年的時候，這兩個區域之間有一道鐵絲網。自由工人居住區，進出都要經過警衛室。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鐵絲網也不是天衣無縫。發電站和河邊的外層鐵絲網之間有一片荒地，勞改犯穿過這片荒地，就可以進到自由工人居住區來了，還算容易。以前這兒沒有鐵絲網，只有一個臨時崗亭，進去要登記。那會兒，勞改犯來來去去很正常，常看到他們在倶樂部，和自由工人在一塊兒喝酒。常聽說自由工人和勞改犯同居，看守也有同居的，其中甚至有黨員也搞同居。有的都有孩子了，在一起過。內務部號召加強安全措施，遵守古拉格的規章制度。可是，一來沒資金，二來大家都饑寒交迫的，日子難熬，而且人都是有弱點的，加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到頭來，內務部前功盡棄。于是，在這勞改體系的邊緣地帶，種種小打小鬧的自由悄悄滋長了起來。

很多自由工人都偷偷地幫助勞改犯送信。有的是有償服務，掙點兒錢物。但還是純粹幫忙的人多，他們仗義而為，分文不取，有為了朋友挺身而出的，也有同病相憐助人為樂的。他們把信藏在衣服里，帶出監獄營區，拿到“小上海”那邊的郵局寄出去。他們還通知外面把信寄到他們家，收到信后再偷偷帶進監獄營區。不管是帶出去，還是帶進來，都繞過了古拉格審查人員的檢查。不過，勞改犯和外邊的親友通信，還是寫得含蓄一點兒為好，以免來回送信的人被看守抓住，會牽連別人。內務部也是心知肚明，知道有人暗中幫人捎信，幾次三番決意禁絕此事。獄方擔心的，不只是犯人在信里實話實說，把勞改營的情況照實捅出去，泄露了秘密，而且還有一個更直接的憂慮，就是怕外邊給勞改犯寄假證件、寄錢，幫他們越獄。

到了1947年，列夫交了好幾位自由工人朋友，他們二話不說，隨時準備幫列夫寄信給斯維塔，再替列夫接收斯維塔的來信。列夫寄出的信，倒不是全都經過這個非法渠道寄的，但是每逢要給斯維塔寫重要的事情，列夫就用這個渠道寄出去。3月到6月間，這個郵遞系統逐步完善，后來完全運行起來了。3月1日，列夫有一封重要信件要寄出去，可是他還得等待，等著找人幫他寄：

親愛的斯維塔，我得給你寫一封信，要講很多很多事。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寄出去。等我確知信落到你手里，并且只會落到你手里，我再郵寄。估計會有機會的。確實，一旦寫好了信，等待時機寄出，也是很危險的。我打算寫兩個問題——一是極小極大（minimax，即列夫不服判決，要上訴），二是看看能否見一次面。

到了5月14日，列夫就用這個“新渠道”寄信了。不過，凡事開頭難，還是有點兒問題：“寄信的‘新渠道’暫時停用，特此告知。有兩封信等待寄出，已經等了兩個星期了。”6月2日，列夫可以確認：“用這個新渠道，我的信好像更準時了，因為不必經過瀝青（暗語，指勞改營檢查信件的看守），卡住的危險少了。”

這個時候，列夫的首席秘密信使和列夫同名，叫列夫·以色列維奇（LevIzrailevich），是個猶太人，小矮個兒，眼睛很有神，圓圓的腦袋有點兒禿頂。他住在科日瓦（Kozhva），在伯朝拉河對岸，是個面積很大的聚居點，他在那兒當鐵路調度。列夫5月16日給斯維塔寫信說：“我認識了一位非常有趣的先生。”

我還沒問他的名字，但我們談得很開心……他很聰明，很有文化。原來他是列寧格勒來的，在工學院[36](#__36)[1]上過學（沒讓他畢業），當記者一直當到1937年……列寧格勒的大人物，工業巨頭之類，他都認識。

列夫·以色列維奇于1937年被捕[37](#__37)[2]。被捕前，他是大眾刊物《科技報》的學術秘書，已經寫了好幾本書，其中就有《怎樣親手制作物品：實用手冊，附圖紙四十張》（1927年版），這本書教讀者制作很多東西，復雜的有顯微鏡、照相機，簡單的有家用器具，例如衣架。他的書都是科普讀物。他想在蘇聯群眾中普及科學知識。以色列維奇從伯朝拉勞改營釋放出獄后，就定居在科日瓦了。他住的房子是個木頭房子，半臥在地下，免得透風。他當調度，也常來木材廠兼職，當技術員、修理工。他有一張通行證，任何時間都可以進出工業區。他酷愛攝影，于是給勞改犯照相，然后把照片給他們家人寄去，掙點兒外快。

偷送信件是這么操作的：斯維塔把寫給列夫的信，交給這位“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維奇，并按照他的要求，附上幾樣東西，一并交給他帶走：照相用的相紙、化學品等材料；“同名人”把信帶到勞改營里，交給列夫，所帶物品照價付款給列夫，然后把東西拿走；列夫如有信給斯維塔，“同名人”當場取走。這樣一來，斯維塔不僅能讓列夫收到信、收到包裹，而且還能收到錢。若不這么遞送，看守們就把錢偷去，中飽私囊了。列夫在信里也寫了偷送信件的始末：

（6月16日）我最近又見到了以色列維奇。他還在幫人照相掙錢，顯影劑總是不夠用，我們實驗室資源有限，少得可憐，實在幫不上他什么忙。哦，對了，他說，如果誰要給我寫信，或者給我發電報，可以用他的地址，這樣又快又安全。地址是：科米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科日瓦火車站貨運部列夫·雅科夫列維奇·以色列維奇轉交我收。他隨時可以給我打電話，打到發電站。

（7月24日）以色列維奇非常感謝你的努力。HgCl2只要藥面，別的形態不需要，有硝酸當然更好……他還要6X9的肢卷和光面的相紙，多大的都行，軟的硬的都要。當然，費用他付……太好了，你的信，我現在都能收到了……只要有一個東西，這事兒就可以辦啦，就是攝影材料。這類東西（至少過去）不貴，但是不好寄，他要一公斤左右，先別買，等我通知。

（8月23日）昨天，以色列維奇給我送來兩封信，日期分別是8月10日的一封、12—14日的一封，編號46和47，此前的信還沒到呢……我寫信告訴過你，不要往發電站的地址寄，只往以色列維奇的地址寄，否則你的信會寄丟的，以前的信不就丟失過嗎？

斯維塔過去寫過一封信，問列夫，給“同名人”寄信時，信封上用不用寫上“列夫收”。列夫回信說：“照我說的辦，不要往發電站寄信。我的同名人那兒才是正確的地址。多虧了他幫忙：你可以不寫‘列夫收’。”

列夫很喜歡和他的同名人在一起。兩人都對數學和理科感興趣，每次在一起交談，列夫都覺得很有意思。

和他交談，受益匪淺。除了談話的快樂之外，還有一點，我最喜歡：有時，他不如我知道得多，但是他有數學思維，所以悟性比我強。如果我太超前，蛋未孵出雞就開始數雞，他肯定會來糾正，叫我先別想得那么遠。所以說，我們倆辦事，一般都能辦得通。

但是，把兩個列夫連在一起的，不是數學，主要是攝影。以色列維奇幫勞改犯照了好幾百張照片。這在勞改營里，可是前所未有。列夫給斯維塔寄來好幾張照片，是列夫和朋友們的合影。起初，列夫有點擔心，在勞改營里勞改了六年，肯定變了模樣，斯維塔怕是認都認不出來了吧。4月份，他給斯維塔寫信說：“那天，真沒想到，有個照相的機會。”

附上一張照片，是加洗的，和原版差不多。前邊是斯特列里科夫。我來稍微解釋一下吧，其他兩人，右邊兒那個是我，從照片上，你可以看得出來，我身體很不錯啊，所以說，我叫你別為我擔心，完全是有根據的……這個照片，我也給奧爾加姨媽和卡佳寄去了，寄到奧爾加姨媽的地址（留郵局待取），只寄了一張。有機會，我得改一改不修邊幅的樣子，再給她們寄張新的。但是，我愛自己的臉蛋兒，還沒愛到要洗很多張、廣為散發的程度哦。

自1941年睽違至今，斯維塔第一次見到列夫的照片（這張照片后來丟了，找不到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了回信：

卡佳姨媽今天來看我們了。她還沒收到你的照片呢。我這張，她看到了，很喜歡。她說你照得很有神采，一雙笑瞇瞇的眼睛。依我看是她眼鏡度數不夠，看得不清，殊不知，你的表情正好相反。但是，總的來說，這張照片比我想的更接近于本人。光線不好，臉上有陰影，一半太暗，不怎么像你。但是，我斯維塔還是很感激你的同名人。

還有好幾位自由工人，也幫列夫和其他勞改犯偷偷捎信。他們把信偷偷帶出去寄走，再把代收的信偷偷帶進勞改營里來。有一個人，名叫亞歷山大·亞歷山德洛夫斯基（Aleksandr Aleksandrovsky），花白的頭發，五十四五歲的樣子，他在供應科干活。亞歷山大出生在沃羅涅日（Voronezh，在頓河中游），1892年生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內戰時期加入蘇俄紅軍。1937年，斯大林鎮壓內戰英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Tukhachevsky）。他公開表示反對，旋即被捕，被判五年勞改，在伯朝拉服刑，刑滿釋放后，轉為自由工人，繼續留在勞改營干活。他和妻子瑪利婭（Maria）住在一起，妻子年紀比他小。瑪利婭原先住在加里寧市（Kalinin），戰爭期間撤退，疏散到這里。瑪利婭在蘇維埃大街的電話局工作。夫妻倆有兩個兒子，一家四口住在河邊一個地下室里，1946年搬到工業區勞改營內犯人村，住進了集體宿舍的破房子里。這房子非常窄小。墻是用膠合板釘的。廚房（沒有自來水）特小，轉身都費勁，兩個小房間只有一張單人床。兩個孩子睡在地上。屋后有一個小園子，養了幾只雞，還有一頭豬。亞歷山大和瑪利婭是斯特列里科夫的好朋友，經常在家里招待斯特列里科夫和他電工組那群隨從。他們夫妻倆很同情政治犯，盡力幫助他們，支持他們。瑪利婭在電話局偷聽官方電話內容，每當聽到當局計劃把勞改犯押送懲戒營地懲辦，或聽到別的什么懲罰措施，就給大家通風報信。他們夫妻倆還幫勞改犯寄信、代收信件。他倆的兒子伊戈爾（Igor），喜歡集郵（列夫拜托斯維塔和他姨媽，每次寄信都貼不同的郵票，因為“這兒有個集郵愛好者”）。這孩子后來回憶說：“我爸常常把信藏在襯衣里，有的信是從外頭帶進監獄里面來，有的是從監獄里帶到外面去。我爸有個通行證，可以進出工業區勞改營。他從來都沒有被搜身過。”伊戈爾還說：“我爸誰都不怕，他常說：‘懲罰我？隨他們的便！’”



亞歷山大和瑪利婭抱著小兒子弗拉基米爾

木材廠有一位機器操作工，名叫斯坦尼斯拉夫·亞霍維奇（StanislavYakhovich），他也是幫勞改犯偷帶信件的自由工人。列夫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發電站，當時他倆險些打起架來。亞霍維奇拿了列夫的手套，拿去的時候是干凈的，可還回來時卻沾滿了油污。當時，列夫剛來發電站沒幾天，還不到一個星期，所以決意要給別人看看，他列夫不是好惹的，不會逆來順受。列夫參過軍，身強體壯，深知要想活下去，就得有自衛能力。所以，列夫一下子撲到亞霍維奇身上，叫他小心點兒，再拿他的手套，就“把他的臉打開花”。亞霍維奇啥也沒說，只是笑了笑。他是個大塊頭，比列夫高大多了。他看得出來，別看列夫說話挺橫，但不是蠻不講理的人。真是不打不成交，兩人成了朋友。

亞霍維奇是波蘭人，家住羅玆[38](#__38)[1]，講俄語有點兒口音。他技術院校畢業，娶了一個俄國人，她老家在奧廖爾（Orel）[39](#__39)[2]，有一兒一女，兒子生于1927年，女兒是1935年出生的。他一直都是機器操作工，1937年被捕，抓到這兒來。幾乎可以肯定，他被捕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波蘭人（只要是波蘭人，就可以扣上個“波蘭民族主義分子”的帽子）。亞霍維奇被判了八年勞改，在伯朝拉服刑，1945年刑滿釋放之后，原地就業。他現在和一個女的住在一起，名叫柳斯卡（Liuska），也是一個刑滿釋放的勞改犯。他倆住在集體宿舍那個破房子里，有一個單間。他住的那條街就叫木材廠街，剛好在工業區鐵絲網外邊。

亞霍維奇在伯朝拉待了這么多年，對勞改犯深切同情，總是想方設法幫他們的忙：幫他們跑腿辦事，給他們拿吃的東西，替他們送信。做這些都是冒很大風險的，但是他愿意。勞改犯，有的像他一樣，妻離子散。他對這樣的囚犯格外同情。1947年，他要去奧廖爾，勸妻子和女兒來伯朝拉和他同住。

斯維塔的來信，越攢越多。列夫把信捆成一捆，藏在工棚住處的地板下面。有一次，列夫把地板撬開，把這捆信取出來，交給亞霍維奇。他想叫亞霍維奇把信帶出勞改營，先找個安全的地方存起來，將來再找人把信帶回莫斯科，由斯維塔收藏。因為這些信上面都沒有監獄審查人員批準蓋章，所以都是非法信件，萬一搜查的時候被看守們發現，就會全部沒收銷毀。列夫也會被罰，會被關進小號，單獨監禁，或者轉到第三村去。那個地方條件極其惡劣。那兒的勞改犯，如果再違反了什么規定，就要被押到條件更加險惡的監獄，進行嚴懲。亞霍維奇接過那捆兒綁得緊緊的信，掖在衣服里邊，向勞改營大門口走去。不料，門口的看守注意到了他衣服下面的鼓包，攔住了他，問他是什么東西。亞霍維奇答道：“啥，這個么？就是紙。”那看守說：“給我看看。”亞霍維奇把包拿了出來。看守說：“這可都是信啊。”亞霍維奇答：“信有什么關系？不知道誰扔的，我把它拿到廁所去當手紙用。”那看守揮手讓他過去了。

隨著這秘密信使網絡的不斷發展壯大，列夫更有把握能避開審查人員了，于是，漸漸地，越寫越白，暗語越來越少了。列夫換了這種新的寫法以后寫的第一件事，是好幾個月來大傷腦筋的一個問題：有人要報復斯特列里科夫，此事暴露出勞改營里的人性黑暗面。斯特列里科夫是釆礦工程師，技術特別好，所以才當上了實驗室主任，這個職位權力很大。木材廠的生產工藝都要拿到實驗室進行試驗、檢測。斯特列里科夫這個工作，誰都干不了。但是，他“頑固堅持”（列夫語）自己的做法，令勞改營好幾個大頭頭不快。本來上峰就給他們施壓，叫他們務必要完成生產計劃，而斯特列里科夫不就是個勞改犯么，可他竟然對勞改營頭子指指點點，告訴他們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這些頭子聽了，不禁懷恨在心。伯朝拉鐵路局林業部副部長，名叫阿納托利·謝赫特（Anatoly Shekhter），1943年，斯特列里科夫和他發生了沖突：他用的材料不符合技術要求，斯特列里科夫說，這種材料不可以，叫他停了工。這件事一直鬧到古拉格最高當局那兒。最高當局說斯特列里科夫說得對。謝赫特對這件事耿耿于懷，從那以后總找茬兒，給斯特列里科夫穿小鞋，雞蛋里挑骨頭，斯特列里科夫做什么都不對。

1946年12月，謝赫特來木材廠視察工作，待了好幾個星期。干燥室的頭頭，名叫吉巴什（Gibash），他自己也是一個勞改犯，列夫說：“大家都說這人特能撒謊，還詐騙錢財。”此人乘著上司來視察的這個機會，想往上爬，就寫了一封惡毒的檢舉信，檢舉斯特列里科夫，說他說的木材不夠干燥只是借口而已，其目的就是拒不給各車間供料，因為木材其實是干燥的。吉巴什把一塊木材樣品送到鄰近的實驗室做檢驗，那個實驗室一檢驗，發現木頭不潮，很干燥，大家都懷疑這廝是先把木材烤干了，然后才送檢的。這封檢舉信，用的是斯大林大恐怖時期的詞兒，指控斯特列里科夫“把干燥材料扣住不發，故意拖延工程用料，破壞工廠計劃，妄圖顛覆政府”。由于這封檢舉信，斯特列里科夫被撤職，扭送至內務機關，說他是“破壞”分子。斯特列里科夫向技術檢驗部申訴，當局又抽樣檢驗了更多的木材，斯特列里科夫最終得以復職。但是，吉巴什又提出了新的指控，此案一直拖到1947年1月份才結案，當時列夫有信給斯維塔：

我本來不想寫這件事，太令人傷心了，不可與外人道，只能告訴你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什么要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吉巴什真不是人啊，白披了一張人皮，早就不配人這個稱號了……這件事拖了很長時間，我自始至終都特別佩服斯特列里科夫，佩服他處變不驚，沉著應對有時候，我真想給他妻子、女兒寫一封信，告訴她們，斯特列里科夫真是堂堂君子，為人太好啦。當然，寫信說這些太蠢，人家比誰都清楚，還用我說么。寫這樣的信去，什么用也沒有，只會讓人笑話，說我不會說話。但是，管他笑話不笑話的，這信我得寫。他女兒是莫斯科國立鐵路工程大學的學生，和她媽媽、丈夫、兒子，一家四口住在真理街。斯特列里科夫這件事，當局要有個表態了，但是太慢了，天知道當局會判誰有理。這兒最有理想的人，有時候，會被逼進最黑暗的死胡同里。我和別人不一樣，我什么都不信，只相信過去。

1月28日，傳來了好消息，伯朝拉勞改管理局在阿別茲做出了決議，恢復斯特列里科夫的工作。幾星期以后，那個吉巴什被送到更北邊的沃爾庫塔去了，那是個煤礦區。

自從出了斯特列里科夫這件事，列夫內心感觸良多。他信中漸漸透露出勞改營的境遇對他的種種影響，越寫越直白。列夫最感到錐心的，就是勞改營把幾乎每個人最壞的一面都釋放了出來：環境太擁擠狹小，人人都掙扎求生，所以，在這種氛圍里，一旦要爭個什么蠅頭小利、彼此有個什么別扭，馬上就會大打出手，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3月1日，列夫的信里是這樣寫的：

我親愛的斯維塔，我有很多事要對你講：能給你帶來寬慰的好消息不多啊，斯維塔，或許，我根本不應該寫這些事兒。過去你說過，痛苦的話，不說完也好，不一定非說完不可。既然開始說了，我就得把話說完。你明白吧，對我們來說，最難以忍受的，絕不是物質匱乏，而是另外一種困難，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與世隔絕，和外界沒有接觸，另一個是朝不保夕，隨時都會出事兒，誰也料不到會發生什么事，明天會怎樣，一個小時以后會發生什么，都不知道。大家正式的罪名隨時都會變，為了一點兒芝麻小事，就會被遣送到別處，有時無緣無故就被轉走了。斯特列里科夫、津科維奇（Sinkevich，他今天就要走了），還有很多其他人，他們的遭遇就是例子。

說來似乎可笑，但是很悲慘。正常生活當中普普通通的事，到了這里，事兒就大了，無限上綱。人都有缺點，不足之處在所難免，也會牽涉方方面面。但是在這里，就都不是小事兒，會引起嚴重后果。當然，社會上也有道德君子，有仁義之士，不過，一般來說，首先仁義道德不是主要的社會風氣。在勞改營里，正人君子更成了鳳毛麟角，十年九不遇了。有人先是不懷好意，接著充滿敵意，敵意又表現為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有人本來心地狹隘，繼而手段卑鄙，終究干出罪惡的事。有人生性粗野，言語粗魯，說著說著就辱罵起來，也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繼之口出讕言，極盡誹謗之能事。有撈錢撈不著就明搶，搶不著就殺人的；有義憤填膺、怒不可遏，進而殺人泄憤的……

哪怕是一丁點兒正人君子的行為都成了多此一舉，對己對人都不講正派。人們最為期望的都是相當無聊的事兒，就好像偏遠地區小劇院里的領座員，清閑自在，每天有十二個小時都沒事兒干，可以照管自己的私事，還可以掙點兒小錢……

啊，斯維塔，今天陽光明媚啊，啰唆了這么多，什么用也沒有。

列夫心里最害怕的就是“轉監獄”。“轉監獄”就是發配到別的什么懲戒性的林區勞改營，那里條件更慘。列夫怕的不是“物質上的艱苦”，而是“和外界失聯”，他說的“外界”就是斯維塔。到了那類勞改營，看守肯定要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列夫跟斯維塔說過，一旦到了那里，什么都沒了——印刷品，手寫的材料，信件，照片），那地方也許根本就寫不了信了也說不定。這也是斯維塔所擔心的——列夫隨時都有消失的可能，那可就聯系不到他了。這木材廠，每個月都有犯人被送走嚴懲。勞改營當局用懲戒性勞改營來懲罰犯人，若覺得哪個團伙“太危險”，就用這個辦法把他們拆散。至于要把哪個勞改犯送去懲戒，全憑看守或獄方一句話，他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弄走。

列夫還有一個擔心事兒，就是害怕生病。有從其他勞改營轉過來的囚犯，“都是瘦得不像樣子了，一看就是重病在身”。看到這些人，列夫忽然意識到，“自己也像他們一樣，說病就會得病的”：

營養不良性病變——消耗性疾病——我們這個勞改營很常見。也有壞血病，不過，懂一點兒醫學，有一點兒經驗，這類病還是能控制的。夏天一片綠，如果吃不到檸檬，攝取不了維生素C，有松針、有各種草本植物，所含的維生素C足夠了，記住這一點就行了。冬天，我把你的藥片兒派上了好用場，給了兩三個朋友，還剩點兒，阿尼西莫夫正在服用。他得了壞血病，現在好多了。看你的藥片兒幫了多大的忙啊！

列夫要是病了，進了勞改營的診所，即使能康復也不會很快。診所只有一個大夫，也沒什么藥，吃的東西也不多，因為病人的藥品食物都被看守偷走了。

隨著幫勞改犯偷送信件的人越來越多，技術也越來越高，斯維塔給列夫寫來的消息也越來越豐富。1月20號，在列夫三十歲生日前夕，斯維塔和家人、朋友一起舉杯，祝愿列夫生日快樂。奧爾加姨媽有個包裹，想托斯維塔給列夫寄去，于是，斯維塔就去找奧爾加姨媽。斯維塔知道，別人為列夫費心，列夫會覺得不安。斯維塔在信中解釋說：“我把你的想法告訴她了，她要送你枕頭和夏季服裝，我謝絕了，沒拿。”列夫原來住的那個公寓在列寧格勒大街，是幾家合住的那種，里面有一間舊房子是列夫的房間。當地蘇維埃已把這個房間分給“吉普賽人”住了。奧爾加姨媽一看，慌了神兒，一直在和當局不停地交涉，要他們把“吉普賽人”遷出去，把房子還回來。那幫“吉普賽人”早把列夫的東西一股腦塞進他的箱子里，扔了出去。奧爾加姨媽很是著急，列夫的東西沒了，肯定會傷心的，但是列夫真正割舍不下的，是他父母的那幾張照片。列夫曾給他姨媽寫信說：

那個房間已經不是我的了，不必為了我的東西著急。我雖然判了刑，可是并沒有被剝奪任何財產。任何財產，名義上都歸你我所有，但是，現在為時已晚，肯定要不回來了。要是剩下什么東西，不要為我留著，拿去賣了吧。換點兒錢，你更需要。這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無所謂，和他們吵不值得，也不必為這事兒傷腦筋。

莫斯科的物質條件非常艱苦，大家的日子都很難過。商店空空如也，食品短缺，連基本必需品都是定量供應。像很多莫斯科人一樣，斯維塔一家人活得也不容易，為了補貼口糧，他們星期天先坐地鐵、再坐火車，到郊區菜園去種土豆、種菜。到了1947年春天，莫斯科的情況更糟了，大家都擔心快要挨餓了。1946—1947年間，正是烏克蘭大饑荒，餓死了好幾十萬人。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莫斯科人心惶惶。斯維塔給列夫寫了一封信，一五一十寫得明明白白，若是落在審查人員手里，那是萬萬過不了關的：

眼下，烏克蘭發生的事情，慘不忍聞。人們擠上火車，去西伯利亞的去西伯利亞，去白俄羅斯的去白俄羅斯，但是這兩個地方也是啥都吃不上，只有土豆充饑。火車中途就被攔住了，不許進莫斯科。但是，莫斯科還是有大批乞丐。莫斯科現在至少有一半人口的生活連戰時都不如。列夫啊，看到這種景象，真是令人傷心。大家都在算日子，看離秋天還有多少天，互相打聽莊稼長勢如何，收成會怎樣。目前，家中一切均好……我們三口人有六個配給卡，不去黑市也完全能活（只去黑市買牛奶，每隔一天去買一次）……肯定是沒肉吃啦，不是有人光吃素么，據說能活一百歲呢。我們的收入可是今不如昔了：爸爸掙一千三百盧布，我的工資是九百三十盧布，但是這些錢一眨眼就沒了。[40](#__40)[1]

列夫和斯維塔，自從開始通信以來，信中就用暗語商談所謂“最小值”和“最大值”，簡稱“最大最小值”問題。“最小值”指的是列夫提申請，想轉到勞改營別的地方去做科研。“最大值”目標更高些：提出申訴，要求減刑，甚至要求釋放。斯維塔從一開始就抱著樂觀的態度。她在1946年8月28日的信中寫道：“減刑和釋放都有可能。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圖波列夫和拉姆津的事兒[41](#__41)[1]，你是知道的。還有很多其他例子，知名度沒這么大，但也為數不少。”確實，內務部是有個政策，要在勞改營里尋找科學家，把他們重新分配到蘇聯經濟各專業領域去，尤其是調到勞改營控制的各個軍事研究所。問題是，勞改營的負責人通常都不愿意把科學家放走，他們還靠這些科學家干活呢，管發電廠、生產實驗室、照明系統之類。列夫覺得，轉到這電工組已經不錯了，再轉到別處也不見得好到哪里去。至于那“最大值”，他根本不信能辦成，給斯維塔的信是這樣寫的：“我不想讓你浪費精力去申訴那個最大值。”但是，斯維塔繼續兩面作戰，她在12月的信里寫道：“你沒信心，我可能和你一樣，也沒什么信心。但是，列夫啊，哪怕有一丁點兒可能，不也值得試試么？我知道，如果最后沒辦成，豈不是白白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所以，咱們需要冷靜面對，不自欺欺人，不要錯以為希望肯定會實現。——但是，爭取還是要爭取的，天上掉餡兒餅的事兒是沒有的。”

到了1947年2月間，列夫心灰意冷，覺得已經晚了，來不及了，什么申訴也白搭了。他心里尋思，當年在物理研究所做的科研“和學生實習差不多”，光憑這個就希望調轉成功，簡直是異想天開，不過他還是答應斯維塔，要去打聽打聽斯特列里科夫，勞改營里管科研項目的人，有沒有誰近期要來伯朝拉出差的？要是有人來，到時候他就去問問看。如果提出申訴，要求減刑，當局就得審查奧德河畔法蘭克福軍事法庭對他做出的調查。列夫知道，此案已經定案，再把經過復述一遍，實在沒有必要，說不定弄巧成拙，罪加一等呢。

3月1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了一封長信，寫得非常坦率，說不想再提“最小值”和“最大值”的事兒了：

我不想為最大值傷腦筋了，因為要想申訴成功，必須要有證人作證，他們不會找證人出庭的，即使找也很難找得到了。出庭作證在前……宣布判決在后，這期間會不會冒出什么新的謊言來，那可說不定。有了第一次墊底，再來第二次倒是會更加有經驗……不過，成功的可能性還是渺茫。干什么事兒都有動機，動機可能至少有兩個——動機“好”和動機“壞”。說你動機是好的，那自然沒錯；沒準兒也會說你動機不好，說你居心險惡。因為他們之間平時總是心懷鬼胎，所以也就習慣于設想別人和他們一樣居心不良，以為這里面隱藏著什么“損招”，正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大的問題是，雖然很多事實都對我有利，但是沒有證人，我空口無憑，誰都不會信我的話。那些正人君子教授（檢察官）在那一坐，早就先入為主，確信押到面前來的肯定都是壞人，動機不可能好，不會有愛國心，全都居心不善，不干好事……

至于最小值，因為核子研究和空間研究都有秘密的軍事意義，所以，一個人一旦被扣上58-Ⅰ（b）這條罪名，就休想在這兩個領域工作了，更何況不是什么杰出的名人，就更甭想了。服過刑的人是不許在各大經濟一工業中心工作的，即使在偏遠地區的外省小鎮都不行——只有這幾個地方是例外：雅庫特共和國[42](#__42)[1]、科米共和國[43](#__43)[2]、科雷馬等地。這清楚說明，蘇聯當局把這些政治罪條款看得多么嚴重，即使沒這么嚴重的條款，只要是政治罪，均嚴懲不貸。只要是犯了這幾條，有證人作證辯護也減輕不了罪責。這兒有個囚犯，是在“圖哈切夫斯基時代”定的罪，再過兩個月就要刑滿釋放了。此人是蘇聯共青團前中央委員，當過軍機駕駛員，身在勞改營也是不改當年本色——一個名副其實的積極分子。他在勞改營里是做馬鞍子的，那可真是以勞改營為家，憂勞改營之所憂，急勞改營之所急，為勞改營分憂到了忘我的境界……各車間都需要皮帶條，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面包賣掉，強忍著煙癮不抽，把錢節省下來，買皮帶條，送給各車間。他做的這一切都白做了，誰都不感謝。釋放的時候，在考慮他將來的居所這個問題上，全是按規定辦，至于他做過什么好人好事，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沒人記得。一旦判決，永遠有效，不可更改。

列夫的論調，斯維塔可聽不進去。她6月8日給列夫寫信：

我無言以對，也沒詞兒和你爭論，因為我知道，你寫的都是實際情況，你的處境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這種惡劣的情況，剩下的那百分之零點零一就看運氣了。雖然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一，畢竟還是有，這也是實際情況。你要修身養性，好好練一練，遇到失望的事兒，可別太往心里去呀，要百折不撓，努力爭取啊。我知道，說得容易，做起來難啊。換了我，在你那個處境，我也不會把頭伸出去冒險，弄不好還會挨上一下子呢，所以，現在我也不催你，硬要你怎么樣，只是悄悄勸勸你。遞交個申請也能壞事么？會比現在還糟么？列夫啊，你已經熬過來這么多年啦，若不去申請，還要繼續受罪啊？

按照斯維塔的想法，倒不如抓住最大值不放松，也好有個盼頭，同時積極申請最小值，這樣豈不更好？俄羅斯科學院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所長支持這么辦，他許下諾言，要寫一封信，幫列夫美言美言。

斯維塔寫信告訴列夫說：“有希望、有夢想的生活，容易活；沒有希望、沒有夢想的生活，不容易活。或許我說得不對，可是在過去這五年里，你難道不就是這么活過來的么？”

但是，何去何從，最后決定權在列夫。他在6月28日這天寫道：

有一次我給你寫信，曾經順便提到過一個名叫鮑里斯·赫爾曼（Boris German）的人。他是學化學的，哈爾科夫學院畢業，職業是電鍍工。他曾經提出申請，希望做他的本行工作。沒過多久，他們傳他到那個臨時中轉的勞改營（離我們不遠，靠近伯朝拉火車站）報到。他先是在那兒呆坐了好幾個星期，最后終于把他發配走了，可是“弄錯”了，把他發配到沃爾庫塔去了。他在那里干了好幾個星期的普通工（在北極圈內的煤礦挖煤），然后又回到了原來那個中轉勞改營，后來又把他發配走了，這次又“搞錯”了，把他又錯發到哈里梅爾一尤（Khalmer-Yu）這個鬼城去了（北冰洋沿岸一勞改營，專修鐵路），到那兒一看，連個電鍍的影兒都沒有。可憐他每走一趟就被洗劫一次，搶劫被流放的犯人簡直成了風氣。有認識他的人在中轉勞改營最后一次見到他，人比從前瘦了一半兒。誰也不知道他現在到哪兒去了。他臨走時答應大家，會盡快寫信來的。可是到現在為止，誰都沒收到過他任何來信。阿尼西莫夫有個朋友，名叫庫茲米奇（Kuzmich），好像也遇到了同樣的命運。起初也是調他去執行“特殊任務”，可是這一去就沒了蹤影。勞改營的老油條們說，這都司空見慣了，要想盡快“到站”（體力耗盡的最后階段），最快的莫過于申請轉工作，去干本專業。我一時樂觀就把申請調轉的申請書寫好了，正準備遞交給內務部駐勞改營機關呢。一聽這話，我忙把申請書撕了……哎喲，先別提了，暫時擱一擱吧。

列夫還得在木材廠這個勞改營里待著，沒辦法，斯維塔也只得作罷。不過，她開始籌劃起來，要做一件更大膽的事，比“最大值”、“最小值”都要勇敢：秘密去一趟伯朝拉，看看列夫去。

# 六 歷盡艱險的秘會

斯維塔寫第一封信那會兒就把見面這個想法提了出來。1946年7月12日，她寫道：“我知道，你肯定會盡量爭取咱們早日見面，不用再等五年。”列夫從一開始就比較悲觀，回信說：“你問能不能見面……斯維塔啊，見面怕是不行。58-Ⅰ（b）是一個邪惡的數字。”

列夫說得對。親屬朋友來探監，勞改犯獲準接見的，確實極少。即使準許見，也僅限于家人或配偶。如果犯人“干得好，干得認真，干得快”，可以網開一面，允許探視，以示獎勵，但這種情況只是特例。勞改營許諾，犯人若表現好，可以允許外面的人前來探視，此言一出，真好像一股強大的動力，效果立竿見影。但是，盼星星盼月亮，終于盼到了探視的那一天，卻常常令人大失所望，才讓會見幾分鐘而已，并且還有看守在旁邊監視。想說說悄悄話，談點兒個人隱私，那是難上加難。肢體親熱是絕對禁止的。后來有人寫回憶錄，回憶北方勞改營的往事，書中有這樣的話：“妻子走后，犯人都沉默寡言，煩躁易怒。”

連妻子、親屬要探視都夠難的了，更何況斯維塔既不是妻子，也不是親屬，僅僅是朋友關系，大學同學而已。要申請探視列夫，沒有資格啊。但是，斯維塔決心已定，不信那個邪。列夫給她來信說，親屬來伯朝拉勞改營探視，“原則上是可以的”。這消息使她感到很振奮，立刻出去四下打聽，“像你我這樣的，是不是允許探視啊？”，斯維塔給列夫回信說。或許，勞改營當局很開通，把她算作同居女友吧。1946年秋天，斯維塔就盼望著去探視，她在信里寫道：

列夫啊，雖然僅僅是一個可能性，請你竭盡全力，盡快促成這件事。請事假可能不行，但是規定的十天學習，可以不學，走人，甚至不帶薪休假，總可以了吧。米哈伊爾·濟德齊克會支持我的。

列夫不想讓斯維塔冒這個險，叫她先不要動，等他進一步打聽打聽，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年秋天，列夫囑咐她先別來。列夫提醒她，來這一趟，往返要兩個星期的時間，兩個星期不上班，時間太長了，再說事先也沒打招呼要休假，一般提前好幾個月就得提出申請，單位好安排人手。格列勃·瓦西里耶夫，他媽8月份來看他，兩個星期才回到莫斯科。探視的例子，列夫只知道這一個。他一定也知道，他媽回去，路上走的時間長得太出格了（到莫斯科，全程兩千一百七十公里，正常情況下，坐火車兩三天就到）。列夫說這話是搪塞她，想拖一拖再說。或許，列夫是怕她來看了失望，也可能覺得，斯維塔花這么大力氣來看他，實在受之有愧。不過，列夫確實為斯維塔捏了一把汗，如果斯維塔果真按照計劃前來看他，所面臨的危險太大了。斯維塔參與的研究項目，被認為是“國家機密”，可她卻來信策劃，要向內務部駐勞改營機關申請許可證，要去勞改營探視一個定罪服刑的“間諜”。就憑她遞交申請這個舉動，就有被研究所開除的風險，也許還不止開除。

探視路上要走多少天，列夫已經做了估計，會有什么危險，列夫也給她講了，可是她就是不聽。列夫告訴她的信息，她有點兒懷疑，想多了解。她在10月15日的信里說：

路上走不了兩個星期吧。我想，只有寄信才需要那么久。如果真需要那么長時間（我想辦法查一查），冬天不行，就別再考慮了，除非假期來還行。我這不又是沒等孵出雞雛就開始數上了么。你不止一次來信問，我們是否需要特別許可，如果需要，得向誰申請。有人對我說，這完全取決于你那邊兒的當局（還要看他們認為你表現怎樣），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這個說法。當然，鑒于我現在的身份，他們是不會給我特殊照顧的。

斯維塔還不是列夫的妻子，當局會不會允許她去探視列夫呢，這是當前最大的問號。可靠的信息，列夫打聽不到。1947年2月9日，列夫在信中寫道：

他們說，到莫斯科勞改局去申請，有可能會批準。似乎莫斯科的幾率大點兒，北伯朝拉鐵路勞改局的幾率就小了。一般來說，勞改局即使讓探視，時間也很短，少則十五分鐘，最多也就兩個小時。顯然，莫斯科這個上級機關，有時會批準家人、兄弟姐妹、妻子（包括正式結婚的妻子和同居女友）、堂表親，每次探視幾個小時，并且可以連續探視好幾天。很遺憾，這個信息不是來自官方渠道，眼下，我只打聽到這些。

到了3月1日，列夫知道的情況多了，消息不怎么好：

斯維塔，關于探視，不知道他們是怎么給你講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見面時會很難受，甚至有可能很難堪。不過，我美麗的斯維塔啊，到時候咱們唱《苗條的山梨樹》[44](#__44)[1]就萬事大吉了。

探視，通常只給雙方幾分鐘的時間，在大門旁邊的警衛室里進行，還有看守在場盯著……有的時候，看守可以在最后一刻突然決定取消探視，干脆不許見了，有當局的探視許可也白搭，看守不準見，說什么也不行。前些日子，鮑里斯和他母親就是這樣，硬是沒見著……偶爾，有的探視，一連好幾天，天天都可以見面，并且每次都可以見好幾個小時，有時候還沒人在場監聽（格列勃·瓦西里耶夫和他母親就是這樣）。這種情況，工業區里確實有過。不過，這是十年九不遇的事兒。一般來說，犯了58-Ⅰ（b）條的政治犯是另類，勞改營不給他們行這個好。如果能讓勞改局文教部門出個證明，說該犯表現不錯云云，那是很有用的。不過，這樣的證明，很難開出來。話又說回來，主要的問題不在這兒……假設將來真有一天可以探視，咱倆見面的場面會是怎樣？咱倆的關系遇到了現在這種新狀況，不過日久天長已經習慣了，痛苦也減輕了很多。可是，一旦見了面，你會覺得滿足呢，還是會重新勾起你心底里的劇痛呢？一想到這一層，我心里就有點兒不安。回到故鄉，別人都開開心心的，唯獨你一個人，探視回去以后，豈不是更難開心了么？

斯維塔沒有被嚇住。不管有多大風險，不管后果多么嚴重，她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去伯朝拉看望列夫，即使只能見上幾分鐘也好。如果莫斯科勞改局不讓她去看列夫，她就直接向伯朝拉的勞改局申請探視。假如他們也不許，她就另找其他途徑進入勞改營。那些自由工人一直都在幫助列夫，有他們協助，或許能成。既然能把信件偷偷帶進勞改營，交給列夫，為什么不能把她也偷偷帶進去？這個針劃可是膽大包天。以前，任何人都不曾想過要往勞改營里面闖。

眼下有時間，可以從容謀劃，收集更多信息。北極圈內，冬季說不定會持續到5月份，冬天黑暗的時間又特別長，黑天多，白天少，天寒地凍，火車有可能凍壞，走不了了。所以冬天去伯朝拉不安全。列夫在發電站上的都是夜班。3月底，他漸漸看到春回大地的跡象。凌晨，北極光絢爛閃耀，流光溢彩，飄逸蕩漾，美麗極了，列夫萬分驚嘆，但他不敢想得太美，總是盡量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不敢盡情地幻想：

我最厭惡黑暗。早晨，我下夜班，離開發電站的時候，朦朧的夜色已經散去，旭日東升，霞光送暖，在陽光的照耀下，雪堆被融化了邊角，像一塊塊剛剛融化的方糖。你說怪不怪，有些東西本身并不壞，但是卻令人心生反感。一看到虛假的黎明，我就有這種感覺……有一次，天剛朦朦亮的時候，我下班回家，一彎月亮低低地掛在天邊。沒見過這么美麗的月色，我頓時驚呆了。晨曦漸露，平坦的雪面上泛著淡藍色的幽光，周圍影影綽綽，灰蒙蒙一片，那漸漸淡出的月光反射在雪堆的坡面上，仍然一片白亮。松樹林，樹影婆娑。天高氣爽，天空剛才還是一片昏暗，漸漸地變成深藍綠色，又轉成溫柔的玫瑰色……現在，到了白天，好像春天似的，舒服極了，雪慢慢融化了，化出的每一道污痕都是春天的跡象，太陽狠勁兒地照著。春回大地，萬象更新，人也想說說話了（我平時不怎么想說話）——說說某個好人……或者胡謅點兒什么。

天氣轉暖以后，又談起了探視這件事。6月份的時候，尼古拉·利特維年科的父母從基輔來看他。列夫寫信給斯維塔，像是在提前給她吹吹風似的：“他們見倒是見著了，可是掃興的事兒太多了。”利特維年科父母向北伯朝拉鐵路勞改局（位于阿別茲）申請探視，批下來可以探視三次，每次兩小時。但是，到了木材廠這里，獄方只允許見一次，在警衛室見，還有看守在場監聽。列夫寫信告訴斯維塔說：“咱們探視，最多也就這樣。我犯的那條，最多允許見一次。尼古拉犯的是第58-Ⅰ（a）[45](#__45)[1]”盡管利特維年科父母“上了很多潤滑油”，還是沒爭取到更多的見面時間。這“潤滑油可花了他們一大筆錢呢”。列夫說的“潤滑油”指的是賄賂。列夫舉出利特維年科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她，探視這件事，不一定順利：

他們辦這件事，處處都花了很多錢，尤其是宿費。至少他們有不少錢，所以負擔不算很重。那天，我假裝去警衛室辦事，實際是去看他們。他母親年紀不大，但很瘦，可她還說，基輔像她這么胖的人不是很多，又說，稍微胖點兒的人，基輔見不到幾個了（暗指烏克蘭大饑荒）。斯維塔啊，作為外人，看他們探視真令人難過啊。難怪安東·弗蘭采維奇（Anton Frantsevich）[46](#__46)[1]對他妻子說，如果她不聽勸告，非來不可，那么，來了，他也不見。愿上帝保佑他們。這事兒，先不要辦了，以后情況好轉再說吧。

列夫心情非常沮喪，一個勁兒給斯維塔的探視計劃潑冷水，就好像怕見她似的。列夫過去問過斯維塔，探視會不會弄巧成拙，不但沒有一見釋懷，帶來精神的滿足，反而加劇了離別的痛苦。

利特維年科經歷的這些挫折，列夫聽了心涼半截，很是郁悶。但是，還有一個人，也來伯朝拉探視過。斯維塔一聽她的情況，勁頭兒更足了。格列勃·瓦西里耶夫的母親，名叫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Natalia Arkadevna），6月中旬，她還要來伯朝拉看望兒子。1946年，她第一次來，設法和兒子單獨待了好幾個小時，看守沒在場監視。3月1日，列夫寫信告訴了斯維塔這個情況。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很有把握，這次來，也能和兒子單獨待上幾天。她動身來伯朝拉之前，先去見了列夫的姨媽奧爾加。奧爾加姨媽一直想和她一道來看列夫。后來醫生建議奧爾加不要去，身體受不了，她才作罷（她叮囑斯維塔，切勿把這事兒告訴列夫）。列夫得知姨媽不來了，心里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奧爾加姨媽原以為出這么遠的門兒也不要緊，能受得了。斯維塔認為，還是列夫說得對，姨媽想得太天真了，平時坐地鐵從莫斯科這頭坐到那頭都驚慌失措、大驚小怪，更何況要走那么遠的路了！姨媽覺得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是一個“走南闖北”的人，跟她走準沒錯兒。可她自己身體受不了啊。因為奧爾加姨媽原來是準備和格列勃母親一起去的，所以好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向斯維塔講述這次去伯朝拉的事兒。等到格列勃母親整裝待發的時候，斯維塔對她這次伯朝拉之行早已了如指掌了。斯維塔心潮澎湃：自己認識的人，馬上就要見到列夫啦！雖然是間接認識的，畢竟是認識。

斯維塔日夜想念列夫。6月7—8日，是個周末，斯維塔寫了一封信，托格列勃的媽媽帶去，請她務必親自交到列夫手里。這信是周六動筆寫的：

列夫，格列勃的母親去拜訪了奧爾加姨媽，說她周三動身（前往伯朝拉）。所以，我給你寫這封信，還不知道寫什么好呢。說我想你？你心里明知道啊。我覺得我是生活在時間之外，覺得我在等待著，等待我的人生真正開始，現在好像只是一個插曲而已。我不論干啥都好像只是在打發時間似的。堅強的人是不應該浪費時間的，不管是故意浪費，還是因為時間抓得不緊，無意中浪費的，都不對。浪費時間也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失去了就找不回來了。我必須要積極地生活，不能只是消極地等待。否則，閉著眼睛干等，等到不必再等的時候，睜開眼睛一看，驀然發現，要一起營造生活啦，卻又沒有那個營造的能力了。那就糟了。

我一直很害怕，害怕光有愛情是不夠的。不僅要有愛的能力，而且還要有一起生活的能力，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能力，而這個世界十有八九會永遠地殘酷下去。可我覺得，盡管過了這么長時間，我還是沒有長進，既沒有堅強起來，也沒有聰明起來。有些事兒，我至少不像以前那么生自己的氣啦，比如說我的傻勁兒，我不管人家離我多遠都忠于人家啊。離得遠，過去可受不了，不僅我痛苦，別人也痛苦（你也一定難受過吧）。因為這類傻問題，我失去了很多H2O[47](#__47)[1]呢。硬著頭皮等待的時候，生氣的時候，好像我都不怎么堅強。所以，我現在并不覺得自己獨立的能力很強。悲也好，喜也好，我需要靠在你身上。我們要手挽手，度過這一關，像過去那樣，我當時沒怎么靠在你身上吧，不是沉甸甸都壓在你胳膊上吧？我說得對么？我寫這些，只想要你給不了的東西，卻只能給你帶來痛苦，這都是我的不好。但是，我累了，不僅是今天，平時都很累。我需要有人支撐我，即使是你字里行間寫來的支撐，對我也很重要（信是我們之間的談話）。但是，列夫啊，你千萬不要生氣。說到底，你和我比很多人都幸福，比那些不懂愛的人、不懂怎樣尋找愛的人，我們比他們都幸福。但愿我沒說錯。

我累的時候脾氣不好，用伊琳娜·克勞澤的話來說，“內心沒有刮胡子”。另外，和我關系密切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向他們求援，也不知道應該讓他們幫我什么忙。至于他們理不理解，會采取什么行動，我根本就沒有任何期待，至于想要他們干什么，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保持沉默，積極地沉默，也就是說，自己一個人待著，不和大家在一起。連舒爾卡（亞歷山德拉·切爾諾摩爾迪克）這些天我也只是一周去看她兩次而已。這個星期天，我沒去看伊琳娜，她生氣了（我說我太累了，她就原諒了我）。前天更糟糕，她打聽你的情況，我只是搖了搖頭。昨天也不怎么樣，聽完音樂會，我就撇下大家一個人跑了。你看，有時候，我很粗心大意，真壞。這個我懂，也很后悔。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彌補。所以說，我很擔心，哪天我心情不好（哪怕是因為太累了），也不和你講一聲，就打了個響指，銷聲匿跡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列夫，你一定要明白，我不是跟你生氣，別傷心，也別想不通，白白折磨自己，等我休息休息，這勁兒過去就好了。答應我？

上面寫的這些事兒，辦得真是不太聰明啊。我是不想讓你覺得我完美無缺，樣樣都好（有點兒不錯就行了）。列夫，我就先寫到這兒吧，睡覺去了，再寫就更是胡說八道了。動筆之前，哭了一哭，好在這封信現在寫完了，我也破涕為笑了。列夫，親愛的寶貝，我發誓，我沒說謊，我真的笑了。

這是斯維塔第一次真正講到心情抑郁，雖然沒說是抑郁癥。她動不動就“精神崩潰了，不愿意和別人接觸”，癥狀描述得很準確，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病。蘇聯自詡“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所以，抑郁癥這種病，它是不公開承認的，也不公開討論。

第二天早晨，斯維塔接著寫這封信：

列夫，關于我來看你這件事兒，我是這么想的。到哪里去申請呢，我一點兒都不清楚，我很擔心我的無知。你最好和格列勃說說，請他母親回來以后和我聯系（我的意思是，先和我聯系，不要先和奧爾加姨媽聯系），因為姨媽反正會去拜訪她的。她定于7月初什么時候回來，或者7月中旬，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到郊外去看她。眼下研究所有事兒，我走不開，到那時候就沒事兒了。7月份我不想請假（7月上旬肯定不行），出發之前，我得先定定神兒，做好精神準備，預備點兒錢，我想在這里申請探視。雖然格列勃的母親說不必，但是如果能在這里申請到，我就真正放心啦，反正沒有害處。至于要多久才能批下來，我不清楚。如果到時候耽擱在這兒，走不了，米哈伊爾·濟德齊克（斯維塔的上司）有可能那時候也想休假去了。那我就得等他回來才能走了。所以，別指望我會很快就到。至于先休個短假，我現在不想休假，往后挪挪比較好（我和別人不一樣，他們都喜歡早點兒休假），因為，如果休假太早了，假期過后沒幾天，好心情就弄沒了，豈不是白休了，就好像沒休過似的。可是，米哈伊爾·濟德齊克也喜歡晚點兒休假，也是這個原因，像我一樣……奧爾加姨媽來了，先寫到這兒吧……

我們已經和格列勃的母親說了，請她給你捎去一點兒好吃的東西。從4月份起，這些東西就想往你那兒跑了：有奧爾加姨媽的糖果，當然啦，伊琳娜的巧克力，還有我的白糖。伊琳娜不喜歡白糖，自然我就拿白糖好了。我倒覺得糖果沒意思。因為不知道會辦得怎樣，所以我也給你寄點兒錢（別生氣，氣大傷肝）。兜里有錢，總是有用的，自己不想買什么東西用，可以給身邊的朋友買點兒啊。還有一件東西，我也和格列勃的母親說了，請她給你帶去：一副眼鏡。這是第二副眼鏡，也是舒爾卡弄到的。爸爸那副已經做好帶回來了。擱筆啦，保重，親愛的。非常熱烈地吻你。

利特維年科父母沒辦到的，格列勃母親辦到了。第二次去探視，她又是一連好幾天見到了兒子，并且每次都見了好幾個小時呢。這次有看守在場監聽，但是在一間小警衛室見的，在工業區和第二村之間，不是大門旁邊兒那個大警衛室，那里人多，太嘈雜。列夫讓斯維塔做好思想準備，別太指望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會把東西捎到。格列勃犯的那條刑法沒有列夫重，格列勃母親這兩次順利，那是她運氣好（或者僅僅是很會賄賂）。斯維塔若能和列夫見上“幾分鐘”，就算幸運了，說不定內務部派駐機關“干脆不許探視”呢。但是格列勃母親來一說，斯維塔非常振奮。她7月16日給列夫寫信說：“納塔莉啞·阿爾卡德芙娜星期一來看我了，她詳細地說了說‘物資一財務’方面的事兒（暗指行賄）。聽她這么一說，我的神經完全平靜下來了。我告訴她我想去，她支持。她這個人真好，特實在，我很感謝她。”

一聽納塔莉啞·阿爾卡德芙娜介紹的情況，斯維塔決心更堅定了，伯朝拉，她是非去不可了。斯維塔以前就想過，如果勞改營當局不許她探視，到時候可以想別的辦法進去看列夫，現在看來，更覺得這條路能行得通了。勞改營工業區，如果行賄也進不去，就想辦法鉆進去。

動身前往伯朝拉之前，有些事情必須先做好安排，還得趕在暑期結束之前辦完。已經7月16號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什么時候休假，需要征得上司濟德齊克的同意，再說，去伯朝拉這段時間，全靠老板幫她遮掩才不致露餡兒。斯維塔硬著頭皮在等上司回話。7月份最后那個星期，濟德齊克生病住院了。他原定8月1日動身去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最快也要9月12號才能回來，但是現在行程推遲了。7月28號，斯維塔寫信說：“親愛的列夫啊，咱們要再一次咬緊牙關，堅持不住也要堅持，忍不了也要忍——我的假期推遲了。我氣得恨恨的。耐心是一種美德，美德一定會有善報的吧（事先就期待善報的美德就不叫美德了吧？）。如果真有善報，我等到12月也行啊。我又氣得很。”

8月份，很多人都去外地度假去了，莫斯科差不多都走空了。斯維塔整個8月份都在所里，代替濟德齊克值班，把他那份行政工作都接了過來。8月12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這里二十八度，四周工廠煙塵太大，灰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清。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9月7日），市里正在急急忙忙地裝點布置呢，有一半街道都封了，禁止通行。”莫斯科為慶典做準備，斯維塔為伯朝拉之行做準備，現在預期9月底出發。她花了很多時間到處打聽，列夫要的照相器材怎么買比較好。列夫要把她先安排在科日瓦住下，然后再幫她混進勞改營里來。斯維塔8月12號的信里是這么寫的：“照相器材，我問了，目前不缺，商店里很容易買到，誰去買都能買到……我把一切都買好，如果此行不順利，還可以打個郵包，寄到他那個地址——對吧？一個包裹，給你們倆：膠卷給他，書給你。”

這個時候，斯維塔已經知道了，這次去未經批準，屬于擅自出行，是違法行為。內務部勞改局的探視許可，在莫斯科辦不下來，斯維塔已經不抱希望了。伯朝拉是一個秘密的勞改營，地圖上都沒有標示。沒有探視許可，是不可以去的。斯維塔盤算著，如果真能到那兒，就和列夫一塊兒溜進勞改營，到工業區自由工人家里藏起來。列夫去發電站上班的時候，如果能躲過營區大門口的看守，就可以到她住的地方來看她了。這個計劃有點兒魯莽，挺危險，斯維塔很有可能遇到不測。沒有內務部勞改局的批準，擅自進入勞改營區，這可是危害國家的重罪。因為她的科研與軍事有關，一旦被抓住，發現她企圖接觸被定罪的“間諜”罪犯，肯定也要把她送到勞改營勞改的。誰幫助她都會遭殃的。

為了掩蓋此行的真實目的，斯維塔先到烏拉爾附近的基洛夫出差，那兒有個輪胎廠，是研究所的下屬單位，斯維塔假裝檢查工作。按照事先的約定，斯維塔從基洛夫給濟德齊克打了一個電報，通知他回莫斯科的日期延后了。濟德齊克接到電報以后，就把所需的證明信之類幫她辦好。從基洛夫坐火車，經由科特拉斯，到科日瓦只要一天一夜就到了。到時候，列夫·以色列維奇會來科日瓦接她。8月20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基洛夫來的火車都是慢車，所以都可以上，可以一舉兩得。如果濟德齊克12日回來，我就可以正式提出，要去那個工廠出差十天左右。從那個工廠繼續坐火車往前走，假裝還在出差，只是沒有火車票，但有很多維生素D（賄賂款）。這樣，我就可以把火車票錢節省下來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往返基洛夫的天數就不算在我假期之內了，這樣對我更好。我在基洛夫有兩三天的工作（我得去工廠看看，寫個報告，給他們提些建議）。說心里話，這一趟出門，我還真有點兒緊張。我從莫斯科一出發就給你那位同名人發電報，從基洛夫出來以后再給他發一封——一個月之內，兩封電報都會發出去。列夫，附加的行李不能不帶。有些書，P答應幫我找，例如，最新版的英語教科書和與核物理有關的書。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肯定會去寄東西，衣服啦，路上要吃的面包啦，等等。前面好像提到過吧，我想給你寄一個包裹，寄到你那同名人那里去，但是目前我還沒買照相器材……奧爾加姨媽不明白，我為什么給你寄西裝而不寄書，但是，列夫，我怕給你寄書你會生氣。我發誓下不為例，一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1947年11月7日），我都不進書店……這封信，9月5日前后才能到你那里。如果你有急事要通知我，就叫你那同名人打個電報。記住，我的回信不會及時到達。你也可以寄信到基洛夫，注明：留郵局待取。為了保險起見，我到了基洛夫以后，會去郵局和電報局查問。

十天以后，斯維塔又寫了一封信，確認她的旅行計劃：

所有計劃如前，即，15號出發去基洛夫，21號和你相會。如有緊急情況，用復寫紙寫信，一式兩份，分別寄莫斯科和基洛夫，留郵局待取，或者請你的同名人打電報來。

這時，伯朝拉已是夏末了。列夫9月4號發信給斯維塔，信中說：

秋天快到了。前天早晨出現了第一場霜凍，當地的菜地，土豆都凍了，就我們那塊地沒上凍，因為，有一半地，夜間有遮蓋，另一半地，臨近干燥車間，不上凍，所以沒有霜凍。不過，菜地也不長什么菜。夏季時間實在太短了。夜已經不是若有若無了，現在晚上九點到凌晨兩點半是黑天。

斯維塔8月20日的來信，果然不出所料，列夫是9月5日收到的。既然知道斯維塔肯定要來了，列夫必須計劃好，怎樣接待她，怎樣把她偷偷帶進木材廠，又怎樣把她偷偷帶出去。到了9月7日，列夫計劃得差不多了，于是給斯維塔寫信：

斯維塔，果然不出你之所料，你的信是9月5號到的……但是我沒有立即回信，因為看你的計劃，我得先調查一下，看看是否可行。這封信在你動身之前不一定能寄到你手里。我仍然不能給你具體的答復，至少今天晚上之前還辦不到，但是我必須現在就寫這封信，也許你走之前或許還能收到。你表哥[48](#__48)[1]的確切地址，你會收到的，將發電報告訴你（電報將發到基洛夫，是留郵局待取）。你可以在你表哥那里住兩三天。你必須去你表哥家，他會告訴你怎么辦。附加的行李，就放在他家吧。記住，這就是你的主要目的。下一步怎么辦，等到時候再考慮，現在先不用著急。關于書，都怪我。恐怕又讓你受累了——最好用郵包寄給我。如果我的同名人同意，就按照你原來的想法，給他寄去吧，照相器材也一并寄給他。

列夫寫信那天是9月7號，那天斯維塔在家里，沒出去，因為莫斯科正在慶祝建城八百周年。她在自己的房間里給列夫寫信：

禮炮剛剛放完。媽媽出去逛街去了，爸爸和我昨天已經出去逛過了，我們逛了很久。其實，窗外一切盡收眼底——紅場上空飄著氣球，氣球上懸掛著兩個（列寧和斯大林的）巨幅畫像，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全市上空紅旗招展，鮮艷奪目（也是懸掛在氣球上），街上燈火通明。空中的氣球放出煙火，霎時間點亮了夜空，五彩繽紛，好像一張張大網在天上張開，有藍色的，有紫羅蘭淡紫色的……我特愛聽禮炮的聲音……橋上都裝上了白熾燈，掛滿了燈籠和彩色的花籃。河上的游船都張燈結彩。莫斯科發電廠燈火通明……昨天，我和爸爸十點出去的……市中心擠得水泄不通，寸步難行。所有的廣場都搭起了臺子，交響樂隊舉行露天音樂會，有一百二十個便攜式探照燈，市場上到處都是姜餅屋……真是天下奇觀，獨一無二……莫斯科全城的人都到街上來了，真是萬人空巷。



莫斯科夜景（慶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

三天后，9月10號，是斯維塔的三十歲生日。列夫沒收到新的消息。斯維塔馬上就要出發了，列夫擔心她一路上有很多危險，又不知道現在情況怎樣了，干著急，幫不上忙。斯維塔能來得成么，列夫不敢抱希望。

事情都不會像預期的那樣進行的。我好幾天都蒙在鼓里，沒法打聽了。我的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維奇），這些天連影兒都沒見著。見到他，我就給你發電報——兩天后吧。今天是你生日。今天，我總想自己一個人待會兒。所以，此時此刻，我正獨自坐著干活呢……也正在想你。我的想法也有不清楚的時候，心情也不總是愉快，有時候很亂，我想，這也是情理之中吧。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這些想法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東西，很遺憾，不能用這些想法做點有用的事情，也不能付諸實施。

斯維塔生日過得很愉快，9月12號她寫信告訴列夫：

研究所的同事給我送了兩大束鮮花（劍蘭、大麗菊、翠菊），媽媽又給了我一束（康乃馨），一共三束了。他們說，花兒是吉兆。我把幾枝翠竹插在實驗室的燒瓶里，自己欣賞，也插了幾只在大破璃杯里，送給濟德齊克觀賞。剩下的放在家里了。伊琳娜和舒拉給了我一件很特別的衣服，是我為了北上特意要的。我生日，舒拉沒來……但是伊琳娜來了，還有研究所的麗達也來了……媽媽烤了菜餅，好吃極了，我們有兩個蛋糕（用配給證買的，用糖票換的）。

斯維塔原來告訴列夫，她9月15號出發，忽然壞消息傳來，15號走不了了，沒做好準備。研究所的事情往后推遲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出差的詳細計劃都寫好了，在我公文包里。但是會計室空了，沒錢，9月20號之前都不會有錢。”親戚朋友開始給斯維塔湊錢，一共湊了大約一千盧布，比她的月工資還多。這期間，斯維塔還從所里拿到“三四百盧布”（濟德齊克不在的時候，斯維塔負責管理實驗室。這錢是勞動所得，理應付給她），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斯維塔寫了一份報告“工資與工資標準的差異”，然后把這份報告夾在一堆文件里，一起呈交給所長，所長當時也沒認真核對，拿過來就簽了字。于是，所里付給斯維塔這“三四百盧布”，作為酬勞。這筆錢，斯維塔要是要不來的（研究所沒有現金，總是找借口，不給員工付款），說不定上面還會倒咬一口，扣斯維塔一頂帽子，說她缺乏一心為公的精神，還會數落一番，說什么作為研究團隊的領導者，必須具備這種精神，等等。甚至還會問出一些尷尬的問題，盤問她突然要用錢的原因何在。斯維塔如此這般把所長忽悠了一頓，忽悠出三四百盧布來，但是她忐忑不安：斯維塔本來就擔心路上會有什么更大的風險。這點兒外快，讓她更不安寧了。她給列夫寫信說：“各項準備正在做，我很緊張，緊張的原因是有點兒迷信，生怕一切都準備好的時候又走不了了（即使能走得了，說不定又會出什么差錯）。”

列夫想和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維奇）取得聯系，把斯維塔來訪的計劃最終敲定，可是到現在還沒聯系上。9月5號到現在，列夫·以色列維奇音訊杳然，見都沒見著個影兒。列夫給斯維塔寫信：“所以，你信里說的，我沒法轉告他，沒法事先通知他，有什么托他辦的，也沒法告訴他。”她來之前，列夫這邊兒還有重要的準備工作要做。列夫是這樣計劃的，聯系上列夫·以色列維奇以后，馬上發電報到基洛夫，把這邊準備的情況通報給斯維塔知曉。9月17號，列夫寫信給斯維塔，他寫道：“總的來說，過去十來天，事情辦得都不怎么順利。”主要是最近出了一個差頭，這一段時間，列夫被困在集體宿舍里出不來，他所在的第二營區實行安全警戒，這樣一來，他就更難到工業區去接她了。

五天以后，9月22號，還沒有同名人的音訊。列夫尋思，一定是他病了。從9月5號到現在，斯維塔也沒有信來。一位自由工人覺得，斯維塔可能周一已經從莫斯科出發了，于是就以列夫的名義發了一封電報到基洛夫（留郵局待取），告訴斯維塔：到了科日瓦以后，就到列夫·以色列維奇的地址去，在那里等候通知。

斯維塔當時的行程，現在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走的了。這么多年過去了，斯維塔記不太清了，好像是9月20號過后不久從莫斯科出發的。父親和哥哥兩人送她到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又把她送上開往基洛夫的火車，她在基洛夫至少得待三天，名義上是出差，到輪胎廠辦事兒。按照計劃，斯維塔從基洛夫給濟德齊克（他知道整個內情）發了一封電報，通知他，出差要“耽擱幾天”。然后，斯維塔坐火車去科日瓦，這段火車票是她父親從一個軍官手里非法買來的，那軍官同意讓她做“私人助理”，條件是，到了科日瓦就得把火車票還給他。斯維塔的臥鋪是上鋪，她后來回憶說，坐臥鋪可是“前所未有的奢侈享受”。

斯維塔一路北上，在科特拉斯換了車，繼續往科日瓦進發。當時，她作何感想？看到鐵路沿線的第一座崗樓和鐵絲網的時候，害怕了么？非法進入勞改營區，想到過那種種風險么？1948年4月，回想幾個月前的這趟秘密出行，斯維塔覺得當時并沒有害怕，因為她早想好了，“此行也有可能落空，見不到列夫，有了這個思想準備，心情很平靜”。斯維塔心里有數，此行成敗的可能性各占一半，所以，她沒有在成功的愿景里投入太多的希望。這很有幫助，能保持鎮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回過頭來看這次私自進入勞改營，真是后怕呀，當時確是膽大包天。時隔七十多年，至今記憶猶新。斯維塔坐在廚房里，一幕幕猶在眼前，她覺得，當時去看列夫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她也說：“當時一門心思就去了，危險連想都沒想。怎么這么大膽呢？我也不知道。做了件傻大膽的事，肯定是鬼迷心竅了。”此行是非法的，隨時有被抓住的危險，為了掩蓋，一旦暴露也好有個借口，她的朋友舒拉給了她一件女式軍裝。這是舒拉用她自己的舊軍裝咔嘰毛料做的。斯維塔后來寫道：

多虧這件軍裝救了我。當時，車廂里乘警正在查票、查證件，乘客挨個兒地查。我盡量地往后躲，想躲過去。我盡量低著頭，好不容易把軍裝穿上，同時眼睛盡量往別處看，避免接觸到乘警的目光。但其中一個乘警徑直走到我跟前，說我的票不怎么對勁兒，有違法跡象，他想把我帶下車去盤問。我怎么解釋這張假票呢？我也不知道是誰的票啊——上面標的旅客名字很可能是個男人的名字，可我是個女的啊。我甚至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再說，這張火車票，到站時，還叫我還給那位軍官呢。不過，當時車上的旅客都是當兵的，以為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呢，就過來幫我說話，和那個乘警連說帶笑地理論起來：有啥差錯也不是她的錯啊，他們這么說！后來，那個乘警就沒再叫我下車了。

斯維塔坐車一直坐到科日瓦，這地方離伯朝拉還有幾公里的路，到了伯朝拉，斯維塔找到列夫·以色列維奇住的房子。這是一個半地下的房子。他住一個小房間，那房間極小。這些天，他父親從列寧格勒來了，和他住在一起。他之所以沒來木材廠和列夫接頭，可能就是因為他爸來了。由于房間太小，睡覺的鋪位就非常擠。第二天，以色列維奇和斯維塔一起來到木材廠。蘇維埃大街起點是伯朝拉火車站，終點是勞改營大門口。他倆從頭走到尾。這蘇維埃大街是一條土路，街兩邊各有八棟宿舍，都是木頭房子。人行道就是地上鋪的木板。他倆拐進蘇維埃大街，路過一座白色的大房子，建筑風格是新古典主義的。這是城里第一座石材建筑。北伯朝拉鐵路勞改局是最近從阿別茲搬到這里來的，這個房子剛蓋好，給它做機關大樓。大樓外面有衛兵站崗，但并沒有把斯維塔攔住查證件。斯維塔和當地人明顯不同，一看就不是這兒的。以色列維奇和斯維塔從莫斯科大街轉過來，經過第一營區宿舍和車庫街的汽車車庫，向木材廠的大門口走去。他們打算對門衛說，斯維塔是一個自愿留營的自由工人的妻子，住在營區里。

木材廠的安保比較混亂。看守大約有一百人，負責巡邏監獄區。他們大多都是農民出身，服過兵役，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報名來當看守，為的是逃避家鄉的集體農莊。他們很多人都是文盲，大多都酗酒，差不多所有看守都受賄，偷盜勞改犯的東西。他們還搶劫木材廠的倉庫，尤其是到工業區里面的各個馬廄里搶東西。工業區外面靠近第一營區有個風車磨坊，他們經常去那里搶糧食。第一營區發生過一個大案，是十多個看守合伙干的：他們把燕麥偷出去，做成伏特加，然后再賣給勞改犯和自由工人。1946年，好幾噸燕麥就這樣不翼而飛了。



1940年代末，科日瓦火車站

看守有個大毛病，他們總是喝得酩酊大醉，清醒的時候少。木材廠的黨委檔案室里堆滿了紀律聽證會的報告，有因“工作時間喝醉酒”而遭申斥的，有“在警衛室值班時醉得不省人事的”，有“醉酒后好幾天不上班的”，等等。黨的各級領導全都一致認為，警衛人員酗酒對安全危險最大。曾經有過看守喝醉了，在警衛室睡著了，結果犯人走出勞改營，揚長而去。也有犯人賄賂看守，得到看守的許可，進城去找女人去了，回來再向看守行賄，看守就放他們回宿舍，熄燈時算他們“在”。伯朝拉遠在天邊，遙遠本身就是一種監禁——除了勞改營之外，這里離哪里都有一千公里。

也有的看守收受賄賂，讓外人進入監區。1947年，木材廠召開黨的會議，批評營區管理不善，外人沒有通行證，竟然被放進營區，私自會見自由工人。會上通報說，這樣的事發生了好幾次。外人闖入營區后，當局查不出來：街上照明不好，一共才有七個路燈，當初裝路燈是為了搞生產，不是出于安全的考慮。一共有八個崗樓，上面都有探照燈，鐵絲網四周都能照射到，但是其中三個沒有燈泡。



1940年代末，木材聯合企業的看守

列夫·以色列維奇和斯維塔順利來到勞改營大門口。大門搖搖晃晃，來一陣風就能吹倒似的，還沒有兩邊的木頭和鐵絲網結實。大門上方有一塊帶邊框的膠合板，上面寫滿了宣傳口號。膠合板上方是勞改營的標志：鐮刀錘頭。大門右邊是警衛室，進出勞改營都要經過這里，都要出示通行證，讓值班警衛查驗。勞改犯進出都要計數。

斯維塔對門衛說，我丈夫是志愿留營的工人，住在營區里。門衛不讓她進，說必須要由她丈夫出來接她才行。以色列維奇有通行證，就說，他進營區找她丈夫，讓她丈夫來大門口警衛室來。以色列維奇去了很久也沒回來。門衛對斯維塔很無禮，說話非常粗野，竟然說什么“北方的娘們兒”（指丈夫被關在勞改營的女人），聽那口氣，好像他已經猜到了斯維塔是在說瞎話。以色列維奇終于回來了，還帶來了“丈夫”，只見這人渾身上下濕了個透，酒氣熏天。這是營區里的一個自由工人，以色列維奇叫他來，假裝是斯維塔的丈夫，可是正要他好好表演的時候，他卻醉得不省人事，竟然睡著了。以色列維奇只好拿來一桶冷水，朝臉上一潑，他這才清醒過來。斯維塔后來回憶說：“那人一臉不好意思的樣子。夫妻見面是要親吻的。我可不想吻他，于是我就撲了過去，罵了起來：‘我不是給你寫信了嘛！你連來接我都不接！’那人假裝慚愧的樣子，連說：‘咱們走吧，走吧！’”那門衛還沒來得及盤問，說時遲那時快，斯維塔和她“丈夫”已經進到勞改營里邊兒了。

他們來到這位“丈夫”住的房子。原來他有妻子，可是事先也沒告訴她，她不知道丈夫已經答應人家，要讓列夫和斯維塔在她家會面。那位妻子沖著她男人吼叫起來，那丈夫酒氣沖天。兩人頓時吵得不可開交。斯維塔回憶說：“倒不是因為嫉妒，而是因為害怕被人發現，這是伙同列夫和斯維塔共同犯罪，一旦漏了餡兒，要蹲監獄的啊。”其實，列夫早就來了，藏在外邊，正等著斯維塔來呢。這時，那夫妻倆正吵得臉紅脖子粗的，列夫進來了，一個箭步跑過去護著斯維塔，生怕那人的妻子一怒之下傷害到斯維塔。列夫和斯維塔做夢也沒想到，他倆久別竟是如此重逢：破爛的房子里，一個女的嚷個不停，一個男的醉眼惺忪。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還真的走到了這一步。六年來，他倆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這一刻，本以為見面時只有他倆，能夠卿卿我我，沒有任何打擾。沒想到，如今完全是另一番場面。情況非常緊張，充滿危險：那妻子極為害怕，又氣得不得了，說不定會把看守叫來，表白這事兒與她無關。眼下，列夫和斯維塔只能隔空對視一下，不敢出聲。列夫回憶說：“我倆都得克制感情，在那種情況下，沒法撲到對方懷里，熱烈擁抱。咱們現在是犯了大法，必須要小心。”

營區有一座木頭房子，樓上有兩間房，這對夫妻就住這兒：一間有家具，另一間空徒四壁，什么都沒有。斯維塔記得他們給我倆拿過來兩把椅子，我倆坐在一起，坐在這空蕩蕩的房間里。這時候，列夫的朋友們就出去幫我們找地方，另找一個藏身之處最后終于來了消息，說他倆可以住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家。

亞歷山德羅夫斯基這家人也住在勞改營里，住的房子離這里很近。妻子名叫瑪利婭，是電話接線生，目前和兩個小兒子單獨住在這里。她丈夫亞歷山大在伯朝拉監獄里服刑（有人在火車站咖啡廳偷他的東西，他和那家伙打架，遂以“流氓罪”被抓）。瑪利婭晚上要去蘇維埃大街電話局上夜班。下午有一位看守要帶妻子來她家串門。等他們走后，瑪利啞就會把電燈都關掉，表示安全了。列夫和斯維塔一見燈滅就可以到她家來了。

天一黑，列夫和斯維塔就悄悄溜了出來，加快腳步向瑪利啞家走去。瑪利啞家對面有一個木頭堆。列夫和斯維塔躲在木頭堆后面，等待看守離去。他倆正躲在那兒呢，忽見一個看守徑直向他倆這個地方走了過來。他倆尋思，壞了，準是這個看守發現了他倆，這可大事不好了：斯維塔會被捕，并且給她安上一個罪名：反國家罪；列夫的刑期又會多判幾年，送到大北邊的勞改營去懲罰。可是，他倆一聽，那家伙走到木頭堆另一面就嘩嘩地撒起尿來，尿完就走了。

來瑪利婭家串門的客人終于走了。她家的燈滅了。列夫和斯維塔從潛藏的地方探出身來，三步并作兩步，急忙走進屋里。里面只有兩個小房間，有一個房間里放著一張單人床，瑪利婭平時就睡在這兒，還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另一個房間，地上鋪著鋪蓋，她兩個小兒子睡在上面。列夫和斯維塔進來的時候，兩個小孩兒正在瑪利婭房間里睡覺。于是，列夫和斯維塔就到另一個房間去。斯維塔記得：“那一夜，我們一點兒都沒睡。”列夫也說，終于沒有別人，就我們倆了，再沒有害怕的了，兩個孩子已經睡著了，我們這才自由了，我倆盡情地接吻啊，擁抱啊……不過……僅此而已，沒做別的。”列夫沒說的，斯維塔后來講了出來：“當時我問他：‘你想要么？’他想了想，回答說：‘可是會有什么后果么？’”

列夫和斯維塔在瑪利婭的房子里共同度過了兩個夜晚。白天，列夫在發電站干活，斯維塔待在屋里，和瑪利婭的孩子玩兒。第二天晚上，列夫和斯維塔壯著膽子走出來，去實驗室看望斯特列里科夫。列夫好幾個朋友都來問好——大家都對這位年輕的姑娘佩服得五體投地，竟敢冒這么大的風險來拜訪他們。大家都把寫好的信交給她，托她帶走，幫他們寄出去。

第二天，有個人來接斯維塔，把她悄悄送了出去。斯維塔沒記住這個人叫什么名字。她一個人走到火車站，在售票處旁邊的大廳里等著買票。售票處只在火車進站前不久才開門售票。斯維塔坐在行李箱上，雙手托著下巴，不知不覺累得睡著了。火車進站、大家都上了車，她才醒過來。她急忙抓起東西，買了一張票，向火車跑去。車票上標有指定車廂，已經全滿了，還不錯，讓她“到一節衛生車廂去了，那節車廂全是空的，一個人都沒有”。斯維塔在座位上躺下，睡了過去。

車到科日瓦，斯維塔醒了。當時正是深夜。她走到以色列維奇家，在那里睡到第二天早晨。斯維塔臨走之前，以色列維奇給她照了兩張照片，準備送給列夫留念——一張照片是她坐在藤椅上，背后是一張掛毯，作為屏風，照相館的照片都是這樣的，另一張照片是她穿著大衣，肩背手提著行囊，從他家走出去。

斯維塔從科日瓦給列夫寄出了這封信：

我親愛的列夫，我還在科日瓦呢。昨夜沒有直達車，但是今天我要買到一張直達車票。列夫·以色列維奇明天會給你講我出發的情況。非常順利……我在（伯朝拉）火車站睡的覺，坐上火車，又一路睡到科日瓦。我半夜時分到的以色列維奇家，輕輕把他叫醒。然后我又睡到今天早上，中途一次都沒醒。

目前我很好，我看東西的那兩個小孔里，沒流出任何水來。可能是因為這一切都還像做夢似的。列夫啊，昨天，我忘了告訴斯特列里科夫，瑪利婭沒在家，我沒見著她。別忘了告訴他……列夫啊，請代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謝。我拙嘴笨舌的，不知道說什么好，但是他們還是能明白我的意思的。

以色列維奇要給你一個驚訝一暫時保密，不告訴你是什么。

列夫當天就給斯維塔寫信說：

親愛的斯維塔，今天連天氣都令人心煩意亂。風特別大，今天早晨還下了雹子。一切都黯淡無光，真是一個悲慘世界。我在等我的同名人來。他可能明天來吧。當然我很擔心……今天早晨，我和格列勃（瓦西里耶夫）聊天，一直聊到九點鐘。我倆喝了茶。大家都到斯特列里科夫這里來了。他走以后，我就把《秋天的日子》[49](#__49)[1]裝在鏡框里，掛在斯特列里科夫床頭了，然后我坐在鏡框下面，想沾點“好運”……尼古拉（里列耶夫）今晚想來，奧列格（波波夫）可能過一會兒會順道來坐會兒，但是我想一個人待會兒。

列夫急切地等待斯維塔寫信來，他想盡快聽到斯維塔平安到家的消息。斯維塔想溜出營區，被抓住的風險相當大。兩天后，列夫寫道：“親愛的斯維塔，亭亭玉立的斯維塔，到今天，10月3日，我還沒收到你的來信。心煩意亂，什么都做不下去，心里只想著你。”從科特拉斯寄來的信終于到了，里面還有兩張斯維塔的照片——列夫·以色列維奇要給列夫一個“驚喜”，原來是照片：





斯維塔的兩張照片

我親愛的、美麗的斯維塔……信終于到啦！謝天謝地，一切均好。衷心感謝所有的人，有一個算一個，我感謝所有的人。看到你的短短信箋，我馬上就猜到了，你說的驚喜指的是什么，我猜的一點兒不差，但是打開信一看，那份驚喜一點兒都沒少。再過十年（坐在沙發里），你也一點都不會變，就像你現在這樣。你每個方面都永遠美麗可愛……

斯維塔，你確實是令人難以置信地美麗，大家都向你問好，但是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我只想做一件事：想念你，描寫你。我現在避開大家，不想和別人談話，只和德爾列茨基談了幾回。看書也看不下去……我總在看《秋天的日子》這幅畫，看也看不夠，不忍離去……我親愛的、溫柔的斯維塔，緊緊握手。

10月5日，斯維塔回到了莫斯科。她沒有按計劃給列夫·以色列維奇拍電報，因為前一封電報被科日瓦郵局扣下，沒發出去，“立刻變成了所有當地人的財產”（指內容可能已經被報給了內務部勞改營當局）。兩天以后，斯維塔給列夫寫信，告訴他回來一路上的所見所聞：

我花了二百五十盧布，弄到直達車的座位。你那位同名人給了我車票，還把我送上了車。我給他那小房子照了一張（照片）留念，我在那房子里度過了三個夜晚呢。起初，乘務員把我領到一個空車廂里，幾乎沒什么人，我剛睡著，他就來讓我和一個男人換座位，那人跑到女人堆里去了，他想換座位，到別處去。我樂不得地和他換呢。車上遇見三位姑娘，是空中制圖考察隊的攝影技術人員。她們是從終點（沃爾庫塔）上來的，要一直坐到莫斯科。車上無所事事——忘了帶本書，回來的路上看——于是，我一路上都在睡覺……火車到站我都沒醒。

我9月5日（四點三十分）到的家，小睡了一會兒，和阿列克玩了一陣子。然后我就去蒸了蒸桑拿，回來做午飯。那天，媽媽發燒，燒到三十九度呢……

莫斯科陰沉沉地接待了我——天氣很冷，還下雨（但不是淫雨霏霏，連月不開的那種）。以前是天天為面包發愁，現在是為土豆發愁，商店里沒有賣的，黑市價格太高，已經七盧布了（過去才三盧布）。大家都在囤積……糖根本見不到影兒了，糕點和面包全都沒貨。真是郁悶啊。現在，樹葉都快掉光了，市場上也沒有花兒賣了。列夫啊，親愛的，先寫到這兒吧，再見。祝萬事如意，永遠愛你。還沒來得及見大家，凡是見到的都向你問好。

# 七 再次冒險相會

斯維塔走后不久，伯朝拉就進入了冬季。列夫覺得，斯維塔一走，冬天就來了，這兩件事好像是有因果關系似的。10月13號，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今夜下了第一場雪，地面上凍已經兩天了，忽然之間，到處都是冬天的景象了。這兩天，我就是寫不出來……當然這不能怪冬天，斯維特不在，冬天就來了。冬天把情緒都凍麻木了。思想也不靈活了；人漸漸靜了下來，不太想干事兒了。時間好像也慢了下來，在這白茫茫的原野上凍住了。

斯維塔來的時候，列夫興高釆烈的。她一走，列夫悵然若失，心情比以前更加低落。這一來一走，彰顯出列夫日夜盼望的人兒，現在已經人去室空，不在身邊了。斯維塔走后第六天，列夫在信中寫道：“斯維塔，我越是想你，越記不清你的臉了。我怎么想象不出來你的容貌了呢——只見到你的零星碎影。真想哭一場。”列夫可不是顧影自憐那種人，但是此時此刻，他顯然在傷心。列夫接著寫道：“好啦，傷感傷感就行啦，我不能再哭哭啼啼的啦。其實，我現在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寫你的名，一遍一遍地寫，把所有的昵稱都寫出來，正式的名字、小名，一一寫出來。這個坎兒，我能過去。”

釋放，遙遙無期，列夫已經不抱希望了。三個星期之后，信中寫的是聽天由命的話：

你曾經問過，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還是沒希望才容易活下去。我現在不抱任何希望了，沒有希望，心里反倒感覺很平靜。稍微講點邏輯，稍微觀察一下，就不會異想天開了。我不知道為什么會寫出上面的話，既然寫了，就不去管它了。但和我現在的感覺不太一樣。不過，現在，你叫我把意思完整地表達出來，我也說不上來。必須好好想一想，才能說得全。那么，還是不去想它為好。

不過，列夫后來又寫了一封信，談他的幸福觀。幸福這種感覺久違了。和斯維塔在一起的時候，幸福的感覺又回來了。尼基塔叔叔有個兒子在服兵役，休假回家探親，惹得尼基塔叔叔和他妻子對兒子很失望。聽了這個消息，列夫思前想后，浮想聯翩：

有的人知足常樂，能把現在所擁有的利用起來，但這樣的人不多。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可不少。有時候，需要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審視一下自身，要仔細判斷，不要只跟感覺走。也就是說，現在擁有比曾經擁有要強，現在擁有才是幸福，如果有變，很可能不如現在……當年賜給我幸福的時候，我認出了幸福，沒有視而不見。我感謝命運，感謝大自然，感謝你給了我幸福，也感謝我自己的眼光，當時一眼就認出了幸福，不是等到幸福過去才明白過來。

列夫重新回到了勞改營日常生活的常態，每天出工干活。9月初，發電站人員變動了。老站長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Vladimir Aleksandrovich）調到城里的中心發電廠去了。他過去也是勞改犯人。來接他班兒的，名叫鮑里斯·阿爾萬尼托普洛，也曾經是個勞改犯。列夫和他倆處得都很好。亞歷山德羅維奇1938年被捕，被捕前是電氣工程師。那時，他的職業生涯蒸蒸日上，很有前途。而今他很傷感，天天借酒澆愁，女兒死了，哀痛不已，再加上前途沒了，整天唉聲嘆氣。列夫認為他“非常隨和，很有文化”。亞歷山德羅維奇和妻子塔瑪拉住在一起，也住在工業區勞改營里。他也是自由工人，為列夫偷偷捎信的人當中就有他一個，有的信是從外面帶進來的，有的是帶出去寄的。有的時候，他把錢交給列夫，讓斯維塔從莫斯科給他寄衣服、日常用品。亞歷山德羅維奇轉到市內發電廠的時候，建議列夫也跟他去，但是列夫謝絕了他的好意，不想去，他告訴斯維塔，“我在這里安全”。列夫喜歡這個新來的上司阿爾萬尼托普洛，覺得他“人很聰明，很和善，通情達理，不孤芳自賞，也不覺得自己在這里大材小用”。大北邊兒林區新開了一個勞改第四營區，離這兒非常遠。勞改營當局正在往那兒輸送勞改犯。列夫最怕被挑到那邊兒去。如果繼續干現在這個活，就不大可能被轉走。

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廠里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們正在挑選人，要送到第四營區去，有的去伐木頭，有的要在通往第四營區的道路沿線（十五公里）修房子。來了很多婦女，并且越來越多，是來頂替男勞力的。暫時把她們放在了第三營區，有些已經在各個車間開始干活了。”列夫很長時間沒見過這么多女人了——戰爭期間關押他的那些集中營，女犯人都是單獨監禁在別的營區。看到她們被強迫干體力活，列夫“心里很是不安”。他對婦女的看法還是帶有戰前的色彩，那時的風氣是，男人要對女人有敬慕之心，有浪漫的騎士情懷。和這些婦女一談，列夫更加不好受。他告訴斯維塔：“這些新來的女勞改犯，談起她們原來待的地方（勞改營、流放地），很多人都戰戰兢兢的，很害怕的樣子。這些人，能平靜講述，沒有恐懼的，是少數。聽她們這么一說，即使不替她們害怕，心里肯定也是揣惴不安。太慘痛了，實在聽不下去。”

斯維塔自打從伯朝拉回來之后，心情有點兒低沉。列夫早就提到，探視回來，“別人都開開心心的，唯獨你一個人，會更難以開心了”。或許這就是列夫預見的情形吧。這次去見列夫，見是見到了，走，可不是一走了之。心情平靜不下來啊。

斯維塔為了排遣離愁，就不停地忙碌。她一頭鉆進工作里，即使心不在焉，也孜孜不倦地做這做那。她去各地查看工廠，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的，亞美尼亞共和國首都埃里溫的，她都一一去過；莫斯科蘇維埃舉行地方選舉，她也去幫著吆喝；工會開會，她上去發言；研究所的墻報，她也編輯組稿；培訓新來的研究生，寫博士論文，翻譯文章，跟班學法語、英語，參加合唱團演唱，練鋼琴，組織數學俱樂部。列夫簡直想象不出來，斯維塔居然是這樣一位多面手。他在1948年2月3日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閑下來的時候每分鐘都在想你，當我想你的時候，我只能想象得出你在某些場景中的樣子。比如，你遇到什么問題，經過深思熟慮，突然抬起頭來回答的樣子。你和別人談話時的坐姿。你睡覺的模樣（這你可就想象不出來啦，大致什么樣你也無從知道啦！）。你編辮子的模樣（這個技能，我覺得太高深莫測了）。但是，你的聲音，我記不太清了，只偶爾記得你的笑聲，記得你說過的一些話，記得你的語氣。不知你在陌生的環境中是什么樣子，我不敢想，我的想象力被嚇回去了。我擔心出什么錯。實際上出了什么錯，我也想象不出來。我能想象的，是更糟的情況。

斯維塔有很多消息要告訴列夫。12月份，政府把盧布貶值了十分之九，廢止了定量。頓時出現搶購風潮，大家都想把舊錢現金花出去買東西，結果，所有商店門前都排起了長龍，但情況漸漸平靜了下來。有的家庭相對富裕一點兒，如伊萬諾娃家就屬于這樣的人家，他們看到這個新的消費機會，興奮不已。斯維塔1月24日給列夫寫信說：

沒有定量配給的生活，有其消極、負面：種種誘惑，鋪天蓋地而來，也沒個約束。

起初，人們把一切都揮霍掉了，后來他們意識到，還是應該仔細一點兒，新的工資袋一來，又都犯了老毛病。大家都不吃黑面包了（我家過去是一公斤吃三天，現在看樣子還能多吃幾天），現在都在搶白面包，像法國長棍面包那種（每個四盧布，過去才一盧布四十戈比）……原先根本買不到糕點，現在都吃夠了……我們這一帶有夜間營業的商店，真是天賜的禮物。我們樓下有一個食品雜貨店，庫爾斯克地鐵站附近有一個熟食店，波克洛夫門那邊開了一個中央合作社商店，十點以后什么人都沒有，茶、糖、奶油之類都很容易買到。機關、學校的食堂也有面包和土豆賣了。媽媽早早就出門去買肉（喜歡價廉物美的東西）。買面粉得排隊，買牛奶更得排長隊了，因為比別的東西都便宜——四盧布一升……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的，新年過后，我漲工資了，湊了個整數：一千（盧布）……家里一切均好：燈，煤氣，暖氣都好，有軌電車等等都比以前好了。地鐵新車廂裝了新座椅，好像是紅杉木的，還安了新的照明設備，不僅車廂中部有照明，而且座位上方也有照明了，車窗也比以前大了……通報到此結束。

斯維塔寄包裹給列夫和他的難友們，比以前寄得更勤了。她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市場供應充足的新局面。列夫再怎么抗議，她也不聽。斯維塔3月30日的信中寫道：“哎呀，親愛的列夫，傻瓜列夫，你怎么能說今年什么都不缺呢？還吃那干面包吧……你以為我會坐在這里喝香茶、吃火腿，喝牛奶、吃餅干，什么也不想給你寄么？”斯維塔本想寄食品來，列夫還是反對，不讓她寄。不過，列夫倒是要她寄點兒藥品來，有朋友病了，還有其他勞改犯也有病的。斯特列里科夫胃疼病還沒好。列夫把他的癥狀詳細寫下來，寄給斯維塔。斯維塔的朋友舒拉是醫生，癥狀搞清楚了，舒拉就可以下診斷了，斯維塔也可以寄藥來了：

病人四十九歲，性情樂觀開朗，長得很年輕……1938年以來一直有疝氣（有鵝蛋那樣大小）。1920年，他胸部中彈：右乳頭下方仍可見子彈射入的五厘米長傷疤，射出口傷疤四厘米長。射出口在脊骨附近，彈頭是從兩條肋骨之間鉆出來的。1947年10月份，胃里、胃周圍定時出現劇痛，疼痛的面積有兩三個指頭那么寬，位置在第七根肋骨到第八根肋骨之間。疼痛先從中點右邊一巴掌寬的地方開始疼，向左擴散，距離中點有兩到三個指頭那么大的距離……疼痛非常劇烈，令人坐臥不寧，每次發作要持續八到十四個小時，基本上沒有間歇。發作時，若仰臥，疼痛會加劇。如果抱緊膝蓋頂著前胸，疼痛會輕一些。他平時（過去幾年來）的飲食包括：新出爐的黑面包，用磨碎的大麥、珍珠麥、燕麥片加鹽做的稀粥，蕎麥稀粥，其他成分一樣，只是濃度小了。這些食物中只有剛出爐的面包才會導致胃疼……而他的飲食結構不太可能有變化。

舒拉咨詢了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的醫生，和他們一致認為，最可能的解釋就是病人的肝臟有問題。斯維塔回信寄來了舒拉的診斷，并寄來了一系列的藥，一些給膽汁取樣的探針，并囑咐吃什么食物好，斯維塔還說，會給他寄來白面包干。

列夫的室友柳波米爾·德爾列茨基（昵稱柳布卡）也病了。他得的是壞血病，勞改八年落下的，心理崩潰了。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柳布卡抑郁得很，一天到晚都不說幾句話。他害怕一切美好的東西。大自然的美、書里的美，他都不想看，看了就想家。”維生素C抗壞血病。斯維塔開始給他寄維生素C，是粉末狀的，包在一個個小袋內。德爾列茨基一點點兒好了起來，渾身也覺得有勁兒了。但是勞改營對他心理打擊太大，至今沒有恢復過來。列夫告訴斯維塔：

我的柳布卡正在緩慢地重返文明。今天，我問他，和人握手的時候，為什么把臉拉得那么長，怪嚇人的，為什么和別人打招呼那么不自然。他一聽，很不好意思，回答說，過去這八年來，人們見面也不問好，走了也不說再見，只是嘟囔一兩句罵人的臟話，從來不握手，似乎手只是用來打人的，都已經習慣了這些，所以別人伸出手來和他握手，他總也拿不準對方是不是真心。他伸手和別人握手的時候，就好像中世紀向上峰行禮似的。他說：“我也意識到了，有的時候就板著點兒，也就沒那么唯唯諾諾的了。”如搞得好，再過一年，他和別人打招呼就會正常了。

1948年5月，發電站的老站長亞歷山德羅維奇的妻子塔瑪拉也病了，來莫斯科看病。她在首都的時候，斯維塔幫她跑這跑那。塔瑪拉回伯朝拉的前夕，斯維塔交給她一盒子藥品，請她帶回去交給列夫。這藥都是斯維塔平時為列夫的朋友們收集起來的。

斯維塔自己身體也不好，瘦了很多，睡眠也不好，煩躁易怒，動不動就眼淚汪汪的，這都是抑郁癥的癥狀。蘇聯誰也不談抑郁癥，人人都必須樂觀，不準愁眉苦臉，有什么問題都得自行解決，都得撐下去。伊萬諾娃家有很多朋友都是醫生。斯維塔去找過好幾位，請他們給自己看看，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他們都覺得，她這病是身體上的病，誰也沒往精神上說，給她驗了血，發現甲狀腺有炎癥，叫她去內分泌科看看。內分泌科大夫給她開了一些碘，又給她開了鎮靜安眠藥苯巴比妥（Barbiphen，也稱魯米那），但是哪個醫生都沒問她心情怎樣。斯維塔自己估計，身體有病的面兒小，心理的面兒大。她只感覺心情不好，面容憔悴。她給列夫寫信說：

內分泌科大夫說，甲狀腺肯定有點兒亢進（頭疼、發燒、心臟疼痛、消瘦、神經緊張，眼睛有一種異樣的光澤：我覺得是發燒造成的，不是別的原因）。這個診斷不錯，我很高興，我最恨的是不能確診。大夫還開了純碘片，與之同時服用的有碘化鉀、苯巴比妥、溴、樟腦、纈草根，所以現在還不能開始治療。今天，我又去找大夫了，給他看了化驗結果，還告訴他，我去找內分泌科大夫看過了。他看了我的紅血球沉降率[50](#__50)[1]非常驚訝，可能以為我的病都是神經引起的，但是光有神經緊張，血沉也不會升高啊。他還指著內分泌大夫開的處方，神氣地說：“這些藥對你是有好處，但是依我看，問題不在這里。”（他沒說問題在哪里。）“我建議你吃魚肝油，一定要吃到夏天。”（如果無效呢？）我想稱體重，可是找不到秤。所以，我是真的體重減輕了呢，還是別人看著覺得我瘦了呢，現在我說不準。我自己感覺，現在并沒有比過去瘦啊，去年夏天比現在瘦，確實，我現在臉色蒼白，有點兒憔悴。我一般不是這樣兒的，誰見了我都叫起來：“你怎么啦？”不管是當著我的面兒，還是背地里，他們都在講，我在赫羅姆尼克[51](#__51)[2]上學的時候是一個“迷人的姑娘”，現在又如何如何（言外之意是我老了，邋邋遢遢，成了一個丑老太婆）。

斯維塔的感受，只能和列夫一個人吐露。1948年2月，從伯朝拉回來有好幾個星期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我親愛的列夫，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可是信，我一封還沒收到呢。我正在努力擺脫這種心態，努力息怒。我的詞匯里又出現了“不”字。有的人，快樂所需的一切，其實他們都有了，可是還是不快樂。這種人我可受不了。我沒法同情他們。我忍不住還是要對他們說話帶刺兒，還是不耐煩。伊琳娜星期六來電話，邀請我去洛辛卡過周末，我沒答應。朋友們要讓我舒服舒服。這個好意，我接受不了。我需要的是一切。沒有一切，那我什么都不要了。一切又都變成黑白分明了。“不”字都是因為一個“想”字。想要而得不到，那干脆就什么都“不”了。我越來越鐵石心腸了，我也不想這樣，可是沒辦法。所以，我給伊琳娜的回答很刺耳，掛了電話，我就哭了起來。

給列夫寫信，可以把憋在心里的委屈話說一說。列夫理解她的心情。3月2日，斯維塔給他寫信：

前兩天，格列勃的母親來電話，問我一切可好。我不想讓她看出來我很悲傷，就說我很好。可是實際上，我心情非常沮喪，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列夫，我親愛的，我的信有時是寫得很惡心，我知道不應該那么寫，但除了你，我還能向誰哭訴呢？給你寫信的時候，我的神經就不那么緊張了。所以，列夫，如果你收到這樣的信，可不要生氣啊。等信走到了你那里，我寫信時的心情反正早就過了那個勁兒了，正樂得蹦高呢。可以了吧，親愛的？我的信從來都不是要惹你生氣的，也不是要增加你的痛苦的。我已經一連哭了好幾天了，不光是上床睡覺的時候流淚，一大早醒來就哭，午飯前午飯后都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列夫啊，哦，我要說什么你是知道的……

列夫，希望咱們彼此永遠都不要覺得對不起對方，重要的大事都要相互體諒.，無關緊要的小事，都要多包涵，不要生氣（通常都是拿最親近的人撒氣）。

斯維塔不想讓列夫覺得，她的抑郁癥是他蹲監獄造成的，那樣會增加列夫的思想負擔。列夫現在就夠受的了。未來的歲月，列夫還要靠她幫助呢，所以自己一定要堅強，不能氣餒。斯維塔很多信里談到了自己心情低落是另有原因的：“我得了抑郁癥，正等待著痊愈。不知道為什么，1月份怎么這么難過。也許是因為，在過去，1月份是最快樂的月份吧，媽媽過生日啊，圣誕節啊，新年啊。也可能是因為，新年以前，一直到現在，我心情都不好。我好生氣，總感到渾身沒勁兒。”但是，斯維塔的抑郁癥和她母親的生日毫不相干，完全是由于她和列夫被迫分離，不能團聚造成的。這一點，在斯維塔的信中，有時候能在字里行間隱隱約約看出來：

各種各樣的藥片（真是各種各樣，不是夸張）都吞了下去，我都忘了怎么哭了（忍淚吞聲的“吞”也跟著訓練出來了）。最近我睡眠不好，可能是因為房間不透氣，缺氧，夜里外面非常冷，爸爸害怕進風，所以把窗戶都關上了。我的小窗戶反正也開得不夠大。我至少夢見過你五次。可能因為你的刑期快滿了，真的快到頭了吧。可能是迷信吧，估計現在見不到你，由于某種原因，得等到秋天才能見到。秋天可能更好。

斯維塔去滑雪、滑冰，滑著滑著，心情居然好起來。她3月10日給列夫寫信說：

目前，滑雪是我最喜歡的項目，毫無保留地喜歡，勝過文學，勝過音樂會，甚至勝過人。陽光悄悄鉆進森林里來窺探，林中可真美，真純潔啊（我指的是“純潔”這個詞所有的含義），令人不禁想到（還會脫口說出來），活著真好。不知為什么，心情好多了，不那么痛苦了。這也算是快樂生理學吧。

斯維塔本想多做一些冬季運動，可她媽媽覺得她身體不太好，總想把她拴在家里，不讓她出去。只有列夫給她鼓勁，叫她多出去走走，充實一下生活，抑郁癥就好得快了。他4月15日的信里說：“去哪兒走走吧，不光是體魄的健康，還有心理狀態這方面，心理狀態像外部因素一樣，都對人的整個精神有很大影響，有時可能還是初始原因。”列夫很擔心斯維塔的健康，就給尼基塔叔叔寫了一封信，希望他照顧一下斯維塔。那年4月，列夫給尼基塔的信中說：“她太難了，各方面都非常艱難，盡管她不說，情況都是明擺著的，不用說。”

斯維塔有個朋友圈，都是女性朋友，人數不多，都是她可以說知心話的人。除了伊琳娜·克勞澤、亞歷山德拉（昵稱舒拉，也叫舒爾卡）·切爾諾莫爾迪克，還有三個人，斯維塔和她們在一起的時間最多。她們每個人都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但是都堅強地活著，沒有被苦難壓倒。斯維塔很同情她們，有同病相憐的感覺。首先是她研究所的同事，名叫莉季婭·阿爾卡德芙娜（LydiaArkadevna），熱衷于體育運動，還是個登山運動員，她讓斯維塔愛上了滑冰、滑雪這兩項運動。斯維塔2月25日的信中講到了她：

我是怎么和她交往上的呢？因為她人聰明，俏皮話特別多，非常有活力，堅強，興趣很廣泛，等等。她滑雪滑得好極了，也常去滑冰，可她比我大將近十歲呢。她丈夫戰爭期間死去了，一年前十四歲的兒子又沒了（出了一場嚴重的車禍）[52](#__52)[1]，就剩她孤零零一個人在這世界上。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并且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一個女性朋友，比斯維塔小，名叫克拉拉（Klara），是研究所的一個技術助理。戰前她家人就被鎮壓了。克拉拉本人本來在哈爾科夫（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化工學院上學，上大一的時候被開除了，開除以后又被流放了好多年。斯維塔以前在信中提到過她，克拉拉問題的根源是她“地理[53](#__53)[1]知道得太多了”。當局有好幾次想把她排擠出研究所，但是，盡管工資很低，她還是堅持不走。克拉拉也失去了一個孩子。她丈夫也是勞改犯，在伯朝拉勞改營里。她不止一次去看過他，每次去都是住在塔瑪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家里。列夫覺得克拉拉這個人非常好。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說，克拉拉之所以還在等著丈夫，都是因為丈夫家是有錢人家。列夫反駁他這種說法，為克拉拉辯護。不過，列夫自己對她印象不深，只是“浮光掠影”，所以說不準（“挺漂亮，有點兒沉悶，指甲特長，跟吸血鬼的指甲似的，還戴著戒指……不聰明也不笨，中等，她等丈夫不是為了錢，她沒有那個卑鄙的心眼兒”）。斯維塔說話總是很直白，說起克拉拉來，也是口無遮攔，本來說的是克拉拉，卻不知不覺地也說到了自己：

我想象得出，塔瑪拉會更喜歡克拉拉，因為克拉拉更具女人氣質，因為她什么事兒都愛井井有條，喜歡舒適，喜歡服飾，等等。她倆關系很可能也很密切，因為她倆都是母親，又都失去了孩子。而我還只是一個“草上新娘”[54](#__54)[2]。她們失去了孩子，我失去了你。真正的區別可能就在這里，但是，究竟哪種遭遇更悲慘，很難說。再者，克拉拉對人親熱，我不親熱。當然啦，克拉拉趴在她肩上哭了，我沒哭。

最后說說尼娜·謝瑪什科，她是列夫和斯維塔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同學，丈夫安德烈在戰爭中死了，后來又失去了兒子，當時還是個嬰兒。斯維塔寫給列夫的信中，談到了尼娜孩子的夭折，這說到了自己的痛處：

埋葬一個人總是很難的。埋葬一個幼小的人和埋葬大人完全是兩回事。外人看到的僅僅是孩子的現在，而對當媽的來說，這個現在會向后延伸，延伸到過去，并且會把未來的一切都包括進來。不僅是前九個月的期待、后十一個月的喂養，而且，在此之前很久，還有是欲求還是勉強的問題（或者說是能行還是不行的焦慮）。不知我說沒說清楚，但這個未來就是一切，所有的計劃，所有的夢想，都在里面了，連想要抱孫子的愿望都包括在內了。所以，孩子死了，就從這個一切里剜掉了一大塊，世界上再沒剩下什么東西能填補這個空缺了。多虧這個世界忘性大，時間久了，心頭的痛就淡了……尼娜還很年輕，并且自由，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再要一個小孩來填補這個空缺。但是現在不是談這個事兒的時候。眼下，她只是說，人如果倒霉，就不要拼死拼活地去爭取什么了，也不要再追求什么幸福了。

斯維塔渴望有個孩子。她都三十歲了。她知道，至少還得再等八年，列夫才能刑滿釋放，說不定再也回不來了呢。她在信里寫過，說她正在等待著“人生真正開始的那一天”。去了這一趟伯朝拉，斯維塔認定了，自己的未來，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和列夫綁到了一起。但是，他倆早就定下來了，列夫一天不獲釋，不走出勞改營，就一天不要孩子。幾年以后，列夫回過頭來，這樣反思他倆當時的決定：

我不想因為我的現在、因為我的未來而耽誤了她的前途。我不愿意讓她為了愛我而犧牲她自己，也不愿意她跟著我的命運一起浮沉。所以，我不想有孩子把我們綁在一起。只要斯大林還活著，沒人知道世界會發生什么事兒。當今亂世，我可不能讓斯維塔被孩子累贅，我又幫不了她，說不定還會害得她和孩子遭罪，那可就苦了他們了。在斯大林時代，像我這樣的勞改犯，即使刑滿釋放了，也是“人民的敵人”，要想過正常的曰子，那可是休想。再次被捕，判處流刑，那都是常事兒……我可不能再給斯維塔和她家人增加負擔了，否則他們困難就更大了，不會幸福的。我倆如果有了孩子，他們可就糟了，一定會遭罪的。但是，斯維塔想要一個孩子。

斯維塔把她的所有母愛都給了亞拉的兒子阿列克。她在信里經常提起她的侄兒，摯愛之情溢于言表：

列夫啊，阿列克七歲了，不是八歲，星期天給他過了生曰。今天，列娜（Lena，阿列克的媽媽）帶他來和我們一起去看奧布拉茲佐夫[55](#__55)[1]的《靴子里的貓咪》。阿列克說，他很喜歡這個劇，好就好在短，不長，他也明白，里面的動物是假的，不是真動物（他自己裝扮動物裝得也很像，所以知道這些動物是假的），但是他還是以為是人爬進動物身體里面（裝的）呢。這說明，他沒有注意到，這些小人兒太小了，人根本鉆不進去。劇，他已經去真正的劇院看過了，在兒童劇院看過童話劇。你還記得《捷列姆一捷列莫克》（Terem-Teremok）和《山羊的故事》[56](#__56)[2]么？好像是咱倆最后團聚那次一起去看的，當然，最后又去看了場電影，那不算，電影叫什么來著，我記不得了。阿列克長高了很多，所以也比以前瘦了，可不是瘦得皮包骨頭啊。慢慢地，他不像以前那么膽小了，也沉著多了……俄語和算數成績是“優秀”，但是體育得了個“良好”。我告訴過你，他知道七分之一小于五分之一。整數減分數（不太難的分數）怎么減，（他的學校老師）列拉已經教了。現在他對工程學很感興趣——總想方設法把東西拆開，鉆到里面去，然后再把它安裝上，恢復原樣。他不怎么講究整潔，可是“教育”孩子這事我也不懂。

其實，斯維塔的母親阿娜斯塔西婭過去對她說過，當個幼兒園的老師也不錯，叫她考慮考慮。斯維塔對自己搞科研心里沒底，覺得能力不夠。她媽媽想，斯維塔如果整天和小孩兒在一起，心情可能會好。列夫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鼓勵她去當幼師。但是最后斯維塔還是決定不去當幼師了，說自己沒有生兒育女的經驗，“不知道孩子是怎么長大的”。

不過，阿列克來和她住的時候，她特別高興。看他淘氣的樣子，斯維塔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阿列克有本事六點鐘把我叫醒（他自己當然已經睡足了一夜好覺）。他愛弄出各種噪音，總忘記洗手，愛玩兒自行車，那車子大多時間是輪子朝天，鞍座朝下，浴缸里滿滿的都是肥皂泡，他身上穿著衣服就爬了進去。我小時候，如果總裝乖乖，我現在會很后悔、很生氣，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候我們把屋子全占了，椅子都倒了過來，四腳朝天，我們就鉆床底下、鉆桌子底下去玩。沒一個大人呵斥我們，我跳過來跳過去的，門牙撞到床頭板上撞掉了，頭撞到暖氣片上，劃了一個大口子。就那樣兒，大人也不吼我們（可能亞拉挨了罵，不過我沒挨罵）。你瞧，我既不會教孩子，也不會帶孩子。我相信遺傳基因絕對可靠，所以我對孩子是任其發展。看他這么小，就這么精靈，是個好苗子，肯定不是孬種。最糟糕的是我，“帶孩子，我只是理論上行”，毫無實際經驗呢。

說來也巧，此時此刻，列夫正在“教孩子、帶孩子”呢。10月5號這天，斯維塔從伯朝拉回到了莫斯科。列夫那邊，幾天前有一個人來串門：

一個小姑娘來到發電站門口，我問她：“你是來看我們的嗎？”“是啊。”“好啊，那進來吧。”她疑惑地看了看尼古拉·波戈丹諾夫，轉過來問我：“先生，你怎么不臟呢？”說著就拽著我的腰帶，領我在發電機房轉了一圈，同時問個不停：機器是在休息么，怎么到處都是鐘表，如果不給鍋爐加柴火，燈還會不會亮。我們很快成了朋友。我聽說，她名叫塔瑪拉·科瓦連珂（Tamara Kovalenko），是從烏克蘭的文尼察地區來的，她爸在馬廄干活。

塔瑪拉十一歲了，有一個姐姐，名叫麗達（Lida），有個弟弟，名叫托利克（阿納托利的昵稱）。這幾個孩子破衣爛衫，光著腳，沒有鞋。他們的媽媽當洗衣工，也不怎么管他們。他們總吃不飽，挨餓，因為他們的爸爸把夫妻倆掙來的錢大都花在伏特加上了。木材廠這個勞改營里有五百個“特別流放人員”，很多人都住在第一營區的窩棚里，就在監獄外頭。科瓦連珂一家就在這五百個囚犯當中，但是像塔瑪拉這樣的兒童在勞改營里自由，可以隨便走動，去哪兒看守都不阻攔，也不搜查他們。所以這些孩子可以給勞改犯跑跑腿兒，犯人給他們糖果，也給錢，有的還在車間里給他們做木頭玩具。勞改犯有的時候把玩具扔到圍墻外邊，這個城鎮的孩子們會到監獄區的圍墻根兒底下來撿玩具。很多人家都撿來了這種匿名的勞改營禮物，大家看到這些玩具，不禁戚戚然，對勞改犯充滿了同情。這些玩具也在提醒世人，這些勞改犯多么渴望要孩子。

從那天起，塔瑪拉天天來列夫這里串門。列夫也很喜歡她，給她吃的，漸漸地又教她讀書，做算術題。列夫10月25號寫給斯維塔的信里說：

今天我又當爸爸了。我今天來上班，忽然塔瑪拉帶她姐姐和小弟弟來了。以前我在信里講過塔瑪拉——她十一歲，真誠極了，可親熱了。言歸正傳，她一看到我，就撇下她那小家庭（只有姐弟兩人，姐姐十四歲，小弟弟六歲），叫他倆自己回家去，不要管她，然后向我跑來，一下把我攔腰抱住——真不知道她怎么竟能抱得攏呢，然后宣布說，她可想我啦，已經來過兩次啦，但是沒等我回來就走了，還說，要和我待到吹哨再走（下班時吹哨，我五點下班）。她告訴我，她現在要去上學了，在第二班，看起來她父母終于腦筋開竅了。她掏出一條紅色的舊絲帶，打了個領結，還說，很遺憾只有這么一條絲帶。斯維塔，寄書的時候，如果能找到絲帶，就在郵包里多放幾條吧，再放進幾本兒童書。

過了沒多久，麗達也來了。她大幾歲……一舉一動也更像大人。她倆成了三個電工、一個機器操作工的女兒了，但是她們好像拿我這個爸爸為主呢。在列夫的輔導下，她倆的學習成績大有進步。后來，塔瑪拉把一個勞改犯的廉價首飾給偷去了。麗達見了，立刻把東西給人家送了回去。但是，列夫的心卻涼了半截。他給斯維塔寫信說：“我對自己沒了信心。不必再拿絲帶來了。塔瑪拉再也不會到車站來接你了。”

列夫用功讀書，不管能找到什么書，只要里面有電氣工程的，就認真研讀，他想把發電站的運轉好好改善一下，現在發電量太次了，木材廠的生產被拖了后腿。由于缺電，各車間經常被迫停工（1948年5月，屈指一算，機器閑置率幾乎占到了工作時間的四分之一）。沒電時，勞改犯整天坐著，抽煙、玩牌，來電就得二十四小時連軸轉，生產計劃完不成還不行。5月12日，木材廠的黨委書記開會，一個勁兒地挑刺兒：“工作一點兒節奏都沒有，為了趕計劃，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動不動就趕工期，搞得暈頭轉向。”

木材廠下班沒個準點兒，胡亂加班，列夫極為反感。他覺得，這個鬼地方，當官的都是“白癡”。列夫的信里經常提到勞改營領導干的種種蠢事。那些家伙鐵了心，要不惜任何代價提高產量，結果機械故障層出不窮，還經常出事故、失火，全廠混亂不堪，弄得生產計劃更難完成了。例如，有一次，發電站正在進行修理。列夫在5月12號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

這幾天重鋪水泥地，亂糟糟的，一片狼藉。我們得干很多臟活：馬達泵要重新布線，電工組做得糟透了，需要裝新的斷路器，等等。地面之所以做得馬馬虎虎，不合格，要重鋪，是因為負責這項工程的頭頭們，誰都不管事兒。做壞了也沒人懲罰他們。白白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費時間，浪費能源。全都糊弄，誰都不負責任。花十年造的東西，才用一年就扔了。設備本來是臨時造出來的，是為了完成生產計劃的指標而趕制出來湊數的，每次趕工就修一下對付對付，一對付就是好幾年。干什么都是為了應景，根本沒個計劃。只有像斯特列里科夫那樣的人負責，事情才能做好。他一絲不茍，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可他是千里挑一呀。這個體制處處都表現出死氣沉沉，連斯特列里科夫那樣的人都拿它沒辦法。

列夫努力改進發電站的運作，完全是志愿的。他可不是出于政治動機，而斯特列里科夫確是出于政治動機，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相信這個體制，盡力爭取讓這個體制運作起來。列夫也像他一樣，做事非常認真，對工作有濃厚的興趣，以工作自豪。他給斯維塔寫信說：“如果儀表走得不正常，我可不能在屋里靜靜地坐著。機器聲不規則，我就放松不下來。我們那些電工，即使是最好的電工，看他們干的那個活兒，我就想啊，如果我是他們的上司，他們可就倒霉了。”那些電工也是這么想的：

昨天，我們一個操作工說，我總是找事兒做。他說：“列夫，你不干活就難受，你忘啦，傻瓜多管閑事就會頭上遭來一巴掌的。”這個比喻很粗魯，但也很形象：兩個人，一個是到處去找事兒做，做好事兒，找到了事兒做才安心；另一個可倒好，閑呆著沒事干。不該管的閑事他也去管，最后遭到迎頭痛擊。這一下，吃一塹長一智，從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但是，列夫為廠里做事，可不僅僅是認真負責的問題。這里面還有自尊心的因素，他想在被囚禁期間做點兒有意義的事兒。或許，他也認識到，這些年絕不能白白地荒廢了，應該學點兒新的技能，將來刑滿釋放，走出勞改營的時候也好有個正確的心態，也好開始新的生活（列夫每次回想起監獄里的那些年，對自己的成就總有一種自豪感，他提高了發電站的發電量，夠整個木材廠用的了）。他也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驅除一下負面的、有自我毀滅傾向的想法，專心干活不想別的，日子就好打發了。這也是一個活命的辦法，很多勞改犯都靠這個辦法活命。[57](#__57)[1]

之所以這么做，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自我保護。讓發電站覺得自己是有用之人，這樣就能保住自己這個比較優越的職位，減少被調走的危險。調走的話，會有兩個去向：一個是被發配到其他條件更加惡劣的勞改營去，這是他最害怕的事；另一個去向就是被調回拖運隊去拖運木材。列夫還有一個希望，就是爭取減刑。1948年5月1日，勞改營里的“附屬企業”（包括發電站）開始實行一種新的“積分制”，即“以超產換取減刑”：犯人超額完成生產定額，凡超額100%—150%的，一天頂1.25天；凡超額150%—200%的，一天頂1.5天；凡超額200%—275%的，一天頂2天；凡超額275%以上的，一天頂3天。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這樣算來，我們每干一天就多掙了0.25天，也就是說，一個月多掙了6.5天，等于一年多掙了兩個半月，如果單位頭頭評價特別好，還有可能掙到更多的減刑天數呢，不過，如果頭頭評價不好，也有可能一點減刑天數都掙不到呢……靠運氣，這有點兒像彩票吧。”

1948年還真有被發配走的風險。當時勞改營第四營區正在建，木材廠的囚犯正在被源源不斷發配到那邊去。有技術的勞改犯也有被轉到第三營區去的——那里關押的大都是刑事犯和違規的自由工人，勞動紀律全線崩潰，生產指標僅僅完成三分之一，犯人經常鬧事，抗議居住條件太壞。1948年夏天，第三營區發生好幾起犯人脫逃的，既有個人單獨逃跑的，也有群體越獄的。第二營區的囚犯一看，也躍躍欲試，暗中籌劃出逃。第三營區有好幾個出逃的人在森林里被擊斃了，也有扛不住蚊子叮咬[58](#__58)[1]自動回來的。消息傳來，第二營區那些要逃跑的人不在乎，還是要逃。

6月24日，列夫寫給斯維塔的信里說，傳說當局為了對付騷亂，正把大批勞改犯轉押到北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他告訴斯維塔，暫時不要寄任何包裹，等他把情況摸清再說。列夫預料，會先把政治犯轉移到北西伯利亞，包括他自己，或許“這幾天”就能走。6月25日，列夫又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叫她暫時不要計劃到伯朝拉來，來信也不要直接寄，要通過發電站原來的站長亞歷山德羅維奇轉交，萬一被轉走，來信不致落空：

親愛的斯維塔，鑒于即將發生的事情，切記以下各項：休假不要到這里來。如果有出差機會，又不太費事，再考慮來。這兩天，成功的機會基本上沒有了。案子最重的，也就是犯了第58條的，除了做“一般”工作的之外，好像都要被解除現在的工作，轉到（河邊的）第三營區去安家落戶了。現在，第三營區體制改了，變成“嚴管勞改營”了[59](#__59)[1]。工業區，你完全住不下了，短時間也不能住，我們目前在那里干活呢。只有他們把我當做特例留下來，你才能到這里來。但是，我再說一遍，這種可能性實際上是零。這次要嚴多了……不要來了，不來是上策。你在聽我說么，斯維塔？照我說的辦吧。這是我最后的決定，別猶豫了……就這么說定啦，斯維塔？情況就是這樣。至于將來，以后再談。下一步會怎樣，眼下我們只能猜測……如果你需要一個新的地址，等過幾天亞歷山德羅維奇有了新工作，我就給你寄去。但新地址，往那兒寄信，也不要寄得太頻繁了，暫時還好用。還有一件事，斯維塔。這封信，不要保留，所以上面才沒有編號。收到信后，請來信告知，只這樣說就行了：25日的信收到了。

斯維塔并沒有按照列夫說的那樣辦。他的來信太寶貴了，斯維塔舍不得扔，全都保留了下來。她仍然計劃來看列夫，她并沒有放棄。

列夫和斯維塔自從4月份起就一直在商討第二次來探視的事兒。這一次，斯維塔很擔心，不像上次那么輕松。原來打算夏天去。斯維塔的上司濟德齊克說這個想法很好，是應該夏天去，還建議她這次去多待幾天。4月16日，斯維塔給列夫寫信：

昨天，濟德齊克問我打算什么時候去基洛夫。我說，我已經申請8月份休假了，并且打了報告，說我定于8月份到基洛夫的輪胎廠去檢查工作。但是他說：“7月去吧，7月天氣更暖和點兒，在監獄里多坐[60](#__60)[1]幾天，不要像去年那么匆匆忙忙的。”所以沒問題啦。但是，這次來我有點兒害怕，比上次擔心的地方多。上次我心里有準備，很坦然，即使探視壞了也不會在乎。可是現在心情很亂，心思靜不下來。

斯維塔原打算先去基洛夫出差，然后再繼續往北走，來伯朝拉。5月底，這個計劃看樣子要泡湯。由于各單位應該給研究所支付的咨詢費到期未付，研究所放出話來，再不付款就不來工廠檢查項目進展情況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如果整個夏天都不能出差，那我就7月份休假。就這么定了。我也不想這樣。我在研究所里比較招眼，不在所里，大家都會注意到的，他們就會問，我到哪兒去了，等等。”列夫不這樣認為。他覺得，斯維塔應該聽濟德齊克的忠告，因為，來探視這件事，全靠他幫忙才能瞞人耳目。列夫也擔心，7月以后才來探視，“沒想到的難處可能會增多”。6月8日，他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叫她把此行的計劃詳細寫下來，然后寄給塔瑪拉·亞歷山德羅維奇。人家主動提出，要去車站接斯維塔。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傳出了消息，說是要把一批勞改犯押到西伯利亞去。列夫覺得，自己即將要被轉押到第三營區去了，遂于6月25日給斯維塔發信過去，叫她取消原來的一切計劃。不料，這封信發走第二天，6月27日，情況又變了。列夫趕忙又寫一信：“地方當局（也許不是地方當局，是上邊兒）朝令夕改，沒個準兒，這不又出了新規定：一切照舊，幾乎一切照舊，至少下個月不會變，如果按照原定計劃實行改革，生產任務就休想完成了。”第二營區剛從西伯利亞來了一批囚犯。列夫解釋是這樣的：“他們原來打算先把我們轉到第三營區，然后再把我們轉到西伯利亞去。現在看來，他們暫時不把囚犯抽走這個決定還是可信的。”列夫想：“‘不可靠分子’，也就是犯了刑法上最嚴重條款的囚犯，當局是想把他們都集中在這里。斯維塔啊，我25日那封信里的忠告仍然有效。這封信是給你現在看的。我會很快再給你寫一封，此信我得趕快發走。”

7月1日，列夫來信確認，第二營區即將變成“嚴管型的監獄”，專門關政治犯，判刑較輕的，即所謂“普通刑事犯”（偷竊、謀殺、流氓、曠工，等等），將繼續關在第三營區，那里條件比較寬松。列夫又補充了以下信息看樣子，不會給我們（第二營區的政治犯）再加什么特殊限制了。不過，現在住在工業區里面的自由工人，這里不讓他們住了，都得遷走。雇用自由工人和特別流放犯的小型生產單位也必須一并遷出。”工業區的自由工人這一走，斯維塔到亞歷山德羅維奇家和列夫見面的事兒，可就沒法兒再辦了。

列夫曾說，工業區內安全措施要比以前緊了，這話算是說對了，真的嚴厲多了。但是，哄傳自由工人即將被趕出去的流言不太準確。木材廠是勞改營，其頭頭確實下了狠心，一定要提高警惕，絕不允許自由工人和勞改犯暗自接觸。5月12日，他們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只限黨員參加。與會者一致認為，很多違反安全規定的現象都是自由工人和勞改犯暗中接觸造成的，包括代為囚犯偷送信件啊，黑市買賣伏特加啊，外人未經許可非法進入勞改營與犯人相會啊，等等。以前他們就考慮過，要把自由工人遷出工業區，但是最后還是打消了這個想法，覺得難以實行，因為遷出去的話就得在工業區外給他們新蓋住宅。勞改營頭頭們轉而求其次，決定強化隔離措施，把自由工人的居住區和工業區其余的地方進一步隔離起來，建一個新的鐵絲網隔離墻，外加一個崗亭。

斯維塔繼續按計劃準備，定于那年夏天來伯朝拉探視。6月25日，列夫正寫信告訴她不要來了，碰巧她也在給列夫寫信：“這件事已經定了。我先去基洛夫，去完基洛夫，馬上續假，去我真正想去的地方，并且盡量多待幾天。”四天以后，研究所的總會計師通知她，目前所里拿不出旅差費，最快也要等到8月底才有錢。于是，她提出申請，把假期提前到7月份。到了7月份，她就到伯朝拉來，預計7月10日之前會出發。斯維塔已經給列夫·以色列維奇寫信，告訴他7月份到。濟德齊克同意斯維塔休假，但是建議她不管怎樣都要到基洛夫去一下，斯維塔也是這么想的。去了基洛夫就可以掩人耳目，實際計劃就可以隱藏起來了。

7月8日，斯維塔收到列夫的來信，信里說最近營區里安全管控更嚴了，現在最好別來，時機不好。斯維塔回信說，她暫時按兵不動，等列夫進一步的通知。夏天那幾個月，實驗室得有人值班，所以，8月份濟德齊克休假，她就待在莫斯科，等到9月份再去伯朝拉，如果到時候還去不了，那就去佩列斯拉夫爾一扎列斯基玩玩，就在莫斯科東北部，離莫斯科一百公里遠。斯維塔的哥哥雅羅斯拉夫在那里租了一個鄉間別墅。如果不來伯朝拉，斯維塔就去那兒住一兩個星期。

這時候，勞改營的安全管控措施可比以前緊了。列夫已經感覺出來了。他7月7日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他們慢慢出臺了各種各樣的新規定，特別嚴，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造成嚴重的不快。”列夫有十天沒收到斯維塔的來信了，不知這是不是因為勞改營實行新的安全措施，外面的來信進不來了。“一切都是可變的，一晃動顏色就變了，像萬花筒似的。”

第二天，列夫和列夫·以色列維奇聯系了一下。發電站有一部電話，是消防電話，萬一廠內失火，就可以打這個電話。列夫用這個電話給以色列維奇打了過去。以色列維奇告訴他，斯維塔還想來這里，目前正在規劃之中。獄方新的安全措施也雷厲風行起來。要新來一批勞改犯，為了給他們倒地方，7月中旬將“特種流放犯”都遷出了工業區。列夫原來就懷疑，木材廠會變成一個監管極嚴的特種勞改營，現在更覺得在劫難逃了。7月21日，列夫再一次向斯維塔發出警報：夏天見面的事兒，現在定不下來，困難太大。列夫在信里說：“1949年，情況可能好轉吧。所謂的‘強化監管’下個星期就要開始實行了。”

斯維塔雖然把整個假期往后推遲了，但還是聽了媽媽的話，7月中旬和她哥哥全家一起到佩列斯拉夫爾一扎列斯基小憩了幾天。他們這個消夏別墅是木頭房子，有個果園，窗外有一泓湖水，平波如鏡，松林環繞，好一片美麗靜謐的景象。他們又劃船、又釆蘑菇。斯維塔得到充分睡眠，可是沒有列夫，她精神得不到休憩。7月23日，她在信里寫道：

我親愛的列夫，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可我還什么都沒寫。我把欠下的睡眠都補了回來，還曬了日光浴。大家都說，我比以前優哉游哉了。我認為自己很乖巧，通情達理的，沒有哭。我盡量不去想你，但是做了個夢，依稀夢見了你。我把我自己看得很嚴，不讓自己琢磨你的信、信里的內容、什么辦得到什么辦不到。我在這里表現得不錯啊，但那是我的頭在說話，不是我的心在說話。白白辜負了這湖水、森林、空氣，我卻不能盡情地享受。我的身體在放松，可是我的靈魂卻放松不下來。

7月31日，斯維塔的母親從莫斯科來了，還帶來了三封信。斯維塔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急忙把信打開，一一看了起來，看到最后那封信，心涼了半截。信很短，列夫告訴她，年內見不成了，“1949年，情況可能好轉吧”。話說得很在理，但是語氣好像很不在乎似的。斯維塔一看，氣不打一處來，看什么都來氣，看誰都不順眼，就拿列夫撒氣。斯維塔想不通，自己晝思夜想，恨不得一下子見到他，可他倒好，再等一整年都愿意。絕望之中，斯維塔責罵起他來，說他想得倒輕巧，怎么可以把她掛起來，讓她干等，等也不一定能見到他呀。8月2日，斯維塔在信中寫道：“如果沒有這么多‘但愿’就好了。你怎么看？我很想知道。你回答不了——我不是在問你，是在責備你。”一直到8月9日，她給列夫寫信的口氣才冷靜下來：

已經一個星期沒給你寫信了，因為我的靈魂一直沒能（現在還沒）安靜下來。媽媽來佩列斯拉夫爾一扎列斯基看我們，帶來了你的信。一看到信，我又徹底泄氣了（這倒不是說，你的信還不如不寫，我可不是那個意思）。所有那些明白人，都給我潑冷水，不讓我去伯朝拉。我生的是他們的氣。也生媽媽的氣，她硬是叫我休暑假（雖然她的想法沒錯）。都怪我不爭氣，都三十歲的人了，應該自己拿主意。怎么不抓緊時間，早點去看你呢。趁還來得及，本來應該馬上趕回家，去研究所辦好出差手續的。都是我的錯，現在辦來不及了，太晚了。真窩火，不知怎么辦才好。

斯維塔擔心，前些日子去信責備列夫，他可能會受不了，于是又寫了一封信，把意思說得更清楚了：“上次寫信責怪你，目的是讓你永遠也不要以為，沒有你，我會生活得更好。為了保險起見，我現在再說一遍，萬一上封信你沒收到呢。”

斯維塔急壞了，恨不能一下子就飛過去看他。如果聽列夫的忠告，還要再等一年才能見到他。到了1949年，斯維塔滿三十二歲了。她還要再等多久才能開始自己的人生啊？還要過多久才會有孩子啊？和列夫綁在一起，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斯維塔是清楚的（列夫已經給她講過好多次了）：時間拖得越久，越有可能永遠也生不了孩子了。一想到這一層，斯維塔簡直受不了了。

斯維塔寫過兩封信責備列夫，信里也都提起過生孩子的問題。信里還提到，她有一次和尼基塔叔叔談天，尼基塔堅定地說，任誰都“沒有權利生孩子”，“人們生兒育女都是自私，都是為了自身著想”。當時斯維塔回答說：“新的生命有可能給世界帶來更多的美好，世界需要美好啊。”斯維塔想，尼基塔沒有把握能讓兒子安居樂業就把兒子生了出來，所以覺得對不起兒子。正因為這一點，尼基塔心頭才有怨恨。斯維塔得出一個結論，應對這種局面的最好辦法就是多生幾個孩子。“如果尼基塔還有一個孩子，比現在這個孩子小點兒，不，最好比現在的孩子再大點兒，那他現在就抱孫子了，人生不就更有意義了么，這種憤憤的想法也就不會鉆進他腦袋里了。可能男的和女的想法不一樣吧。對于女人來說，有了愛情、有了孩子，人生就已經圓滿了。對（幾乎）任何女人來說，不管在公共生活中、在工作上有多少興趣愛好，愛情和孩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焦點。”

斯維塔回到莫斯科以后，又一次打定主意，要去伯朝拉，并且要在夏天去，不能拖到秋天。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8月18日要出發去伯朝拉看兒子格列勃了。她倆合計好了，等納塔莉啞出發幾天以后，斯維塔就要想辦法說服研究所預支差旅費，讓她去基洛夫出趟差，去工廠檢查工作。納塔莉婭要從基洛夫拍一封電報給斯維塔，說說情況。斯維塔第二次密訪勞改營是否可行，電報里會說。時間一天天過去，可是，沒有充分準備就貿然前去，這里面的風險可不低。斯維塔8月13日給列夫寫信說：

一方面，過一天，機會就少一分；但另一方面，必要的安排，事先不做好，也沒法兒去，可有些事，確實非常不好安排。所以啊，最明智的選擇，就是等到格列勃的母親到那兒以后，給我發個電報來……她定于18號動身，所以，19號之前，她拍不了這個電報，也就是說，我得在基洛夫待到20號。過了20號，再等我就不敢等了，害怕。也沒有什么好的聯系方式。或許與她同行比較好，可是同行又有車票的問題了，買兩張票不好買啊。她不先來個信兒，我自己就奔了去，兩眼一抹黑，有危險。如果這么去，到那兒的時間是22號或23號。當然，我會從基洛夫發一封電報的，可是，你不一定能來得及收到啊。將來不用這么事先籌劃就能相見，那就好了。（據尼古拉他爸伊凡·里列耶夫說）照（今年的）列車時刻表看，沒有夜里到的火車了，都是上午十到十一點之間到。如果沒人來車站接我，我就到廠里去找他們（行李要少，還不能風塵仆仆的，讓人一下子就看出來是剛下火車的），不能直接去他們住的地方[61](#__61)[1]。我想這樣最好。我神經很緊張，生怕一不小心出了錯。正當假期，我這個愚蠢的頭腦居然把他（阿爾萬尼托普洛）的名字給忘了（不過，還記得縮寫），信也弄丟了，要想從信里找到必要的信息也辦不到了。我記得，寫有最重要信息的那封信，我把它單獨擱在伸手就能拿到的什么地方了，可是這個“什么地方”又在哪兒呢？我得把所有的信都拿出來，再一一查看一遍。那位也叫列夫的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維奇），我對他還是抱一些希望。臨來之前，我也給他寫了信，請他那些天、那些時候，哪兒也別去。反正他知道，我對這一帶不熟悉，基本不認路。我很害怕，生怕命運會和我過不去，所以這冒險出行的日期和時間，我守口如瓶，誰都沒告訴。盡管今年是閏年，我還是懷著僥幸心理，希望蒙混過關，混進勞改營去。因為害怕這次運氣不好、倒霉，所以，我計劃什么也不帶，絕對不帶任何東西……我有三個請求：一、立刻給我發一封電報來；二、我發的電報，收報人必須能看明白才行；三、相見。

五天以后，斯維塔還沒有從莫斯科出發。火車票非常難買，真是一票難求（這在蘇聯是常事兒，人們去售票處排隊買票，一排就是好幾天）。她8月18號的信里說：

出差人員專用售票口，已經三個月沒開了。運氣好的話，一兩天就可以在預售窗口買到票了，因為他們會把頭一天排隊的人都登記下來，第二天來就不用重新排隊了……但是，都怪我太傻，我們兩天都白排了。我是先排上隊，占個位置，然后就換上亞拉替換我，再由媽媽替換亞拉，可是沒等媽媽排到窗口，車票就賣光了。這個時候，排在前邊的和后邊的都還在原位上排著呢，應該先和他們說好，把自己的位置確定下來然后再走。可是媽媽不懂，一聲不吭就回家了。媽媽在生自己的氣，第二天一大早又排隊去了。可是，等我趕到售票處去接替她的時候，卻發現她已經聽信了一個警察的話，不在我原來的那個隊里排了。那警察對她說，開往高爾基城方向的火車票，不在這個窗口售票，在另一個窗口。長話短說吧，再重新排隊。可我沒時間了啊，我得去研究所上班……

就這樣，斯維塔的媽媽又折騰了好幾天，最后終于給她買到了一張單程票，是21號的。火車票有效期只有六天。斯維塔得先去基洛夫工廠出差，然后再趕到伯朝拉去。這六天時間剛剛夠，只是太緊了點兒，到了基洛夫馬上就得走，不能耽擱。基洛夫工廠，是去程去，還是回程去？必須馬上定下來。斯維塔決定，先去基洛夫，不能等回程再去。只有先去，才能到郵局看看有沒有納塔莉啞·阿爾卡德芙娜的電報來，并且還要給濟德齊克發個電報，說回程推遲了。如果是去程去基洛夫，回來的時候可以買通票，一直坐到家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很遺憾，還得在基洛夫停一下。但是，去了基洛夫之后，我也就不用擔心了。”

斯維塔8月21日從莫斯科出發了。到了基洛夫，給列夫發了一封電報，列夫第二天就收到了。但是，斯維塔曾囑咐他，收到電報后要回電報，列夫卻沒有回，以為太晚了，發了她也收不到，于是就干等著，看她會不會到來。這個時候，列夫已經和他的朋友兼老板鮑里斯·阿爾萬尼托普洛說好了，由他去車站接斯維塔，并且給她安排住處。于是，23號那天，鮑里斯·阿爾萬尼托普洛去車站接斯維塔。看著火車緩緩進了站，出站的旅客從他身邊走過，往車站大廳去了。他在人群當中尋找一位苗條的年輕女子，梳著辮子，背著帆布背包的。人群中沒有斯維塔。第二天，24號，他又去火車站，可是，那天的火車上也沒有斯維塔。每次見鮑里斯獨自一人回到勞改營，沒有跟斯維塔一塊兒回來，列夫都急瘋了，坐臥不寧。他24號給斯維塔寫信說：“親愛的斯維塔，我正坐在這兒想，你到底來了沒有？如果沒來，那都是我的錯，我聽信了納·阿的話[62](#__62)[1]，沒給你往基洛夫發電報。我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你。或許你出了什么事兒吧。”

斯維塔還真是遇到了麻煩。火車過了基洛夫，還沒到科特拉斯，鐵路工作人員檢查車輪，發現火車后部那幾節車廂的車輪有毛病，于是就把那幾節車廂摘了鉤。乘客紛紛跑到前邊的車廂來搶座，簡直像發瘋似的。斯維塔抓起東西就跑，剛跑到前部車廂的尾部車就開了。那些動作慢、沒趕上來的旅客怎么辦，斯維塔就不知道了。更大的危險還在后頭呢。在科特拉斯火車站廣場，斯維塔坐在背包上，等著去伯朝拉的火車，希望能避開別人的注意，忽然，一個警察向她走來。當時她穿的是平時的衣服，沒穿第一次來的時候給她解圍的那身軍裝，所以，她可能覺得，最好不要在火車站大廳里邊等車，所以才坐到了外邊。那警察本來會查她的證件，盤問她去哪里的。這一查一問，斯維塔麻煩可就大了。沒想到，警察卻很和藹，只是關心她的安全而已，說這里有小偷，到車站大廳里面候車更安全。

25號那天，斯維塔終于到了伯朝拉。是阿爾萬尼托普洛來車站接的她，然后領她到家里。他家就在木材廠的圍墻外邊住。阿爾萬尼托普洛家里安了電話，他必須時刻待命，萬一發電站那邊失火，他就得去救火。發電站那邊也有一部電話，列夫當班的時候可以用那個電話打電話。斯維塔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電話局的瑪利婭·亞歷山德羅夫斯卡婭，就是前一年把列夫和斯維塔藏到家中的那位女人。瑪利婭把電話給列夫轉了過去。列夫告訴斯維塔，有人向看守告了密，揭發斯維塔蓄謀已久，要非法進入勞改營。列夫還說：“他們正在急切地等待機會要抓捕她。”不過話又說回來，既然有個看守為列夫通風報信，叫他注意這個危險，那么，看樣子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那么敵視他。列夫早已經把發電站地下室的一間庫房收拾了出來，變成了“陰謀密室”。如果斯維塔能混進來，就可以和列夫待在這里了。

斯維塔橫下一條心，一定要見到列夫，但是非法進入勞改營有被捕的風險，她不想冒這個險。前一年來的時候，和列夫·以色列維奇一起去木材廠，曾在勞改局門前走過，那是一座古典風格的白色樓房。現在，斯維塔就去這個勞改局，正式申請探視列夫。斯維塔1947年非法進入勞改營一事，勞改局差不多肯定已經知道了，現在有可能把她就地逮捕也說不定。所以，她毅然前來，確是一個勇敢的壯舉。斯維塔走上樓梯，來到二層樓。寬闊的走廊鋪著木地板，透過寬大的窗戶，斯維塔可以望見木材廠發電站的煙囪。在走廊的盡頭，她找到了勞改局局長博羅維茨基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不止一間，最大的那間非常寬敞，墻上是勞改犯做的浮雕風景畫，畫面是北方森林、建筑工地、鐵路。斯維塔來一看局長不在，就等他來。千里迢迢從莫斯科趕來，斯維塔累得很。她回憶說：“我等了一整天，一直到深夜那個局長都沒來。”

勞改營的頭頭全都是夜間工作，博羅維茨基也一樣，都像斯大林，斯大林也是白天休息，夜間工作。每個辦公室的鐘表定的都是莫斯科時間。勞改營的頭頭夜里都不敢睡覺，萬一首都的內務部勞改總局來電話，睡著了可不行。后來，博羅維茨基終于來了，在辦公室里接見了斯維塔。他面前是辦公桌，身后是一個大保險柜。博羅維茨基彬彬有禮，立刻同意了斯維塔的請求，簽署了一道命令，一邊遞到斯維塔手里，一邊送她到門口。斯維塔回憶說：“當時，我很激動，對他連連稱謝。”到了外面，“路燈很亮，或許是探照燈吧，說不準。可是，就著燈光仔細一看，只見這張紙上寫著：‘準予會面二十分鐘，但軍警看守人員要在場監視’”。

第二天，終于見到了列夫，是在第二營區勞改犯集體宿舍門口的小警衛室見的。值班看守比他的上司態度和藹，允許列夫和斯維塔在正廳旁邊一個小里間單獨在一起，外人看不見。屋里有張桌子，還有一條板凳。會見時，這個里間房門開著，但是看守沒進來。桌上有個登記簿，是讓看守登記外來的探監人員的。按規定，斯維塔的探視時間是二十分鐘，但看守并沒有記錄她是什么時候到的。如果有人來問，他會說剛到的，還沒來得及登記。就這樣，那天列夫和斯維塔在一起待了好幾個小時。那位看守臨下班之前，告訴他倆，明天中午他上班，叫他倆中午再來。于是，斯維塔第二天中午又來了。她先到的，列夫后到的。他倆整個下午都在一起，坐在那個里間的長凳上。所有這段時間，外面警衛室里人來人往，進進出出，有勞改犯，也有看守。但是，有門擋著，外面看不見屋里。沒想到，會面的時間比預想的多多了，可還是遠遠不夠，不夠又怎么辦呢。

斯維塔8月30日離開了伯朝拉。列夫忠貞不渝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亞霍維奇把斯維塔送到火車站，幫她弄到了一張火車票，然后送她上了開往莫斯科的火車。在去科特拉斯的途中，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我親愛的列夫，沒有你的第二天已經來而復去了。我這個車廂是坐臥兩用車（上面是臥鋪，下面可以坐），也就是說，車上人走動的（比臥鋪車）多。不過，我這個車廂的人都是去科特拉斯的。火車要在科特拉斯停車五個小時。科特拉斯那地方真嚇人，沿線哪個地方都沒有那么臟，簡直下不去腳。我會睡著的。夜里雖然冷，但是我隨身帶了一件羊毛背心，況且渾身上下包上了毯子，凍不著……森林里已經沒有沼澤地了，秋意正濃，森林分外美麗……我在上鋪，下鋪是三個小孩：有個小姑娘，十歲，還有一個小男孩，一個小女孩，都是五歲。他們是三個姐姐帶來的，姐姐的丈夫都被打死了，現在她們三人帶著弟弟妹妹組成一個家庭，在一起生活。孩子們可愛極了。好了，列夫，先寫到這兒吧。照顧好你自己，向大家問好。

斯維塔9月4號晚上才到家，到家一看，她父母都要急死了（斯維塔臨走說要發電報回來報平安的，她也真發了，可是她父母一封電報都沒收到）。斯維塔當晚給列夫寫信：

我親愛、親愛的列夫，我終于到家了。本來想從高爾基城再給你發一封信的，可是沒時間了，沒來得及寫。一路上給你寫了兩封信：一次是從一個火車站寄出的，另一次是從基洛夫寄出的。那天基洛夫下雨，馬路上走不了人，泥濘得很，不過，倒不像科特拉斯那樣成泥塘了，還沒那么嚴重。基洛夫到高爾基城的火車好像是從諾亞方舟里開出來似的，不過我的臥鋪很舒服，周圍人也很不錯，所以我下車的時候心情很好。下鋪有一個女的，又當媽媽又當奶奶，帶了一個三歲的小男孩兒，不會走，也不會說話。醫生說不用治療，如果外界平安無事，照顧得好，到了六歲就會好的。那孩子真好看，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卷曲著，對人非常親熱……車上在我旁邊還有一位婦女，也是莫斯科人，等待她丈夫勞改刑滿釋放已經等了十年了，這次去基洛夫是準備和他團聚的，沒想到，她丈夫已經和別人結了婚。對她來說，這個世界變成了一個空蕩蕩的地方。

我們這趟車到莫斯科已經晚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我是八點鐘到的家，媽媽下樓來接我……現在是九點鐘，外面漆黑一片。好的，親愛的，先寫到這兒吧。別忘了什么事兒。希望你靈魂安寧，希望你心情平靜，不要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心情就不平靜了。若有什么不快浮上心頭，就給我寫信吧，我來想法給你解決。祝萬事如意，向大家問好。

斯維塔總是愿意接近失去親人的人。但是，這次遇見的這個婦女，她丈夫在勞改營里移情別戀了。這樣的人，斯維塔還是第一次遇見。這位莫斯科婦女的遭遇不算是個別案例，很常見。很多夫妻都被十年刑期拆散了：丈夫被關進勞改營，妻子有宣布脫離夫妻關系的，有等不了而改嫁的，也有的以為丈夫已經死了，就和別人生活在一起。丈夫一旦被關進勞改營，有勸說妻子離婚的，離婚是為了救妻子、孩子免遭歧視，否則，身為“人民敵人的親屬”，受氣就沒完沒了了。也有見異思遷，不要原來妻子，和勞改營的女犯人結婚的。女犯人同在勞改營勞改，可能更容易體諒彼此的遭遇。

斯維塔這次去伯朝拉，回來以后心情好多了。她回來以后第二天給列夫寫信說：“今天我照鏡子一看，比從佩列斯拉夫爾一扎列斯基回來那會兒臉色好多了。”三天以后，她覺得“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對誰都格外親切”。甚至三個星期以后，斯維塔仍然陶醉于此行的愜意：“我心里樂開了花，不僅不再哭了，而且那天坐電車，我還情不自禁地笑呢。”

與此同時，列夫滿腦子想的全是斯維塔。9月4號，他還在等斯維塔已經平安到家的信。那天，他寫信說：“我親愛的、美麗的斯維塔啊，我不知道怎樣描述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不全是‘渴望’，還有‘擔心’的成分在里面。我想的是你，閉上眼睛又看到了你，不是看到了你的全部，只是看到了你的眼睛，你的眉毛，你那灰色的連衣裙。”五天以后，還沒接到斯維塔的信，就寫信去，祝愿斯維塔10號那天生日快樂，不過此時他的心情很傷感：

我親愛的斯維塔，明天是你的生日。親愛的，祝愿你什么呢，真不知道怎么祝愿哦：我的祝愿是一回事，現在和將來能辦到的是另一回事，兩者有霄壤之別。所以說，我給你的一切祝愿，一定是像瘋子口出狂言吧，誰都不相信。如果這封信明天能郵到，我就不寫了。我不想在你生日這天，無謂地提起我們的處境，太掃興了。斯維塔呀斯維塔，但愿命運更寬宏大量一些，但愿命運對我們微笑……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事，未來會怎么樣，但是我倒愿意相信，我們會有未來的。這個信念難道是奢望么？……保重，斯維特，祝健康，斯維塔！

9月22號，屈指一算，斯維塔已經走了三個星期了，還沒有信來。就在幾天前，其他勞改犯還收到了莫斯科寄來的信呢，可是沒有一封信是給列夫來的。列夫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我親愛的斯維塔，沒收到你的信。此時此刻我給你寫信，上帝知道我在想什么。我這個三十二歲的傻瓜，居然像個十六歲的孩子，動不動就多愁善感的，真是丟人，又像個老媽媽似的，牽腸掛肚，惦記這惦記那的。可是，我倒不覺得難為情，只是怕這么纏著你，聽我嘮嘮叨叨地，你會嫌煩。也許一切均好，只是郵政太慢了。是這樣么？

23號那天，終于把信盼來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心煩意亂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人，其實我和他不怎么熟悉。他給我拿來一封信。一看是你的筆跡，居然都忘了謝他。斯維塔，你是我的，我親愛的、美麗的斯維塔。只有一個問題，我看你信的時候，想象不出你此時此刻的樣子。有兩個斯維塔，一個你，是能用眼睛看到的你，另一個你是在信里浮現出來的你。如果我想要信中的你，就想起你寫的字句，但是你的字句默默出現在我的眼前，卻沒有讓我聯想到你的風采。如果我想用眼睛看見你吧，那就最好不看信，直接看你好了，一目了然。可要聽好啊，這可不是說，沒有你的信，我的日子就好過了，可不是那個意思，斯維塔，我親愛的。

漸漸地，列夫又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冬天又來了。勞改營還沒做好過冬的準備。第二營區的窗戶，玻璃碎的，還沒鑲上，很多房頂漏了還沒堵上，勞改犯宿舍取暖設備、電燈都太少，不夠用。勞改營管理局凈說空話，說是要給整個勞改營的房子都重新拉上電線，可是根本沒動。11月，天寒地凍，剛剛封河，勞改營就開始每年一次的大掃除了。廢木頭都拉到冰上點著了，燃起一堆堆高高的篝火。

列夫很忙，在發電站修理機器。他給斯維塔寫信說：“一天天過得真快。白天在發電站干活跑了一天，晚上只想睡覺。柳布卡還在這兒，謝天謝地，他還沒走。我倆一起把控制板安裝完了。發電站成立以來，新裝設備第一次運轉正常，沒出故障。”

最近又有傳說，要把一批勞改犯轉到最北邊的“特種嚴管”勞改營去。列夫很擔心。這批犯人名單最終公布了，上面有他最知心的朋友兼室友柳布卡·德爾列茨基。11月2日，德爾列茨基被押到因塔去了。這因塔是古拉格的一個釆礦勞改營，條件最為嚴酷。這地方離伯朝拉一百八十公里，通往沃爾庫塔的鐵路經過那里。列夫聽說這個消息，簡直如五雷轟頂。列夫對他摯愛如兄弟，擔心他這么年輕，身體這么虛弱，可怎么受得了。當天深夜，他絕望地給斯維塔寫信：“今天傍晚，他們終于把柳布卡帶走了。這群畜生，他們都是畜生。”柳布卡一直在阿爾萬尼托普洛手下干活，在發電站為他賣力。阿爾萬尼托普洛竟然沒有伸出援手，拉他一把，而電工組新來的頭頭亞歷山大·謝苗諾夫，并不怎么認識柳布卡，卻想方設法營救他。列夫特別寒心，阿爾萬尼托普洛太不夠意思了。列夫寫道：“謝苗諾夫的行動自由再多點兒就好了，說不定就能辦成了。這個腐爛發臭的制度，頂風也能臭八百里。”

列夫捏了一把汗，他的朋友在那個勞改營里可能活不到刑滿釋放那一天。11月3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柳布卡做了這么多年苦工，病得不輕，神經非常緊張，痩了很多。這天寒地凍的，走這么遠已經夠難的了，比他強壯的都受不了，何況他身體這么不好了。我擔心會發生最壞的情況……我和他關系最近，從來也沒有和誰這么近過。今后11個月，你覺得他能堅持下來么？”[63](#__63)[1]

能不能在勞改營活下來，這基本上要看有沒有朋友支持了。列夫認為，柳波卡是自己在勞改營里唯一真正的密友。11月9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詳細講了他和柳波卡的關系為什么這么密切：

我不能趴在任何人的肩膀上哭泣，只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但是，在這里，有柳波卡在，艱難的時刻就容易挨過去。我的苦難，如果是因為私事，我什么都不和他講，一般來說，我和他的交情沒有任何多愁善感的成分在里邊。不過，即使和他爭吵，也覺得吵得舒服，讓人釋然于懷。平時無話不談，天南地北隨便聊，雞毛蒜皮什么都說……柳布卡，柳布卡，我要知道你還活著就好了，你要能堅持活到刑滿釋放的那一天就好了。斯維塔，我把你的地址告訴了他，叫他記住。你不在意吧？萬一他別人誰也不認識，至少可以聯系你。也許連你他也不想寫信聯系呢，他就是這么個人。

12月3號，列夫坐下來給柳布卡寫信：

你好，我的朋友，不要怪我給你寫信。我連這封信能不能寄出、什么時候會寄出，都不知道呢。我寫信是為了讓我自己好過一點兒，寫信能讓我一吐為快，向一個活生生的人說幾句話，即使是筆談也好啊，因為，在我周圍這里，沒有活生生的人。或許，沒有信來，對你更有好處——我了解你——但是，如果有信來，你也能承受得了的話，那么這封信肯定不會對你有什么害處。

柳布卡啊，不管那里情況多么糟糕，記住這一點：八年半都熬過來了，第九年就不堅持了，那多愚蠢啊，第九年以后，不管形勢有沒有好轉，現在一定要堅持下去啊。

柳布卡走后這一個月發電站發生的一切，列夫都一五一十地講給他聽，消息很多，一寫就寫了十二張紙。信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柳布卡，我本來不想說，但是，不說實在沒道理：想你了。斯維塔來信說，她想和你握手。握手，就當已經和她握了吧，和我也算握了吧，記住她的地址：8，17，SAI，Kazarm，M。這個地址別忘了，萬一將來要寄什么東西呢。如果有包裹，不要怕，我和她說過，請她給你寄點兒維生素，對你的壞血病有好處，一點兒都不貴，不值幾個錢。無論如何，一定要活下去啊，朋友。

這封信壓根兒就沒有寄出去，因為德爾列茨基在因塔勞改營的具體地址，列夫不知道，甚至他是否真的在那兒，列夫也說不準。

# 八 三進虎穴探監

我親愛的斯維塔，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了祝你“新年快樂”的時候了。我想，今年我祝愿你的應該是那些最簡單的事情，你也應該祝愿你自己實現這些簡單的事兒……你親近的人不必祝你如何如何幸運，幸運和幸福一樣，太含糊了，和我們所處的境遇不太吻合……我想要你更加笑口常開，給自己唱更多的歌，哼唱給自己聽。平時，你見到有趣的事兒就瞇縫起眼睛來細細查看，所以我祝愿你更經常地瞇縫起眼睛細細查看，看到什么東西使你高興，你就微微揚起眉毛、睜大眼睛看，所以我祝你睜大眼睛高興地看。我想要所有這些愉快的表情更經常地停留在你的臉上……所以，親愛的斯維塔，繼續做這些日常小事：你的辮子要好好保養，請不要疏忽了，如果把辮子剪掉，別讓頭發亂了，這是第一件事。第二，星期天要出去消遣消遣，不要做家務，也不要做公務，滑雪啊，溜冰啊，劃船啊，去哪兒走走……

親愛的斯維塔，保重身體——歸根結底，這是最重要的祝愿。這里應該用最高級的副詞來強化動詞，形容詞就不必用最高級啦。

1949年初，斯維塔犯愁的事不少，除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很多傷腦筋的事。研究所的行政工作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她的實驗室正準備搬上四樓去，房子改建裝修的活兒千頭萬緒，手忙腳亂。與此同時，她又要組織人手，進行橡膠壓縮的新研究，又要向部里索取更多經費，還要寫規劃來落實五年計劃的指標。斯維塔不喜歡這個工作。她寫道：“這個工作一點兒樂趣都沒有。”壓力越來越大，精神越來越緊張，斯維塔很擔心，“不該批準的事兒，如果批準同意”，萬一出了錯兒，那可就要吃不了兜著走了。

當時冷戰正在高潮，蘇聯科學家受政府打壓，并且壓力還不斷加碼。物理學家遭到批判，有的還被開除公職，不是說他們“向西方低頭”，就是說他們對量子力學的“唯心主義”哲學死抱不放。1930年代就已經批判過了，現在又拿出來批判，說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違反辯證唯物主義，那還得了，那可是馬列主義的“科學”根基啊。有些科學家被清洗了出去，說他們是“世界主義者”（暗指猶太人），不可留用。蘇聯政府說，猶太人這些“世界主義者”是一個“反對愛國的集團”，給他們扣上一個大帽子，說蘇聯在反西方，而他們卻破壞蘇聯的藝術和科學。1949年1月發動了“反世界主義”運動。這運動一經發動起來，研究所里至少有兩位斯維塔的同事（維塔里·愛普施坦和拉扎爾·維尼茨基）就被開除了。莫斯科城里不讓他們住，他們被迫到莫斯科市外去找工作。各研究所把很多蘇聯猶太科學家都解雇了。因為斯維塔和各科研院所都有聯系，所以很清楚這些內幕。

這一切都在影響著斯維塔的健康和心情，列夫知道了心里很著急。斯維塔在服用魚肝油和鎮靜藥魯米那。她告訴列夫，服這些藥是為了“鎮定一下神經，以免按捺不住怒火，否則逢人便要大喊大叫了”。這個鎮靜劑好像有效。她給列夫寫信說：

多虧這些藥丸幫了我的大忙。首先，我總算能挺住了，現在只笑不哭了（可能笑出來就不哭了）；其次，雖然還是沒有食欲，但是體重已經不往下降了（我在工廠時稱體重五十六公斤）。大家都說，我的臉色漸漸比以前好了。

雖然斯維塔自己從來不顯擺自己長得好，不自詡回頭率高，但是大家伙都覺得她楚楚動人。有一次，尼娜·謝瑪什科家舉辦派對，斯維塔也去了，不知不覺間和幾個朋友暢談到深夜。當時，帕維爾也在座：

帕維爾我認識，但關系并不密切，突然間，我和他有了共同語言，這可是十三年來頭一次。當時談的是人道、幸福、工作，還有其他高尚的話題。我得承認，如果滴酒未沾，我萬萬不會信口說起這些事。我回到家已經凌晨三點了。帕維爾送我回家，他也有三分酒意，竟然怪罪起我來，說我在過去明知道已經有了你，卻還對他說這說那。我發誓，我記得，和他說的話總共也不超過兩個詞呀。我一直以為他心里只有寧卡（Ninka）—個人，對我不感興趣呢。如果我對他說過什么話，可能也只是為了敷衍，為了不和他說什么認真的話吧。如果不說敷衍話，那就只剩下認真話了。而認真的話，要么是話趕話，說到那兒了，不說不行，要么是本來沒想說，一不留神就說了出來。我壓根兒就不想和他說認真話，所以只好敷衍他了。

對斯維塔感興趣的男人可不止帕維爾一個。戰爭結束那會兒，發生了一件事，斯維塔1948年的時候對列夫講過。當時，斯維塔和她的朋友伊琳娜·克勞澤有一個共同的朋友，此人和一個有婦之夫發生了風流韻事。斯維塔和克勞澤爭論起來。斯維塔不贊成她這位朋友這么做，說這等于是說謊，令她想起一個青年人：

那年輕人當時正打算結婚，再過一星期他們就要舉行婚禮了，正在這時，忽然我出現了。我們見面談了一談。他對我說，他遇見的人都不如我好，他的未婚妻也根本比不上我，所以他極為痛苦。我回答說，我在等列夫（當時是1945年），并且問他，既然他的未婚妻不是最佳人選，為什么這么急于結婚呢？應該等到遇見別的人再結啊。他說再等也沒用。不管你選了誰，總有一天會遇見更好的人。為了對得起良心，一旦選定了人，就得把眼睛閉起來，別人就不要再看了。既然為人說話要算數，要娶人家，一切也就這么定了。我說，這么對待那姑娘有點兒不恭。這種盲目地講良心，我接受不了。這樣的良心是拽著你的尾巴用力往后拖，我不需要這樣的良心。或許，當時我是少不省事，一時糊涂吧。

可能也是斯維塔幸運：明知道已經有了心上人，即使還不能團聚，畢竟已經找到了真愛。

列夫也有同感。他不需要將斯維塔和任何人比較，因為愛的就是她。

至于“最佳”人選，將來你就閉上眼睛吧，不用再找啦。當然，閉上眼睛可不行，閉著眼睛怎么活呀。在這大千世界，肯定還有更好的，世界比“她”大呀，但問題不是這么回事兒。世界也比“我”大，要讓我清談起來，還是用第一人稱比較容易，所以我用“我”和“你”這兩個代詞。歸根結底，在我眼中，你是“最好”的。我不需要任何別人。即使是示巴女王（Sheba》[64](#__64)[1]，我也不稀罕，因為我愛你，愛你的一切資質，就連你的缺點我都特喜歡，你的優點更是我快樂的源泉。當然，剛認識的時候，那感覺是來自令人愉悅的優點的，后來就無所謂了……失望的情緒常常對愛情有影響，外部環境也會有影響——會造成吸引力消失，等等。但是，如果相知甚久，也就是說，不是認識一個月、一年，而是認識很多年，那就沒這個危險了。反正我就是這么想的。人常說紅顏知己，至于紅顏會不會褪色，白頭發多了幾根，那都不重要了。在這方面，常識一點用都沒有，尤其是我，根本不理會常識。我愛你，別的沒什么好說的。愛會持續多久？現在看起來，真要海枯石爛心不變呢。以前把握沒有現在這么大，剛剛分別那會兒，是那種心情，但是現在，我堅信、堅信、堅信。別的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列夫覺得，如果一個人心有雜念，見異思遷，還想找個“更好的”，那他就失去“激動的能力”了，再也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了。他在信中寫下“常識”這個詞的時候，心里想的是世俗那些“虛偽的空話”，比如馬雅可夫斯基最后一部長詩《放開喉嚨歌唱》片斷之一《五年計劃頌歌前奏曲》，里面有一句，說的是“可恥的理智”。那首詩是這樣寫的：

她愛我么？難道她不愛？

把手指節掰斷，

揉揉手，把斷掉的手指拋向風。

你在五月碰見的花環，

你用來算命的花環，

已經撕碎、遠遠地拋開。

讓我來發現須發的花白

歲月的白銀發出鐘聲的豪邁。

我希望并且確信：

可恥的理智或理由，

我永遠也不會接受。

斯維塔日夜思念列夫。她在3月5日給列夫寫信說：“不知道怎么回事，這一個星期以來，天天夢見你。可我就是高興不起來，因為，雖然見到了你，卻碰不到、摸不著（阿列克說，上帝也是碰不到、摸不著的。顯然，阿列克認為上帝是存在的），然后你一直都在離我而去。”列夫也夢見過斯維塔，能聽見她的聲音，可就是見不著她的人影兒，夢里還見到她寄來的一封信，可就是摸不著，信封也打不開。列夫不僅在夢中見到她，“而且也在殘酷的現實當中見到了她，唉，形勢真是越來越糟糕了”。

列夫眼前經常浮現出斯維塔的身影。干活的時候常常想起她來，在心里默默地與她暢談。當班的時候，有同事和他搭話，他特別不愛搭理，反感同事驚擾了他的清夢。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尼古拉·里列耶夫換班了，叫他上夜班去了。這下好了，沒人煩我了，不用把心里想的講給別人聽了。（‘在想什么呢，列夫？’問這樣的問題，真傻！）”

1949年初，列夫很忙，忙著修理發電站的設備。前一年，他設計了一臺機車用的蒸汽鍋爐，可是，新年過后交貨來一看，他們把尺寸給弄錯了，無奈之下，就把這臺設備送到機修車間修理去了。1月18日，列夫請了一天假，這是一年半多以來第一次請假。他給斯維塔寫信，今后還會有休息的日子，可是休息也沒什么好休的。”

德爾列茨基走后，列夫很孤單，別的朋友都不能給他什么安慰。列夫獨立精神越來越強，不想和任何人過從甚密。1月19日，他給斯維塔寫信說：“干活的時候，我想一個人干。當然，別人會過來和我搭話。人家對我友好，對我關照，我就得立刻熱情對待人家，表示領情之意。硬著頭皮這么做，那才叫尷尬呢。說說話倒沒關系，只要別讓我覺得尷尬就行。和尼古拉·里列耶夫，或者和別的什么人，如果他們覺得是我的朋友，那么這種答謝，我絕對做不出來，太俗了。”集體宿舍里的逗樂，列夫不喜歡，寧愿離他們遠點兒。沒有德爾列茨基，列夫覺得比以前更加孤單了。他在1月20日的信中寫道：“今天過得特沒勁，宿舍里他們胡來亂來，鬧笑話的、搞惡作劇的，干什么的都有，真煩死我了，謝苗諾夫[65](#__65)[1]那樣的人，按理說心眼兒也不傻，居然和他們一樣廝混，找在場的人尋開心，搞惡作劇，真弄不懂他是怎么想的。”其他勞改犯虛度光陰，列夫可不愿意和他們湊趣。那些家伙，又是喝酒又是唱的，收工回來還玩多米諾骨牌，鬧嚷嚷的，列夫心里氣得很。躺在鋪上，想看看《安娜·卡列尼娜》，可是周圍卻鬧翻了天。但有的時候，列夫也和大家打成一片，說說笑笑很開心。1月25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今天，我們宿舍的人玩得很高興，其實也沒什么好值得慶祝的事情。又是跳舞，又是彈吉他，地板、窗戶都在抖動。真沒想到，最佳音樂人居然是亞歷山德羅維奇，得向他脫帽致敬呢！”

三個星期以后，辦了一個生日派對，慶祝斯特列里科夫五十大壽。列夫和里列耶夫來到實驗室和斯特列里科夫一起喝茶。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今天真差勁，生日快樂這句話，我就是說不出口。他心里當然明白，我們是干什么來的，可來了又什么也沒說，他懂的。斯特列里科夫的病還沒有好，還是敗血癥，膽結石急性發作，一次比一次嚴重。勞改營衛生所的大夫治不了。他必須動手術。但手術很難做，衛生所的大夫醫術不行，做不了。列夫很同情斯特列里科夫，把心里話都告訴了斯維塔：

木材廠的生產，他出力最大。但費力不討好，誰都不感謝他。他的工作幫了許多人，可是那些人都不提不念，不愿讓上面知道，自己的活兒原來是別人給干的。他的定量還是那么丁點兒，他是病人，定量反正有他的份兒。可當地的頭頭們根本不幫他額外多申請一點。

4月17號是斯特列里科夫女兒瓦麗婭的生日，那天的慶祝更讓人心里不好受。瓦麗婭和丈夫、母親，還有兒子住在莫斯科。斯特列里科夫還沒見過小外孫呢。

她女兒才二十五歲！如果斯特列里科夫能活到和女兒團聚的那一天，她女兒就三十七歲了！快四十了！但是會有團聚的那一天么？真苦了他啊！有時我離開他，想到他的不幸，想到他那可憐的處境，我的眼淚就往下掉……他的遭遇太慘了，我心里干生氣，幫不上忙，恨得我自己直想用腦袋撞墻。我和他經常爭論（當然是和顏悅色地爭論了）。

1949年，春天來得很晚。5月份還有雪，6月中旬天氣才暖和起來。漫長的寒冬讓每個人都多遭了不少罪。伯朝拉河還沒有開化，上游的木材運不下來。發電站發電是用木頭作燃料，所以三天兩頭停電。木材廠和各車間沒有電，全都停了產。工人就用手動工具干活，結果勞改營欠產太多，生產指標完成不了，勞改營就減少了糧食供應。那年冬天，勞改犯總是穿不上暖和的衣服，靴子和手套也不夠。囚犯們被迫在冰凍的溫度下加班加點干活，獄方逼他們把欠下的產量補回來，結果很多人都病了。列夫在第二營區服刑，1949年第一季度，得病的人估計有十分之一，但是在官方的統計數字里，每一天患病人數不得超過百分之一。

發電站有個劈劈柴的工人，身材高大，名叫康斯坦丁·雷卡洛夫。他是政治犯，年輕的時候是一位拳擊手，勞改營的苦難把他折磨得不像樣子了，后來得了一種急性肺結核，害得他喘不上來氣，呼吸困難，一點兒勁兒都沒有，什么都干不了。列夫很擔心他，對他很有好感，在給斯維塔的信中說他是“一位很有文化的人，堅強、誠實，誠實到一絲不茍的地步。他進勞改營都兩年了，可還在追求真理，那股鍥而不舍的勁頭，這輩子算改不了了”。列夫到衛生所去看他：

我在走廊里見到了他，他穿著勞作服，挺輕松的樣子。他說，為了鍛煉身體，他堅持劈木頭，可是沒干幾下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我問他：“那你的斧頭放哪里啦？”他回答說：“我劈到了一個大木頭結子，非常硬，用力一劈，斧頭把子就斷成兩截了。他們得做一把新斧頭了。”

雷卡洛夫干活是為了恢復體力，希望列夫和謝苗諾夫幫他一把，讓他到發電站去當電工。午休的時候，他常來找列夫：

他總說我不去看他了，聽了他這么一說，我倒很難為情了。于是兩三天以前，我去拜訪他，和他喝了一晚上的茶。他拿出來一摞照片，回憶起往事來，我靜靜地聽著。雖然，品茗懷舊，對我來說有點兒陌生，但是這個時光過得很有意義。第一，他肯定是個好人，有一顆善良的心。他的愛好，他的本領，都很不錯，他又很文靜。第二，他在這里很孤單，我知道他覺得和我很談得來，感到輕松愉快。能幫到別人，我自己感到很愜意。我現在是事后分析，當時只是覺得高興而已。

雷卡洛夫在干燥車間鍋爐房里當上了司爐工，可是活兒太重，他干不動，后背嚴重扭傷（這位當年的拳擊手以為自己還很有體力，沒想到會這么虛弱）。有一次，他在禁止吸煙的地方吸煙，被逮了個正著，衛生所不讓他住院了，并且把他關進了懲戒牢房，只給他面包加白水，他病得很厲害。多虧大夫出面說情，才把他放了出來。他被帶到衛生所肺病專用區，讓他干勞改營內較輕的活兒。

列夫到衛生所來看望雷卡洛夫，發現有一個護士特別關照他，“好像不是當地人，而是接了家人的班，才有這個崗位的，看樣子已經有了家室”。伯朝拉各個衛生所里有很多流放來的護士。4月20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告訴她，這個臨時中轉勞改營的醫務室有一個醫務助理，名叫尼娜·格林。

這位婦女四十多歲，出差（暗指刑滿）結束以后就五十多歲了。但是，我想，她的真名應該叫格林涅夫斯卡婭（Grinevskaya）。患者請她找些讀物來讀讀，于是她就給大家拿來了《紅帆》、《滑行在波濤之上》[66](#__66)[1]，患者都特喜歡她。

列夫猜得沒錯，尼娜正是作家亞歷山大·格林的遺孀。她丈夫寫的浪漫航海故事，列夫當時正看得津津有味。書中的故事和古拉格的殘酷現實相比，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尼娜的丈夫1932年死了，這樣她就符合就業條件了，可以當理療助理，于是就來克里米亞海濱勝地費奧多西亞當護士。戰爭期間，德國人把她關進了集中營，就在波蘭布雷斯勞（Breslau）附近。1945年，蘇聯人說她通敵，判了她十年勞改，在伯朝拉服刑。

這個臨時中轉勞改營里，還有一位護士，名叫斯維特拉娜·圖哈切夫斯卡婭。她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女兒。1937年，圖哈切夫斯基經過秘密審訊，被定為內奸，迅即被槍斃。父親被捕后，斯維特拉娜和母親、兄弟姐妹一起被遣送到阿斯特拉罕。后來，母親也被捕了，她被送進了孤兒院，在孤兒院一直待到1941年。戰爭打響之后，頭幾天局勢大亂，她逃出了孤兒院，不料秘密警察又把她查了出來，判了她五年勞改，押到伯朝拉服刑來了。衛生所里有個德國女醫生，名叫阿加塔·倫佩爾，也是被鎮壓的。她看得明白，斯維特拉娜這個美麗的姑娘，才二十四歲，身為著名的蘇聯元帥的女兒，如果陷在勞改犯中間沒人保護，一定活不長。于是，她把斯維特拉娜從犯人名單上劃掉，把她藏在衛生所里。斯維特拉娜在衛生所里工作，卻住在城里。刑滿釋放、自愿留在勞改營就業的工人把她接到城里各自家中藏了起來。

1949年7月2日，勞改營的黨領導開會，討論如何貫徹執行內務部勞改總局第10190號令。此令的內容是，對勞改犯要加強管控，把他們都隔離開來。這道命令是1947年3月份下發的，可是下面沒執行。獄方并沒有對犯人和宿舍進行全面搜查。于是，勞改營內外，大家暗中合作，偷偷遞送各種東西，有帶進來的，也有帶出去的。這邊是工業區，那邊是自由工人居住區，中間隔離得不嚴。把守大門的看守都很腐敗，見財眼開，只要行賄，不論是物還是人，一律放行。很多看守都和勞改犯串通起來，從事黑市買賣：有個犯人，名叫利亞舒克。他是裁縫，手藝很好，給很多看守做衣服；還有一個人，名叫科扎利諾夫，是廚師，他給看守做飯吃。甚至還有一個買賣“政府機密”（政府文件）的黑市。這些機密是從勞改總局偷出來的，然后再賣給勞改犯，有些是讓人把自己的檔案從官府里偷出來，然后篡改判決條款，甚至把刑滿釋放的日期都改了。

那次黨領導會議作出決議：要重新做通行證；對探視要嚴格控制；對宿舍要多搜查；嚴禁穿軍裝（有些勞改犯身上穿的仍然是當年的軍裝）；取消干的食品（因為逃跑時也可以吃）；把鐵絲網隔離墻修好（上面有好幾個缺口）；鐵絲網和風車之間有灌木叢，應該清理干凈（過去曾有人躲在灌木叢里，把斧子、鉗子、鋸和其他工具扔進宿舍里）；瞭望塔上要增加警員（有三個崗樓已經好幾個月沒人把守了）；最后，經過一年的討論，在居住區和工業區之間，要修一個隔離墻，加設一個新崗亭。

列夫告訴斯維塔：“今年你究竟怎么溜進來，我還沒想好。現在這些新規定很棘手。”斯維塔一聽，再一次下了決心，反正去看列夫還是要照常去，絕不能往后拖：“去年的決策確實不是什么上策，但是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67](#__67)[1]。迄今為止，我屢試屢驗，每次都成功了，當然命運或許不會永遠都對勇者微笑。”

這一年，又節外生枝，出了麻煩事。研究所沒有經費了，只去基洛夫一地太費錢，不能去了，但是把鄂木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基洛夫“沿線的所有工廠”都檢查一遍，差旅費倒是能說得過去，不算浪費，但是要一個月時間，濟德齊克可不想讓她走這么長時間，實驗室最新的研究項目需要她來主持。她走了，研究所可能就完不成計劃了。到7月4號的時候，斯維塔已經爭取到去鄂木斯克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的出差機會，她希望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繼續往前走，伯朝拉，不過不一定去得了：出差伯朝拉的人選已經定下來了，是一位同事去，可那人慢騰騰地，遲遲不啟程，而那人不回來，斯維塔還走不了。

三個星期以后，斯維塔那位同事還沒動身去基洛夫。斯維塔一看這般情形，只好認了，也就不強求了，心想，只好等到秋天請一個星期假再去了。“以往都是秋天去的，秋天運氣好啊。”列夫早就給她吹了風，現在規定更嚴了，探視時間大為縮短，“少則三十分鐘，長則兩小時，里面還得有‘調料’（暗指有看守在旁邊監聽）”。利特維年科的母親6月份去探視過了。賄賂的錢也遞了上去，可是才允許他們娘倆見三次面，每次三小時，倒是沒有看守在旁邊監聽。里列耶夫的父親沒這么幸運，和兒子只見過兩次面，每次也是三小時。斯維塔在信里不敢明寫，只好寫暗語，萬一這信落到當局手里就糟了，可要防備著點兒。用伏特加（信里的暗語是“維生素C”）[68](#__68)[2]或者現金（暗語是“維生素D”）賄賂看守，讓他多給點兒見面時間，別在旁邊監視，這倒是好了，可這樣行賄有什么風險，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大呢。斯維塔囑咐列夫寫得詳細一點兒。斯維塔寫道：“那些來探監的妻子，看她們是怎么做的，她們更有借鑒意義。而母親來看孩子的，情況和我們不一樣，所以還是留心一下那些妻子吧。”斯維塔的意思是，她渴望和列夫單獨在一起，看守不要在旁邊監視。作為夫妻，見面時或許看守會避一避，不在旁邊當燈泡。“我關心的是一個實際問題：見面能在什么地方見。”列夫回信也用暗語回答，告誡斯維塔別抱太大希望，以為賄賂了看守就萬事大吉了，問題沒那么簡單：

大約三天前，里列耶夫可能已經給你講過各項技術事項，現在你懂了，即使具備最佳條件，事情也不是一定能辦成。用D制劑或等值有機物（暗指用酒賄賂）進行發酵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不管怎么說，空間時間的細節（暗指會面的時間和地點）是改變不了的，充其量只能夠減少零件的數量（暗指把看守支出去，不要待在屋里監聽），但即使這一點也不是十拿九穩。情況就是這樣。統計數字表明，你說得對，妻子對丈夫的興趣不如母親對兒子的興趣大。根據當地數據，前者與后者的比是零，所以沒有專講第一種情況的信息，但第一種情況和第二種情況估計沒有什么區別。

困難再大也擋不住斯維塔，她要照去不誤；即使能見到列夫，也只能見幾個小時，但是斯維塔認了，時間再短也要去。她給列夫寫信說：

也許休假過后再去看你更加“有趣”，不過，若不是先見了你，然后再休假，那我這個假也過不好，“放松不下來”呀。我真想不明白，為什么別人怕見面時間太短暫，竟然怕到這個地步，寧可不見也不愿少見一會兒。我可不這樣，見三個小時也好啊，比根本見不著不是強多了么。擔心見面以后情何以堪？我可不糊涂，對我來說，能見著總比見不著好。你也是這么想的吧。列夫，這兩種方案，哪個對你更方便？說一千道一萬，咱們能見上一面不是更好么？觸摸一下就放心了，咱倆不僅存在于信中，也存在于現實生活里。肯定比見不著面兒強多了。或許，你覺得，我這次執意要來，冒的風險太大了吧。

列夫回信說：

能見面就好，見面時間長短都不重要。此事不必多想。你這次來，雖然時間短，下次你還可以再來，想到這一層，我也就釋然了，可以平靜地等你下次再來。即使等待的心情不平靜，很痛苦，那也仍然是件好事啊，好就好在心里有把握，不僅過去、現在見了，將來還可以見。反正現在是見了。這件事，我之所以從來不提，是因為有自私之嫌，說出來等于是間接地施加壓力，提都不應該提的。不是我不相信你，斯維塔，所以請不要生氣。

8月份冒出來一個出差的機會，斯維塔可以去烏赫塔，那是一個工業重鎮，距離伊日馬不遠，科特拉斯到伯朝拉的鐵路經過這里，主要人口是勞改營的囚犯。當地的工廠請求研究所派一名專家去檢查一下工廠實驗室的工作情況。濟德齊克挑選了斯維塔去做這件事。濟德齊克不知道烏赫塔在什么地方：他通知斯維塔，不去鄂木斯克了，改為烏赫塔，心想，斯維塔原計劃前往伯朝拉看望列夫的，這一改，把斯維塔的計劃打亂了，所以連連道歉。斯維塔回憶說：“當時我問濟德齊克，知不知道烏赫塔在哪里，知不知道烏赫塔距離伯朝拉還不到二百五十公里，如果我出差晚回來兩三天也沒關系，那可太理想啦。”8月30日，斯維塔坐上火車，前往烏赫塔。她在烏赫塔待了至少一個星期，住在工廠附近的一個村子里。工作完成之后，工廠官員們建議，她回莫斯科，最好是飛回去。當時烏赫塔機場正好有個航班，馬上就要起飛了。但斯維塔說，她不愿意坐飛機，想坐火車走。斯維塔回憶說：“他們開車把我送到伊日馬火車站，我盡力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勸他們馬上回去，不必等我上了火車之后再走。真幸運，去莫斯科的火車和從莫斯科開往伯朝拉的火車幾乎是同時進站。東道主們剛一消失，斯維塔立刻買了一張往北邊去的車票，匆忙爬上了火車。

在伯朝拉，斯維塔住在鮑里斯·阿爾萬尼托普洛夫婦家里。女主人名叫薇拉，前一年斯維塔來就住在她家里。斯維塔9月9日到12日在伯朝拉待了三天，不過，這次來，和列夫在一起的時間少多了，可能不超過兩小時，上次來，她和列夫是在那個小警衛室見的面。這一次，不管是在總警衛室，還是在小警衛室，都有警衛在場監聽。果然像列夫說的，保安的確更嚴了，會面時間定多少就多少，花錢行賄也延長不了。見面時間雖短，但兩人相見，精神為之一振。斯維塔可沒有白來，未來若干個月，雖然還要天各一方，但是有這次見面墊底，將來的日子就不會那么難熬了。為了能和列夫待上短短一會兒，斯維塔來回走了四千三百四十公里。

斯維塔是在9月12日清晨告別阿爾萬尼托普洛夫婦的。那天傍晚，斯維塔從烏赫塔南郊的托貝斯（Tobys）火車站寄出一封信：

我親愛的列夫，一路上很順利。

請代向亞歷山德羅維奇致謝。[69](#__69)[1]我昨天晚上哪兒都沒去，換完衣裳，把東西整理了一下，十點鐘就上床睡了。薇拉四點把我叫醒，天已經大亮了。售票窗口沒有售票員，有一趟北邊來的火車晚點了，車一進站售票處就像炸了鍋似的，人們一擁而上，買票的買票，不買票的就是在伯朝拉中轉簽票。我好不容易才買到一張火車票。我給了鮑里斯一百二十五盧布，讓他給我買通票，還給了薇拉五十盧布。當然，剛開始她不要，后來很爽快地收下了。我答應要給她寄一個流行喇叭裙的樣板，她還計劃寄錢來，叫我給她代買一件毛朝外的皮大衣。我勸她放假的時候來莫斯科自己買。但是我最希望她不要把這筆錢省下……

我在科日瓦見到了以色列維奇……他還是老樣子……

火車經過烏赫塔和伊日馬，簡直就像穿過我的故鄉似的，市容似曾相識。車窗外可以看到村莊，但看不到工廠，工廠在山后邊擋著呢。夕陽西下，他們說，火車要在這兒停留三十分鐘，所以才能把這封信給你寄去。

保重身體，親愛的。

剛剛和她摯愛的男人好一番卿卿我我，而這封信卻不露聲色，寫得滴水不漏，仿佛在這漫漫歸途上必須要控制住感情似的。9月14日，斯維塔在“路上第2封信”中寫道：“火車現在到了科特拉斯。一夜無話……他們并不想挨個查驗旅客，只是在車廂里來回走動，有選擇地查驗。”

相比之下，列夫的信更加抒情。他在9月16日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斯維塔：

我走到哪里都有你跟著。如果腦海中浮現出什么美麗的東西來，比如一首美妙的音樂、一首普希金或者彭斯的詩、一幅畫，我就會聯想到你，就會看到你，看到你的面容、你的眼睛，你的笑容動不動就浮現出來。我不知道把這些寫出來給你看到底好不好，我是寫給我自己看的，不是給你看的，但是不寫是不行的。斯維塔啊，我的斯維塔，我親愛的斯維塔。有時，聽見一首美麗的音樂，我知道你也喜歡，仿佛在和你一塊兒欣賞似的。這時，我的心情就會平靜下來，遇事更能忍耐了，對人也更加和藹了。我的斯維塔，有你在真好，你無時不在，你無處不在——詩中有你，散文里有你，音樂里也有你，連我的線路圖里都有你，我的眼睛里只有你。

斯維塔走十二天了，又走到列夫的夢中來了。“只是你鼻子眼睛嘴都沒長，臉部根本沒有，但是我看得出來，是你。”我好幾天夜里都做噩夢，但是接著一連三天夜里都做同一個夢，可清楚了，1945年被關在德國魏瑪蘇聯秘密警察監獄的時候也做過這個夢，一模一樣的夢，夢見斯維塔穿著一身白色的連衣裙。

幾星期之后，列夫閱讀屠格涅夫的小說《貴族之家》，書中描寫環境奪走了愛情，愛情轉瞬即逝。列夫讀書讀到深夜，然后提筆給斯維塔寫信，暢敘衷腸：

我明白，人生最怕絕望，完全失去希望是一種最為恐怖的事態……把所有的“可能”都一筆勾銷，本來還有力量奮斗卻放棄奮斗，這是一種最為可怕的自殺。看到這種悲劇發生在別人身上，真是慘不忍睹。而沒有道理的希望是弱者精神的救生圈、弱者智力的救命稻草。這樣的希望令我生氣。但是，喪失希望是靈魂的癱瘓，甚至是靈魂的死亡。斯維塔，趁著咱們還有力氣希望，讓我們希望吧。

# 九 同是天涯淪落人

1月8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1950年。一個世紀過完了一半。”新的一年開始了，列夫在計算著時間。再過兩個星期，他就三十三歲了。

我覺得，我這一生，現在正好過了一半——只要沒超過一半就好。剩下的歲月里，又要有多少個年頭要劃掉，劃到老年這個年齡段里面去呢？只有在沒有“如果”的前提下，這些計算才有意義——只要有一個“如果”，我的個人日歷馬上就會停止不前了。

眼下，列夫最重要的是把命保住，不要被嚴寒凍死：“天越來越冷，冷得刺骨。昨天零下四十七度，前天零下四十九度，今天‘暖和’了一點兒，零下三十六度，但是現在溫度又降下去了。”

50年代初期的時候，勞改營的人口達到頂峰。據官方統計，古拉格系統的勞改營、勞改隊當時關押了2561351名囚犯，比1945年多出了一百萬。古拉格雖然只占全國整個勞動力的百分之二，但是在蘇聯經濟中的實際份額可要大得多。邊遠高寒地區貴重金屬釆礦，雇用自由工人，即使能雇到，成本也會非常高。于是就把勞改營的大批勞工投了進去。40年代末、50年代初，所謂的“基建大項目”后來成了蘇聯體制戰后成就的象征，至少官方是這么吹噓的：連接伏爾加河和頓河的大運河，古比雪夫水電站，貝加爾湖到阿穆爾河[70](#__70)[1]的鐵路，穿越北極地區的鐵路，莫斯科地鐵延伸線，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巨型新大樓。那些年，在蘇聯首都的周邊有七座龐然大物拔地而起，外形好像結婚蛋糕一般，均為“蘇維埃帝國”咄咄逼人、招搖浮夸的風格，人稱“斯大林大教堂”。莫斯科大學的新大樓即為這七座建筑物之一。

莫斯科大學主樓是全市最高建筑，在莫斯科市中心，幾乎從哪里都能看得見。當時，斯維塔覺得美輪美奐，她給列夫寫信說：“夜里好像全城都被它照亮了，主樓的輪廓明亮極了，非常漂亮。”斯維塔可能有所不知，這座新大樓是勞改犯修建起來的。斯維塔天真，對這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基建大項目”贊美有加，可她不曾想到，這些建筑物全都是古拉格奴隸勞工建造的。列夫見了大片建筑工地的宣傳照片，也覺得十分壯觀。勞改營的俱樂部里有時候放映電影。列夫看過一個紀錄片，講的是連接伏爾加河和頓河的那條大運河，演了整整一個小時。后來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人類的智慧真不簡單，把成千上萬個想法轉化成了摸得著看得見的奇跡，做得這么井井有條，這么渾然一體，我沒有別的想法，也沒有別的情感，只覺得非常自豪，非常欽佩。當然了，電影有很多缺點，尤其是拍得太匆忙，拼湊得有點兒不細致，但是即使這樣也無傷大雅，還是大有看頭。

列夫怎么會被打動了呢？他明知道，古拉格勞改犯正在伏爾加河到頓河的大運河工地上干活呢。和他一起服刑的勞改犯亞歷山大·謝苗諾夫本來是電力組的組長，他自己申請調到運河工地當工程師，結果申請成功，就被調了過去。列夫1945年被秘密警察反間諜單位逮捕，從那時候到現在，他的政治觀點肯定變了。共產主義也好，蘇維埃的正義也好，列夫已經看清了它的真面目，不再心存幻想。然而，列夫仍然滿懷豪情地相信蘇聯科技的進步力量，即使在古拉格里頭勞改，這個信念仍然沒變。他自己經常動腦筋，想方設法要改進發電站的運作，這就是他這種信念的標志。

一個個勞改營、建筑工地、礦井、鐵路筑路工地，在廣袤的區域內星羅棋布，合在一起就像一個幅員遼闊的群島，稱為古拉格群島。這是一個奴隸經濟體，給整個蘇聯投下一個巨大的陰影，但是蘇聯國內的人，當時知道古拉格的不多，不識古拉格真面目，只緣身在古拉格。戰后，古拉格和民用經濟漸漸整合，融為一體。當局和民用經濟各部門簽訂合同，每年把大約五十萬勞改犯調去干活，大部分是在建筑行業，反正民用工業各部委哪里缺勞動力，就把勞改犯拉去，白干活，不給報酬。此外，古拉格系統還雇傭了大約五十萬自由工人，他們是有償勞動。漸漸地，為了讓人干活，勞改營越來越得用物質刺激，連被判處強制勞動的勞改犯都學會了，不給錢不干活。戰后，勞改營里關進來大批蘇聯紅軍、外國戰俘、烏克蘭和波羅的海諸國[71](#__71)[1]仇視蘇維埃政權的“民族主義分子”，這下子，勞改營的犯人就越來越不服管，越來越難以控制了。這些勞改犯不懼怕暴力，除非給他們報酬，否則拒不干活，生產指標十有八九完成不了。

1950年，北伯朝拉鐵路勞改營（North Pechora Railway Labour Camp）改組，更名為伯朝拉勞改營（Pechora Labour Camp，簡稱Pecholag），任務是在科特拉斯和沃爾庫塔之間再建一條鐵路，把兩地連接起來。戰爭那幾年，匆匆忙忙修了一條臨時的單軌。可是，后來沃爾庫塔盆地煤產量大增，伯朝拉也由于勞改營擴大生產而成了工業重鎮，貨運量激增，所以這條單軌就應付不了了。

修建第二條鐵路可不容易，對伯朝拉勞改營的頭頭們來說，是個挑戰。必須調用大批勞工在森林里開出一條通道，挖溝筑壩，把枕木和鐵軌統統備齊、鋪好，這可是重體力活兒。沿線個個勞改營現有人手不夠，需要增加新的勞改犯，還得進幾千人才行。枕木、工棚和其他建筑材料需求量增多了，所以木材廠必須提高產量才能滿足需求。上司命令，這條鐵路必須在一年之內修完，勞改營頭頭們覺得壓力太大。沒有新的物質刺激，休想在兩年內竣工，三年都夠嗆。勞改犯個個心灰意懶，實在是一點兒干勁都沒有。

1950年1月，大尾巴會開了一個又一個，討論前一年木材廠為啥沒完成計劃指標，討論來討論去，找出的原因都是平時就司空見慣的：缺原料，缺電，計劃不周，勞改犯技術水平不夠，等等。但是勞改營當局尤其注意到，“勞改犯完不成生產定額的越來越多，犯人拒不出工的，也越來越多”。

勞改營當局，為了加快修鐵路的進度，制定了一套物質刺激的辦法，包括給工資。以前是白干，現在給工資了。給犯人付工資，這是1948年11月的一項政府法令提出來的，允許幾個指定的勞改營發獎金，獎金數額不超過外面普通工廠同類獎金的百分之三十。從1950年開始，這類獎金就已經推廣到古拉格系統內的所有勞改營了（懲戒性特種勞改營除外）。

木材廠本身也是一個勞改營。它是在五一勞動節這天開始實行工資制的。普通勞改犯每月工資九十盧布，有技術的犯人掙雙倍工資，一百八十盧布。[72](#__72)[1]按照這個規定，木材廠必須要盈利才能從莫斯科勞改總局那里領到錢和配給品。最低口糧費用，勞改局還是繼續支付。但是，計劃的增產數量夠不夠給勞改犯發工資并且支付最低的口糧費用呢，誰都沒把握。木材廠的領導人大肆宣傳，布告滿天飛，俱樂部、車間、宿舍里到處都是，連他們也是半信半疑。這個工資制度在邊遠林區的勞改營試行得比較早。十一營區是其中之一，那里的生產效率是有提升，但是入不敷出，不夠開銷，因為很多勞改犯干活并不比以前賣力。勞改犯覺得，這個工資制度有兩大問題：第一，看守向犯人索賄，索賄就是盜取犯人的工錢，但很難制止；第二，沒什么東西可買，沒貨。邊緣營區的售貨亭里只有幾個碎肉罐頭，幾個煮熟的甜品，其他就沒什么了。黑市上伏特加、煙草倒有的是。

話又說回來，能掙點兒錢，列夫還是很高興。他的姨媽、尼基塔叔叔，還有其他親屬，這些年都給他寄包裹來，列夫覺得欠大家很多，有工資了，這些感情的債，可以還一還了，也好讓他不那么覺得自己“像個小孩兒似的，讓人家拿著湯匙一匙一匙地喂飯”。依他看，倒是他應該反過來照顧他們才對。這層意思，列夫過去給斯維塔寫信的時候，多次提到。7月份，列夫給奧爾加姨媽寄了點兒錢。他高興地告訴斯維塔說：“現在實行計件工資了，這不是要把我們變成資本家了么？”那年晚些時候，他把攢下來的二百盧布全給斯維塔寄去了，讓她轉交給卡佳姨媽，讓她去療養院住幾天。

1950年春天，木材廠領導人做出了一個決定，允許他們在菜園里種蔬菜，自己種，自己吃。這是當局給勞改犯的又一讓步。列夫和電力組的朋友們組織了一個“集體農莊”，種生菜、水蘿卜、豌豆、甜菜、黑莓，都是富含維生素的。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斯特列里科夫是這個“集體農莊”的主席，他“很慈祥地主辦這一切，愛聽我們夸獎這菜園子長得好，夸他廚藝高明”。他甚至還拉起了電燈，天黑以后就把燈打開，用燈光來保護菜地，防止被盜。列夫不信能防得了賊，心想，偷菜的照樣偷，“盜竊，充其量減少了百分之一而已”。斯特列里科夫和他的“農民工”還在玻璃棚里種了金蓮花，在發電站的地下室里養了兔子（他們給兔籠子配上了暖氣），這樣大家就能燉兔肉了，那味道鮮美極了。10月中，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我們把菜園收拾了一下，早該收拾了，現在才做，有點兒晚了。收成沒多少，也沒贏什么利，但是大家感到很滿意，尤其是斯特列里科夫更是樂滋滋的。他窗臺上種的西紅柿快熟了，除此之外，什么都沒了，只有土豆（順便說一句，土豆現在不缺，有的是）。大地出產的其他果實，現在都吃光了。甚至食用大黃和菠菜，這里都有，好像俄國的北大荒有個西歐了嘛！尼古拉·利特維年科可喜歡這菜園子啦，既飽了口福，又飽了眼福。他現在不種菜了，養免子去了。還沒有規定說不讓養。所以，發電站的地下室里住著一伙大耳朵家伙，一共六個。尼古拉打算把它們都燉了呢……我沒參與飼養，只是在一旁看著這些兔子，真是賞心悅目啊。我們養了一只貓，名叫米特卡（Mitka，不是和G.Y.在一起住的那只貓，而是我們宿舍這只）。眼下，我們都瞅著它呢，成了我們關注的焦點。它得了一種什么病，主要是眼睛，總是水汪汪的……沒有獸醫，我們只好自己給它治療，給它維生素C喝，用硼酸給它沖洗眼睛。應該好好護理：它抓耗子簡直神了，一舉一動無懈可擊，性情溫順極了。

木材廠里還有其他一些小來小去的改善。新蓋的犯人宿舍比以前大了。勞改營里新開了一個俱樂部，向所有勞改犯開放，里面有一個圖書室，一臺收音機（只能接收國內廣播），還有一張乒乓球臺，一個打撲克、玩多米諾骨牌的地方。警衛室旁邊新開了一個郵局，還開了一個小賣店。犯人們可以到這兒來買面包，有時，甚至奶油、香腸、伏特加、煙草、衣料這些東西都能買到，只是什么時候有貨不一定（店里有六百米毛巾布現貨，但是，比毛巾布更暖和的東西，一概沒有）。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為什么給我寄糖來啊，這里可以買到的。牙膏、肥皂，現在這里啥都有。”在自由工人的幫助下，列夫還可以從主城區買到東西，那里小商店越開越多，罐頭食品的種類比這里稍微多點兒，還有干魚，偶爾還有蔬菜、茶葉、塊狀咖啡[73](#__73)[1]。



斯特列里科夫、列夫（后排）與里列耶夫（左）和利特維年科一起在實驗室外

伯朝拉本身也在迅速發展著，給勞改犯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甚至還提供了娛樂。1949年，市中心新開了一家文化宮。這座古典式的大樓裝飾著廊柱，樓里有一個大禮堂，里面的一切設備都是勞改營里的木工做的。禮堂放映電影時，自由工人有自由工人的專場，勞改犯有勞改犯的專場，電影要分開看，不許坐在一起看。勞改犯不許自己來，是由荷槍實彈的看守押送到文化宮來的。文化宮有一個常駐樂團。1951年又成立了一個常駐劇團，劇團成員都是勞改犯。這些“農奴劇場”和“農奴樂團”為勞改營大大小小的頭頭爭光不小，他們引以為榮，互相討價還價，私相授受，要把最好的音樂家和演員弄到自己的勞改營來。此外，還有足球隊，隊員有的是在押的勞改犯，有的是刑滿釋放后自愿在原地就業的人員，這些人，全市各行各業的都有（有一個鐵路工人足球隊，一個造船工人足球隊，還有一個木材廠足球隊）。這些足球隊之間常有比賽，球賽在文化宮附近的新足球場舉行。有時舉行大型球賽，參賽雙方，一方是伯朝拉勞改營的東道主，另一方是來自另一城市的客隊。這時候，勞改犯就在武裝看守的押送下，列隊來到足球場，為本隊鼓勁兒加油。



伯朝拉勞改營足球隊的五名囚犯

之所以要這么千，是因為當局有個想法：古拉格也是一種文明，應該與蘇聯社會并駕齊驅，應該對勞改犯進行再教育，通過文化宣傳活動把他們改造成為蘇維埃“公民”。勞改，勞改，用強制勞動來改造囚犯，這是1930年代初期古拉格意識形態的核心基礎。1930年代后期，這一條基本上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因為勞改營的中心任務變了，現在是要最大限度地剝削和懲罰“人民的敵人”。但是從1940年代末開始，勞改營的頭頭們就挖空心思，用他們的官腔來說，就是要激發勞改犯的積極性。于是，他們匠心獨運，想出了這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主意。木材廠的黨委領導人引入了一個教學計劃，向勞改犯傳授工業技術。三八大街原來有個勞改營房，最近廢棄不用了。1950年，他們從勞改犯中挑選一些“可造之材”，在這個地方辦了一個培訓班，在上班的時間教他們大地測量、地形測繪、鐵路工程等。教員也都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

這個培訓，列夫沒有被選上，但是他已經在私下開始給發電站的幾個工人上課了，其中就有那位來向他請教數學問題的二十三歲的司爐工，還有一位三十歲的機修工，列夫教他類似工程學的課。列夫很適合當老師。他為人善良，平易近人，大家都喜歡他，常常來向他請教，請他出出主意，解決實際問題。列夫正需要在勞改營里找到人生的更高目的，幫助別人正好滿足了他的這個需要。

列夫深知，自己在勞改營里地位相對比較優越，比別人混得好。所以，那些混得不如自己好的人，列夫強烈感到，要竭盡所能來幫助他們。他給內務部寫信，一連寫了十八個月，向他們詢問他可憐的朋友德爾列茨基的地址。7月份，他終于打聽到了，德爾列茨基已經放出來了，不在因塔特種懲戒勞改營了，現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一個小村莊里。列夫給他寫信，并且通過銀行轉賬給他寄了錢，可是錢又被退了回來，還附來一個簡短留言，寫的是：“不需要資助。”列夫一看，覺得德爾列茨基拒絕接受自己的幫助是自尊心在作祟。他就是這么個人，特要面子。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這么說，他肯定還活著，這一點是確定無疑了，身體很可能也不錯，還是一如既往地倔強。我真可憐他。他不給我回信，我一點兒都不生氣。如果我心里有把握，給他寫信不會給他帶來痛苦，那么，我就會繼續給他寫信。他不回信，我也寫。啊，柳布卡，你小子真是個笨蛋！盡管他才智過人，可有的時候卻像個孩子似的。”

還有一個人，列夫也同樣放心不下，就是電力部門那位有一半拉脫維亞血統的年輕人，奧列格·波波夫（OlegPopov）。1948年2月，波波夫被押走了，押到第三營去了，那是個嚴刑峻法的特種勞改營。他在那里拖運木材。兩個月以后，他回來了，滿身創傷，一看就知道，在那里受盡了折磨。列夫說：“他的手長滿了凍瘡，沒一塊好地方，人也比以前瘦多了。他的眼睛里有一種奇怪的眼神。”看到朋友變成這個樣子，簡直判若兩人，列夫心里很難受。他給斯維塔寫信說：“奧列格來看我，他走后，我滿腦子想的都是他。我良心很不安，理由有兩個：他遭遇到那么大的不幸，我覺得也有點兒怨我。[74](#__74)[1]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我的境遇比他好多了，簡直沒法兒比。我有點兒不安。”



德爾列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布爾什維克經濟師葉甫蓋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女兒伊琳娜·葉甫蓋耶芙娜·普列奧布拉任斯卡婭生活在一起

1948年4月，奧列格被送到了附近一個臨時勞改營，這是把勞改犯先集中在這里，然后統一轉到苦役勞改營去。趁著這批囚犯還沒有上路，列夫給奧列格寫了一封信，把斯維塔的地址給了他。十個月音信皆無，后來，奧列格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原來，他在科西尤（Kosiu）—個特種苦役勞改營里。這地方在伯朝拉東北一百公里處，通往沃爾庫塔的鐵路線經過這里。那個勞改營是一個釆石場，奧列格干的活兒就是把石頭打碎。那里條件非常惡劣，奧列格砸石頭把手都砸傷了。他想讓斯維塔給他寄幾本書來。列夫非常惦記他，就發動大伙湊錢，給他買點兒東西寄去。斯維塔也給他寄了東西。可她不斷接到來信要東西，要的東西都是已經寄去的。有些來信是用一種奇怪的英語寫的，把斯維塔的地址都寫錯了。原來，是其他犯人逼迫奧列格給斯維塔寫信要東西，東西來了，他們就自己扣下。為了不讓這個欺詐得逞，奧列格每次都故意把地址寫錯。

列夫剛一掙錢就盡量省吃儉用，他要把省下來的錢給奧列格。2月份，列夫寄去了一百五十盧布，奧列格“用來買面包了”。斯維塔接到這個消息犯了嘀咕：“花這么多錢買面包”，勞改營倒是有可能允許，不過這事兒有點蹊蹺。斯維塔懷疑，奧列格可能又被其他犯人欺負了，于是她把包裹暫時擱起來，沒寄出去，只給他寄了點兒小錢兒，供他今后幾個月用。列夫從另一個勞改犯那里知道了實情。那人見過奧列格。原來，奧列格確實是愛吃面包：在釆石場又餓又累得了病，兜里有一個盧布就去科西尤的小賣店買吃的。斯維塔得知以后，又開始給他寄包裹了，還寄錢，讓他買面包吃。7月19日，斯維塔給列夫寫信：

我收到奧列格三封來信。他心情好點兒了，已經收到了我寄的郵包。但是寄錢還不讓收，等小賣店進完了貨，寄錢才讓收。現在那個小賣店空空的，什么都沒有……看起來，我寄的這些包裹，東西選得不對。我選的是阻力最小的方案，給他寄了蕎麥（他說要黑面包的皮或者最便宜的蕎麥），但是搞不清楚，他可怎么煮呢。本來應該烘干一些面包皮給他。星期天，我又給他寄了一個包裹，有玉米片、面條，還有大麥粉。我在包裹里放了一個便條，外加二十五盧布。以前一直以為不讓夾寄錢呢，有的人經常寄包裹，他們說可以這么寄。奧列格來信說，這個辦法更可靠。

肺結核病人在衛生所住院，其中就有雷卡洛夫。列夫放不下心來，惦念著他。列夫對斯維塔說：“不好，他心情非常沮喪……身體很虛弱。目前，衛生所看得很緊，不容易進去，但我要去看他，試一試，看能不能進去。再有一個得這種病的，我就真信命了。和我合得來的，怎么都這么不幸呢，說來真是不可思議。”1949年，衛生所發生好幾起病人逃走的事兒，現在都用鐵絲網圍起來，一般人不讓進。列夫對看守說，他要進病房去查查電線。這個謊要是被揭穿，那可就要倒大霉了。他用這個借口混進去看雷卡洛夫，看了好幾次。這位當年的拳擊手，現在病得非常嚴重。他后來給列夫寫信說：“我以為活不了了。當時我病得很重，身體徹底垮了。我以為誰都不要我了。”列夫來看他好幾次，他感到很安慰，心情好了許多。

雷卡洛夫的妹妹在莫斯科，列夫和她取得了聯系。于是他妹妹給列夫寄來新鮮食品，還寄來了藥。列夫收到后拿到衛生所，交給他。雷卡洛夫情緒特別低落，以為他九歲的兒子不想見他了呢。他得了黃疸，臉都黃了，這么虛弱的樣子，都不敢回家了。但是，在列夫開導下，他終于想通了，摒棄了這個想法。列夫把來龍去脈告訴斯維塔：“我一直不停地勸他，終于把他勸過來了。現在他明白了，不管他處境怎樣，兒子都和他親，離不開他。這就是說，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堅持到底，活下去（順便講一句，換了我，能不能堅持到底，我可沒有信心）。”

與此同時，列夫也在盡力幫助斯特列里科夫。1月份，斯特列里科夫的病情突然惡化了，“膀胱劇痛”起來。當時的情況，列夫在給斯維塔的信中說得很詳細，從中可以看出來，古拉格的犯人得了病是怎么治的：

他情況確實很不好。在現在這種醫療體制下，實際上得不到有效治療。大夫“出診”時間倒是誰都可以去看病，不過，出診醫生水平太差，好像給農村醫生當助手的小大夫差不多，治療方法就像契訶夫短篇小說里說的那個檔次。所謂的“醫務局”，說是“監管全局”，簡直是個笑話。兩個醫生一小時接診二百來個人，誰先來給誰看，診斷主要是憑眼睛看。那個醫務局天天這么對付。改變現狀，他們個人也拿不到什么好處。當地人很可能一輩子都是這么過來的，沒見過別的世面……人們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功能才能活過來。斯特列里科夫看病的時候，有這么一幕，你看了就知道那醫務局認不認真看病了：斯特列里科夫說心臟難受，一個女的就開始給他“聽”心臟，但是忘了叫他深呼吸，歪過頭去和同事聊天去了。就這么邊聽邊聊，過了十五秒的時間，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兒，就叫斯特列里科夫穿上衣服走了。

原則上，專科醫生（泌尿科、神經病理科等）應該經常來衛生所給病人看病，但是這兒的人得等待好幾年才能讓這些醫生看上病。醫生能讓病人轉院到專業醫院去的，那可是沒幾個，這是特例。我們一個操作工，胃疼疼了一年多了，大夫只叫他拿熱磚頭暖一暖胃，說是“包治百病”。就這樣一直捱到一個月以前，疼得受不了，我們不得不把他送到衛生所。一檢查是癌癥晚期，不知道會死在手術前還是手術后，等著吧……

到衛生所去看病只有一個好處，可以休幾天病假——大夫心里都清楚。還有就是可以隔離傳染。除非是非手術不可，衛生所一般只有這兩個功能。要手術的病人都被送到外科醫院去了。外科醫院比專科醫院強，大夫比較有經驗。但是，只有在身體健康被毀了之后，外科醫院才給你治治。

最好把斯特列里科夫送到這個醫院去……但是直接去不收，要辦理轉院。轉院必須要有大夫下診斷，說要轉院去動手術，這樣才能轉過去。盡管斯特列里科夫給醫護人員幫過大忙（給藥房供應蒸餾水、幫他們制作內窺鏡。若不是斯特列里科夫提供蒸餾水，他們就得到五公里外的地方自己去取），但是，斯特列里科夫是謙謙君子，過去幫的忙，不會總掛在嘴上，說我對你們如何如何好。而那些人忘性也大，別人的不幸，他們更不在乎了。

斯特列里科夫被病魔折磨得不像樣子了，看了真是令人痛心。去年一年，他老了許多。如果今年他還得不到治療的話，你見到瓦麗婭（Valya，斯特列里科夫的女兒），就勸她今年夏天無論如何一定要來看她爸。再不來，恐怕就沒機會再見到了。還要告訴她，她爸不讓她去也要去，不要聽他的。斯特列里科夫嘴上從來不說，但是我知道，他內心里還在暗自盼望著女兒能來看他，若是不來，那就真讓他寒心了。所以，和她好好說說吧，斯維塔。

斯維塔來到瓦麗婭家，勸她去看看她爸，但是斯特列里科夫的妻子、家里其他人都反對，不讓她去。斯維塔給列夫回信說：

我正準備要走，瓦麗婭的媽媽回來了，臉上無動于衷的樣子，什么都沒問。我向她問好，她漫不經心地答了一聲。我開導瓦麗婭說，已經失去十三年了，不要再等十二年才去看斯特列里科夫。瓦麗婭的媽媽一聽，好像我把瓦麗婭領上了邪道，對我沒有好臉色。斯特列里科夫過去不愿意讓她女兒來看他，但現在應該是想開了，最好女兒能快點兒來看他。然而，即使斯特列里科夫同意了，就算瓦麗婭想要來，其他親屬也不同意（只有一位住在西伯利亞的姨媽不反對）。

瓦麗婭到底還是沒去伯朝拉。斯特列里科夫患膽結石，沒有藥，也沒得到妥善的治療，病情急轉直下，非常嚴重。只有藍色光譜理療燈[別名：米寧反光燈（Minin Reflector），當年蘇聯很流行]有點兒鎮痛作用。列夫本人有點懷疑，不信照這種燈會有什么好處。

朋友們這一切苦難，列夫盡力幫忙紓解。斯維塔在旁邊幫著列夫，她寄錢、寄食物、寄藥品。看到這些處境不如自己的人，斯維塔向他們伸出了援手。幫別人，無形之中也拓寬了自己的眼界，對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3月25日，她給列夫寫信說：“我不再哭了，也不躲避別人了。現在看別人也不像過去那么不順眼了。”這時，斯維塔接到奧爾加姨媽一個電話，說她病了，覺得非常難受。斯維塔一聽，有點生氣。奧爾加住的房子不是獨門獨戶，而是廚房衛生間和鄰居共用的。斯維塔到那兒一看，只見奧爾加姨媽“在屋里走來走去的，說明她還沒病得要死呢”。斯特列里科夫和雷卡洛夫都是真正在遭罪，而奧爾加姨媽在這里無病呻吟。兩相對照，斯維塔火冒三丈。她后來給列夫寫信說：

我不是基督徒，不信教，實際生活中的演戲真讓人受不了。我什么都向媽媽傾訴。她理解我的煩惱，但她說，奧爾加無病呻吟也是人性的弱點。我就是這么個嚴厲的人，要我怎么辦？我答應媽媽，放假我會去看奧爾加的。早晨六點鐘，我正在忙著洗刷、整理家務呢，謝留扎叔叔（Uncle Seryozha）突然來了。原來，奧爾加有個鄰居，給他來了電話。這次，我沒有馬上跑過去，等吃完了午飯我才過去。好像她前一天感覺不錯，于是就熨了幾件衣服，做了點兒針線活兒。有點兒累著了，所以心臟又出了問題。但是，我到她家一看，發現她興高采烈（她口若懸河，可見她心情不錯）。在這個時刻，我沒好氣地說了她幾句——如果有病，就應該躺下，沒必要的事兒，不要干。不要喊這疼那疼的，應該記住，她那點兒小病兒，沒什么大不了的。得癌癥的，天知道還得了什么別的病的，這樣的人有的是，成千上萬，都比她難受多了。

古拉格的物質條件，斯維塔知道得不多。人們為愛情做出的犧牲，她可知道很多。她有些朋友，要什么有什么，可還是不快樂，身在福中不知福。斯維塔看到這樣的人也是氣不打一處來。5月中旬的一天，斯維塔去看老朋友尼娜·謝瑪什科（Nina Semashko），尼娜剛剛和丈夫奧列格遷入新居。他倆三年前失去了幼小的兒子。現在生活漸漸好起來了，至少物質方面是這樣：

我原以為，到了她家，只能是所謂家徒四壁，見到幾個我認識的人，見到幾件熟悉的東西（幾件老家具）而已，可是我發現滿屋子設備都是新買的：衣柜、書柜、一套瓷器、兩張折疊式餐桌、一個寫字臺、一個梳妝臺（大理石的面，有五個鏡面）、一張廚房桌子、兩個長沙發，哦，對了，還有一張木頭雙人床。很好，人們生活漸漸好起來了，我應該高興才對啊。但是要生活、要幸福，所有這些東西就都少不了。一想到這里，我心情就沉重了。人們過去喝茶，是端起煮茶的鍋來就喝，現在是買了茶壺喝。東西雖小，倒是賞心悅目。他倆買了整整一屋子的東西，可他倆一點兒都不幸福。確實，都是賒賬買的。賒賬是有點煞風景，但東西可是買到了手。我是九點半鐘到的。尼娜正在打掃屋子，要打掃完了，她建議我體驗一下衛生間的美妙（裝修得非常漂亮，還有淋浴）。我進去體驗了一下。十點鐘，奧列格回來了。當時，我正在吹頭發，尼娜已經進了浴缸。他一張嘴就是尖酸刻薄的話，沒完沒了，整整說了一晚上。尼娜叫他干點什么事兒（例如，把垃圾拿到外邊去），他就說“明天再說吧”，要不就是“我要媳婦是干啥用的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我聽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斯維塔新買了一個照相機，是為了給列夫寄照片才買的。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看到照片，我覺得好像在你身邊。”每次收到斯維塔的照片，列夫都特別開心。列夫對這個照相機的技術層面也很感興趣：

昨天，我收到好幾封信，還有一張照片。從技術上講，照片沒照好，可能是照相機的問題，但是瑕不掩瑜，你同樣是光彩照人，非常美麗，我特別喜歡這張照片。所以，根據我這個看法，還有你媽媽的看法（自然嘍，不是你的看法），你可以高高地昂起頭來了（據這里有些人說，照片上的你顯老，不如你本人年輕）。從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出來，奧爾加姨媽身體很好，別墅引起的官司，會處理好的。而上次寄的照片，奧爾加姨媽臉色可差多了。卡佳姨媽正好相反。兩個月前照的那張照片，她照得更精神、更年輕，臉上的表情也更自然。如果這張照片照得和本人一樣，那真是太遺憾了。你現在自己有照相機了，這可太好啦。光圈多大，鏡頭多長，景深怎樣？

最近好像讓人有了點盼頭，覺得照片上的近距離接觸說不定很快就要變成現實了呢。1950年，木材廠比以前有改進，包括建造了一座“會見廳”（Domsvidanii），勞改犯獲得官方許可之后，可以和前來探視的人在這里單獨會面。這個“會見廳”其實只是一個小木頭房子，坐落在第二營區大門口的警衛室邊上，里面有一個房間，一個小廚房。房間里有一張床、一個桌子，還有幾把椅子。但這是一個私密的場所：犯人可以在這里見妻子，沒有看守在旁邊監聽，還可以和妻子在這里過夜。

6月底，木材廠貼出來一個布告，把“會見廳”的各項規定都列了出來：勞改犯可以在這里會見任何前來探視的人，不僅限于妻子或親屬。只要向勞改營主管部門申請，每個探視人員都會得到一定的探視時間。至于時間長短，那就要看犯人犯的是什么罪、平時表現如何了。



斯維塔和列夫的姨媽在一起：奧爾加（左），卡佳（右）

斯維塔橫下一條心，決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即使要橫穿蘇聯全境也在所不辭。斯維塔原定于8月底出發，去高加索度假。她打算去亞美尼亞共和國首都埃里溫，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還要去巴統（Batumi，前蘇聯外高加索黑海東岸港市），然后到山里待幾天。但是，現在斯維塔決定把那幾個地方的行程縮短，利用擠出來的時間去看望列夫。從列夫那里回來之后再回研究所上班。8月13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我休假到9月23號結束。24號是個空閑的日子，我還得想辦法找出六天的時間來（“家里有事”請假，學術休假，等等，不帶薪）。1號又是一個星期天，2號回所里上班。我決定了，無論如何都來看你（除非發生了什么非同尋常的事），有問題我會在路上解決。寧可這樣，也不愿在高加索浪費更多時間了。如果去高加索，就有可能去不了你這里了。明白吧，列夫？我還在擔心，怕哪個環節拖了時間，耽誤了整個行程。

斯維塔是8月26號從莫斯科動身的。按照事先和濟德齊克的約定，從巴統給他發了一封電報，通知他，需要推遲六天回莫斯科。斯維塔從巴統買了一張去伯朝拉的直達火車票。她坐火車先到莫斯科，回家拿了幾件保暖的衣服，一條羊毛毯子，一張床單，然后又上了北行的火車，向伯朝拉駛去。斯維塔從巴統坐火車，坐了四千二百公里來和列夫團聚。

斯維塔獲得許可，可以和列夫在會見廳住三天。三天時間可是來之不易啊，簡直不敢奢望。斯維塔出了車站，徑直向伯朝拉勞改營管理局主樓走去。探視都必須先辦理許可證。去年也是在這座白樓里辦的。她到的那天好像是9月26號，因為列夫那天給尼基塔寫信說，他“接到了”斯維塔。斯維塔從莫斯科帶來的毛毯和床單，顯然是要在會見廳的床上鋪蓋用的。她記得，列夫一直在她身旁。即使有人來探視，勞改犯一般也得去上班。列夫和那些當官兒的關系不錯，允許他和斯維塔待在一起，不用去上班。所以，那天列夫沒去上班。那幾天，他倆過得很暢快，第一次享受到了夫妻二人生活在一起的那種普普通通的歡樂。這么多年來，團聚似乎是沒指望了，哪承想會有今天。

斯維塔是9月28號那天晚上走的。她給列夫立刻寫了一封信，很可能是在伯朝拉火車站等車的時候寫的。像往常一樣，她信里寫的都是日常小事兒，仿佛是想分散一下心情。剛剛告別列夫，心里一定非常難受，寫信可以緩解一下：

再見，列夫。

我沒費勁兒就買到了車票，只是坐臥兩用車廂的躺椅。

我去了那兩個小女孩兒的家，見到了麗達和涅莉。原來，她倆都已經得到了深藍絲帶，但是她倆很喜歡紅絲帶。涅莉和麗達都沒有練習本。為了確保不忘記，我記了下來。目前，麗達沒有上學，在給別人帶孩子。她打算和妹妹塔瑪拉到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epropetrovsk）去上學，上一所技術學校。我贊成她的計劃，把我的地址給了她們。

我會把旅途的情況寫給你看。現在累了，沒精神頭兒了，就寫到這兒吧。

列夫啊，怎么也得保重啊。代問大家好。

10月1號清晨，斯維塔回到了莫斯科。那天是個星期天。第二天，她就上班去了。誰也沒問她，這些天到哪里去了。

斯維塔這次來伯朝拉，列夫的朋友們都到會見廳來看她，有的是來道謝的，感謝她寄包裹、寄藥。列夫9月29號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想讓她知道，他的朋友們對她印象特別好：

我親愛的斯維塔，所有的溫暖都跟著你走了——昨天傍晚的天氣已經是深秋季節，寒氣逼人了，夜里就下了雪，早上化成了爛泥。

很多人讓我代問你好。其中有一個人是這樣說的：那姑娘真有口才啊！能和死人談起來！（意思是能把死人說活了——別弄混了，不是“對死人說話”，他不是那個意思。）巴舒恩（Bashun，發電站的高級技師）一般和陌生人沒什么話的，但是，他說，和你談話可以暢所欲言。

前兩天晚上，利特維年科來了，面帶詫異地說，他原以為你是膀大腰圓的女人呢，“反正比你膀大腰圓就是了”（他指的是我），但是見了面這么一看啊，（我這個人口無遮攔，請上帝和你都多多包涵）原來“是一位小巧玲瓏的姑娘啊”。看到了吧，人家說的可是真心話啊。我當然非常高興啦！謝謝大家，都是明眼人！

接下來幾個星期，列夫和斯維塔又回到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列夫距刑滿釋放還有四年時間，這四年他倆打算怎么過呢。就這個話題，兩人一來一往地筆談起來。是斯維塔先開始說的，把今年冬天要過的“理想生活”大致說了一下，說要盡情地滑冰、滑雪、游泳、聽音樂。10月4號，她寫信說：

我只想玩兒，優哉游哉，沒有特定目的，不知這想法是好還是不好。因為，眼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身體健康，別的都無所謂，為了我們將來的生活，現在要保持健康。生活條件不會怎么安逸，我得有一個強壯的身體，適應能力要強。或許這是為懶惰找借口。通常，我喜歡有目的地出去郊游（采蘑菇、采摘漿果），不愿意沒有目標地到處閑逛。但是現在我只有一個目標：等你。“等”這個字眼兒太消極了：悲傷粍盡了我的力量，讓我無法生活下去。你曾經說過的話，忽然蹦到我的腦袋里：“沒有你，我將一事無成。”這話真不假，列夫，我也是這樣。但我想要這個世界善待你，讓你覺得這個世界很有意思，即使世界上沒有了我。如果真能這樣，那我就真的勝利了，因為那樣的話，我就不用擔心你了。沒有別人，只靠一個人，這不好（只有一個孩子，太少，同樣不好）。

列夫的回信寫得非常熱烈，是他最為深情的書信之一。這封信是在11月份的頭三天寫的：

你說，不管誰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世界都是一個好地方，有意思的地方。你的話，我同意。不過，我只是泛泛地同意而已。因為，如果把你也牽涉進來，事情可就不是如此。斯維塔喲斯維塔，這個世界肯定是美好的，但是當它被你照亮的時候會更加絢麗多彩——因為有你發光，世界才明亮。沒有你帶來的光明，這個世界我不想看，也不感興趣。沒有你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你離去的世界是半黑暗的世界。你真想讓我去享受那樣的世界么？“不要只依靠一個人么？”斯維塔喲斯維塔，如果這話不是出自你的手筆，如果不是有你那無限的忘我精神（別的詞都不足以達意），如果這封信是別人寫來的，那我就會就此封筆，再也不寫信了。泛泛而言，你說得對，我同意，人生在世，是不應把一切都托付給一個人。但是，如果把你說成是那個人，那就不合邏輯了，大錯特錯了。

“如果真能這樣，那我就真的勝利了，因為那樣的話，我就不用為你擔心了。”斯維塔，如果這句話是虛擬語氣就好了。

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之所以不會發生，是因為倘若你的話成真，我內心深藏的對人世的一切向往就會立刻終結。那將是道義的自殺，而不是道義的勝利。誰的勝利？戰勝了誰？你的勝利，戰勝了你自己？在這個意義上講，聲稱戰勝了自己是沒有意義的，讓外界的人或事征服我心中的你，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的閱歷，因為我們的氣質，因為我們共同分擔的那不幸的過去，所以，誰也征服不了我心中的你。為什么你要說出那些話，要我相信這么一個空洞的“勝利”呢？這是殘忍，不是善良。凡是有心有肺的人，在過去這一千年里，不管是說、是寫，有這么三言兩語就拉倒的么？斯維塔啊，這些安慰是虛的，我不需要。冬天去滑滑雪，去游泳池游游泳，去鄉下住一住，真的，你會感覺好多了。保重。

斯維塔回信說：

我親愛的列夫，你11月1一3日的信，我是昨天收到的。列夫啊，我那封信拙嘴笨舌，詞不達意，現在更是不知怎樣表達才能說明我的本意了。我可沒想讓任何人去把你心中的我征服，上帝都不會答應。我說的勝利指的是我們的勝利，不是別人戰勝我們，而是我們戰勝一切殘忍的東西，推翻壓在我們身上的重負。它壓得我們直不起腰來，趔趔趄趄隨時可能摔倒，給我們造成巨大的苦難，現在我們要擺脫它、戰勝它。希望你身在苦海，心在彼岸，一刻都不要忘記，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美好的東西——大地、陽光、水，尤其是人、親情和友誼。愿我們笑口常開，青春永駐。快樂不需要理由，任何理由都不需要。列夫，既然世界已經照亮了，我希望它繼續亮下去，管他什么物理定律啦，光源太遠啦，都不在話下。其實，沒有什么遠不遠的，因為光源就是你對別人的態度，態度當然永遠在你自己心中了……不過，我說不要光依靠一個人，這話可沒說錯哦，列夫。人生的態度不應該是心胸狹隘的市井小民的心態，而應該像托爾斯泰那樣抵制邪惡，這是一種高人雅士的睿智心態。要堅定地直面人生，不管遇到多大的悲傷，都要堅守不渝。這樣，人性不但不會被摧毀，還會得到伸張。可惜我拙嘴笨舌，滿肚子話就是寫不出來。這封信撕了也罷。有人受到打擊，立馬覺得人生沒了奔頭兒。我對這樣的人很同情，可能也很憐愛。也有人身處逆境，仍然昂然挺立（不是油嘴滑舌硬充好漢，而是真正的意志堅強，天資聰穎，品格高尚），我對這樣的人最敬重……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以為我很勇敢，其實，我膽子沒那么大。但是，我不會打退堂鼓，我會堅持，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本想寫一封漂亮的、幽默的、歡快的信，并且對你說，你的信像歌聲一樣響在我的耳畔，可是不但沒寫成，反倒生起了悶氣，恨自己嘴笨，話說不清楚。氣得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哦，這里天氣怎么樣？唉，別提了，糟透了。

# 十 勞改營的衰落

1951年1月4號，列夫寫道：“我親愛的斯維塔，新的一年開始了，新年也是舊歲的延續。除夕之夜，我們是在宿舍過的，過得靜悄悄的。多虧廖沙·阿尼西莫夫布置了一棵圣誕樹，枝繁葉茂，大家一起動手，裝點得相當壯觀。”聽大家數著倒計時，把1950年剩下的時間一秒一秒地數盡，列夫心中在想，距刑滿釋放又少了一年。

1月份，氣溫零下四十度，列夫在嚴寒下掙扎著。此時此刻，他一心想著斯維塔。1月13號，他在信中寫道：

信昨天就寫好了，還沒給你寄出去呢，我又一次被信紙吸引住了，不是想寫什么，只是要找個地方好寫你的名字：我腦袋里已經裝不下你了，一直都在默誦你的名字，什么聲調的都有，各種昵稱一一叫了一遍，至于拼法對不對，根本顧不上了……我埋頭多干點活兒，省得心里總想著大小姐你，效果還真不錯——果然不出我所料。

發電站有很多活兒等著列夫做。伯朝拉突然冒出來兩臺德國“賠償的發電機”[75](#__75)[1]。當時列夫想，“很可能是要運到別處去吧”。其中一臺，后來安裝在了木材廠的發電站里，用來增補發電量。列夫參與了安裝。另外那臺，運到城里的發電廠去了，目前正在安裝。伯朝拉各種工業都在快速發展，用電量激增，急需增加供電。伯朝拉發電站太小，滿足不了需要。1951年以前，木材廠得從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購買電力。發電站雖然自顧不睱，但還是向市區提供了大量電力，滿足了很大一部分電力需要。古拉格的頭頭們都住在市內，為了家里舒適，要求暖氣必須總是熱的，燈泡必須總是亮的。木材廠必須得有燃料才能完成生產計劃。于是古拉格的頭頭們經常和木材廠爭能源，雙方互不相讓，爭得不可開交。這兩臺德國發電機一來，木材廠就“不用再給市區供電了”。4月7號，列夫給斯維塔講解了這其中的奧妙：“要是沒有這兩臺新發電機，肯定得限電、停電。現在好了，雙方的沖突會減少的。”

1月份，發電站出了一個事故，于是就關閉了三個星期，進行檢修。今年第一季度，木材廠沒完成計劃。莫斯科的內務部一旦震怒，怪罪下來，勞改營管理局的頭頭們都跑不了。于是，他們激烈爭吵起來，互相指摘，推倭責任。最終恢復供電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增加生產，希望把浪費的時間彌補回來，不過這么一弄，又出了好幾起事故，屢屢停產。5月9號，木材廠主管安全生產的官員向上級報告，年初以來，發生了二十九起“嚴重事故”，死了三十六個人：他說，這些人不按安全規程操作，各部門“一片混亂”。第五營區有一輛卡車，車載七十人，早晨上班的時候在冰上打滑翻了車，造成三十六人死亡。第三營區，木料從一節鐵路貨車車皮上滾落，砸死兩個人。6月10號，列夫在信中嘲諷當局：

對于我們很多大叔[76](#__76)[1]來說，建設項目簡直就是兒戲。經理們平時待在辦公室里，一個星期左右才鉆出來一次，每次來都是坐著小轎車來（距離才一公里），大搖大擺各處轉一轉，扯開嗓門大喊大叫：“真見鬼，怎么這么慢騰騰的？！啥都沒干！”意思是這么個意思，可那個話講出來就刺耳多了，簡直沒法聽。根本沒有具體指導，比方說，總要加快生產，可是到底怎么加快，沒人給你講。級別稍微低一點兒的叔叔們圍觀過來，看那樣子好像挺關心似的，時不時地還說兩句有用的話，不過太模糊，意思不清，沒說到點子上。管工程的負責人，沒一個動腦筋去想一想，問題的根源到底出在哪兒（主要的問題，很不幸，解決不了：項目本來應該全面評估，可是卻根本沒有做過評估）。他們好像都認為，下來走走就行了，就等于是必要的監督和幫助了。唉，這些敗家子兒！

這些“敗家子兒”，4月份被上頭解雇了七個，后來內務部展開特別調查，發現他們犯有大規模盜竊罪，于是又把他們統統抓了起來。他們偷了八百米吊索具、二百公斤西紅柿、七箱奶油、六箱香腸、五十七個床墊，又偷偷把這些東西賣了。出了這件丑聞之后，勞改營黨委領導人下決心，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新的運動一起來，最先遭殃的人里邊就有鮑里斯·阿爾萬尼托普洛。他是發電站站長。斯維塔1948、1949年那兩次來就是住在他家。阿爾萬尼托普洛這一輩子，當局總是讓他不得安生。1950年3月，他被扭送到勞改營黨委領導人面前，說他“玩忽職守”，換言之，就是說他界限劃得不清，和勞改犯稱兄道弟，有時還和犯人喝醉了酒，因此被“嚴重警告”。第二年，阿爾萬尼托普洛又被警告六次。有一次說他未經批準、擅自在家中留宿不速之客（可能是指斯維塔）。1951年1月，發電站發生事故也誣賴到他的頭上。現在又指控他“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他在家具車間花錢給他妻子薇拉定做了一個衣柜，然后花三百盧布賄賂一個看守，想把衣柜偷偷運出勞改營。有人要求解雇他，把他送上人民法庭。木材廠黨委書記兼副廠長佐季科夫·謝爾迪托夫（Zodkov Serdkov）給莫斯科內務部寫了一封正式的揭發信，阿爾萬尼托普洛隨即被免職。他繼續和家人住在一起，人住在伯朝拉，但是到其他城市去找工作。由于這件事給他抹了黑，外地也不容他。列夫很難受。他給斯維塔寫信說：“這是一場災難，薇拉本應讓他們這兩個孩子吃上飯，把他們撫養成人，但是卻沒有這個能力。確實，薇拉有一門手藝——她是一位廚師。”但這日子，薇拉將來可怎么過呢，現在還不清楚（現在談這件事還為時過早）……鮑里斯還能挺得住，可是薇拉（之所以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就是因為她貪小便宜）一天到晚總是哭天抹淚的。

勞改營管理人員和犯人過從甚密的，并非阿爾萬尼托普洛一人。負責生產的頭頭弗拉基米爾·諾維科夫（Vladimir Novikov），大家經常看見他在犯人宿舍里玩多米諾牌。總經濟師伊萬·謝爾普寧（Ivan Serpunin），很多犯人都是他的朋友。

勞改營管理人員照過一張合影，大約就是這個時候照的。這張照片上的組合是這樣的：有內務部官員，有黨的官員，有志愿留營的工人，也有勞改犯。這張照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每個人看樣子都很輕松，不拘束。古拉格體制下，本有上下級之分，但是看他們座次實在是不分官階高低，彼此也沒有拘謹的跡象。內務部派駐木材廠的辦事處處長，你看他坐在大家中間，悠然自得的樣子，犯人坐在他腳下邊。扎堆站在他背后的也是犯人。

從1951年開始，勞改營安保措施漸漸散架子了。究竟是因為勞改營官員和勞改犯交往頻繁，越來越打成一片呢，還是因為行賄受賄機會多了呢，再不就是因為伏特加突然間供貨激增醉倒一片？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就說不清了，肯定這些都有關系。1951年6月6號，在一個黨的會議上，看守長伊萬·科瓦爾丘克（IvanKoval’chuk）透露了一個情況：前三個月，犯人逃跑的一共有二十七起，有單個人出逃的，也有集體出逃的。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用伏特加賄略看守，每人一瓶，他們就幫犯人逃跑了。有的犯人見有火車向勞改營外駛去，就縱身一躍，跳上車廂，逃了出去；也有的犯人，趁著大門口把門的看守喝醉了酒，就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也有的把刀、鋸、利刃一亮，門衛嚇得就讓他們出去了。



這是1950年木材廠管理人員的合影。在中間那排人有：諾維科夫（右二），謝爾普寧（左二），內務部派駐木材廠辦事處處長鮑里斯·波波夫（左三）。前排右邊三人、后排中部六人，都是勞改犯

列夫在第二營區服刑，這里的安保措施特別松懈，有一次，四十個勞改犯串通好了，計劃集體出逃，卻不料被科瓦爾丘克偵破而落敗。看守們雖然知道這個出逃計劃，但是并沒有懲罰密謀出逃的犯人。大批犯人罷了工，勞改營的局勢更加復雜了。看守要犯人出來集合點名，大家沒理他，繼續在宿舍里玩牌。看守大都是農村來的年輕人，科瓦爾丘克抱怨說，這些看守，很多人自己就仇視內務部。他們對犯人并不兇。看守們，即使不同情犯人，犯人給他們錢，給他們伏特加，他們也還是照收不誤，遇有女犯挺身而出，甘愿奉獻魚水之歡的，他們也是隨時笑納。

第二營區發現，有人在策劃起義，準備登高一呼，揭竿而起。4月25號，木材廠黨委領導人趕緊討論，該如何應對。原來，有一伙勞改犯打算在五一勞動節那天在各車間縱火，目的是群起出逃，心想五一節假期，看守們必將個個喝得酩酊大醉，正好起事。于是，黨委領導人接管了安全保衛，認定造反是出于政治原因，與冷戰密切相關。其中一位硬說：“勞改營內與我們為敵的人預料會爆發新的戰爭，他們天天關注國際事件的演變，得知國外有他們的盟友，心中大喜。”5月1日那天，勞改營全體黨員（蘇共正式黨員二十五人，蘇聯共青團員二十人）嚴陣以待，個個荷槍實彈，在工業區內各個車間站崗。而對于勞改犯來說，5月1日仍然是個工作日，要照常出工，不放假。這一天平靜地過去了，沒出事。安保措施收緊，大家一定看出來了，所以決定中止這次行動。但是，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很多看守都喝醉了。傍晚時分，看守們居然在會館里吵了起來，互相對罵。

五一節這天游行，斯維塔和同事們從研究所走到紅場。她給列夫寫信說：“我們玩得很開心。”那天下著瓢潑大雨，個個都澆成了落湯雞。

人們唱著《如果想要身體好，就用冷水澆身》、《要像鋼鐵一樣硬》。[77](#__77)[1]我兩點三十分穿過紅場，兩點四十五分的時候，大雨傾盆而下。當時我在馬洛謝伊卡大街（Mamseika），雨下得非常大，游行都游不了了，只好停止。我蹚著水回家，水深到踝骨（我的鞋到現在還沒全干）。大家看著涼鞋前邊露腳趾的地方往外淌水就笑，說設計鞋的時候，之所以前邊要露出腳趾，就是為了往外淌水用的。市區有些地方還下了雹子呢。研究所旁邊，雹子下了一地，三四個小時都沒化。

那天下午，斯維塔參加紅場游行，當她在斯大林面前走過的時候，心中會作何感想？當時，蘇聯領導人站在列寧墓頂上向下面的游行群眾揮手致意，斯維塔可曾抬頭瞧他們一眼？她有沒有想到過斯大林？斯維塔的信里極少談政治。她顯然不喜歡官僚體制，也不喜歡那種官腔套話。她對“辯證”（辯證唯物主義）嗤之以鼻，可是在研究所里非學不可，不學不行。科學界正在進行大清洗，所謂的“反世界主義”運動實際上是沖著猶太人來的。斯維塔看在眼里，知道來者不善。內務部的特務時不時地來騷擾她，盤問她列夫如何如何（斯維塔去伯朝拉途中發的那些電報，至少是被他們截獲了一封，所以，他們肯定在監視她）。斯維塔小心提防著內務部的秘密警察。但她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參與公共生活。地區蘇維埃選舉時，斯維塔自愿參加選舉工作。工會開會，她代表研究所出席。她是共產黨員，研究所開黨員會議，她寫報告。她在研究所里職位不低，研究的是軍工項目，當然要通過這些政治活動來表忠心。不這樣表現，會引人注意的。但是從她來信的內容來看，她履行黨員職責，也像做科研一樣，勤勤懇懇，一絲不茍：黨務和科研，在她的職業生涯當中，這兩者是融為一體的，無法做到涇渭分明。盡管疑慮重重，她還是相信這個社會主義的理想：通過科學技術實現社會進步。宣傳口號說，古拉格勞改犯做的是共產主義偉大建設項目。這話，斯維塔也信以為真。

像千百萬蘇聯公民一樣，斯維塔也生活在一個雙重社會里。一方面是相信，另一方面是懷疑。在公共生活中，她是蘇聯體制內的一個公職人員。她研究輪胎生產，這對軍工很重要，而軍工也靠剝削列夫這樣的勞改犯來發家。可是在她的私人生活里，感情上完全站在勞改犯這一邊，寄錢，寄食品，寄藥，想方設法減輕他們的痛苦。這兩種心思互相排斥，一定攪得她有些心緒不寧吧。紅場五一節慶典，她參加了。五一節前大約一星期的時候，她做了個夢，夢見了列夫。這個夢可清楚了，一幕幕全是列夫在勞改營里的處境。斯維塔素知勞改營里條件極其惡劣。現在又做了這個夢，她更加揣揣不安。4月23號，斯維塔在信里說：

列夫，良知和悲傷在嚙噬著我的心。不知道是我昨天太累了，還是睡覺的姿勢不對，我做了一宿的夢，夢見我去看你，你現在的處境都在夢里出現了，就像現實情況一樣——所有那些人啊，手勢啊，說的話啊，不光是熟悉，而且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樣。醒來以后，好個想念啊，那滋味可不好受。

斯維塔原計劃那年要去看列夫的。這個時候，她把計劃暫時擱置起來，不去了。所以，斯維塔的焦慮和這也有關系。4月2號，列夫給她寫過信，告訴她先別來，因為他已經決定要申請調轉。連接伏爾加河和頓河的大運河即將竣工，他要到工地上當個電工：

我想要步大胡子的后塵（亞歷山大·謝苗諾夫，他申請調轉成功了，去了伏爾加河一頓河工地）。好處如下：一、可以減刑一年；二、那里的活兒更有趣；三、在南方。壞處是：一、工程快結束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二、工程結束以后，我怎么辦？會把我打發到哪里去？三、路途遙遠。總的來看，那里對身體的影響不會比這里差。但有另外的問題，更令我擔心：今年咱倆能不能見上面呢，我走了，就剩斯特列里科夫一個人了，我很不愿意這樣。

列夫是希望斯維塔能贊同他這個調轉的計劃。三天以后，列夫又給斯維塔發了一封信：“你說了算，聽你的。”斯維塔回信，說就按他的意思辦吧。列夫“非常高興”。可是，原計劃夏天見面，這么一來，就不一定能行了。4月25號，列夫告訴斯維塔，先不要“專程去北邊出差”，等他得到當局的答復以后再說：

這類事情能拖好幾個月才能定下來。所以，不用等，早著呢。如果有什么新情況，我就電報通知你，或者更精確地說，有人會通知你的，我不一定有時間，從得到通知到出發，一般只給幾個小時的時間就得走，不會給好幾天時間的。由于你非要寄包裹來不可……我這里的累贅越積越多——衣柜都滿了，我想送給尤施凱維奇（Iushkevich），他也是勞改犯，身體有殘疾。不然就先給你寄回去，我可以委托利特維年科夫妻倆代我寄給你，或者找個別的什么辦法郵寄。或許最好還是統統送給奧列格算了，聽你的。我會帶走幾本書，如果可以帶的話。我打聽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剩下的東西（當然不是全部，只挑選最要緊的）轉運給我：或者直接運給我，或者通過你轉給我。先不要特意安排出差，親愛的，情況會怎樣，現在真是不好說。但愿萬事如意。

既然列夫希望轉到南方去，斯維塔就計劃夏天加入一個旅游團，去西伯利亞南方的圖瓦（Tuva）共和國[78](#__78)[1]露營度假。斯維塔很想休假，但是又擔心一休假就沒時間去看列夫了。6月22號，斯維塔敞開心扉，把心里話和盤托出：“我良心不安啊。我需要和你在一起的，可我為什么總是心里癢癢的要去圖瓦呢？”去西伯利亞走這么一趟要一個月的時間，那就占去了全部假期。如果去高加索度假，回來以后就可以去伯朝拉了。前一年就是去的高加索。一個星期以后，宿營這件事泡湯了。這下斯維塔就自由了，可以去看列夫了。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列夫也得到了信兒，“伏爾加河一頓河這條大運河工程，不需要勞動力了”，其他地方的工地也不需要，例如烏克蘭南方的哈科夫卡（IChakovka）水電站，其實，列夫倒很想轉到那里去。斯維塔聽了也感到失望，不過這樣一來，現在就可以來看列夫了，所以又高興起來。6月29號晚上，斯維塔寫道：

列夫，我真想睡覺，但是我先不睡，我要馬上告訴你一件事：我的命運定了下來，不過不是像你建議的那樣，你說的那個選項，我從來都沒考慮過。所以，為了不耽誤事，圖瓦我不去了，就這么定了，我可松了一口氣，這下離你就近了。

斯維塔放棄了休假，列夫打心眼兒里感到失望。他7月17號回信說：

你不去圖瓦，別以為我高興。可能是有那么一天晚上，剛聽說你計劃要去圖瓦，那會兒我心情不太好，我承認是這么回事。但后來，我心情就好了。我一直都是想要你去度假的，真是不好意思，我居然還有不愿意你去度假的時候，想來真是無地自容。

斯維塔現在按照計劃，為伯朝拉之行做準備了。伯朝拉，她打算8月份去。臨去之前，先去一趟高加索，到了高加索，把假期延長四天，就能去伯朝拉了。然后，從伯朝拉直接回莫斯科上班。1950年那次去就是這么辦的。斯維塔7月15號寫道：

昨天，所長批了，允許我延長四天。所以，如果不出什么差錯的話，會一切順利。旅行券是七天。我9—10號到家，也就是說，我13—14號和你在一起，20號回到莫斯科上班。

斯維塔于8月15號到了伯朝拉，好像是住在阿爾萬尼托普洛夫婦家中。阿爾萬尼托普洛給她捎來列夫的一個便條：

歡迎，斯維塔！雖然可喜可賀，但是這次可能不能像上次那么痛快。首先，差不多一個月以來，他們只讓在勞改局總部探視，不讓在各營區探視了，不像去年那樣是在“我們區”，不是像尼古拉父親里列耶夫那樣，也不像利特維年科那樣了。所以，很可能咱們不能想說啥就說啥了，再說，他們非有人在場不可（指看守）。因此，就申請見一次吧，不要多申請了，尤其是你的時間還這么有限，像你說的，20號還得回到辦公室上班。如果你假期的日期沒變，明天不走不行么？或許，你可以帶阿爾萬尼托普洛一塊兒去，也許他能幫上忙，把會面地點改在我們營區這個看守室也說不定。既然只讓見一次，或許會延長兩小時以上呢。但我不抱太大希望。一般來講，這里現在比以前更緊了，限制也多了。看守都換新的了，原來的老人兒，一個都沒了。所以，親愛的，要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當著他們的面，別漏出不滿的情緒。別理他們。不管怎樣，你會給我講一路上的見聞，還會講我姨媽、尼（指尼基塔）大叔、卡佳姨媽，亞歷山大·伊萬諾娃（AleksandrIvanov，斯維塔的爸爸），所有其他人，包括阿列克……

列夫做了幾個玩具，托斯維塔帶回去，在9月1號開學前，送給自家孩子和朋友們的孩子：

順便說說那三個小玩意兒——請給阿爾卡一個，作為開學禮物吧（或者什么時候最好，由你定）；給阿連卡（尼娜的女兒，十一歲）一個，作為生日禮物；還剩下一個，你愛給誰就給誰（萬一路上弄丟了一個，這個就是備用的）。這幾個東西，恐怕只是徒有其表，拿給明眼人看，真有點兒不好意思。我不說，你看不出來毛病，其實每個都有瑕疵，質量檢驗部門肯定不會驗收合格的。但是，當兒童玩具還可以，給的時候可要講好條件：丟了不許哭。

斯維塔與列夫見面，一定是見到了不止一次，因為她17號那天收到這封信的時候還在伯朝拉（不過，好像不在阿爾萬尼托普洛家住了）：

親愛的斯維塔，早晨好！

這件事兒也別忘了：趁阿爾萬尼托普洛在家，去拜訪一下——禮節性拜訪。科·西[79](#__79)[1]求我一件事，昨天忘了告訴你：如果這里的商店有煉乳，如果你有時間進去買，請買四瓶左右，來看我的時候帶來。之所以請你代勞，是因為他求別人不容易。或許你可以求維克托去買，買完帶來就行了。

如果你沒辦法買也沒關系。

斯維塔，暫時就寫到這里吧。列夫

那天晚些時候別人捎來一張便條，確認已經安排好，當天晚上見面：“好的，斯維塔，七點后見（他們七點檢查）。可能七點到了以后得等著。但愿一切順利。”

斯維塔是第二天早晨走的。菜園子里種了花，列夫釆了一束，送給斯維塔，讓她帶回家。三天以后，斯維塔回到了莫斯科：

列夫，我到家了。車上的人都很好，就是有點兒擠，不過，越是擁擠越熱鬧，大伙兒好歹都睡了點兒覺……我們是一點左右到的。我跑回家去沖了個澡。然后吃了點兒午飯，四點鐘就睡著了。我八點起床，但是起床到現在還沒完全醒過來呢，一會兒還得上床去睡。我接到你兩封來信，還有一封是奧列格來的，是深淵里發出的呼喊，是寫給你的……當然嘍，火車上誰都沒有花。我一路拿著花回到家，路上沒法放在水里。那一大束鮮花，一半放在了行李架上，另一半放在了座位底下……好了，列夫，暫時先寫到這里吧。保重身體。

斯維塔走后第二天，列夫給她寫了這封信：

我親愛的斯維塔，這么早我就得起床了，沒有你天色總是黯淡多了。剛才我去把變電所的開關打開，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浮現出你的身影，響起你的聲音。今天干的活兒還不少，我迷迷糊糊都干完了，好像是在睡夢當中似的。明天我一個人值班，所以很難寫信，不去想你那就更難了。但是我的感覺還不錯，親愛的。

像以前一樣，斯維塔一來，列夫就感到精神振奮。8月23號，列夫寫道：“這幾天，我感覺好極了。干活兒得心應手，看什么都不生氣了。別看我時不時地吼叫幾聲，那是表面，沒真生氣。”

斯維塔正好相反。回來以后，不知不覺地像個泄了氣的皮球。她28號那天寫了這么一封信：

我回來正好一個星期，上次給你寫信到現在也正好七天。莫斯科的氣候給我的感覺很不好。第一，到處都很沉悶——看電影，上班，坐地鐵，坐火車，坐電車。第二，我只想睡覺。第三，我腦袋一片空白。這不能怨氣候。也不能怪我的腦袋，要怨只能怨我自己，我總給腦袋出難題，根本解決不了的難題，不是難為它么。回莫斯科，還沒下火車，這么多破事兒，心里就開始煩了：所里有個新的研究項目，本想堅決不干，可是不干，我的“科學生涯”就砸了，以后就混不下去了。干吧，就得拿出吃奶的勁兒來，我知道不干不行，可是干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來……怎么辦呢？天天愁得我團團轉，對實驗室的工作一點兒興趣都沒有。

斯維塔感到很灰心，連攝影都不想玩兒了。9月12號，列夫給她回了下面這封信：

斯維塔，你這個人真夠嗆，總是找外界的東西來數落自己。當然，你最近照的照片，我沒看見，是有可能照得不怎么樣。但是，照得好你也不會高興。——你會說：是瞎貓撞上死耗子，下次再照，一定好不了。不管怎么說，希望你別把攝影荒廢了，給我寄幾張，看看你的手藝。我更想看看你自己的照片（別人給你照的照片）。別人給你照相，你最不感興趣了。所以呀，你看看，我這么一自私，就和你的興趣（照相）撞車了。但是，你為別人照的照片，我也喜歡。別害怕，把你的照片統統給我寄來。我不會給別人看，即使照得不錯，我也不給別人看……我只想自己看。

那年秋天，斯維塔起早貪黑，忙得不可開交，又是給全蘇國家標準總局（該局監管制造業產品質量）寫報告，又是去列寧格勒各工廠檢查工作，還要參加勞動隊，去莫斯科地區的集體農莊，幫忙收割莊稼。1952年初那幾個月，濟德齊克患病住院，行政上的事兒都壓到她一人頭上，這么一來，她的工作比以前更繁重了。有一次，斯維塔得了蕁麻疹，非常嚴重，筆都拿不住。她給列夫的信里說：“蕁麻疹可不是皮膚病，完全是兩碼事兒，又疼又難受，只有一點讓人感到安慰，就是蕁麻疹不是癌癥，不是肺結核，不是……”

斯維塔的抑郁癥又犯了，越來越重。媽媽催促她快去找個順勢療法的大夫看看。那大夫一看，給她開了一種腰果屬的草藥。當時普遍用這種草藥治健忘癥和煩躁易怒。斯維塔告訴列夫：“好像有效。所里大家都認識我，但是每年秋天新來的女生，名字我總也記不住……我動不動就罵人。”她發起怒來，列夫有時也免不了挨罵。3月19號那天，列夫給她寫信，說收到了尼基塔叔叔一封信，信里說，想到列夫，想到列夫的種種優秀品格，心里就覺得安慰，列夫是他唯一的慰藉，只盼有朝一日能和列夫一起生活。列夫在信里寫道，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怕寫不好，一看好像故意謙虛似的。”斯維塔3月26號的回信是這樣寫的：

要是有人拿鞭子狠狠抽你一頓就好了，列夫！依我看，這事兒最好不要寫。第一，你說的，他不會信。第二，即便他相信，你為什么非要寫這事兒啊？不想說謊？不一定說實話就好，那可不一定。為了滿足你的虛榮心（“啊，瞧我多么實在！”），你把人家的理想奪走了，也就是說，你給別人造成了痛苦。現在失望，將來就不失望了：這個邏輯真棒！尤其是你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更加難辦。有的時候，我也恨不得馬上把別人的幻覺捅破。不過，我心情壞極了的時候才那樣想。心情好的時候，我就想，最好還是讓孩子們高興去吧，別掃他們興。列夫，向上帝保證，我可沒說瞎話……再說，你的缺點都在那兒呢，并不是你數出來一個就少一個。我不是說你，是泛指：我的缺點更是不少……你是個好人，列夫。我不好，怎么個不好法兒，我能給你寫出一大篇（我寫了那么多信，明擺著的，一看就看出來了，不值得專門浪費一封信來歷數我的不好）。

這是列夫在伯朝拉的第六個冬天。這個時候，他正在為活命而掙扎著。像往年一樣，勞改營根本沒有做好防寒的準備，經常停電。在列夫這個勞改營里，很多宿舍都破爛不堪，急需修理。流感、壞血病正在流行，沒有藥治，必不可少的維生素也沒有，衛生所里東倒西歪地躺了一大片。太多了，醫生治不過來。1952年1月，勞改犯每天發病人數一百二三十人（占這個勞改營在押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宿舍同屋的住院了好幾個，列夫去醫院看他們。他寫信告訴斯維塔說：“大家都吃不飽，抗壞血酸也不夠用，所以大家身體都很虛弱。”患肝炎的非常多。科農·特卡琴科得了一種重型肝炎，在衛生所里躺了八個月。斯維塔上次來給他帶了煉乳。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病得很厲害，簡直認不出來了，皮包骨頭。基本上走不了路了，話也說不出來了。”斯特列里科夫沒熬過去，也得了肝炎。他患膽結石和肝病已經好幾年了，病得很厲害，現在又并發了肝炎，后來每天吃“集體農莊”種的蔬菜才漸漸好了起來。到了1952年的時候，斯特列里科夫只能靠綠色卷心菜[80](#__80)[1]和植物油活命了。

每年3月8號這一天，列夫都要給斯維塔寫信，祝賀她國際婦女節快樂。1952年，他的節日祝賀信寄得太晚了，拖到3月12號才寄出去，但是他的信是一封特殊的信。他有生以來最重要的人都是女性——姥姥，姨媽，斯維塔。他給斯維塔寫信，心中充滿了敬意和感激：

斯維塔啊，親愛的，三八節的祝賀還沒給你寄呢，你比誰都應該得到節日的祝賀。值此節日之際，應該向你致以特別的敬意。你謙虛，不會受我一拜。不過，我可以盡情說心里話，不怕別人說我。世界上有女性存在，最讓我高興了。我對你們所有的女性都懷有最崇高的敬意，比對一般人的敬意更加崇高。如果文采不夠，很難把這種感情用文字表達出來。弄不好，肯定不入耳，聽起來好像夸夸其談的空話似的。即使涅克拉索夫有詩在先[81](#__81)[1]，我還是想試一試我的手筆。因為，在我的生活中，從幼年開始，對我最好的都是女性，是她們把我拉扯大的。她們心中沒有自己，只有我，比如我姥姥。還有其他女性，她們實為人類的楷模，面對人生的磨難，她們心地善良，意志堅強。她們洞明世事，文靜里有睿智，活潑中蘊含幽默，孜孜不倦地勞作，堅定不移地愛護著我。她們的恩情，我永遠報答不盡。想來，心中很是不安。

我生活中有很多女性，我景仰她們的品格，不管她們做出什么錯事，不論是我親眼看到的，還是聽別人說的，都改變不了我對她們的看法。的確，世界上好人少，壞人多。但是一個好人的善良足以彌補多個壞人的邪惡。我姥姥莉季婭·康斯坦丁諾芙娜（Lydia Konstantinovna），她的妹妹，麗莎，伊麗莎白，亞歷山德羅芙娜（Aleksandrovna，尼基塔叔叔的妻子），列麗婭（Lelya），還有很多，我一想起這些女人，就油然產生一種最深切的敬仰之情。我姥姥忍受了多大的悲痛啊，她那么堅強的意志，也被壓垮了，她遭受了多少不幸啊！她堅貞不屈，永不絕望，得有多大的毅力啊！她對人總是寬宏大量，精神總是那么純潔，同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看到有人無力獨自抵擋這樣的困難就不斷伸出援手，這是多么偉大啊！有多少女性能比得上我姥姥啊！如果沒有她們，這世界會多么黑暗啊！斯維塔啊，還用我說么，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所認識的所有最優秀女性的品格。

親愛的，我的斯維塔。

從1952年春天起，木材廠的勞改犯人口數量開始下降。很多人刑滿之后釋放了。過去是放了舊人就大批抓人來填補，這次沒有再抓人進來。這個現象是全國性的。古拉格這個大監獄在慢慢關門歇業了。刑滿釋放的人，走了，剩下沒出去的，有親朋好友在外邊，給他們找了很多支持者。這下子聯系面廣了，也人多勢眾了。剛剛獲釋的勞改犯，一回到社會上，馬上就可以回過頭來幫助那些還沒出來的。很多勞改犯沒了家，沒了家人，刑滿釋放以后也沒處去，工作也沒有。所以，這個非正式的關系網對他們特別重要。刑滿釋放人員，大城市一般不讓他們住，擔心他們心懷不滿，言論會擾亂民心。所以，他們需要親朋好友的幫助，幫他們安頓下來，資助他們錢，找到工作以后才能自立。

1952年3月，雷卡洛夫八年刑期滿了，他出獄后去了莫斯科。他姐姐家住在莫斯科。姐姐和家人商量，把他安置在哪里，怎么活法。他身體非常差，肺結核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列夫委托斯維塔幫助他：

他只剩下一個肺葉了，還不是完整的肺葉，走路都費勁，上不來氣，渾身沒勁兒。他想搬到吉爾吉斯斯坦去住（但說不準那里的氣候能不能受得了）。可能哈薩克斯坦北部，他覺得也行。他和母親、姐姐關系很好，但是他自己處境不怎么好。詳細情況，他沒講，沒時間了，電話上又不好直說，但是他答應給我寫信，在信里告訴我。他如果有時間的話，想來看你。我對他說，不要特意來，每走一步都很費勁。但是我代表你答應了他，如果身體允許的話，你會去拜訪他。

十天以后，雷卡洛夫還沒聯系斯維塔。他消失不見了。3月26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現在可能太早了。明后天我去找他……他姐姐好像名叫瑪露西婭（Mamsia）。她住哪個單元，我記不清了，到時候看吧，哪座樓，哪個樓梯口，我都還記得一清二楚。”

下一個要刑滿釋放的就是阿尼西莫夫。3月5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廖沙（阿尼西莫夫）已經收到出獄的批準文件了。沒有他，這里更無聊了。這里的人，除了柳布卡（德爾列茨基），只有和他才能真正談到一塊兒去。”阿尼西莫夫是莫斯科人。

他如果克服了靦腆心理，下次去莫斯科市外的住所，途中會順便來看看你，喝杯茶。他這個人很不錯，我以前跟你說過好幾次，很直爽，通情達理，可是一有人在，就靦腆起來，話也少了。他愛喝茶，最愛加了果醬的茶（給你透露點兒小秘密）。

阿尼西莫夫是3月12號出獄的。列夫擔心他剛釋放出獄，穿得破衣爛衫的，會不好意思去見斯維塔。阿尼西莫夫3月16號到了莫斯科。他在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82](#__82)[1]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說他得了流感，胃又疼，所以不能來看她了。斯維塔已經把果醬給他做好了。她給列夫寫信說：“早知道他在火車站坐著，我就會去找他了。這么多節外生枝。等天氣暖和點兒了，也許他就會來了吧。”斯維塔把果醬放在櫥柜里，給他留著，可是阿尼西莫夫后來還是沒露面兒。過了五個月以后，他給列夫寫了一封信，解釋了一下原委：“那天，我到了車站，在板凳上坐了一個半小時，然后作別了莫斯科，就繼續忙我的去了。”阿尼西莫夫本來是個合格的工程師，但是他有勞改的前科，所以工作就不好找了。去工廠當鉗工還行，于是，他就去找修理類的零活做。

隨著勞改犯大批釋放出獄，勞改營漸漸衰落了下來。列夫寫道：“人越走越多了。由于缺原材料，勞改營不像以前那么盈利了，這樣管理人員也必須減少。真可悲，沒走的都是那些干活兒不怎么樣的人。情況到處都是這樣：勞動力短缺，效率低下，生產力下降，費用上漲。費用主要都花在看管犯人上了。這時候的犯人，你越讓他們干重活累活，他們越不服管。勞改營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糟。到了1953年，內務部維持古拉格運轉的開支是勞改營收入的兩倍。內務部好幾個高官對強制勞動的效率表示懷疑，有人甚至主張把勞改營裁掉一些，把部分勞改犯轉為普通工人。但是斯大林不同意，他非要把勞改制度推行下去不可。所以，這些想法，誰也沒認真報上來過。

古拉格制度的衰落，在木材廠暴露得非常清楚，一眼就能看出來。1952年，蘇共的檔案里寫的大多是浪費、低效、盜竊、暴亂，還有就是勞改犯不給報酬就不干活。1952年上半年五千多個工作日/人就這么沒有了，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勞改營管理局急了，逼迫勞改犯干活，手段更加狠毒了，每班時間延長到十四個小時，病了也不許休息，還得照常出工。結果激起犯人暴亂、罷工、怠工。身體強壯的人禁不住折磨，都瘦弱不堪了。1952年前六個月，木材廠發生三起集體出逃事件（兩次出逃成功）。

這個地方敗象比比皆是。多年以來，勞改營內從未清理過，廢木頭、樹皮、鋸末子、磚頭、繩索，在木材廠和各車間周圍堆積如山。冬天河面上凍了冰，這些廢料，有的就搬到河面上燃起了篝火，沒搬走的，繼續堆在那里，成了火災的隱患。列夫進勞改營最初那幾年，偶爾在周圍還能看到美的跡象。可到了1952年，全都沒了。他寫道：“客觀地說，這一帶沒什么好看的東西了。到處都蓋起了房子，垃圾成堆，樹都砍倒了。夏天，花也沒有，漿果也沒有，三年前還有呢，現在都沒了，甚至草都看不著了。什么都沒了，只剩下天空了。”自從來到伯朝拉第一天起，列夫就常常仰望蒼天。逃不出勞改營，只能仰頭望去，逃向云天。他在北極光里看到了美，在浩瀚夜空的群星里發現了美。8月12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夕陽西下，留下悠長的晚霞，漫天神奇的色彩，神奇的效果，你怎么舍得走開——站在那里，頭朝后仰起，直到凍得牙齒打顫（秋涼已經感到了）。今天多云，天空灰蒙蒙的，凄凄慘慘戚戚。可是，傍晚時分，東邊天上那沉悶的烏云啊，忽然之間散了個凈，霎時間碧空如洗，瓦藍瓦藍的，就連高加索山區那蔚藍的晴空都要嫉妒了。過了半小時，已經退到地平線下面的太陽忽然在暴風雨的云層里找到了一個小小的縫隙，驀然傾瀉出橘黃色的萬丈光芒，一大片松林一下子亮了起來，洋溢著一種暖意，不是紅色的暖意，而是一種淡淡的黃綠色的暖意。這種景象，我可是從來都沒有見過：松樹不是樹了，一裸棵變成了發光的倩影，映襯著火焰般的明亮；松林里飄出了一縷青煙，在晶瑩剔透的空中裊裊娜娜，整個松林都好像活了起來。天上的星星睡了一夏天的覺，現在都醒了[83](#__83)[1]。我也感謝群星，謝謝它們出來看我。

列夫望著天空，心想，此時此刻斯維塔可能也在望著天空吧，列夫想她的時候，就仰望云天。

1952年，發電站用紅磚新砌了一個煙囪。建完之后，勞改營的頭頭們才恍然大悟，煙囪高度還沒測量呢。于是號召志愿者拿一根繩子爬到煙囪頂上去量。煙囪側面有鐵把手，是從磚縫里凸出來的。謝爾蓋·斯卡托夫（SergeiSkatov）是廠里的司爐工。列夫和他一起，抓著那一個個小小的鐵把手，一點一點爬到煙囪頂上，并排坐在煙囪口那窄窄的沿兒上，離地面大約有四十米高。放眼望去，前面是一條大河，河那邊是一片松林，他倆面朝南，向著莫斯科的方向極目遠眺。列夫進勞改營快七年了，這是第一次看到勞改營外面的世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我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樣子，看看勞改營周圍都有什么，看看河水是怎樣流的，流到哪里去了，河對岸有什么東西。我們在上面坐了一會兒，然后爬了下來。我兩腳剛一著地，就覺得后背一陣劇痛。是坐骨神經痛。我倒在了地上。如果早幾分鐘發作，我可就完了。

列夫和斯維塔，不管兩人多么相互信任，彼此多么海誓山盟，一旦斷了音訊，或者該做的事到時候沒做，他倆都往往非常緊張。1952年，斯維塔沒來看列夫。這可是1947年以來頭一回。她本來打算6月份去鄂木斯克和基洛夫兩地出差回來就去看列夫的，但是從那邊兒回來以后得了蕁麻疹，非去醫院看病不可，于是就直接回莫斯科去了。她想9月份再去伯朝拉，但是9月份她媽媽阿娜斯塔西婭還在病著，斯維塔離不開，得在家照看她。7月19號，斯維塔在信里寫道：“媽媽還不見好。如果沒有人照顧她，給她做飯，她就不吃了，病情會更嚴重的。這一陣子我走不開，過些天還應該領她去哪兒走走。”列夫8月6號回信說：

我覺得，你今年，實在應該待在家里，不要到北方來了。你有這么多事要做，時間不夠用，面面倶到是顧不過來的。即使你身體非常好，今年要出力的地方也比往年多。你需要在家照顧你媽，帶她去哪兒走走，你自己也要把身體養好，問問伊琳娜·克勞澤什么時候休假，最好你倆一塊兒休假。和同事銜接好假期可不容易，濟德齊克什么時候休假，應該和你的休假銜接好。斯維塔，或許咱們可以等一等，等今年這幾個月過去再說？

斯維塔這個夏天全陪她媽媽了，領她去大大小小的醫院看病。8月份，阿娜斯塔西婭被診斷患有脊柱骨關節炎，疼得她經常哭，夜里也睡不著覺。9月又說她得了肺結核。阿娜斯塔西啞臥床不起，覺得好不了了。斯維塔又得照顧媽媽，又得照顧爸爸。爸爸亞歷山大也病了，是肝有病，但沒確診是哪種類型。9月28號斯維塔寫信說：“爸爸的癥狀是脅痛，體重減輕很多（今年夏天掉了四公斤）。”從7月到9月，斯維塔忙得要死，下班回家就侍候爸媽，爸爸去醫院檢查的時候，她就在家和醫院之間來回穿梭。白天出去給家人買東西，夜深人靜的時候給列夫寫信，這時候已經是筋疲力盡了，眼淚禁不住往下流。她的信寫得像醫學報告似的。

到了10月份，斯維塔還沒死心，希望能有時間去看列夫。不過，列夫再一次勸住了她。10月20號，列夫在信里說：“你媽的身體狀況，如果你心里沒底的話，最好等她好點了以后，出去好好休幾天假，滑滑冰什么的，放松放松。不管怎么說，不要到這兒來，一來就把時間都花在路上了。今年咱們樣樣事兒都不順——你的身體，你媽的身體，還有就是時候趕得不巧，正好趕上現在這幾個月。”四天以后，列夫給卡佳姨媽寫信，把自己擔心的事兒告訴她：“斯維塔來信說，你答應過她，星期天要去看她，可是你說來卻沒來。她擔心你可能是病了，但是她自己又來不了，因為她媽病了。她家現在難處很多。”

11月，斯維塔終于請了假：整個11月都在家伺候她媽。11月8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假期過得真快，轉眼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四分之一時間沒了。這可不好。媽媽已經習慣有我在身邊了。昨天我出去了一會兒，媽媽就抱怨了，說我把她給忘了。今天一睡醒就叫我哪兒也別去，簡直像個小孩兒。”

列夫越是見不到斯維塔，就越是夢見她。12月24號，列夫寫信說：“我算錯日子了，斯維塔。今天沒有你的信。我做夢又夢見你了，經常夢見你，但是夢并沒有給我帶來快樂。因為夢醒以后，那個滋味真不好受，好傷心，醒來以后也忘不了夢中的情景。”三天之后，列夫又寫道：

我把書和報紙放在一邊，閉上眼睛，盡力把腦袋里想的都驅逐出去，什么電場、離心調節器、一致轉動（coherentrotation）啊，都不去想。于是你就在我的眼前浮現了出來，非常清楚，我覺得喉嚨發干，想拉起你的手，眼淚卻流了出來，我雙手捂著臉，哀嘆你離得這么遠。我夢見了你那件紅毛衣（過去那件，現在早沒了），夢見你臉旁邊有一縷頭發翹了出來，夢見你眼睛里的眸子，濕潤的眼瞼。我還夢見你把手放在膝蓋上，手心的紋路清晰可見。我想反復對你說，世上沒有比你更好的人，只要想起你來，別的一切都黯然無光了，都不足道了，都無所謂了。

一年一度的除夕夜又到了。列夫是和斯特列里科夫實驗室平時那幫朋友在一起過的。1月2號，列夫給斯維塔描述了一番昨夜除夕的情景：

這里寒流來了整整一星期了，氣溫從零下四十二度降到零下四十七度。各車間都停工了。出去不帶棉手套，一會兒也受不了。連麻雀都凍僵了。有個麻雀飛進我們宿舍取暖來了，在我們這兒已經待了兩天了，是個小不點兒。除夕夜，我們是和斯特列里科夫一起過的，一起迎來了新年。就我們仨。大個子利特維年科還沒出院，特卡琴科怕冷，沒來。瓦麗婭給斯特列里科夫寄來了漂亮的煙斗、煙絲，還有一頂帽子。我為他高興，他自己也很高興。這禮物確實讓他的精神為之一爽。

列夫三個星期沒收到斯維塔的信了，夢里越來越焦急。他1月6號寫道：

親愛的斯維塔，沒有你的信，沉悶得很。一連三天都夢見了你，夢見我們把設備運到你的研究所，你出來接收，但是我沒能和你說上話，后來就找不著你了，顯然你已經走了，什么都沒留下，只在送貨單上留下了你的簽名。后來發現，那個簽名根本不是你的。

又過了一個星期，還是沒有斯維塔的來信。1月10號，列夫寫道：

親愛的斯維塔，你怎么不給我寫信呢？你的信一停，我就開始多心了，啊，胡思亂想起來。偶爾我還能做出理性的推理，但是，即使用最合理的邏輯來推理，也推翻不了那最不合邏輯的假設，尤其是現在，生活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也不費什么事，寫兩行就行。

三天以后他又寫了一封信：

明天郵遞員來。現在，我明日復明日地等待，稍稍有點兒絕望了。而在過去，空等一天沒等到信，我就會自我安慰：沒關系，今天快過完了，或許明天會有信來吧。

列夫最害怕的就是怕斯維塔把他給甩了。其實呢，斯維塔這些天是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和鄂木斯克出差去了。她原以為用不了這么長時間呢，可是輪胎工廠問題多，耽擱了。1月18號，斯維塔終于回到莫斯科，一到家馬上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你說寫兩行，不知為什么，我覺得兩行可不容易寫啊。其實，我寫長信倒是更容易，雖然寫長信時間要長點兒，但是長信容易寫。出差本來打算去七天的（光在路上就要五天），好像我寫信告訴過你的。本來一個星期很短，沒什么值得擔心的，但我還是帶了信封和信紙。隨身帶著，為的是寫信。可是，卻沒能抽出時間來寫……往往是頭一天下定了決心，第二天一定要寫，可是到了第二天，事兒更多了，更忙了，于是就尋思，過三四天再寫吧……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只要你愛我，就不會生我的氣。這是愛情的特權，有了這個特權，干了啥事兒也沒關系。不過，對不起啊。我要盡量乖一點兒……我到家一看你的來信，簡直想哭，可是我哭也沒地方哭，再說，要哭也沒有時間。

1月27號，列夫寫了回信：

我親愛的斯維塔，請原諒我，再一次原諒我。我寫了那些信，都怪我愚蠢。斯維塔啊，親愛的，是我一時糊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就知道一件事兒：不應該吼叫，也不要生氣，但是別的沒能忍住：一來掛念你，二來害怕你不愛我了，第三呢，我想你，越想你越掛念。除此之外，心里還有點兒嫉妒，我生自己的氣，恨自己太愚蠢，好想把一肚子苦水都說給你聽。憋在心里的話，實在忍不住了，我簡直要絕望了……斯維塔啊，真不好意思，寫這些難為情的事兒。親愛的斯維塔啊，你不來信，我還以為你不是沒時間，而是另有原因呢。不過，親愛的斯維塔啊，當時我確實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打算走多長時間——你的日程可能忘記告訴我了，我只能這么推測：按照你1952年的計劃，12月底你應該會回來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的問題，鄂木斯克的情況，我都不清楚。原則上，兩地的狀況是能夠推測出來的。我頭腦清醒的時候，也確實想到過。不過，我清醒的時候不多哦，那怎么辦呢？

斯維塔啊，親愛的，我的信都快要把你給說哭了，真讓我心疼。我后悔也來不及了，當時真應該多為你著想才是。

你18號的來信，我是一個小時前才收到的。我正要去上班呢，你的信就到了。斯維塔啊，其他一切事項，稍后給你寫信告知。目前倒沒什么新鮮事兒。我親愛的斯維塔。咱們倆的事兒，盡量爭取一切順利，好么？

# 十一 出獄在即的籌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是中風死的，人事不省躺了五天，然后就死了。到了3月4號蘇聯報紙才報道，說他病了。兩天以后，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新聞報道來得真是突然。碰到這樣的病，嗚呼哀哉，現代醫學顯然也是回天無力。只有攤上了重要人物，天下才看得明白，如果是天數已盡，人為地茍延殘喘也沒戲。”

斯大林的死是3月6號對外宣布的。葬禮前，遺體在紅場的圓柱大廳停靈三天，供眾人瞻仰。前來吊唁的各界人士人山人海。首都市中心擠滿了眼淚汪汪的人群，他們是從蘇聯天南地北各個角落來到莫斯科吊喪的，前后擠死了好幾百人。沒了斯大林，蘇聯人民大為震驚。近三十年來，蘇聯人民一直生活在他的陰影之下。是非曲直，蘇聯人以斯大林為定盤星，斯大林是他們的導師、領袖、慈父般的保護人、國家領導人、克敵制勝的大救星、公平正義和社會秩序的擔保人（列夫的姨媽奧爾加，遇到什么不公正的事兒了，習慣說“反正有斯大林在”）。斯大林一死，人民勢必茫然不知所措，不管在斯大林當政時遭遇如何，此時此刻都自然而然地感到悲傷，就連受到斯大林殘害的人心里也不是滋味兒。

列夫和斯維塔，跟大家一樣，也是在3月6號那天從收音機里聽到這個新聞的。他倆既驚懼，又興奮，可內心的真正感想，卻不能說。列夫在3月8號寫道：“斯大林死得太突然了，剛開始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給人的感覺就像戰爭剛爆發那幾天似的。”列夫一定在心里暗自祈禱，希望斯大林死后勞改政策會有變化，希望能早日獲釋，但他對這個重大新聞沒有加以評論。在這個有可能會改變人生命運的時刻，雖然列夫和斯維塔遠隔萬里，但是收音機把他倆連接了起來，兩人都在收聽這個消息。這種電波上的團聚讓斯維塔掩蓋不住內心的喜悅，但她小心謹慎，不敢喜形于色。3月11號，她給列夫寫信說：“過去這個星期是莫斯科史無前例的時刻。我多次想到，世界上發明了收音機，讓人們在同一時間收聽到同一個消息。這是多么美妙啊！世界上居然還有報紙，這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過一陣子我多給你講講，現在先不說。我得仔細想想，怎樣才能用清楚的幾個字把我內心的感覺表達出來。”

倒是有一個地方，一聽斯大林死了，大家都歡天喜地地慶祝，絲毫不掩飾喜悅之情，這個地方就是勞改營、犯人聚居點。當然也有例外，有的勞改營，獄方嚴加防范，布置線人告密。有了這一損招兒，勞改犯的快樂就沒辦法表達了。但是總的來說，斯大林的死訊一經傳出，勞改營立刻一片歡騰。列夫回憶說：“對于斯大林之死，誰也沒哭。勞改犯都清楚，自己落到這個悲慘的境地，都是斯大林害的。只要安全沒問題，大家都敢說話，對斯大林嗤之以鼻。列夫回想起，1952年發生了一件事，當時住在他那個宿舍里的勞改犯正在收聽收音機廣播，播報的是蘇共中央主席團的選舉結果。候選人獲得的選票，當時正在唱票，每喊一票，播音員就喊一句：“ZaStalina！”（“為了斯大林！”）有些勞改犯把詞兒改了，改成了“Zastavili！Zastavili！”（“是強迫的！是強迫的！”），意思是說，選票是被操縱的。后來每個人都參加進來，一塊兒起哄，津津有味地看著虛假選舉這場鬧劇。

勞改犯私下都說，斯大林這一死，大家馬上就要獲釋了，要自由了。3月27號，蘇聯政府宣布大赦，凡是判刑五年以下的，被定為經濟犯罪的，年滿五十五歲的男犯，年滿五十歲的女犯，患有不治之癥的囚犯，一律釋放。此令一出，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有大約一百萬囚犯獲得釋放。1953年，大赦把木材廠的囚犯人數減少了一半（大赦前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大赦后六百二十七人）。獲釋的大多是刑事犯。這些人一出來就大肆為非作歹，搶商店，入室搶劫，強奸婦女，弄得伯朝拉風聲鶴唳，恐怖異常。4月10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他們一有機會就為非作歹，不是偷就是搶。那些品行最壞的現在自由了。馬卡羅夫（Makarov），相貌堂堂，留著大胡子……他持槍搶劫，勞改了八年。科利亞·聶任斯基（KolyaNezhinsky）也要出去了。他1947年就進來了，后來因為偷了六公斤蕎麥，又被加刑十年。去年，他偷了別人三百盧布，又小偷小摸偷了很多鄰居。雖然有這些劣跡，但還是很可憐的，最初的判決很愚蠢，判得不公，沒有第一次的判決，后來不一定會變成小偷。

列夫抱很大希望，盼望大赦擴大范圍，把“政治犯”也包括進去。發電站有些技術員，內務部已經慫恿他們寫申請了，叫他們申請釋放。他們判的都是58—11這一條（參加反蘇組織），這條沒有列夫犯的那條重。但是因為這兩條性質差不多，所以列夫心中泛起了希望：既然他們都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了，自己也有可能被釋放。列夫的希望不久就落空了。他4月14號給斯維塔寫信說：“原來是本地的看守給弄錯了。拿命運開玩笑，真是殘酷！大赦的范圍不會擴大的……大家還以為有盼頭了呢，家人也在等他們獲釋的消息。白等了。”

由于監獄人口減少了，所以木材廠總是勞動力不足。砍伐木材、拖運木材的勞改犯不夠，于是燃料供應、原材料供應都急劇下降。1953年5月，勞改營不歸勞改總局管了，改由交通運輸部管轄。當局想把新釋放的犯人留住，從而彌補勞動力的流失。內務部有專門的官員負責釋放犯人，他們用各種手段把人卡住不放：不發出獄證明，不給買火車票的錢，對出獄人員，一方面嚇唬他們，說到別處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物質刺激引誘他們留下來當合同工。技術工人、工匠、技術人員大赦獲釋走了，當局就培訓沒走的，叫他們接替走的。到了1953年年底，有二百二十四名獲釋人員在接受培訓，有的學開車，有的學木匠，有的學機器操作，有的學機修，有的學電工（列夫也參加了教學，教他們在發電站上崗接班）。但是，盡管費了這么大的勁兒，木材廠的生產效率還是大幅下滑。計劃完不成，工資和配給品都減少了。自由工人消失不見了。原來他們是擇木而棲，到其他勞改營尋找更好的待遇去了（而其他勞改營也有同樣的問題）。列夫寫道：“伯朝拉這里正在全面削減，就業困難，不知干什么好。尤其是行李箱里有橡皮布防水衣的（指的是獲釋的囚犯）[84](#__84)[1]，更難找工作了。”

新釋放出來的勞改犯，回到家里，確實很難找到工作。蘇聯官員，一般來說，都不信任被勞改過的人。很多單位的負責人仍然對他們另眼看待，認為他們都是潛在的搗亂分子，“人民的敵人”。失業問題非常嚴重，一些獲釋的勞改犯迫不得已，只好又回勞改營尋找營生去了。這些人出獄以后，沒有家人、沒有朋友幫他們站穩腳跟，可選擇的余地實在太少了。他們有把握一定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只有勞改營了。回到勞改營，他們可以當自由工人，或半自由工人。所謂“半自由”，就是掙工資，但不可離開勞改營營區。到了1953年7月，木材廠雇了一百多名半自由工人，他們以前都是勞改犯。到了1954年年底，半自由工人總數增加到四百五十九人。很多人還是住在從前第一勞改營區的犯人宿舍里。那個宿舍就是工業區柵欄外邊那個。他們每個月工資二百盧布左右。為了吸引自由工人到北極圈內工作，除了最低工資之外，還有“北極獎金”。可是他們在伯朝拉這里，只有最低工資二百盧布，沒有額外的“北極獎金”。不過，只要每周兩次到勞改局報到，這二百盧布的工錢就能拿到手。有個工人叫帕維爾·班尼科夫（PavelBannikov），他就是這樣的半自由工人，原來和列夫住一個宿舍的，因為在莫斯科地區找不到工作又回到了木材廠。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班尼科夫回來已經四天了，他認為這里是臨時落腳點，打算秋天再出去找個好一點兒的工作。他給我講了他對莫斯科的印象，很有趣。經他這么一說，又回想起了過去的點點滴滴，同時，仿佛又看到了新的莫斯科。”

班尼科夫已經去看過斯維塔了。很多人釋放以后就離開了伯朝拉。他們來到莫斯科，斯維塔就招待他們住宿。列夫常常把斯維塔的地址給他們，并且通知斯維塔，他們來到莫斯科以后，要幫助他們。6月12號，列夫寫道：“親愛的斯維塔，特卡琴科或許告訴過你，如果不是他告訴你的，那肯定是我告訴你的。維塔里·伊萬諾維奇·庫佐拉（Vitaly Ivanovich Kuzora）要來拜訪你。現在他來了。這個人非常有條理，也很謙虛。不知道莫斯科情況怎樣，怎么安排他住宿。他可能需要在莫斯科過一兩個晚上。我知道，是不方便，尤其是現在，更不方便了。但是，長不了，最多再過一年半就好了。”列夫這時還在勞改營，還有十八個月就要刑滿釋放了。斯維塔接待這些勞改營來的陌生人，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兒。斯維塔已經兩年沒見到列夫了。這是他倆1946年久別重逢之后，離別最長的時間。

睡過伊萬諾娃家[85](#__85)[1]地板的不光是勞改犯。幫助過列夫和斯維塔的自由工人，來莫斯科的時候，很多都是住在斯維塔家里。斯大林死后，氣氛輕松了許多，出行到外地去一般也容易多了。勞改營，為了留住自由工人，建立了“北極獎金”。工資加獎金，他們掙的比以前多不少。還記得發電站那個波蘭籍技工，斯坦尼斯拉夫·亞霍維奇吧，他曾經幫列夫偷偷帶過信，把列夫的信帶出工業區，再把外邊的來信偷偷帶進來，交給列夫。這時候，他計劃在克里米亞度完假，返回伯朝拉的時候，取道莫斯科看看。列夫寫信說他想借個光，睡在地板上，有兩平方米的地方就行，放一個床墊，一天占用八小時，別無所求。他會郵一個明信片給你，通知你哪天到。如果你忘了他的長相，很好認，他眼睛斜視，字母‘L’是波蘭語那種發音（‘louse’發音‘wouse’）。”

1953年6月來了好幾位客人，其中之一就是列夫·以色列維奇。斯維塔第一次去伯朝拉的時候，就是他把斯維塔偷偷帶進監獄禁區的。那個月，斯維塔還在家里給巴舒恩夫妻倆提供過住宿。伊凡·巴舒恩是發電站的高級技工，也為列夫偷偷帶過信。那夫妻倆可真是老土，斯維塔簡直受不了。她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不屑之態，但還是盡了地主之誼，熱情招待了他們。7月3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尼娜和伊凡，他倆在我這兒住了一個星期了。我對他倆說，他倆在莫斯科的表現，五分制，我給他三分（比“一般”還稍微高點兒），說實在的，應該給一分。他倆除了商店，哪兒都沒去。如果不是我硬拉著他倆去逛逛列寧墓、莫斯科大學，他倆自己都不會去看的。他們覺得啥東西都沒什么看頭，地鐵、大樓、列寧山[86](#__86)[1]對面的景色、莫斯科大劇院，一概不感興趣。我千方百計給他們找有趣的看，累得我腰酸背痛的，可他們看了都是不疼不癢的，我可是沒招兒啦。他們什么都沒買，就買了兩個購物袋，還給斯拉維克買了點兒什么。他們認定，莫斯科有的，科特拉斯也能有。他們那里沒有的，莫斯科這里也不會有。

斯大林死后，還在伯朝拉服刑的勞改犯，情況也有所改善。監獄里勞改犯的總數下降了，犯人宿舍沒那么擁擠了。1953年新建了犯人宿舍。以前老房子里都是并排兩張床。1946年，列夫進來的時候，床鋪都是統一這么并排放的。現在新房子里，床鋪是單獨放的。勞改犯的文娛活動也多了：俱樂部定期放電影，演劇，還有音樂會。連為舞會伴奏的樂隊都請來了。伯朝拉監獄區以外的地方漸漸有了城鎮的模樣，常住人口達到兩萬五千人，有商店、露天市場，新開了一家餐館，還通了公共汽車。所謂公共汽車其實是卡車。鎮里有一個廣播電臺，廣播喇叭支在了街上。勞改營組織犯人參觀文化宮，去體育場看球，次數都比以前多了。勞改營內專門對犯人廣播的廣播站也比以前強了：犯人宿舍破天荒第一次可以聽到全國的廣播了。犯人可以接收的信件比以前多了，獄方的信件檢查也比過去松了。

1954年1月，勞改營貼出來最高蘇維埃制定的新法律，禁止看守對犯人施暴。凡控告施暴的案件，依據該法律可以開庭審理，依法裁決：罪證確鑿的看守，要收監服刑；罪大惡極者，處以死刑。過去，勞改犯被看守毆打，被看守殺害的，時有發生。有的是看守覺得犯人罵了他而實施報復，有的是認為犯人不服管教而濫施淫威，但最常見的情況是，看守打人只是為了取樂。過去，看守傷害犯人，最多就是被“嚴重警告”或降薪而已。新法令大大改善了犯人的境遇。勞改營關的關，轉的轉，看守數量也就隨之減少了。所謂“轉”，是轉變為經濟特區，名義上雇用的是自由工人。

雖然氣氛比以前人道了，但是列夫和他頂頭上司的長期麻煩卻沒有解決。他這個上司就是發電站的站長，名叫伊里亞·謝爾曼。這廝生性粗野，像野獸一般，斗大的字不認識幾個，根本不懂什么工程，卻升到了內務部中尉工程師這個級別。列夫形容他“心胸狹窄，凡事吹毛求疵……看誰都可疑”。發電站每次出錯，謝爾曼都認為是有人故意破壞。他對列夫總是看不順眼，屎盆子一般都往列夫頭上扣。他專門欺負列夫，命令列夫干的活，根本就沒法完成，好幾次威脅說，要收拾列夫，把列夫送到懲戒勞改營嚴懲，發到那里去做苦役。列夫最怕的就是這一招。

斯特列里科夫出面干預，才把列夫救了下來。1953年6月，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助手特卡琴科即將刑滿釋放，需要找人接替他。特卡琴科是工程師，又懂化學，負責監測發電站鍋爐系統內的水質。這個崗位責任重大，一旦計算錯了，就會造成嚴重事故。列夫上大學的時候，當過化學助手，所以這個活兒，他能干。做這個活兒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直接歸技術控制部（OTK）領導，這是上級單位，謝爾曼管不著。經斯特列里科夫同意，特卡琴科開始培訓列夫。4月13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特卡琴科臨走之前，在供水控制方面的一些竅門兒，他打算傳授給我。從今天夜里就開始，我要讀他的筆記，他有什么文獻，我都要讀。然后，他答應再教我一些實用知識。”6月1號，列夫接手了這個新工作。雖然還是在發電站干活，而發電站由謝爾曼管理，但是列夫是水質化學師，由斯特列里科夫和技術控制部領導，這個新的崗位對他是個保護，謝爾曼休想再把列夫送到懲戒營去了。列夫6月9號給斯維塔寫信：

和上個月相比，我現在心情很平靜，盡管工作量非常大，但是感覺比去年好多了。尼古拉（里列耶夫），不知什么原因，他認為給斯特列里科夫干活會很難，給我干活尤其難。瞎說，我不相信。我覺得他這個想法很奇怪。斯特列里科夫和我之間，不管在什么條件下，都不會出現嚴重誤解的。過去我們之間有過爭論，有時嗓門兒還挺高，但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兒，并且每次爭論，其實都是我的錯，沒好好動腦子。知道了這一點，肯定有助于我保持冷靜。我對斯特列里科夫非常尊重，爭論過后，我對他的敬意更是與日俱增。有敬意，我就不會失控，所以有敬意就夠了。

列夫在斯特列里科夫手下干活兒，心情輕松不少，不像以前那么神經緊張了。不過，和其他朋友，和宿舍所有的人，他卻越來越煩躁，沒耐心。囚犯們在一個狹小封閉的空間里關了這么多年，煩躁易怒、鬧別扭也不奇怪。即使是最鐵的友誼有時也會不堪重負的。

尼古拉·里列耶夫是列夫在勞改營里交情最久的老朋友。1952年快到年末那會兒，他倆的關系緊張了。他們來伯朝拉，是同一批進來的，朝夕與共已經七年了。列夫非常景仰里列耶夫的善良、誠實、勇敢。至少有兩次，里列耶夫表現出超凡的勇氣：有一次，一匹馬驚了，在勞改營里四處狂奔。只見里列耶夫奮身一躍，把馬拽住了。還有一次，三個武裝罪犯來搶實驗室。斯特列里科夫力戰劫匪，奮力保護實驗室。后來這三個罪犯來報復，圍攻斯特列里科夫。里列耶夫見狀挺身而出，一陣拳腳，歹徒落荒而逃，救了斯特列里科夫一命。列夫覺得里列耶夫這個人很好，對他敬重有加。盡管有這層關系，或許正是因為有這層關系，列夫經常和他發火，對別人反倒沒這么發火。列夫埋怨他“幼稚”，“把生活當兒戲”，“不圓滑”。這些話，列夫大多是在宿舍私下和他說的。12月24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好像我們彼此之間有點兒厭倦了。和他沒有什么可談的了。制造方面的問題，他不感興趣。不管是什么機器，包括發電機，他都不聞不問，實踐也好，理論也好，他都不關心。數學課，他也跟不上，成天打乒乓球、下棋，要不就和瓦季姆（Vadim）學德文。語言肯定是一個有用的東西。但是，瓦季姆認為，電氣工程和數學用處更大。他自己也明白呀。所以，依我看，尼古拉上的課，好像純粹是順著自己的愛好，跟他說也沒用。有話只能和斯特列里科夫說、和伊萬·瓦麗婭文（Ivan Valiavin）說[87](#__87)[1]、和尤施凱維奇說。如果他們不在，不管是誰，只要能正視人生的，哪怕是機器操作工，我都可以和他講。和這樣的人講，也比和尼古拉講有趣十倍。

列夫這話可是錯怪了人家，有失公允。一個勞改犯，不想學數學，只想下下棋，打打乒乓球，學學德文，放松放松，這有什么不對的呢？列夫越來越志存高遠，同時也越來越看不慣身邊這些勞改犯同伴，認為他們不思進取。

列夫覺得，宿舍室友處處都可氣：夜里睡覺有人說夢話，凡事從眾跟風，惡作劇，吵鬧得很，一點兒都不安靜，不停地玩多米諾骨牌，回憶過去多愁善感。他發現好幾個勞改犯“過分溫存”，特別“討厭”。勞改營里男人之間自然產生的情感，他也反感。以前從來沒碰到過，現在見了，實在看不下去。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說到理想家庭，男人之間的友誼不能套用理想家庭，套用是不對的。依我看，是大錯特錯的。那是不正常狀態，我覺得討厭，簡直令人作嘔。安德留什卡·謝瑪什科，任卡·布克（Zhenka Bukke），納特·格里戈羅夫（Nat Grigorov），瓦斯卡·古謝夫（Vaska Gusev）（都是戰前上學時的朋友），我和他們的交情肯定都是真誠可靠的。沒有這種友誼，我們幾個誰都會覺得人生更不好活了。我們一人有難，大家都感同身受，誰有快樂的事兒，大家也都跟著高興——但是這種快樂的外在表現不過是握握手而已。

列夫看到周圍人性的墮落比比皆是，他不僅僅是生氣，更感到震驚。過去很體面的人，現在卻成了卑鄙小人，兇殘自私，麻木不仁。列夫給尼基塔叔叔寫信說：“進到這里，人心免不了要蛻變。蛻變的程度，會因人而異，但總的趨勢只有一個：人遲鈍了，感情麻木了……漸漸地，過去絕不可接受的品質和行為，現在漸漸地都接受了。”

首先，列夫覺察到的是，人類同病相憐的那種同情心沒有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全都被窒息了，互相懷有無限的敵意。這一點最為觸目驚心。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朋友之間本應同心同德、互相幫助，可影兒也沒有。既不同心同德，也不互相幫助。大家都互不信任，人人都想占別人的便宜。人人都心存戒心，隨時準備伏擊他人。似乎還有三三兩兩的工人，因為共同利益，彼此還有點兒交情。不過，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關系不牢靠，說斷就斷。

那些想干點兒事兒的人，有一個算一個，全都是小偷：

我一看周圍的人，就煩他們。凡是精力充沛、頭腦機敏的人，幾乎都是貪小便宜，像賊一樣，有機會就偷盜。修鞋的，就盜竊材料去賣，當官兒的也參與盜竊。電工也用這個辦法撈錢。司機就更不用說了。

身在勞改營，耳濡目染，列夫看明白了：“大家為了活命而掙扎。如果堂堂正正，講做人的準則，那就連飯都吃不上。一千人，有九百九十九人是這樣。”

列夫覺察到自己也變了，這可把他愁壞了。他給斯維塔寫信說：“我經常擔心，害怕天長日久人會變得像野獸一般，野蠻不開化，心腸也壞了，再加上頭腦遲鈍，聽到笑話也不笑了，將來給孩子講故事也不會講了。有一段時間，我不擔這個心了。現在不但擔心，而且怕得要死。”

在勞改營里蹲了這么些年，將來有了孩子，自己會是個什么樣的爸爸呢？這個問題，在列夫腦袋里轉了很久。培養孩子，什么最重要？經歷了這些年，他的看法變了。列夫不是一個暴力男人，但是在勞改營里有幾次他迫不得已，不得不自衛。有一次，他事后給斯維塔寫信說，勞改營讓他明白了體力的重要。為了增強體力，他就練舉重（院子里有鐵路車廂上的車軸，他就把車軸卸下來，做成杠鈴）。列夫想，在這個殘酷的世界里長大的孩子，體力對他們尤其重要：

體力是人生最必要的條件。身為父母，卻不想辦法促進孩子的身體發育，這樣的父母都應該受到懲罰。只上學校的體育課是不夠的，應該在課外也鍛煉身體。尼古拉·里列耶夫差不多比我高一倍，我舉重不次于他，如果摔跤，他的優勢只在身高。他實在太窩囊了。光看他那架勢，還以為他身強體壯的，能把電線桿子當保齡球來扔呢。

列夫通過親身經歷也認識到，小孩兒必須學會實際的技能，將來才能活下去：

一個人像我這樣，學完了大學課程，從高等院校畢業之后，適合干什么呢？如果不留校任教，那他僅僅是有了一個本錢（雖然是個不錯的本錢），繼續努力，將來可以成長為專業人員。依我看，小孩上學，上七年就夠了，不要再多上了。然后再上三四年高職院校，學建筑、電氣工程、機車、機械，等等。畢業以后，再當一兩年學徒工，獲取實用經驗。這樣的教育，培養專門知識，對某個專業領域會有詳盡的了解，遇到困難局面也能順利挺過去……未雨綢繆很重要，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應該未雨綢繆。這樣的事例，眼皮底下就有不少。說到培養孩子，當父母的，心里要有一根弦兒，要有思想準備，很多事情，孩子學不好不行，要懲罰他。朋友打他，他不還手，那就要懲罰他。如果還不肯還擊，那就更要懲罰他……我說的，對女性也適用——當然啦，格斗除外。

列夫親眼看到很多勞改犯墮落了，本來是品格高尚的人，后來滑了下去，成了下流之輩，動不動就打人、酗酒，有的都瘋了。同是勞改犯，眼睜睜看到他們走上了下坡路，將來自己會不會也落到這個地步呢？這么一想，不禁忐忑不安起來。正是因為這個，列夫對奧列格·波波夫愛之深、責之切。列夫本來非常喜歡他的為人，但后來看到他的種種變化，不禁拍案而起。奧列格·波波夫，那個有一半拉脫維亞血統的難友，曾被送到嚴懲犯人的勞改營去做碎石的苦工。他在碎石場餓得什么都不想了，只想面包。列夫和斯維塔一直不斷給奧列格寄東西。看到他對文學感興趣，兩人很受鼓舞，覺得，愛文學就說明他心中有希望，于是兩人常常猜測，他會喜歡什么書。奧列格在釆石場的時候，不可以給列夫寫信（釆石場有規定，勞改犯之間不許通信），但可以給斯維塔寫信：

非常感謝你為我費心，感謝你為我奔忙，感謝你的關心，感謝你的友誼。我內心的感受，不知怎樣表達才好，可能這樣的情感是不應該溢于言表的。有時候，我想列夫一定是個非常幸運的人，至少我是這么看的，像你這樣的好人可不是說找就能找到的。

1952年12月，奧列格被押回伯朝拉，送到一個林區勞改營繼續勞改。他從那里給列夫寫信。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今天我收到一封短信，你絕不會想到是誰來的——是奧列格來的！我樂得像什么似的。他現在離這里才三公里，從那個勞改營轉到這邊兒來，他感覺就像是出了地獄似的。”

1953年，列夫不停地和那邊的頭頭說，想把奧列格轉到木材廠來。1954年1月，列夫終于把他轉了過來。奧列格被編入一個木材拖運隊，隊里其他犯人都是從波羅的海那邊兒抓來的。1月8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昨天，奧列格來看我們了，一別六年，他在荒無人煙的地方衣食無著地熬了這么多年。萬萬沒想到，臉色還挺好，身體不錯，還是那么年輕。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笑了，有一些精神障礙的跡象。”可是，沒過幾天，列夫就不那么興奮了，他大失所望，傷透了心。1月24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了這封信：

奧列格變了，和他相處，我越發不喜歡他了。我越來越覺得，他腦袋里什么都沒有，沒有主見，沒有原則，沒有感情。好賣弄，炫耀他有“獨創精神”。獨創精神是帶引號的，實際上他根本沒有啥獨創精神。獨創精神是他過去的事兒了，他早就不是那樣的人了。他從來不用平易的字眼兒，一開口總是裝腔作勢的。以前可不是這樣啊。顯然，這些年來，他的聽眾把他說話的習慣給改了，假話說得不那么含蓄了，太露骨了……當然，這是很悲哀的，我本來對人就很失望，又多了他這個例子——他不是第一個叫我失望的，還有別人，所以說，他給我火上澆油，讓我更不舒服了。

五天以后，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已經不搭理奧列格了，和他斷交了。“大家都和他鬧翻了，不光是我，那兩個尼古拉也都和他掰了。斯特列里科夫歷來就覺得他這個人不怎么地道，現在更煩他了。”

列夫心想，在勞改營再這么待下去，自己會落得什么結局呢。一想真是不寒而栗。他常常做噩夢，夢見自己被卡在這里無法脫身：路上總有一些障礙，堵住了他的去路，害得他回不了家，不能和斯維塔團圓。列夫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斯維塔身上了。

他倆已經兩年半沒見面了。1952年和1953年，斯維塔都脫不開身，伯朝拉，沒能來得了。她媽媽肺結核臥床不起，她爸爸體弱多病。斯維塔必須在家照看他們。單位里，濟德齊克病了，行政事務一股腦兒都壓在斯維塔身上，她一天忙到晚。1953年3月，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列夫啊，什么事兒都得我去辦呢，回家也輕松不了，療養院也好，度假勝地也好，都去不了，去了也得像在家一樣掉眼淚。”列夫給她打氣，叫她出去度度假，可以去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去野營，并且叫她不要來伯朝拉。列夫預料，明年什么時候就會刑滿釋放了，可能是在1954年7月份吧。12月才釋放也說不定，看內務部最終怎么決定了。1953年6月，他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如果有機會去阿爾泰或者埃里溫度假，千萬不要拒絕。不管什么情況，都要去……其他路線（暗指伯朝拉）太復雜了；如果咱們還得等一年，最多一年半，那就等吧，沒問題。這回有希望了，斯維塔。

闊別了這么多年，還剩最后一年多了。這一年多，是列夫在支撐著斯維塔。他倆的角色調了過來。列夫盡管還是焦慮，但是隨著勞改營的條件慢慢改善，眼看著釋放出獄的日期也越來越近，他的身體漸漸強壯了起來。而斯維塔在家照看父母，在單位忙工作，越來越感到體力不支。

8月初，斯維塔有生以來第一次住進了醫院。她得了敗血癥，發高燒。病好以后，她聽列夫的忠告，去阿爾泰休假散步。她本想從阿爾泰回來以后去伯朝拉，無奈體力不支，只得作罷。列夫非常惦記她。

卡佳姨媽來信說你病了，可把我嚇壞了。多虧郵局送來了你的電報，我才放了點兒心。所以，收到你從醫院寄來的信，我也就沒再恐慌了。我只是有點兒擔心，你出行的時候，又犯病了可怎么辦，這個病真是不可思議。

這么長時間沒見到斯維塔，列夫非常苦惱。但是長年累月地等待，反倒讓他悟到了一些好處，找到了一種慰藉：

斯維塔，我有話要對你說，越來越想和你說，都是些多佘的話，或許還會傷你的心呢，所以一直不想說出來。我是想說，這么長時間，只在照片上看到你的臉龐，真是苦了我了。雖然苦，思念你也是一種快樂。每過一天，這苦味就多一分，樂也隨著多了一分。所以，我想說，心中這份情，有時候，時間和距離固然能毀滅它，但是也能滋養它，讓它茁壯成長。

9月22號，列夫給她寫了信，她前幾次來伯朝拉都是這個時候來的。今年又來不了，又錯過了一年。列夫請她放寬心，不要難過。這時候，列夫預料，1954年11月份可能會被釋放出獄了。他告訴斯維塔，要堅強：

斯維塔，親愛的，你千萬不要怪罪自己——你一定要保重身體，前途在向你招手，幸福在等著你。你到處奔波，又是出差，又是照料父母，又是家務，還有你自己的難題，千萬別把身體累垮了。這里的勞改營管理局那些王八蛋，今年他們更蠢了，比過去蠢了四倍，今年他們更壞了，比過去壞了四倍，官僚架子也比過去大了四倍。親愛的斯維塔啊，說一千，道一萬，只剩下十四個月了——這回可不多了。斯維塔啊，要保重身體，好好地活著，不要疑神疑鬼的，不要愁，要快快樂樂地活著。

斯維塔回信說：

當然啦，列夫，就剩十四個月啦，不是十四年啊。我心情好的時候，會想起這些。但是，心情不好的時候——真是難受。確實不應該把身體累壞了，做事應該快、應該輕而易舉就辦好，不費什么事就把事情辦成，可我還沒那兩下子啊。

眼下，斯維塔的主要任務，就是兩件事：第一，要先做好計劃，列夫釋放出獄后應該干什么；第二，要好好考慮一下，將來他倆一起生活的地點，應該選在哪里。釋放出獄的時候，內務部會發相關的證件。只有領到手了，才能知道哪里許可居住。哪些城市不許可居住，內務部發的證件上會有明文規定。但是，很可能不會允許他回莫斯科（距離各大城市一百公里以內的地方，新釋放的囚犯基本上是禁止居住的）。能用得上他專業技能的工作不好找。但是，列夫安家的地方，離莫斯科越遠，就越容易找到這樣的工作。不過，那樣一來，斯維塔要見列夫可就難了，除非她把父母留在莫斯科，自己一個人跟列夫到外地去。

這些問題，列夫和斯維塔早在1949年就商量過了。那時候，斯維塔曾經建議列夫考慮一下烏克蘭東部城市波爾塔瓦，或者外省的其他城市。去那些地方，列夫有可能找到教師的工作，斯維塔也能來和他同住：

列夫啊，為什么你不想當老師呢？我不知道波爾塔瓦那一帶情況怎樣，但是，依我看，越是遙遠的地方，機會越多。當然嘍，認真談這個話題，現在還為時過早，六年[88](#__88)[1]后形勢會怎樣，咱們現在一點兒都不清楚。到時候，也許一切都和現在一樣，也許不一樣，也許我們也不一樣了呢。如果一切照舊，那么，你知道的，不管是晴是雨，我都沒問題——最好下雪。

到了1953年底，斯維塔看好了雅羅斯拉夫爾。有一次出差去檢查工廠，她去過那里。從莫斯科去，坐一夜火車就到了——這樣她看父母就容易了——他倆學的專業，那邊都有對口的工業，所以都能找到工作。12月15號，她從北方的伏爾加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雅羅斯拉夫爾這個城市很不錯，不像鄂木斯克那么富有田園風光。這個城市有筆直的大馬路，街道很長，有不少林陰大道、花園，兩三層的樓房也挺多。市中心和工廠附近還有四五層的樓房。人不怎么土氣，至少我在劇場沒看到有人穿荒唐可笑的衣服，也沒看到濃妝艷抹的女孩兒。她們去劇場看戲沒穿靴子，也不嗑葵花籽。這里食品供應也比較好。有很多乳制品——露天市場和商店里都有賣的（奶酪、農家干酪、酸奶、奶油）。肉的供應情況不怎么好，但是，蔬菜倒有的是，要什么有什么。蕎麥、白面、糖、甜食、糖果，等等，都總有貨。有各種葡萄酒，種類很多（不像鄂木斯克，只有一種苦艾酒）。面包質量確實好，味道很地道，看當地人在食堂吃得都不錯。

還有一個地方，也可以考慮：沃羅涅日（在頓河中游），在莫斯科南邊，離莫斯科四百公里，比雅羅斯拉夫爾遠一倍，但這個地方有幾個優點。濟德齊克推薦去那里。12月10號，斯維塔給列夫寫的信里說：

M.A.說，沃羅涅日比雅羅斯拉夫爾強，氣候更溫和（我看不一定，那里夏天特別熱），還說，那里空氣中沒有橡膠味兒（工廠都不在市中心），雅羅斯拉夫爾市內有橡肢味兒。春天或者夏天，我去沃羅涅日看看怎么樣。去那里要十個小時左右（也是坐夜車）。爸爸過去挺喜歡沃羅涅日——他和媽媽曾經認真商量過，要不要搬到那里去住（戰前）。

列夫回信說：“我也聽說那里不錯，但我想，既然你父母還沒打定主意要搬到那里去住，咱們住的地方必須能當天趕到莫斯科才行，或者朝發夕至，或者晚上上車，早晨到。時間再長不方便。”其實，列夫有點兒悲觀，覺得將來真能和斯維塔住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想到很遠的地方去落戶。如果太遠，斯維塔在列夫和父母之間來回跑，就疲于奔命了。

斯維塔和親朋好友商量，沃羅涅日行不行。1月19號，她給列夫寫信：

我問過別人，沃羅涅日和雅羅斯拉夫爾這兩個地方哪個好，誰都說沃羅涅日好。他們一點兒都沒猶豫，都說沃羅涅日好。第一，那里有很多學校，學校都會對所在的城市有所熏陶的，文化氛圍更濃。人也好像比雅羅斯拉夫爾友好。街道也更加漂亮。氣候也更暖和。不知道天氣暖和好還是不好。好像冬天照樣還是很冷的。冬天不冷可就壞了。我特愛冬天。不過，夏天那里肯定相當熱吧。

缺點如下：距離遠了一倍，雖然經過重建，市區得以修復（戰爭期間受到嚴重破壞），但是還有很多房子沒建起來，所以，住處很可能不好找。這里（研究所）畢業的人，只要在工廠找到工作，都給一個房間，有的甚至還能分到一套房子。但是，如果自己找房子，可能會有點兒難。他們工程師不夠，還要招人，所以待遇會更好吧。不過，我這只是瞎猜了。

列夫現在最為關切的，就是不要拖累任何人，把大學畢業證書辦下來，這樣才能繼續搞原先的專業。不過，關于居住地，他還是想住在雅羅斯拉夫爾，因為離莫斯科更近。他在信里告訴斯維塔：

至于是不是落戶在雅羅斯拉夫爾，我還沒有準信兒給你。很多人被迫在這類城市的郊區落戶。但也有人住在利沃夫這樣的地方。為什么有的去這兒，有的去那兒呢？不清楚這里面有什么來龍去脈，是當官的腦袋一熱就把人發到那里去了呢，還是因為個人資源的關系，包括動用維生素（暗指行賄）的能力有多大。反正我覺得，距離雅羅斯拉夫爾十到十五公里，去那里落戶是辦得到的。我可以先投奔尼古拉（勞改犯，在木材廠服刑）的朋友們去，把行李放他們那里，在那兒住幾夜，然后我就能找到個旮旯安身，也能找個地方工作了。關于工作：不找到工作，不找到住的地方，家人、朋友，我都不想見，也不會去見。辦理畢業證書，我不能指望別人會幫我辦。我想，等我到了上帝給我安排的地方，一切都辦理停當以后，最好還是我自己去辦。文憑沒辦下來之前，我先看看哪兒有電氣設備，找個鉗工之類的活兒干干，沒別的要求，只要每月能有五百到六百盧布就行。等畢業證書辦好了，就能換工作了，或者在原單位，或者換單位……我想，這個“過渡期”估計有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

列夫已經跟斯維塔把話說在了頭里，在這個“過渡期”，只能偶爾去看看她，每次去也只能待幾個小時。釋放前，當局會定下條件，責令他在莫斯科的連續逗留時間不許超過二十四小時；在外省城市找到工作，要像所有蘇聯人一樣，每周必須工作六天。但是列夫心里還抱著一線希望，“將來有一天”，等拿到了大學文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最終會讓他回家的”。在那天到來之前，列夫說什么也要讓斯維塔和她父母住在一起。列夫等著和斯維塔團聚，都等了這么多年了，所以他練出了耐性。

我親愛的斯維塔，這封信里寫的只是我的初步設想，若有不妥，請不要往心里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作，咱們早晚會找到的。如果不是十全十美，那也沒辦法。至少比過去好，也比現在強。斯維塔啊，當然嘍，你需要離你媽近點兒，不只是你媽，你爸身體也有可能出岔兒（他們現在的狀況已經夠差的了），你要是走了，他倆的健康說不定會惡化的……也就是說，現在只有一個辦法——我想辦法找一個離你盡量近一點兒的工作，即使不能朝朝暮暮都在一起，一周七天，至少能有一天在一起。這也比過去十三年好了不知多少倍呢。

1954年，蘇聯露出了解凍的跡象，列夫覺得更有盼頭了。3月25號，他在信中寫道：“春天來了，已經來了三天了。前天剛下了雪，地面上已經不見了白色，滿地爛泥，下不去腳，一落腳就陷進去了。”這一年，列夫在那盎然的春色里看到了前途的希望。勞改犯大批釋放，并且越放越多了。他預期，今后幾個月，說不定哪天，自己就會自由了。展望前程，出獄在即，列夫朗朗吟起詩來，尤其是普希金的詩句，更是他的最愛：

企盼著榮光和善良，

我無畏地望著前方。

斯維塔知道列夫快回來了，心情為之一振。她在信中寫道：“親愛的，這幾天，我一直都想告訴你，最近我的心情好極了。我對誰都可好啦。我高興啊。早上，我去趕電車，覺得仿佛你像當年一樣，又在路上等我呢，并且人約黃昏后，整個一晚上都是咱們的啦。”

這久別的重逢，會在哪兒見呢，又怎樣見呢？回來的頭幾天，斯維塔要和列夫單獨在一起，不許別人打擾。為了能和列夫單獨在一起，斯維塔做好了準備去接他，把他接回家，去哪兒接他都成，到伯朝拉去接他都沒問題。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將來我可以把你一個人放走，一兩個月不見也可以，但是此時此刻，我不想讓你走出我的視野，一小時也不行。你一定要告訴我，我來接你行不行。我來接了你，才能把你移交給所有的姨媽呀，讓她們每人都能和你待上足足幾分鐘的時間……有我在，你就不會孤單啦，永遠不會。我保證。你走到哪兒，我都在后面跟著你。我要像個尾巴似的跟著你。像尾巴沒關系，至少不用擔心又把你弄丟了。你回來咱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不想有其他人在場，任何人都不許在，你姨媽、我父母、任何朋友，一概不行。我要把你獨自占有，這是我的壞脾性。

列夫也想馬上見到斯維塔。他希望能從伯朝拉直接到莫斯科來。5月10號那一天，列夫寫了一封信給斯維塔：“哪怕只能待一兩天也行啊，只要能見到你就行。”

列夫很悲觀，覺得獲準回莫斯科定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回莫斯科生活，需要有一個“干凈的”戶口本。要想拿到這個“干凈的”戶口本，只有兩個途徑：第一，正式平反昭雪；第二，釋放的時候得到赦免。可是，這兩條，哪一條都沒什么希望。4月11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這個事情的本質，我弄明白了。依我看，現在怎么努力也辦不成。完全平反是不可能的，以前的定罪如果不取消，現在赦免了將來也沒什么好處。”列夫心里有數，扣在他頭上的反國家罪，上訴也推翻不了。因為他在德國集中營的時候，德國人叫他翻譯，他照辦了。所以，1945年審判他的時候，即使把他戰時的表現綜合考慮在內，仍然會被定罪，只不過刑期會短一些而已。戶口本上仍然會注明：此人曾被判刑。

關于扣在他頭上的罪名，列夫現在不是一概否認了，而是部分否認。這是個新的想法，以前他可不是這么想的。以前（1946—1947年），他倆商量過是不是要上訴。斯維塔建議，應該爭取把這個判決推翻掉。當時，列夫還沒有部分認罪的想法，也沒有用這個想法來反駁斯維塔的建議。或許，多年的勞改已經把他的棱角都磨平了，到頭來，逆來順受，蒙冤也不做聲了。勞改營肯定給他開了眼界，讓他認識到，原來，他的處境沒什么特殊的，很多人都像他一樣慘。5月10號，列夫向斯維塔解釋說：

我要是覺得，自己作戰有功，配得上作戰英雄的稱號，或者至少應該榮獲獎章，那我就會申請復審了。但是，這話連我自己都不信。相反，我也覺得自己有罪，只是沒有（判決書上寫的）那么嚴重罷了。如果起訴書里寫的一切都對，并且得到了全面、正確的審理，那么我可能會被判五年，或者三年，或者更輕。但是，還是有點兒事兒的，有事兒就有“連帶的一切后果”。所以不能要求做沒事兒處理。沒事兒的處理，怎么處理呢？根據什么呢？你看，對于很多人來說都很難辦。但是，因為大家都覺得難辦，就對每一個人都網開一面，這是辦不到的。如果只對一個人網開一面，為什么那個人應該是我呢？我也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非選我不可呀。因為我能做更有趣、更有益的工作么？其實，我覺得，我就做我現在這個活兒（電工）最有益了，讓我搞科技，還不如當電工用處大。做科研工作，我就更研究不出什么名堂來了。當科學研究人員，這輩子算甭想了。要說當個普通技術員，還可以。

到這個時候，斯維塔也想開了，列夫釋放后，他倆很可能還得分居兩地。分居，她也認了。既然列夫進不了莫斯科，只好聽天由命，兩地分居了。闊別這么多年，好不容易出來了，還得分居兩地，斯維塔真接受不了，可是父母離不開她，得她照料啊。斯維塔想，列夫若能獲準在附近什么地方落戶，離莫斯科不太遠，那就萬幸了。5月2號，她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我早就想給你寫一封信，談談重要的事兒，可是一拿起筆來，我就犯愁了，寫不下去，只好擱筆。我愁的是，六個月以后，事情還是解決不了，咱倆還是不能在一起生活。試想，到時候，媽媽病情惡化了，爸爸又得了什么病，保姆要走，發生世界大戰，或者哪里又出了事兒什么的，而我又走不開，哪兒也去不了，只能偶爾去看看你。我真得做好思想準備。所以，我干什么工作都無所謂，考慮都不必考慮，只要離得近就行。哪里最近？我猜，加里寧最近吧。可是，越近，你越不好找工作。例如，亞歷山德羅夫很近，郊區通勤車都能到那里。可是，那里人才濟濟，什么專家都有，所以，工作肯定不好找。不過，咱倆將來要是生活在一起了，我的工作呢？這事兒也得考慮，不能忽略了……現在還不用馬上去想，眼下應該想更有趣兒的事兒：你的到來，咱倆的團聚，要離得越近越好，還要非常自由，不可以被工作綁住，想來也來不了，那就糟了。回來以后，你還要去見幾個人，把懸在你頭上的那些舊雨傘垃圾都清理掉[89](#__89)[1]。如果辦這些事兒一時沒法兒出去工作，那就先不工作，沒關系。幾個月沒工作沒關系，世界上這樣的人有的是，不光你一個……

斯維塔提到加里寧，列夫覺得這個主意不錯，非常感興趣。加里寧，原來叫特維爾，是一個外省城市，離莫斯科不遠，在莫斯科北邊，莫斯科通往列寧格勒的火車經過那里。其實，列夫也一直在考慮加里寧，他琢磨著，從伯朝拉勞改營出來以后，如果當局允許，也可以去那里落戶。列夫5月10號給斯維塔回信如下：

我也在考慮加里寧呢。不知道那里能找到什么工作，條件是不是和亞歷山德羅夫一樣。既然咱們現在只是初步設想，沒定下來，為什么只考慮一個地方呢，哪里都可以考慮嘛，只要有火車站就行。有火車，交通就方便了，別的都無所謂。你考慮加里寧，主要著眼點是什么？不管怎么說，我找一找，看這里有沒有特維爾人，問問他們，那里怎么樣。那地方很可能不錯，反正有伏爾加河，錯不了。不過，也麻煩，說不定人滿為患呢。

斯維塔提到加里寧，“只是隨便一提，沒有詳細說”。她聽說，那里要新建一個輪胎廠，于是琢磨著，說不定她和列夫都能在那個新廠找到工作呢，有可能。“那個城市正在全面發展，莫斯科的郊區電動火車很快就要通到那里了（鐵路線路很好，每天至少有六趟長途列車要經過那里）。加里寧距離莫斯科一百六十七公里，只要四個小時就到了。舒爾卡·亞歷山德拉·切爾諾莫爾迪克去年夏天去過那里，她說很喜歡那個城市。”

與此同時，斯維塔把沃羅涅日和雅羅斯拉夫爾兩地的工廠情況了解得更透徹了。她不喜歡雅羅斯拉夫爾那個輪胎廠：“太大了，進去以后走丟了，別人找都找不著。”如果列夫在那里找個工作，這正好，別人都不會注意到他這個曾經的勞改犯。沃羅涅日就不行了，會“更顯眼”。有弊也有利，沃羅涅日那個廠，專業技術人員少，所以列夫找工作比較容易。6月1號那天，斯維塔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我在家里隨便問了問爸媽，問他們愿不愿意搬到沃（沃羅涅日）去住。爸爸問：“為什么？”媽媽說：“不愿意。”這是我自己的事兒，不知道怎么和他們講，所以就沒往下說。何必讓他們著急呢。這個事兒，不必馬上定下來，“以后”再說，先不著急。

斯維塔參照火車時刻表，把目前要考慮的各個城市列出了一個清單，每個城市旁邊都標上了距離莫斯科有多少公里。她在表格的下面寫道：“看這些地方怎么樣。我的了解？一無所知。工廠和發電廠肯定哪兒都有。別的就不知道了，欲知后事如何，就用咖啡渣算命吧[90](#__90)[1]。然后，斯維塔把各個選項一一列了出來，以便選擇：

以下選項，可以考慮：

一、如果半徑小于一百公里，我可以住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工作，坐火車來看你，也可以和你住在一起，坐火車到莫斯科上班，晚上回家。半徑越小，這兩個方案就越方便。

二、如果半徑小于二百公里，但大于一百公里，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我繼續住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工作，我來看你。

三、如果半徑大于二百公里，還是可以住在莫斯科的，但是就不能那么經常來看你了。和你住在一起，同時繼續工作的話，雅羅斯拉夫爾就是最佳選擇了。如果選雅羅斯拉夫爾，還可以有如下的選擇：或者我爸媽繼續住在莫斯科，或者我把爸媽也隨遷過來（舒爾卡認為完全可行，但我想，媽媽不會同意）。半徑還可以再大些，但是，如果爸爸不想退休，還想繼續工作的話，那就還得選雅羅斯拉夫爾，或者沃羅涅日。我們住慣了莫斯科，把爸媽搬到外地，不知道值不值得……外省安靜，空氣比這里清新，莫斯科這里亂糟糟的，東奔西跑的。還是外省對他們更有利。但是，莫斯科食品供應比較好，藥品也充足（雖然舒爾卡說，嗎啡哪兒都有）。對我來說，最好的方案，肯定是大家都住在一起，這樣我就放心了，就不會崩潰了。如果分居兩地，我的蕁麻疹總也好不了不說，還會見人就看不順眼，非要把人家打個落花流水不可。住在一起還有一個好處：省錢。兩個家總比一個家費錢……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好。

斯維塔進退兩難，很是苦惱。一方面。要照料父母，這是做兒女的責任；另一方面，又想和列夫在一起。她左右為難，心情煩躁，非常郁悶。今后到哪里去住呢，愁得斯維塔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可是還有一個更擔心的事兒在后頭呢：將來和列夫生活在一起，日子會過得順心么？這一刻已經等了十五年了，眼看就要等到頭了，斯維塔疑慮重重，心里沒有底：

我現在大頭朝下，一頭栽進了泥坑里，在泥坑底下掙扎著無法自拔。想來慚愧，我沒好好學習，也沒盡好孝道，工作碌碌無為，只為自己奔忙，為上帝盡心了（別人侍奉上帝，肯定比我虔誠。如果將來上帝讓我升入天堂，那都是你的功勞）。萬一將來我賢妻良母當得都不稱職，那我只好上吊算了。我現在茶飯不思，夜不能寐。我害怕把媽媽一個人扔在莫斯科，除了這個擔心，還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如果相夫之道我也不會，那可怎么辦啊。說實話，我真有點怕呢。

列夫心里也很緊張，他也有他的疑慮。不過，他信不過的不是斯維塔：

斯維塔，親愛的，上吊大可不必，你這個小傻瓜！現在也不必茶飯不思、夜不能寐。你可真是妄自菲薄。你就做你自己就行了，別的，咱們都不需要。天下還有你做不好的事兒么？不管將來你的身手如何，你都將是一把好手。有沒有賢妻良母的持家之道有什么關系呢，沒有就不是賢妻良母了？你我之間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緣分，使我們彼此不離不棄，長相廝守，這是無價之寶啊……你不應該把母親一個人留在莫斯科。我也像你一樣，心懷恐懼。說真的，我是擔心我自己，不是擔心你。據朋友們說，根據他們的回憶，和我生活在一起，我這個人不容易相處。但是，我說你應該和你媽生活在一起，不是因為我這個人難以相處，而是擔心你爸媽：如果咱們把你爸媽扔在莫斯科，咱倆永遠都會放心不下的。我已經覺得對不起她了（不只是此時此刻，一直都有這種感覺），你如果為了我舍她而去，讓我這良心往哪里放？我暫時能想到的，就是爭取創造一種局面，我是說找一個地方，找一套房子，要你媽也能接受的，最終我們都住到一起。現在我們兩眼一抹黑，還能指望什么別的呢？

什么時候會被釋放，列夫也不知道。6月4號，他寫道：

我什么時候能離開這里，還陰影重重，不明朗。但是我已經開始尋思了，要把我的書一點一點兒地寄回家去。只是不知道往哪里寄。我有兩個行李箱，里面裝得滿滿的，都是各種各樣的書。我要整理一下，壓縮到一箱子半，分成小包寄出去。不知道出獄以后先去哪里，走到哪都拖著兩大箱子書太累贅了。但是分小包寄走，往哪里寄呢？寄到你家還是寄到尼基塔叔叔家？

六天之后，“前途如何，還是沒有確切消息”。釋放的程序如何，不得而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官方沒有發表聲明，也沒有簽署任何文件。獲釋出獄的人，今天辦這樣的手續，明天又辦那樣的手續。天天變，沒個準兒。

事情還在未定之天，列夫制定了一個臨時計劃，打算先去馬拉霍夫卡，去尼基塔叔叔家住，爭取把大學畢業文憑辦下來。他想，有了文憑，找個好點兒的工作，找個落腳的地方，能容易點兒，申請把戶口落在離莫斯科五十公里以內的地友，獲批的幾率就大了。

我要先住在尼基塔叔叔家，白天出去辦我的大學畢業文憑，得一步一步從頭辦起。然后找工作。當然，凡是期待我回來的人，我都要去看望他們。我原來下定決心，要自食其力，絕不去寄人籬下。現在，先別要這個強，過一個月再自力更生也不晚。做這么多年苦工，休一個月假，也不為過。這個理由也算合情合理。如果明年不死，還可以把債還清……過了這一個月，或者這一個月快過完的時候，如果還沒辦成（文憑沒辦下來，在莫斯科附近找工作也沒找到），我就去加里寧。反正我倆覺得哪里方便，我就去哪里。到那兒找個工作，再找一個屋頂、四面墻，然后就等著花好月圓的時候你來了。

6月7號，斯維塔的父親去希羅科耶（Shimkoe），住進了療養院，整個夏天都要在那里療養。十天以后又犯病了。斯維塔急忙趕到療養院陪他。雖然沒有癱瘓，但是非常虛弱，出現語言障礙，吐字不清。斯維塔給列夫拍了一張電報：“爸爸第二次中風，雪上加霜。稍見好。我現在住在希羅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Shimkoe Bologovskoe）。”列夫估計再過幾天就能被釋放了。這一天終于快到了，但是他怎么也高興不起來。要走了，心中有些傷感。各位難友，朋友一場，日后他會想念的，例如，斯特列里科夫，現在病魔纏身，列夫不忍離他而去。此情此景，列夫在他最后一封獄中書簡中詳細說給斯維塔聽。如果把過去八年寫的信編上總的序號，最后這封信就是第647封了：

1954年7月9日，第29封

親愛的斯維塔，電報收悉，今天又收到你29號的來信。希望明天還能收到你的信。亞歷山大·阿列克謝維奇（斯維塔父親名）身體怎樣？你母親呢？過去這個星期，我真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幫斯特列里科夫“還了舊債”，他各種各樣的指令、諾言，我都幫他辦了。說來有點兒奇怪，再過一個星期，我就要和老朋友離別了。心中有點兒舍不得，當然是舍不得這些人了，再不能和他們朝夕與共了，令人愴然。有些人還能再見面，可能不久以后就能再次相聚。對了，斯特列里科夫現在比我們大家都自由，可以隨意走動。所以，他心情好了很多。上兩個月，他掙的比平時多了三倍，首先是因為他各項計件工資都漲了。第二，有個車間主任休假去了，他現在臨時代理……

我在這里沒找到加里寧的人，不過沒關系。尼基塔叔叔家，如果只能住兩三天，不能多住的話，也沒事兒，我就去加里寧。還要在這里待多久，現在尚不清楚。再怎么也不會超過一星期。最近這里高溫，已經十多天了，昨天將近三十八度。我今天才第一次游了泳。

前天，我和尤施凱維奇在一起，我讓大夫給我敲了敲前胸后背，好好聽了一下，還是四年前收我住院的那位大夫。他說，我身體一點兒毛病都沒有，不用擔心。我完全同意大夫的診斷。我還沒給我姨媽寫信呢。明天我給尼基塔叔叔寫信。

保重身體，斯維特。

# 十二 終成眷屬

1954年7月17日，列夫獲得釋放。屈指一算，他在伯朝拉勞改了整整八年零四個月。當時被判十年勞改，由于1948年下來新規定，超額完成生產定額可以抵扣刑期，所以，列夫獲得抵扣刑期一年零八個月。為了給出獄做準備，列夫在廠里釘了兩個木頭箱子：一個裝衣服、床單和其他個人用品；另一個裝工具——鉗子、扳子、錘子、螺絲刀，將來不管是當技工，還是當電氣工程師，都是用得著的。列夫一手提一個沉重的箱子，走出了犯人宿舍區。終于自由了。

但是一下子還走不了。首先得去辦出獄證明，這個證明要經過內務部審核，得一個星期才能辦下來。等待期間，列夫住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家，在工業區里邊。1947年斯維塔來，列夫就是在這個房子里和她見面的。釋放前不久，列夫給斯維塔寫信，通知她來信寄到新地址：“信，暫時還像以前那樣，寄到這里來。但是，從下封信開始，最好寄到瑪利啞·亞歷山德羅夫斯卡婭那里。”

在伯朝拉最后這幾天，列夫一邊和朋友們一一告別，一邊收拾東西。尼基塔叔叔家住在馬拉霍夫卡。列夫把書打成包，寄到他家去，他家有地方放。列夫還到卡寧的市場去了一趟。卡寧也是一個勞改營，離伯朝拉不遠。他早晨去晚上回。那天，他還帶伊戈爾一塊兒去了。伊戈爾是亞歷山德羅夫斯基的兒子，十一歲了。這孩子生下來就在伯朝拉，長這么大，哪兒都沒去過。那天，天氣非常熱，去卡寧要走很遠的路。路上，伊戈爾頭疼了起來。到了市場，列夫給伊戈爾買了一個冰淇淋。伊戈爾從來沒吃過冰淇淋，這是頭一回吃。伊戈爾后來回憶說，“在伯朝拉從來沒聽說過這種美味”。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吃著，忽然有個小孩兒走了過來，穿得破衣爛衫的，纏著他不放，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手里的冰淇淋，好像在看什么神奇的東西似的。列夫可憐這孩子，把精打細算攢下的錢掏了出來，也給他買了一個冰淇淋。

出獄證書批下來了，列夫現在終于可以走了，可以離開伯朝拉了。他向朋友們最后一一告別，道完珍重，從木材廠的大門走了出來。木材廠，這個勞改營，別了！列夫提著那兩個木箱子，向左拐，走上了莫斯科大街，又向右拐，到了蘇維埃大街，這是勞改營的主要干道，路很長，橫貫全城，一直通到火車站，從木材廠走到火車站，一共四公里。進了火車站，列夫等著開往莫斯科的火車進站。這趟車是從沃爾庫塔開來的。這條鐵路線都是古拉格的勞改犯修的。內務部給了他一張火車票，拿著這張火車票，可以一直坐到加里寧。不去別處，去加里寧，為的是先找個住的地方。

列夫的第一個愿望就是先找到斯維塔。火車到莫斯科的時候已經深夜了。到處漆黑一片。列夫在雅羅斯拉夫爾站下了車，走到斯維塔家，不料，“窗戶都熄燈了”。列夫不想把大家吵醒。這時候，喀山站去馬拉霍夫卡最后一班車，快開車了。于是，列夫急忙趕到喀山站，上了車。那一夜是在尼基塔叔叔家過的。第二天早晨，回到莫斯科，來到斯維塔家門口，輕輕敲了敲門。1941年出發上前線，一晃兒十四年沒來了。此時此刻，也像當年一樣，是斯維塔的媽媽開的門。列夫回想當時的情景：“阿娜斯塔西婭（斯維塔媽媽名）自己也有病，她說，亞歷山大·阿列克謝維奇（斯維塔爸爸名）得了中風，現在療養院療養，斯維塔在那兒陪護呢。”列夫心中想象的場景不知在眼前浮現過多少回了，估計有百萬次之多吧：他敲了敲斯維塔家的門，斯維塔開門擁抱他。結果卻不是這樣。

列夫又回到火車站，坐車坐到波洛戈夫斯科耶。療養院在希羅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是離希羅科耶最近的火車站。下車以后，列夫徒步走了過去。列夫身上穿的衣服就是離開伯朝拉時穿的那身衣服，他面色蒼白，瘦得皮包骨，再加上大熱天坐長途車，風塵仆仆，一臉疲憊不堪，一看就知道是剛釋放出獄的犯人。療養院的醫護人員不停地打量他。列夫在病房里找到了斯維塔，她正陪著爸爸待著呢。斯維塔本來是想，這久別重逢的一刻只有他倆，沒有別人在場。六個月以前，她在信中寫道：“別后初見，不想有別人在場。”現在沒關系了：終于團聚了，團聚了就行，別的都不在乎。在見面后最初的這幾個小時里，亞歷山大是他倆關注的焦點。他倆坐在他的床邊。斯維塔的哥哥亞拉，這時候也到療養院來了，和他倆坐在一起。此時此刻，列夫覺得自己和他們是一家人了。五十多年以后，列夫回想起當時感人的一幕：斯維塔的父親躺在床上，坐不起來，招手叫列夫過去。列夫走過去和他接吻，他也吻了列夫。亞歷山大對列夫說，他有三萬盧布的存款，“給你和斯維塔”——這錢夠買一套房子了。他老人家的這片心意，列夫非常感動。他明白，亞歷山大已經同意自己和斯維塔的婚事了。

那天晚上，列夫在療養院給斯維塔的媽媽寫了一封信，仿佛已經是她多年的女婿似的：

親愛的阿娜斯塔西婭：

斯維塔叫我給您寫信，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您，寫這封信就是這個目的。首先，亞歷山大身體比我想象的要好。上次聽您說的情況，我沒想到他身體這么好……他興致很高，還開玩笑呢。思維清晰，記性特好，但說話還有點兒問題：發音有點不清楚，但是語句全都很連貫。如果他想強調什么事兒，就會把話說得有板有眼，非常清楚，但是一聽就知道，發音有點兒費勁兒。

斯維塔很可能累了，但表面上看不出來。我看她臉色挺好，但是不知道前些日子怎樣，所以無法比較。我們分到了住處：亞拉在第五別墅，走路一分半鐘就到。我現在和亞歷山大、斯維塔在一起呢。迄今為止，一切順利。

如果最終定下來，亞歷山大29號出院的話，到時候斯維塔就把他接回家……現在這里天兒有點兒涼，時不時地下一陣兒雨，但是我們不在乎，經常到戶外去。我和斯維塔出去想采摘一點兒紅樹莓（raspberry）來吃，但是樹林里地上浸了水，沒敢進去，所以只好散步了。我們走了一個半小時，欣賞著周圍的田園風光。

這個地方真漂亮。景色剛剛變了，令人耳目一新。即使不是現在這個時候來，照樣會令人心曠神怡的。情況就是這樣，該說的好像都說了，先寫到這里吧。

請保重身體，我們大家向你們致意。列夫。

三天以后，亞歷山大轉院了，轉到了莫斯科一家醫院。斯維塔陪爸爸一起去了。列夫動身去了加里寧，他必須去警察局辦理住處登記。剛剛團聚就又分開了，不過，大家心里知道，現在人都在一起了。

在離開伯朝拉之前，列夫找了個人，請他幫忙把戶口落在加里寧地區。這人是個司爐工，在車間里干活，他家在庫茲明斯克耶（Kuzminskoe），就在加里寧旁邊兒。他給了列夫一個地址，是個女人的家。他說，可以在她家暫住。庫茲明斯克耶是個破破爛爛的村子，有五十戶人家，還有一個荒廢的教堂，村子里有一條小溪，有個池塘，幾塊田地，走半個小時有個火車站，莫斯科到加里寧線上的火車在這里有一站。村子邊上有一個臟兮兮的小破房，房子旁邊還有一個小果園。這里住著瑪利婭·彼得羅芙娜（MariaPetrovna）和她的孩子們。列夫就是奔她大兒子來的，請他幫忙找個活兒干。

列夫到的時候，他不在：現在是秋收時節，他去集體農莊干活兒去了。列夫本來希望在這兒租一間房住，可是瑪利婭要租給他的那間實在是太臟了，列夫就沒住進去，暫時先在外面的干草棚里湊合湊合，準備日后再到別處找個地方住。8月1號，列夫寫信給斯維塔，把他的情況介紹了一番：

我很快找到了那位婦女。要幫我在加里寧住下的就是她兒子，當時沒在，去集體農莊干活去了，四五點才能收工回來。所以，明天我自己去辦辦看，爭取辦個護照[91](#__91)[1]等等。今天我去一趟加里寧，買點兒茶，給孩子們買點兒糖果，再給這家人買幾個湯匙什么的。這家的媽媽是卡累利阿（Karelia，與芬蘭接壤）人，大約五十到五十五歲。她那兩個小兒子，一個十八歲，一個十四歲。這家人不錯，就是不怎么收拾家，家務沒人料理。我這個人，經過這些年，什么都能將就了。可是，這兒，就連我也待不了，太臟了。不過，按照起碼的禮貌，還不能馬上就走，那就住三四天吧。過了這三四天，我得換個地方，搬到別的農家去住。單門獨戶的房間（記住，我們提出的條件，這一條最重要），你說根本找不著吧，倒也不是，但肯定是很難找。明天，我要把情況好好考慮一下。眼下，先在瑪利婭·彼得羅芙娜的干草棚將就一下吧……這個地方很單調，挺沒意思的，村子附近很無聊：平緩的山坡上種著莊稼，每隔一兩公里就有一個村子，人都面黃肌瘦的。村里有花園，我們這個村子也有，花園里有蘋果樹、櫻桃樹、漿果樹。當然還有菜園子了。櫻桃六七盧布一公斤，黃瓜二點五盧布。昨天他們給我吃的是烤土豆和黃瓜，今天是鵝蛋和牛奶。

沒護照，就找不了工作。列夫離開伯朝拉的時候，內務部還沒發護照。所以，他得向加里寧警察局申請護照。這可就難辦了：辦護照需要遞交一些文件，他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張出生證明。列夫去了一趟又一趟，花了很多時間。8月4號，他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為了走出這個惡性循環，昨天我直接去找當地警察局的護照科科長。起初他還不信，后來，我猜想，他看到我很為難的樣子，不像是說謊。批準護照的事兒，他們自己決定不了，得請示“莫斯科”。運氣還真不錯，一打聽，莫斯科有個代表，人正好在這兒。他們建議我去找他說說看。本來約好下午四點見我，可是我到那兒的時候，他和別人已經談上了，把我推遲到今天上午。現在是上午十點，我現在在中心郵局等著呢，到點我再去找他。情況就是這樣。

第二天，列夫搬出了干草棚，在附近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個房間。房東是一對老夫婦，姓羅欣。列夫希望，搬到這里就可以去村蘇維埃辦理居住登記了，有了居住登記就可以申請護照了。他給斯維塔寫信，談了這個情況：“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村蘇維埃。真是不可思議，這個村的村名居然是基督教福音書上的地名：以馬忤斯（Emmaus）。咱們得去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位鄉紳這么會開玩笑，給這個村子起了這么一個名兒。”于是，列夫就走上了通往以馬忤斯之路[92](#__92)[1]。到那一看，辦理護照的窗口已經關了，人家給他一個回執，叫他下星期再來。村蘇維埃主席是個女的，見他當過電工，立馬給他一份工作，叫他去當地一個小發電站干活。列夫想去的不是那里，所以沒要這個工作。他要去的地方是加里寧，打算到那兒去找個活兒干。

護照拖了很久也沒辦下來，非常耽誤事兒。列夫早就計劃去看斯維塔，可是護照的問題把他給拖住了。8月7號，他給斯維塔寫信說：

暫時還來不了，時間還得往后拖。我昨天給你打過電話（是個女孩接的），想盡快告訴你。護照“或許今天下午四點以后”能批下來，但是很可能還要等到辦護照的窗口下次開才能領到，下次開是星期二。然后還要拿到村蘇維埃登記，登記完了還要到警察局。警察局下次開可能是星期三，不是星期三就是星期六（相關的辦公室每周只開三天）。這么多繁文縟節，真是無聊。內務部派駐伯朝拉的那些白癡，該死。

列夫在庫茲明斯克耶也忙個不停。他很喜歡羅欣夫婦倆，但他是城里人，覺得他倆的農民生活方式有點奇怪，也很原始。而鄉下人大多都像這樣生活。列夫給斯維塔寫信描述了一番：

我的房東，這老兩口——彼得·庫茲米奇和馬爾法·葉戈羅芙娜——不認字，也沒有孩子。他們的木板房有幾個小套間，還有一個大房間，大約六米見方的樣子，房山頭有個小廚房。這家相對來說比較干凈，和原來那家比，堪稱非常干凈了。這里有一股氨水味兒——豬圈就在隔壁（豬圈和院子都在一個屋頂下），同時兼做廁所。這種布局，以前從來沒見過。很久以前，我聽過一首民歌，歌里唱到，特維爾的村莊都是這樣。過了二三十分鐘，鼻子就聞不到這個味兒了。這里又安靜，又寬敞，我寫字的桌子光線特別好（前邊有一個窗戶，左邊還有一個窗戶），房東性情也非常安靜。住在這里十分愜意。

老兩口讓我睡大房間的沙發床，一天三頓飯全包，每天十盧布：

一、早飯——和他們一起吃，午飯、晚飯也和他們一塊吃——土豆加黃瓜，農家干酪，茶。

二、午飯——還不知道吃什么呢。

三、晚飯——不是湯就是蕎麥粥，還有牛奶。晚上沒有茶。床單、被褥，他們都沒有；誰洗衣服，沒說。那位老奶奶很可能不會洗，都七十歲了，不去集體農莊干活了。那位老爺爺在集體農莊修理馬鞍子。他喝伏特加，抽煙，有肺結核。但是總的來說，人好像很不錯。我得給他們買幾把餐刀，再買幾把叉子，因為他們家只有一個茶壺，兩個盤子，幾個湯匙，別的什么都沒有。真是沒想到。

從庫茲明斯克耶到加里寧，才十二公里，列夫可以走著去。他去加里寧轉了轉，把在那里住的好處一一講給斯維塔聽。列夫認為加里寧是個“壯觀的”城市，廣場和街道都很漂亮，歷史建筑保養維修得很好。他給斯維塔寫信說：“就拿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來說吧，有些房子蓋得浮夸俗氣，一點兒品位都沒有。這里沒有那樣的房子。”但是，加里寧住房很緊張，公寓式的房子，基本上找不到。城里新來了很多人，全是剛剛獲釋的勞改犯，都看好了加里寧離莫斯科比較近，紛紛涌到這里來。這些人住在簡易旅館里，每天光是床位就要七個盧布。列夫想起斯維塔的爸爸給他倆的那筆錢，心里琢磨著買個房子要多少錢。

加里寧郊區的房子，買個極小的房間都要一萬四千盧布。由此可見，三萬盧布是買不了總督府的。加里寧，最好看都不要看，試試雅羅斯拉夫爾吧，或者沃羅涅日。如果真想買，你爸爸不妨親自來看看，不用急，慢慢來。最近，村里有人買了半個農舍，得修理才能住，修理的費用要自掏腰包，他花了一萬盧布，還覺得便宜呢。

斯維塔最近出差去雅羅斯拉夫爾檢查工廠工作。她給列夫寫了一封信，從中可以看出來，這座伏爾加河上的北方城市，前景不容樂觀：

要說找工作，現在可不是好時候——到處都要減人。這兒的管理人員裁掉了百分之十二……列夫，別往心里去啊。你的信里也說，你一詢問，他們問都不問，就只答復一句話：“我們不需要人。”這種情況，即使還要拖下去，也不要灰心喪氣，否則，看你那樣，我自己也要沉淪下去了。



羅欣夫婦

以馬忤斯村蘇維埃，列夫沒白跑，8月底，終于拿到了護照，加里寧地區的居住許可也辦了下來，有了居住許可，就可以找工作了。但是護照上蓋了一個印：“第39條”。這就是告訴未來的用人單位，此人是刑滿釋放人員。列夫找工作去過二十多家工廠，問過不少建筑工地、學校，還去過劇院、博物館。各處的答復都一樣：“我們什么人都不缺。”找了三個月，啥工作也沒找著，列夫心情非常沮喪。11月23號，他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斯維塔，過去這二十四個小時，我去過九個地方找工作，其中三個或許還有一絲希望。今天只收獲了這一線希望，沒收獲別的。我去過貿易學校、紡織培訓學院、紡織廠[93](#__93)[1]、針織廠、絲綢紡織廠（廠名為無產階級絲綢紡織廠）、加里寧建筑材料實驗室，還去過印刷廠的建筑工地，全都沒戲。其中有三個地方讓我過些天再來打聽，看有沒有活兒：伏羅希洛夫紡織廠需要一名熱能工程師，沃羅達爾斯基服裝廠有一個化學處理工程師（工頭）的職位空缺，如你所知，這正是我過去這一年半“最拿手的活兒”。這兩個地方都在減人，是不是用他們現有的員工來填補這兩個空缺，他們也說不準，所以他們要研究研究，明天給我答復。還有一個地方是工業培訓學院的函授部，教理論力學和高等數學的教師一直在向函授部主任抱怨，說他們工作太累。那位主任打算查一查，看看這兩位教師的真正目的是不是想要減少課時，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減少的課時，他就推薦讓我來上。但是，泛泛地抱怨工作太累，那是說說而已，真給他們錢，他們還能不要？所以，周一（或周二）我給主任打電話，問問他談判談得怎樣，不過，估計沒什么戲。目前情況就是這樣。

到頭來，列夫徹底放棄了，工作找不著，干脆不找了。倒是斯維塔有辦法，她托列夫爸爸的朋友，莫斯科大學聲學教授謝爾蓋·勒熱夫金（Sergei Rzhevkin）幫列夫找到一個當翻譯的活兒，不固定，有活兒就干。原來，莫斯科有個期刊《物理學》，需要把德文、法文、英文的文章翻譯過來。這些語言，列夫有的是上學的時候學的，有的是在勞改營里練會的。勒熱夫金教授和這家期刊的人很熟，翻譯這活兒就是這么找到的。要翻譯的文章，一般是由斯維塔拿到庫茲明斯克耶，譯好以后再拿回莫斯科。斯維塔住的那棟樓里有個鄰居有打字機。斯維塔借用他的打字機，把拿回來的文章打出來，交給勒熱夫金教授。然后，勒熱夫金教授把稿件交給期刊編輯部，假裝是他自己翻譯的，然后把稿費交給斯維塔，斯維塔再轉交給列夫。刑滿釋放人員是不準在莫斯科工作的。如果被人發現是列夫翻譯的，上面肯定會怪罪下來，也會傳得滿城風雨。過了不久，列夫也寫書評，寫文章。然后，勒熱夫金簽上自己的名字，交給編輯部發表，當然，稿費一律歸列夫。

列夫常來莫斯科看望斯維塔，每次來一般會待上幾天，有時會待一個多星期。他沒有公民權，不可以到莫斯科來；他護照上蓋的那個印章[94](#__94)[1]，目的就是不讓他進莫斯科。如果被警察逮到，就會被驅逐，還有可能被送到勞改營勞改。一想到要進莫斯科，列夫就非常擔心。但是一想到莫斯科有斯維塔在，斯維塔可以為他撐腰，心里就覺得安慰。8月份，列夫臨來之前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

斯維塔，有時我在人多的地方，在大街上，會突然緊張起來，我就設想你在我身邊，這一想，馬上就挺起了頭，局促不安的感覺也沒了，一切都變得簡單、容易了。

見到莫斯科，列夫有什么感想呢？已經十三年沒見到莫斯科了。十三年來，列夫每時每刻都在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回來。在勞改營的時候，列夫遇到莫斯科老鄉總是津津樂道莫斯科的方方面面，每次斯維塔來信談到莫斯科，列夫都非常高興。列夫做夢都夢見莫斯科。回想起剛回來那天，莫斯科好像并沒有變化得這么大似的。路上小轎車多了，地鐵里人也多了，人們穿的也比以前好了，其他方面沒什么變化，還像他二十四歲以前那個“昔日的莫斯科”一樣。

到了1954年年底，列夫基本上都是住在斯維塔家里。白天，斯維塔上班，列夫就在家里翻譯文章，照看斯維塔的媽媽。她老人家現在肺結核到了晚期。斯維塔的爸爸也在家，也需要人照顧，所以斯維塔雇了一個保姆，保姆晚上睡廚房。家里沒別的地方睡，只能睡廚房。斯維塔的哥哥現在列寧格勒。列夫睡他的房間。斯維塔和父母住在一個房間里，夜里好照看母親。

1955年1月28日，斯維塔的母親阿娜斯塔西婭去世了。她彌留的時候，列夫在她身邊。當時，她躺在床上，列夫把她抱高一些，讓她更舒服點兒。列夫抱著她，就像多年前列夫出發上前線那天，她擁抱列夫那樣。忽然，她說謝謝你了，上帝。”這是她最后的話。

列夫在莫斯科算是非法逗留，所以，他平時很小心，盡量在樓梯上避開鄰居。雖然有的鄰居比較可靠，知道他的事兒也有好幾年了，列夫覺得還是盡量避開為好。街上有警察，列夫也得躲避。這可不容易。有些地方，列夫從學生時代起就去慣了，習慣成自然，現在動不動就橫過馬路往那兒走。可他不知道，橫過馬路有時候是違反交通法規的（戰后，莫斯科新的交通法規很嚴，不看信號燈，亂過馬路是違反交通法規的）。他外出的時候，身上從來不帶護照，怕路上遇見警察，一查就漏了。為防萬一，他就帶一個空兜子，里面放一張購物清單，身上帶著錢。一旦遇上警察，就可以說住在拐彎兒那里，下樓去商店買東西的。有時候，他在購物袋里放一瓶伏特加，作為道具，遇到檢查，就可以說，家里來了客人，出來買酒招待客人的：這么一說，可信度就增加了，也好讓警察有個沒收的東西，把酒沒收了，就會放他走了。就這樣，一直都很順利。突然，有一天，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個警察，說有個人住在這里，但沒有居留權，問這人是誰。列夫當時在廳里，一聽門口的對話，準備撒丫子就跑。原來，有驚無險，警察查的是保姆。保姆確實沒去派出所登記。事情解決了，列夫松了一口氣。

1955年9月17日，列夫有了好消息。凡是戰時勾結德國的蘇聯軍人，蘇聯政府宣布一律大赦。不久前，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來莫斯科訪問，吁請蘇聯釋放囚禁在勞改營里的德國人。他走后一星期，蘇聯突然宣布大赦蘇軍囚犯。原來，勞改營監禁了九千名德國戰俘。當年，蘇聯援引刑法第58條，宣布這些德國戰俘犯了“反人類罪”，判處勞改。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為了改善與西德的關系，命令將在押的這九千名德國戰俘全部釋放。德國人是當年的敵人，現在都放了，而本國的所謂“通敵者”卻還關著不放，那就說不過去了。于是很快擴大了大赦的范圍：凡是像列夫這樣的蘇聯軍人，按照第58條以“背叛祖國罪”而被判勞改的，一律大赦，免于處罰。

對于列夫來說，大赦意味著一切——除了政府給他正式平反昭雪，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意義。作為合法居民，他可以回莫斯科了。

護照清白了，他就可以找工作了；可以和斯維塔結婚，開始新的生活了。蘇聯《消息報》宣布大赦后的第二天，列夫立刻去以馬忤斯蘇維埃，讓他們把護照上蓋的那個“第39條”的印抹掉了。他現在的身份又恢復了被捕前護照上的法律狀態，在劃掉“第39條”印鑒的那頁上，標出了戰前護照的號碼，并且在號碼旁邊記述了更正的原委。原來的判決取消了，檔案記錄里沒有了前科。如果列夫和斯維塔登記結婚，現在就可以公開地住在她家了。他倆原來的打算就是，什么時候能夠合法地生活在一起了，再結婚。

1955年9月27號那天，他倆登記結婚了。兩人都是三十八歲。沒舉辦婚禮，斯維塔沒披婚紗，列夫也沒穿禮服，沒邀請嘉賓，也沒有證婚人。他倆連結戒指都沒有。列夫和斯維塔僅僅是拿了各自的護照，到當地的民事登記處登記而已。列夫記得，登記處是在一個“昏暗的地下室”里，他們倆就是在那里登記結婚，成為夫妻的。當局把每戶人家的家庭成員都列在一個表格里。這個表格就是每戶居民的姓名表。現在把列夫的名字也添了上去。當時，登記處負責給他倆登記結婚的是個女的，年紀不大。她知道，刑滿釋放的人，很多都把加里寧作為臨時落腳地，加里寧因此而出了名。她看到列夫的護照是加里寧的警方簽發的，于是明白列夫也是刑滿釋放的，上面還有那個劃掉的印鑒呢。她發現斯維塔要嫁給這樣一個人，這后半生不是要給他毀了么。她想，自己或許可以搭救斯維塔，于是就說：“建議您最好不要嫁給他。”斯維塔笑了，說：“不勞駕您費心啦，快把他的名字登記上去吧，他是我丈夫。”

列夫和斯維塔回到家，告訴她爸爸，他倆已經辦完了結婚手續。亞歷山大說道：“讓我吻吻你們倆吧。”列夫回憶道：“我們結婚只是做了登記，得到爸爸的一個吻，沒有任何慶祝。”但是，后來親友們還是帶著結婚禮物來了，食品放在桌子上，大家舉杯為新人祝福。沒有男儐相致辭，但幾天以后，斯特列里科夫來向新婚夫婦道喜，他來道喜最合適了，是他救了列夫的命。

1954年11月，斯特列里科夫獲得釋放。這個老布爾什維克原來被判了二十五年，實際被關押了十六年。這時，勞改營改為工業企業，歸交通運輸部管轄。斯特列里科夫決定繼續留在木材廠工作，當了副廠長。副廠長的工資相對較高。斯特列里科夫不住在實驗室里了，他搬進了蘇維埃大街上一座樓房里。房子不是獨門獨戶，是幾家合住的。他在里面有一間房，但他沒把書搬進來，書都放在工業區里面的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家里了。列夫和斯維塔結婚的時候，斯特列里科夫正好在莫斯科看他女兒瓦麗婭和七歲的小外孫。這孩子，他還從沒見過呢。

斯特列里科夫來看列夫和斯維塔，他說：“列夫，幫我出出主意。我要給一個人送件禮物。你有藝術眼光，可以幫我挑選。”莫斯科市中心高爾基大街旁邊有一條小巷，名叫斯托列什尼科夫胡同（Stoleshnikov Pereulok）[95](#__95)[1]。這里有一家古董店。斯特列里科夫把列夫領到這里，請他幫忙挑選一套盒裝鍍銀的餐具，給朋友作為禮物。這朋友叫什么名字，他沒說。列夫還沒來得及挑選，斯特列里科夫已經看上了一套銅鎳合金的餐具。仔細一看，陳列出來的餐具，這套最貴，并且貴出很多。列夫建議他買個便宜點兒的。好不容易掙的錢，列夫不想讓他白白浪費了。但是，斯特列里科夫別的都沒看上。他向店員付了款，然后轉身對列夫說：“這是給你和斯維塔的結婚禮物。”

列夫和斯維塔的夫妻生活開始了。斯維塔繼續在研究所上班，列夫到處找工作。雖然有了大赦，但是用人單位疑心未減。列夫在莫斯科遭遇的歧視不亞于加里寧。列夫走了一家又一家工廠、研究所，全都被轟了出來。聽說莫斯科動物園要招一名電工，他跑去一問，也被人家回絕了。最后，一家做科學儀器的工廠聘用了他，讓他做工程師。招工廣告說，要招一名工程師，要有物理學專業知識。那老板見列夫是學科學的，大喜過望。列夫自曝被勞動教養過，那位廠長根本不在乎，徑直叫他去見總工程師。總工問他翻譯資料掙多少錢，然后出價超過了翻譯費：起薪每月六百盧布。工人工資，一般也就這么多。斯維塔的工資幾乎是工人工資的兩倍。和斯維塔的工資合在一起，還是夠活的。

列夫和斯維塔住在卡扎爾梅尼胡同她爸爸家里。新婚夫婦和她爸爸都睡在那個大房間里，以便夜里照看他。斯維塔的父親身體漸漸恢復了一些。退休以后，讀了很多書。列夫和斯維塔白天上班，他就屋里屋外地做家務。他們相處得非常融洽。列夫從童年到現在，第一次體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或許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1955年12月，斯維塔三十八歲生下一個女兒，隨她母親的名字，也叫阿娜斯塔西婭，昵稱納斯佳。1957年1月，他們生了一個兒子，隨列夫叔叔的名字，也叫尼基塔。他倆大難不死，那么大年紀還生了兩個孩子，簡直是個奇跡。

1945年，在德國魏瑪，經過蘇聯內務部反間諜別動隊整整一夜的嚴酷審訊，列夫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他夢見斯維塔穿著一身白色的連衣裙，跪在一個小女孩兒身邊。1949年，斯維塔到伯朝拉來看他，走后沒幾天，列夫又夢見了斯維塔，那個夢還是那么清晰，就好像在眼前似的。

1962年，在馬拉霍夫卡，列夫和斯維塔帶著孩子住在尼基塔的別墅里。有一天，他們穿過森林邊兒上的田野，向湖濱走去。列夫在前，斯維塔領著孩子走在后面，當時阿娜斯塔西婭六歲。列夫回憶說：“我走到森林邊上，又有了夢中那個感覺……轉身一看，看到斯維塔在我后邊，穿著一身白色的連衣裙，跪在地上給娜斯提啞摩挲衣服，那情景和夢中一模一樣——斯維塔在右邊，左邊是我們的小女兒。”

# 尾聲歷史的見證

2008年3月，我又來到莫斯科，這次來是來拜訪列夫和斯維塔的，我想認識他們。我想和他們錄制幾場釆訪。他們的通信很難讀懂，連俄國人都不容易看懂，信里有各種各樣的細情、暗語、字母縮寫、隱藏的含義，只有他們本人才能解釋清楚，所以我想問個明白。

列夫和斯維塔的家住在莫斯科西南郊，那個區，名叫亞謝涅沃區，是一個以住宅為主的區。伊琳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是俄羅斯“紀念碑”歷史教育與人權組織的工作人員。我跟著她走進一個大樓，上到十四層。一出電梯，迎面見到列夫·格列勃維奇，他早在電梯口等著了。只見他身材瘦小，飽經風霜的臉龐和藹可親，一身衣裝干凈利落，淺藍色的襯衫，灰色的褲子。他先用英語結結巴巴地做了自我介紹，然后彬彬有禮、自然大方地領我們走進屋里。列夫已經九十一歲了，但是腿腳很利索。過道很窄，他把家具挪開，騰出地方好讓我們的器材能過去。我一看，他很有勁兒。在這個小廚房里，我們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廚房的窗戶望出去，只見莫斯科一幢幢混凝土大樓和工廠的煙囪。為了招待我們來訪，塑料貼面的桌上已經擺好了面包、香腸、糖果和餅干。列夫告訴我們，他叫孫子出去買面包去了，讓他再多買點兒。他怕我們不夠吃——從勞改營里出來的人，以前我們也釆訪過，他們都擔心東西不夠吃。

大家坐定之后，列夫就說，他去把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接出來。這樣稱呼斯維塔是相當正式的，我聽了有點兒吃驚。我還以為這是他紳士風度，喜歡用老式稱呼呢。后來我才明白，斯維塔是他的救命恩人，這樣稱呼斯維塔，其實是尊稱。不一會兒，列夫就和斯維塔一起出來了，不過，斯維塔是坐輪椅出來的。列夫推著輪椅進到廚房來。他操縱自如，十分熟練，一看就知道他多年來精心護理，所以才練得這么麻利。斯維特拉娜已經病了很長時間了：心臟病，加上一連串的小中風，已經走不了了。斯維塔滿頭白發，戴著厚厚的眼鏡，顯得非常老，但是說起話來，立刻談笑風生，妙語連珠，俏皮的藍眼睛顧盼生輝，炯炯有神。

斯維特拉娜1972從研究所退休，六年以后，和列夫搬到亞謝涅沃區來。當時這里還是一個新郊區，地鐵還沒延伸到這兒。他倆和女兒住在一起。女兒長期患有雙相抑郁癥，不能工作。兒子尼基塔是一位醫學研究人員，后來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也搬進了父母這棟樓，他們住另一個單元。

當年，列夫擔心，自己這一輩子恐怕永遠也不會有搞科研的那一天了。其實，他后來真的東山再起，又回到了蘇聯的物理學界。戰前，列夫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有個朋友，名叫納烏姆·格里高洛夫。1940年的時候，由于他的推薦，列夫才得以進入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列夫進勞改營以后，納烏姆還給列夫寫過信。納烏姆是黨員，給勞改犯寫信可是犯大忌的，會招來大禍。1956年，納烏姆剛被委任為莫斯科大學核物理科學研究所所長。這個研究所下面有個宇宙射線實驗室。應他的邀請，列夫來到該實驗室工作。列夫在這兒一干就是三十四年。列夫幫助設計、安裝設備，把實驗數據記錄下來。但是，對于列夫來說，起步實在太晚，科研生涯是不會出成果了。從列別捷夫研究所出來以后，荒廢了這么多年，這期間，亞原子粒子領域的研究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列夫跟不上了。

列夫關注的焦點是家人。他和一般人不一樣，在卡扎爾梅尼胡同住的時候，他買菜、做飯、洗衣服、帶孩子。斯維塔爸爸有病，列夫一直護理他，一直到1962年她爸去世為止。家里，斯維塔說了算，日常的大事小情，都由她定奪。但是大事兒，她還是聽列夫的。

在如何撫養孩子這點上，他倆的看法是一致的。這件事，他倆在信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兩人的人生經歷凸顯了共同的價值觀念。據尼基塔說，他爸媽不像一般父母那么嚴厲。“他們并不想控制我們的行為。”但是，全家人都嚴格遵守道義原則：

我父母有極大的道德權威，在他們的熏陶下，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都能管好自己：我們知足常樂，學會了像他們那樣看世界。他們又有身教又有言教。身教是以自身為例來教育我們；言教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說，不隱瞞，又不傷我們的自尊心。尤其是我爸，他總是盡量和我們在一起，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講給我們聽，并對各種環境下人們的所作所為，一一做出評價。

今天回過頭來看，父母的熏陶肯定對我們都有教益。他們的價值觀念是在親身經歷中形成的，有時難免也向我們灌輸，要我們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念去生活，用他們的價值觀念塑造我們的思維。他們的教育觀點比較嚴厲，我們長大了，有些話可以不聽。教育孩子是不容易的，很難說什么好什么不好。

我爸我媽有一個大優點，他們總是想聽我們的想法，幫助我們糾正錯誤，不是動不動就懲罰我們。全家氣氛好，彼此絕對信任，如果有誰說了一件什么事兒，大家都覺得說得對，是那么回事兒（也就是說，深信不疑）。懷疑家人的話，包括我們的話，那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從來都不擔心，父母會因為我們說了什么話而懲罰我們，也不擔心他們會不相信我們的話。但是他們的眼力特厲害，我們都逃不過去。

列夫和斯維塔給孩子們講述自己的往事，什么都講，沒有顧忌。斯大林當政時期大逮捕，受害的人家從此噤若寒蟬。像列夫他家這樣暢所欲言的，實在是少之又少。就拿利特維年科和里列耶夫來說吧，他們就不給孩子們講勞改營的事兒。像千百萬刑滿釋放的勞改犯一樣，他們也不想讓孩子知道實情，怕自己“被糟蹋的履歷”不光彩，成了孩子終生的心理負擔。學校給孩子洗腦，叫他們相信確有“人民的敵人”。所以，當父母的，出于自我保護的心理，也不敢和孩子述說自己的身世，害怕孩子真把自己當成“人民的敵人”，那可就慘了。列夫和斯維塔可不這么看。他們覺得，隱瞞實情，把女兒阿娜斯塔西婭和兒子尼基塔蒙在鼓里，這可不對。孩子將來勢必會遇到這些難題，何不未雨綢繆，先讓孩子有個心理準備。斯維塔早就說過，光有愛是不夠的：“這個世界多半會永遠殘酷下去，人必須要有生存的能力才行。”

小時候，尼基塔聽父母講過去的事情，幼小的心靈沒認識到問題的嚴峻，以為很正常，沒什么特別的。等長到十七八歲的時候才明白過來，父母的故事是多么難得。但是他時刻記得，父母的經歷，除了在親朋好友之間，對誰都不講，在學校也不和別人提。“我從小就知道，我們有兩種生活：一個是在公共場合的生活，一個是和家人在一起的私人生活。一個外面，一個家里。兩者都得有，又要分清楚。”

一樁樁往事，主要是列夫在講，斯維塔不愿意細說。列夫為斯維塔感到自豪。他總愛念叨，斯維塔等了他那么多年，真不容易。列夫說這話，主要是給孩子們聽的，讓他們明白，媽媽是多么偉大。雖然有時候媽媽累了、心情低落了就愛發脾氣，首先拿孩子撒氣，但是爸爸的意思是說，不管怎么說，媽媽是偉大的母親。

人生的經驗教訓，他想傳授給孩子們。尼基塔回憶道：“我爸不給我們講古拉格的暴行，但是他愛給我們講遇事應該怎么辦，應該有什么樣的指導原則，以勞改營里的真人真事為例，給我們現身說法。首先，永遠不要自嘆命苦，為了讓我們記住這條原則，他就給我們講勞改營難友的例子：那些人真堅強，受了苦，咬緊牙關，從來不怨天尤人。第二個原則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哪怕只是臨時的暫住，都要做長久打算，就仿佛要在那里永久定居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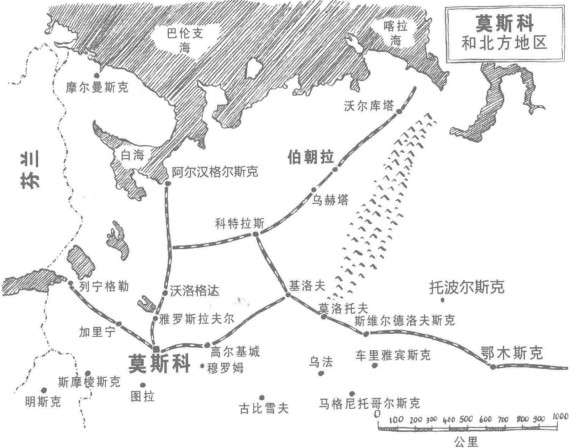
當年的勞改犯，到家里來看望爸媽的有很多很多。他們的家門永遠向伯朝拉的朋友敞開著。尼基塔和阿娜斯塔西婭也從他們口中了解到勞改營的情況。在勞改營建立起來的交情世代傳承，把蘇聯各地的家家戶戶聯合了起來。米申科（列夫的姓是米申科）這一家人，到列寧格勒就會住到里列耶夫家里，到基輔就會住到利特維年科家里，到利沃夫就會住到德爾列茨基家里。這幾家人來蘇聯首都的時候都會住到米申科家里。里列耶夫放出來的時候是三十三歲，他考上了列寧格勒工學院[96](#__96)[1]，后來成為一名教師（仍在世）。德爾列茨基后來上了利沃夫美術學院，成為一名雕刻家（1993年去世）。斯特列里科夫也和列夫保持著聯系，常來莫斯科看他。在尼基塔的記憶中，斯特列里科夫就是伯朝拉照片上那個樣子，只是老了：“他很有風度，精力充沛，白頭發，帶卷兒的，嘴上叼著煙斗。”斯特列里科夫1976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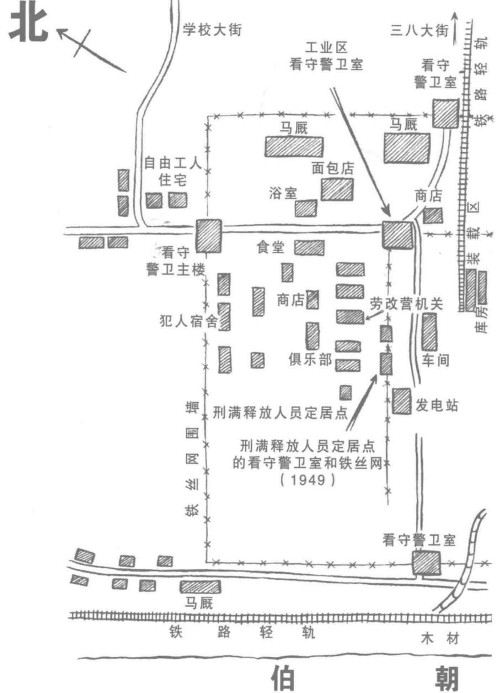
1990年，列夫從宇宙射線實驗室退休，那年他七十二歲。1998年，他寫了一篇勞改營簡記，把打印稿寄給了伯朝拉地區歷史博物館。當時這家博物館正在收集當年勞改犯的回憶錄。2006年，列夫出版了回憶錄《趁我還記得》，寫的主要是戰爭那幾年的經歷。這本書最后一章寫的是伯朝拉勞改營，內容和先前那個打印稿差不多，書后還有一個附錄，簡短記述了斯維塔當年來勞改營探視列夫的情景。俄羅斯“紀念碑”歷史教育與人權組織對列夫進行了一系列的釆訪，釆訪他戰爭期間的種種遭遇。2007年，夫婦倆把當年的所有通信都捐獻給了該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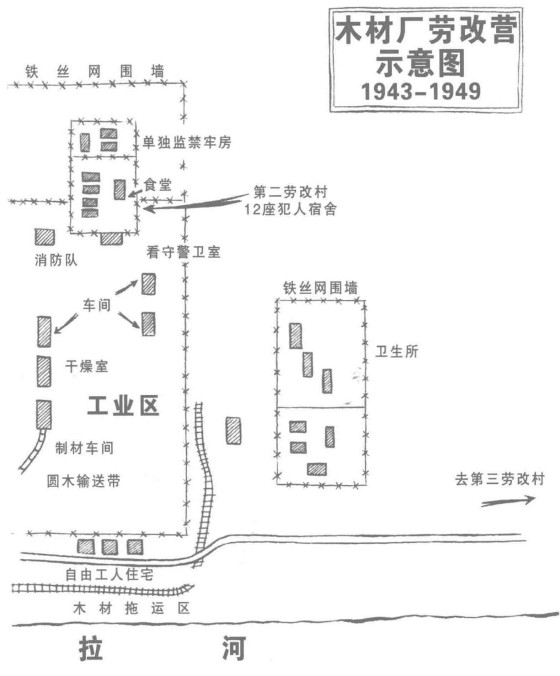
我們在他家釆訪了兩天，釆訪都作了錄像。列夫記性特別好，聽他講，往事一幕幕都記得非常清楚，他對歷史的反思極有見地。斯維塔的話比較少，但是她陪坐在列夫身旁，握著他的手。我問她，當年是什么使她愛上了列夫。她想了一下，答道：“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未來。他不在身邊的時候，我就會去找他。他總會出現在我的身旁。這就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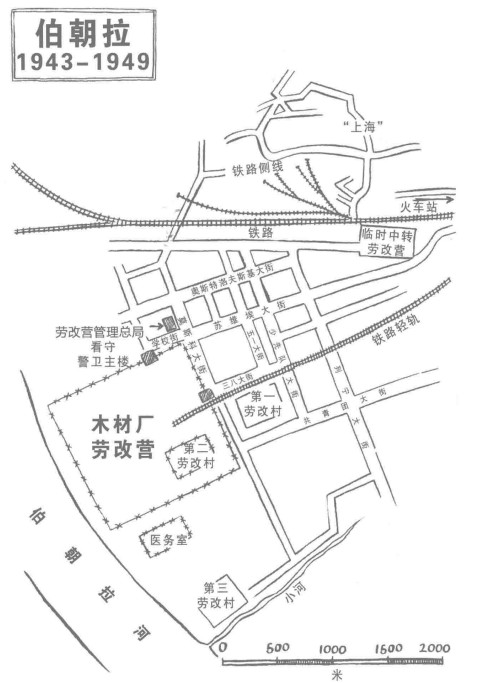
2008年7月18日，列夫·格列勃維奇與世長辭；2010年1月2日，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也溘然長逝了。兩人并排安葬在莫斯科格洛文斯克公墓。

1980年，一把大火把木材廠這個勞改營燒成了灰燼，誰都沒覺得驚訝，只有入口的大鉄門、發電站的紅磚煙囪還有幾個房子還在那兒立著。大火過后不久，蘇聯交通運輸部就下令清盤關閉。如今這里成了一片廢墟，只住了三兩個人，幾只野狗。









# 鳴謝

這本書其實是米申科全家人的作品。這是他們的故事，沒有他們的幫助是寫不成的。列夫·格列勃維奇，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他們夫婦倆從一開始就支持這件事。他們沒能活到本書出版問世的那一天，我很難過。他們的家人幫了很多忙，謹以此書獻給他們，聊表謝意。列夫的兒子尼基塔·利沃維奇（Nikita L'vovich）閱讀了俄文草稿，加了寶貴的評語，每一條都極有洞見。他的批評意見說得非常委婉、圓滑，很是感人。我也很感謝尼基塔的兒子伊里亞，女兒麗達和薇拉。他們三人當然都為爺爺奶奶而自豪。

“紀念碑”的高級研究員伊琳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啞為本書收集了很多材料，對本書的寫作幫了大忙。列夫和斯維特的信還沒被發現的時候，她就認識他倆了，并且已經和他倆合作很多年了。由于伊琳娜從中撮合，我才得以接觸他倆當年的通信。釆訪錄像大多是在伊琳娜主持下完成的，她是導演。這些信的轉錄也是伊琳娜帶人做的，她還寫了生平簡介，回答了沒完沒了的詢問。她還閱讀了我的俄文草稿，不厭其煩地改錯。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她都提出了異議。

我要感謝“紀念碑”莫斯科分部的阿廖娜·科茲洛娃（Alyona Kozlova）、葉蓮娜·熱姆科娃（Elena Zhemkova），感謝學術委員會各位成員，他們分工閱讀了草稿各章節。

我要感謝“紀念碑”伯朝拉分部主任塔季亞娜·阿法納西耶娃（Tatiana Afanas'eva），她犧牲了大量時間幫我找資料；我要感謝鮑里斯·伊萬諾娃（Boris Ivanov）。有關伯朝拉城區和木材廠，他提供了非常寶貴的信息。他幫我畫了一張圖，把第一營區外面那個懲戒性勞改隊的布局畫得巨細無遺，在此特別致謝。

我要特別感謝瑟克特夫卡爾（Syktykvar）的安東·尼斯科夫斯基（Anton Niskovsky）。他是科米共和國人民檔案館的研究員，幫我找到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其中包括“木材廠”和“伯朝拉勞改營”的官方古拉格檔案卷宗。

我欠了BBC（英國廣播公司）的情。BBC兩次帶著我訪問莫斯科：第一次是陪同BBC廣播制片人馬克·伯曼（Mark Birnnan）去的。我們在“紀念碑”辦事處第一次見到那幾箱子信的時候，他也在場；第二次是陪同本·劉易斯（Ben Lewis）和保羅·考克斯（Paul Cox）—塊兒去錄制釆訪的。我要感謝尼克·弗雷澤（Nick Fraser）投資做這個項目，感謝本·劉易斯極力提高大家對這個紀錄片的興趣。我還要感謝英國電影理事會（UK Film Ccnmcil），感謝它出資復制DVD視頻光盤，送給米申科夫婦和“紀念碑”。我尤其感謝塔尼啞·賽格哈茜（Tanya Seghatchian）的支持。她不知不覺地幫了我大忙。

利弗休姆信托基金會（Leverhulme Trust）資助“紀念碑”把列夫和斯維塔的通信抄錄了下來。我感謝基金會的慷慨贊助。

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朋友伊曼努爾·羅曼（Emmanuel Roman），他一直是我們這個項目的熱心支持者，也參與了資助。

我非常感謝尼基·布朗（Nicky Brown），他是一位有才華的譯者。這些信，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為我指點迷津。本書援引的信，是他先給我解釋清楚墊底，然后我才譯出來的。多謝他幫忙。我還要感謝包琳娜·海恩斯（Polina Haynes），感謝她把我的草稿譯成俄文（這樣，列夫和斯維塔、“紀念碑”才能查看我寫得對不對）。她譯得一絲不茍，效率極高。

我要感謝大衛·赫梅爾尼茨基（David Khmelnitsky）給我介紹蘇聯物理學界的方方面面；感謝艾米麗·約翰遜（Emily Johnson）把研究古拉格信件的成果與我分享；感謝安娜·羅特克齊（Anna Rotkkch）給我介紹談戀愛的門道；感謝黛博拉·卡普勒（Debomh Kapk）給我寄來她的《古拉格頭子》初稿。我要特別感謝羅德里克·布雷思韋特（Rodric Braithwaite）和黑宮廣昭（HiroakiKuromiya），他們通讀了我的初稿，并且做了寶貴的評述。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斯蒂芬妮（Stephanie）、伊娃（Eva）、莉季婭（Lydia）、艾麗絲（Alice）、凱特（Kate）、斯托夫（Stoph）——幾遍初稿，他們都讀了，或者聽了朗誦，他們的建議很有幫助。

感謝我的代理黛博拉·羅杰斯（Deborah Rogers）。像以前一樣，這次我又欠了她的情。這本書和我以前的書不一樣，換了題材。但是，她始終對這本書有信心，非叫我這么寫不可。感謝我的版權代理RCW，多年來，莫森·沙（Mohseti Shah）、史蒂芬·愛德華茲（Stephen Edwards）和勞倫斯·拉魯亞克斯（Laurence Laluyaux）全都棒極了。

我要感謝一直支持我的企鵝出版社編輯西蒙·文道爾（Simon Winder），感謝企鵝出版社的斯蒂芬·麥格拉斯（Stefan McGrath）、詹妮·弗莉（Jenny Fry）、瑪麗娜·肯普（Marina Kemp）、佩涅羅珀·沃格勒（Penelope Vogler）和責任編輯大衛·沃森（David Watson）；感謝“大都會圖書”的責任編輯羅斯林·施洛斯（Roslyn Schloss）。“大都會圖書”的薩拉·貝克特爾（Sam Bershtel）編輯本書費了很多心血，本人欠她的情最多。經過她睿智的點撥，嚴格的編審，這本書好看多了。

2012年1月于倫敦

# “紀念碑”按語

對于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學者來說，信件具有特殊的價值。私人家中保存的信，是生活經歷的實時見證，屬于直接證據，能讓我們進人寫信者的內心世界，一窺堂奧。通過信件，我們能夠以歷史事件為背景，跟蹤個人、家庭甚至幾代人的故事。寫信的人，生逢亂世的時候寫的信，就更加彌足珍貴了。

“紀念碑”收藏大量古拉格時期的書信——既有寄往勞改營的信，也有從勞改營寄出來的信。大多數的信是寄往勞改營的。對于囚犯來說，信，是把他們和“正常”生活連在一起的唯一一條線。收到的信，他們都留著，怕失去，釋放出獄以后像寶貝似的珍藏著。相比之下，從勞改營里寄出來的信，保存下來的很少。和犯人有聯系，信就是證據，留著非常危險。

這樣的信，“紀念碑”的檔案館里，各種各樣有很多。有的信只剩下了一頁，有的一頁都不到，只是撕下來的一角，其余的都亡佚了。也有的一共才有幾封信，再多的就很少了，寫信的前后跨度通常也就幾個月，充其量有一年的。能把通信雙方都找到，的確是極為少見的：若是真能找到，研究人員可就太幸運了。

所以，這么一比較，列夫和斯維塔長達八年半的通信，真是難能可貴，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些信一封不少，都完整地保存在“紀念碑”莫斯科的檔案館里，是已知的、與古拉格歷史相關的、數量最多的書信藏品。列夫在伯朝拉勞改營關押期間，他倆一共寫了一千二百四十六封信：六百四十七封是列夫寫給斯維塔的，五百九十九封是斯維塔寫給列夫的。

“紀念碑”是2000年開始結識列夫一家人的，當時他正在寫回憶錄。我們的研究人員很想詳細了解他的回憶錄，有很多問題想請教他。我們和他在一起暢談了很多次。他給我們講述了他的人生故事。在這些訪談當中，列夫常常提起這些信件，但他并沒有太重視，覺得這些信只不過是私人資料，大家不會怎么感興趣的。但是，列夫一邊寫回憶錄，一邊反思過去，漸漸地對自己的經歷有了新的看法，感到自己是20世紀厲史的見證人。到了2007年，他和斯維塔才打消了種種疑慮，決定fe家中保存的全部資料都捐贈給“紀念碑”，這里邊就有那些信，有的是寄往勞改營的，有的是從勞改營里寄出來的。

這些信，數量之大，質量之高，都是絕無僅有的。最了不起的是從頭到尾一封不少：第一封是列夫1946年7月12日從勞改營寄出來的，最后一封是他1954年7月9日從加里寧寄的。寫信的人很細心，每封信都寫明了日期，標上了序號，每年年初序號都從頭開始數起。寄出的每封信，列夫和斯維塔都記得一清二楚，收到后都告訴對方。

哪些信是通過普通郵局私自寄出來的，哪些信是通過勞改營官方渠道寄出來的，現在已經無從查考了：信上沒有獄方檢查蓋的印或簽注。這些信，大部分是偷偷直接寄出來的，躲過了獄方的檢查，但是，即使這些信也不能算是完全自由：寫信的人明白，有可能被當局截獲，這一點他們時時刻刻牢記在心。所以，有三種情況：一、有很多該說而沒說的話；二、有的話雖然說了，但沒明講，話里有話；三、有的話是暗示，指東說西。

列夫把宿舍地板撬開，把收到的信藏在里面再蓋上。這些信就是這么存放的。這些信是自由工人偷偷幫他帶進來的，攢多了，列夫就把信打好包，求這些自由工人代為寄回莫斯科，寄給斯維塔保存。

列夫從勞改營里寄出來的信分以下幾類：

一、講述勞改營里生活狀況的：犯人之間的關系·，犯人干的活兒；宿舍的條件；犯人和勞改營當局的關系；勞改犯之間各種仇隙、暗算、檢舉、誹謗。

二、講述勞改營里其他犯人的情況，寫他們的生活經歷，有不幸的遭遇，也有開心的事。

三、講述列夫自己的想法、情感：對什么感興趣，有什么煩心的事；列夫在科學方面的想法，關于工作的想法；列夫評說斯維塔寄來的書；列夫對勞改營外面事情的反應。

斯維特拉娜·伊萬諾娃（Svetlana Ivanova，即斯維塔）寄來的信，內容主要是：

一、她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情況，在職業、物質生活、智識、情感方面感到關切的事，再就是親屬、朋友的近況。

二、戰爭期間，她自己生活當中發生的事，和她關系近的人生活當中發生的事。

三、戰后那幾年莫斯科人的情況：疏-結束，從外地回到首都，物質匱乏；他們的工作狀況和業余愛好。

四、戰后莫斯科的狀況：新的建筑物、商店、市內交通、節假日、戲劇首演、新電影，等等。

五、公共活動以及她的參與。

列夫需要什么，斯維塔知道了馬上去辦。她不僅幫列夫，列夫的勞改營難友有困難，她也幫助。從她的信里看得很清楚，她有很多親友都向列夫伸出了援助之手。斯維塔寄到勞改營的包裹里有什么東西，信里都一一列了出來。她總擔心包裹會寄丟。看了包裹的內容，勞改營的情況，我們就知道了個大概。包腳布、內衣內褲、木梳、牙刷、枕頭、衣服、藥品、繃帶、針線、鋼筆鉛筆、書籍報紙，這些東西都寄到勞改營里去了。斯維特拉娜寄的東西有眼鏡、理科教科書、米、面，還有維生素。她來的信，里面常常夾著空白的信紙、信封、郵票，還說過，因為沒有箱子，所以東西沒能寄出來，非常抱歉。

看了斯維塔的信，蘇聯首都戰后的日常生活狀態，歷歷如目。每天發生的事情，信里都寫得很細，有共青團搞活動，有排長隊買東西、買火車票。看了信，我們明白了莫斯科的生活狀況，感受到了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那種氣氛。

斯維特拉娜之所以在信里要寫這些內容，是因為她深信，莫斯科發生的事兒都和列夫$其難友有直接關系，對他們都很重要。她遇事讓列夫給她出主意f有什么疑慮也告訴列夫，日常的大小事情都讓列夫參加進來，目的是減少列夫的孤獨感，讓他覺得正常的世界就在身邊，并沒怎么把他孤立出去。看她信里寫的，顯然她不是為自己一個人活著，而是為他們兩人活著。斯維塔告訴列夫，最近上演了什么新電影、新劇，談觀后感，給他講與朋友聚會的情景，還寫信告訴他莫斯科最近有什么新鮮事兒。她希望，看了信，列夫或許能忘憂于一時，暫時在精神上逃出勞改營鐵絲網的牢籠。日復一日地勞作實在太單調無聊，列夫看看信，也好散散心。

與此同時，勞改營里面發生的事情也成了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她盡力替列夫打氣，告訴他車到山前必有路，人都是否極泰來，不讓他悲觀絕望。

列夫和斯維塔來往的書信有好幾千頁，每一頁都充滿著愛，雖然字里行間很難見到愛這個字。在他倆的信里，浪漫的情感寫得很少。如果“敞開心扉”，對方聽了，心頭會沉重的。所以雙方都避免談情說愛。但是，有的時候，這些情感會禁不住傾瀉到紙上，令人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對男女戀人的信，他們在熱烈地相愛。

1947年，斯維特拉娜決定去伯朝拉看望列夫。她沒有官方的許可，但她還是要去。一個共青團員，居然要去看望一個被定了罪的“人民的敵人”。事情一旦敗露，前途就毀了，還會引起政治警察的注意。斯維塔既不是列夫的妻子，也不是他的親屬。警察已經盤問過她，威脅過她。去勞改營，路上不容易走，很危險：弄不好會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會被抓起來。去了能不能見到列夫，她心里也沒有底。但是，她還是去了，為他倆偷偷送信的那些朋友又幫他們非法地相會了。

斯大林主義體制的殘酷壓迫沒能把他倆壓垮。他們守住了愛情，鴻雁傳書，近十年不斷。雖然遠隔千山萬水，但是堅信將來一定會團圓。這心中唯一的信念支撐他們活了過來。應該把他們的信作為一部歷史劇來讀，作為兩大主角之間的對話來讀。你看他們兩人多么深情地傾聽彼此的訴說，能理解彼此最微小的暗示。劇中的這兩位主人公是不平凡的人，也是蘇聯社會的典型人物。在歷史學者看來，那幾個箱子里裝的是無與倫比的檔案瑰寶，揭示出一個深藏不露的情感世界，一個鮮為人知的人脈網絡。

國際“紀念碑”組織

伊琳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

# 資料來源

## 檔案

米申科一伊凡諾娃（列夫一斯維塔）的通信保存在“紀念碑”的莫斯科分部檔案館里。列夫（LM）和斯維特拉娜（SI）1946年到1954年寫的信按年份和序號排序（例如，SI46-20指的是本書引用的第1封信，是斯維特拉娜寫給列夫的，是她1946年寄給列夫的第20封信）。列夫和斯維特拉娜把所有的信都仔細地編了號。“紀念碑”檔案館用的編號就是他倆原來的編號丨沒變。他倆1941年以前的通信，是按寫信的人和日期排序的7例如，LM39-28.10）。米申科一伊萬諾娃檔案資料里的其他文件是單獨引用的。米申科一斯維特拉娜通信，從2013年起對公眾開放。

1.      
（“紀念碑”人權組織）伯朝拉歷史暨地區博物館[ArchiveofthePechoraHistorical-RegionalMuseum（Memorial），Pechora，俄文縮寫APIKM]

2.      
瑟克特夫卡爾，科米共和國人民檔案館[People’sArchiveoftheRepublicofKomi，Syktykvar，俄文縮寫GURKNARK]

3.      
圣彼得堡“紀念碑”人權組織檔案館[ArchiveoftheMemorialSociety，StPetersburg，俄文縮寫MSPj

## 訪談

亞歷山德羅娃，伊琳娜·弗拉基米羅芙娜（Aleksandrova，IrinaVladimirovna）（莫斯科，2008）

亞歷山德羅夫斯基，伊戈爾♦亞歷山德羅維奇（Aleksandrovsky，IgorAleksandrovich）（伯朝拉，2010）

伊萬諾娃，鮑里斯·鮑里索維奇（Ivanov，BorisBorisovich，伯朝拉，2010）

里列耶夫，尼古拉·伊萬諾維奇（Lileev，NikolaiIvanovich）（圣彼得堡，2004）

米申科，伊里亞.尼基第奇（Mishchenko，II’iaNikitich）（莫斯科，2008）

米申科，列夫.格列勃維奇（Mishchenko，LevGlebovich）（莫斯科，2006，2008）

米申科，麗達·尼基托芙娜（Mishchenko，LidaNikitovna）（莫斯科，2008）

米申科，尼基塔·利沃維奇（Mishchenko，NikitaL’vovich）（莫斯科，2008）

米申科，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Mishchenko，SvetlanaAleksandrovna）（莫斯科，2008）

米申科，薇拉·尼基托芙娜（Mishchenko，VeraNikitovna）（莫斯科，2008）

謝爾基托夫，尤利·佐第科維奇（Serditov，IuriiZorikovich）（伯朝拉，2010）

亞霍維奇，阿莉婭·斯捷潘諾芙娜（Yakhovich，AliaStepanovna）（伯朝拉，2010）

## 出版的著作和論文

阿普爾鮑姆，安妮（Applebaum，A.），《古拉格：一部歷史》（Gu知··Affistoiy）（倫敦，2003）

阿扎羅夫（Azarov，O.），《在冰原上，在鐵路旁》（Potundre，pozheleznoidoroge），《受難物語：懺悔錄》（Afardroiog：   
兩卷）（瑟克特夫卡爾，1999）

一博士論文《科米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內務部鐵路勞改營1938\_1959》[ZheleznodorozhnyelageriaNKVD（MVD）natenritoriiKomiASSR（1938-1959gg\_）1（瑟克特夫卡爾，2005）

貝京（Begin，M.），《白夜：一個俄國囚犯的故事》（奶―Ni沖rs：TheSforj’ofaPrisonerinRussia）（倫敦，1977）

布雷思韋特（Braithwaite，R.），《莫斯科1941：全市人民在作戰》（Moscow]CityandJtsPeopiearW！ar）（倫敦，2006）

齊瓦諾夫（Chivanov，V.），《伯朝拉注視著外來的訪客》（PechoraglazamiPriezzhego），刊于《回首往事》（V）妙；idyvaias’vpros/iioe）（伯朝拉，2009）

《國立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faA-W’tetMGLTVWi/coiOfechesfve/inofVoiny）（莫斯科，1975）

格里高利（Gregory，P.），《古拉格經濟學引論》（AnIntroductiontotheEconomicsoftheGulag），此文收于格里高利（P.Gregory）和拉扎列夫（V.Lazarev）合編的《強迫勞動經濟學：蘇聯的古拉格》（TT^eEcono/nicsofFarcec/Labour：T/ieSoviefGu/ag）（斯坦福，2003）

赫林（Herling，G.），《化外之地》（AWbWdZP/rt），英譯者：瑪瑞克（J.Marek）（倫敦，1986）

伊萬諾娃（Ivanova，G.），《勞改營社會主義：蘇聯極權體制中的古拉格》（LabourCampSocialism：TheGulagintheSovietTotalitarianSystem）（紐約州，阿蒙克，2000）

《有女懷春：從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到現今時期的俄羅斯女性詩歌》（Khochubyt9liubimoi：RusskniazhcnskaiapoeziiaotZolotogoiSt’rebr/a/ino^）veAa（fo c/nei  
）（莫斯科，2008）

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V.），《未完成的詩》（UnfinishedPoems），英譯者伯納德·米爾斯（BernardMeares），刊于《二十世紀俄國詩歌》（TVenfjefh-Onfun’尺ussfanPoetij），由葉甫蓋尼·葉甫圖申科（YevgenyYevtushenko）編選并導讀（倫敦，1993）

米申科（Mishchenko，L.），《趁我還記得》（PoA：aiapomniu）（莫斯科，2006）

《趁我還記得》（Pokaiapomniu），刊于《回首往事》（’v

pros/iioe）（伯朝拉，2009）

莫丘爾斯基（Mochulsky，F.V.），《古拉格頭子：一部蘇聯回憶錄》（Gii/咕Boss：ASovietMemoir），卡普勒（D.Kaple）編譯（牛津，2011）

莫洛佐夫（Mmrozov，N，），《科米地區的古拉格1929—1956》（GUhgnaKomi/o\*ae]929-！956）（瑟克特夫卡爾，1997）

《戰爭的莫斯科，1941—1945：回憶錄和檔案文件》

Z94U945：niernuaiyiar^iiiVayec/oioimenty）（莫斯科，1995）

《伯朝拉史：創造的歷史》（Pechomroi：Lstoriiasozdaniia）（伯朝拉，2000）

羅西（Rossii，J.），《古拉格參考資料》（Spravoc/HiiApoGL/LAGu），兩卷（莫斯科，〗991）

薩哈羅夫（Sakharov，A.），《回憶錄》（Memoirs），英譯者：R·勞荷（R.Lourie）（倫敦，1990）

謝羅夫（Serov，B.），《囚禁中的伯朝拉》（VPechorupodkonvoem），刊于《回首往事》（Vygiiacfyvaias’rprosii/oe）（伯朝拉，2009）

索科洛夫（Sokolov，A.），《蘇聯工業中的強迫勞動》（ForcedLabourinSovietIndustry），刊于P.格里高利（P.Gregory）和V.拉扎列夫（V.Lazarev）合編的《強迫勞動經濟學：蘇聯的古拉格》（TTieEconomicsofForcec/Labour：TheSoWetGu/ag）（斯坦福，2003）

《1939年人口普查：主要結果》（Vsesoiuznaiaperepis’nase/eniia1939goc/a：Osnovnyeitogi）（莫斯科，1992）

《回首往事》（Vygiiacfyvaias’vprosWoe）（伯朝拉，2009）

# 專有名詞對照表

Abez阿別茲

AgataRempel阿加塔·倫佩爾

Akhmatova阿赫瑪托娃

八leksandrGarden亞歷山大花園

AJeksandrA丨eksandrovsky亞歷山大.亞歷山德洛夫斯基

AleksandrAlekseevich亞歷山大.阿列克謝維奇

AlcksandraChernomordik亞歷山德拉切爾諾莫爾迪克

AleksandrGrin亞歷山大·格林

AleksandrIvanov亞歷山大.伊萬諾娃

AleksandrSemenov亞歷山大謝苗諾夫

AlelcsandrZlenko亞歷山大.茲連科 J

Aleksandrov亞歷山德羅夫

Aleksandrova，IrinaVladimirovna亞歷山德羅娃，伊琳娜.弗粒基米羅芙娜Aleksandrovich亞歷山德羅維奇Aleksandrovna亞歷山德羅芙娜Aleksandrovsky亞歷山德羅夫斯基

Aleksandrovsky，IgorAleksandrovich亞歷山德羅夫斯基，伊戈爾·亞歷山德羅維奇

AJeksdAndreev阿列克謝·安德烈耶夫

AlekseiAnisimov阿列克謝·阿尼西莫夫

AlekseiTolstoy阿列克謝.托爾斯泰

Alenka阿連卡

Alice艾麗絲

Alik阿列克

Alika阿利卡

Alka阿爾卡

Altai阿爾泰

AlyonaKozlova阿廖娜.科茲洛娃Anastasia阿娜斯塔西婭

八nastasiaErofeevna阿娜斯塔西規.葉羅菲耶芙娜

AnatolyShekhter阿納托利.謝赫特

AndreiSakharov安德烈·薩哈羅夫

AndreiVlasov安德烈‘弗拉索夫

AndriushkaSemashko安德留什卡·謝瑪什科

Anisimov阿尼西莫夫

AnnaRotkirch安娜·羅特克齊

A.nton\_Frantsevich安東.弗蘭釆維奇

AntonNiskovsky安東·尼斯科夫斯基

Applebaum，A.阿普爾鮑姆，安妮

Ashkhabad阿什哈巴德

Astrakhan阿斯特拉罕

AuntKatya卡佳姨媽

AuntOlga奧爾加姨媽

八zarov，O.阿扎羅夫

Barbiphen苯巴比妥（藥名）

Bashun巴舒恩Batumi巴統Begin，M.貝京

BellaLipkina貝拉.李普金娜BenLewis本.劉易斯Beryozovo博遼佐沃Bespalov別斯帕洛夫

nepecjiaB；ib-3ajieccKHft佩列斯拉夫爾-扎列斯基Blok勃洛克Bohr波爾

Bologovskoe波洛戈夫斯科耶

BolshakNikitskaiaStreet波爾沙雅·尼基茨卡亞大街Bolshoi莫斯科大劇院

BorisArvanitopuIo鮑里斯.阿爾萬尼托普洛

BorisGerman鮑里斯·赫爾曼

BorisGessen鮑里斯.蓋森

BorisIvanov鮑里斯·伊萬諾娃

Boriskovo鮑里斯科沃

BorisPopov鮑里斯.波波夫

BorisSerov鮑里斯·謝洛夫

BorisTolmachev鮑里斯·托爾馬切夫

Botrovitsky博羅維茨基

Braithwaite.，R.布雷思韋特

Breslau布雷斯勞

Buchenwald布痕瓦爾德

Buchenwald-Wansleben布痕瓦爾德一萬斯萊本

Bums彭斯

CarloRussi卡洛·羅西Catherine葉卡捷琳娜Caucasus高加索Chelyabinsk車里雅賓斯克Chivanov，V.齊瓦諾夫Crimea克里米亞

DavidKhmelnitsky大衛·赫梅爾尼茨基Dessau

Dnepropetrovsk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on頓河Donbass頓巴斯Dresden德累斯頓

EduardH丨adik愛德華·赫拉迪克Einstein愛因斯坦Eisleben艾斯萊本

EkaterinaTrubetskaya葉卡捷琳娜特魯別茨卡啞

ElenaRyvina葉蓮娜·雷溫娜

ElenaZhemkova葉蓮娜，熱姆科娃

Elizavera伊麗莎白姐

EmilyJohnson艾米麗·約翰遜

EmmanuelRoman.伊曼努爾·羅曼

Emmaus以馬件斯

Erevan埃里溫

EricR6dd埃里克.若德爾

Eva伊娃

HvgeniiBukk葉甫蓋尼.布克

[LvgeniiPreobrazhensky葉甫蓋尼.普蕾歐布拉申斯基

Fedor費多爾

Fcodosia費奧多西亞

FrankfurtanderOder奧德河畔法蘭克福

Fiirstenberg-am-Oder奧德河上的符騰堡

GeorgiiLiakov格奧爾基·利亞科夫Gibash吉巴什Gleb格列勃

GlebFedorovichMishchenko格列勃·費多羅維奇.米申科GlebVasil’ev格列勃.瓦西里耶夫GolovinskoeCemetery格洛文斯克公墓G6rlitZ格爾利茨

GranovskyStreet格拉諾夫大街Gregory，P.格里高利Grinevskaya格林涅夫斯卡啞

Heisenberg海森堡Herling，G.赫林HiroakiKuromiya黑宮廣昭

HugoSchneiderAktiengesellschaft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

Igor伊戈爾Ilia伊里亞

IlyaSherman伊里亞·謝爾曼Imiokenty伊諾肯蒂Inta因塔   
奢

Ira-Io丨伊拉耶爾

IrinaEvgenevnaPrcobrazhenskaiJ伊琳娜·葉甫根耶芙娜·普蕾歐布拉申斯卡啞

IrinaKrauzt·伊琳娜.克勞澤

IrinaOstrovskaya伊琳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啞

IstraRiver伊斯特拉河

Iushkevich尤施飢維奇

IvanKoval’chuk伊萬.科瓦爾丘克

Ivanov伊萬諾娃

Ivanov，BorisBorisovich伊萬諾娃，鮑里斯鮑里索維奇

Ivanova伊萬諾娃

IvanSerpunin伊萬.謝爾普寧

IvanValiavin伊萬·瓦麗啞文

Izhma伊日馬

Kalinin加里寧Kamenka卡湎卡Kanin卡寧Kate飢特Katya卡佳Katyn卡廷Kaunas考納斯Kazakh哈薩克Kazakhstan哈薩克斯坦Kazan嚷山

KazarmennyiPereulok卡扎爾梅尼胡同Khakovka哈科夫卡Khalmer-Yu哈里梅爾一尤Kharkov哈爾科夫Khromnik赫羅姆尼克

Kirov基洛夫Kislovodsk基斯洛沃茨克Klara克拉拉

KolyaNezhinsky科利亞.聶任斯基Kolyma科雷馬Komi科米

KononSidorovichTkachenko科農.西德洛維奇.特卡琴科

KonstantinRykalov康斯坦丁.雷卡洛夫

KoppandGaberlandmunitionsfactory科普與加貝蘭兵工廠

Kos’iu科西尤

Kotlas科特拉斯

Kozarinov科扎利諾夫

Kozhva科日瓦

KrasnopresnenskaiaVo丨unteerDivision克拉斯諾普列年斯克志愿師

Krasnoyarsk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KseniaAndreeva克謝尼姬·安德烈耶娃

Kuibyshev古比雪夫

KiUndzhi庫因芝

Kursk庫爾斯克

Kuzmich庫茲米奇

Kuzminskoe庫茲明斯克耶

Kyrgyztan吉爾吉斯坦

LaTraWata《茶花女》（意大利歌劇）

LaurenceLaiuyaux勞倫斯·拉魯亞克斯

LazarVinnitsky拉扎爾·維尼茨基

Lazarev，V·拉扎列夫

Lefortovo列弗爾托沃區

Leipzig萊比錫

Lelya列麗婭

Lena列娜

Lera列拉

Lev列夫

LevGlebovichMishchenko列夫.格列勃維奇.米申科LevIzrailevich列夫·以色列維奇（猶太人名〉

Levitan列維坦Liashuk利亞舒克Lida麗達Lileev里列耶夫

Lileev，NikolaiIvanovich里列耶夫，尼古拉伊萬諾維奇Litvinenko利特維年科LiubkaTerletsky柳布卡.德爾列茨基LiubomirTerletsky柳波米爾德爾列茨基

Liza麗莎.Los.inka羅欣卡Lubianka盧比揚卡Lvov利沃夫Lydia莉季啞

LydiaArkadevna莉季啞·阿爾卡德芙娜LydiaKonstantinovna莉季啞·康斯坦丁諾芙娜LyoshaAnisimov摩沙·阿尼西莫夫

Makarov馬卡羅夫

M.alaiaNikitskaiaStreet馬拉亞·尼基茨卡亞大街Malakhovka馬拉霍夫卡MalyTheatei·莫斯科“小劇院”

Manikhino馬尼希諾   
一，

Mansfeld曼斯菲爾德

MarfaEgorovna馬爾法.葉戈羅芙娜

Maria瑪利婭

MariaAleksandrovskaya瑪利姬.亞歷山德羅夫斯卡啞

MariaPetrovna瑪利姬·彼得羅芙娜

MariaVolkonskaya瑪利啞.沃爾康斯卡姬

MarkBurman馬克.伯曼

Maroseika馬洛謝伊卡

Mamsia瑪露西0E

Mayakovsky馬雅可夫斯基

Memorial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碑”（也稱：俄羅斯“紀念碑"人權組織）

MenachemBegin梅納赫姆.貝京

MikhailAJeksandrovich米哈伊爾·阿列克山德洛維奇

MikhailSaltykov-Shchedrin謝德林

MikhailTsydzik米哈伊爾濟德齊克

Milcun米昆

MininReflector米寧反光燈Minsk明斯克Mishchenko米申科

Mishchenko，II’iaNikitich米申科，伊里亞.尼基第奇Mishchenko，LevG丨ebovich米申科，列夫·格列勃維奇Mishchenko，LidaNikitovna米申科，麗達·尼基托芙娜Mishchenko，NikitaL’vovich米申科，尼基塔.勒沃維奇Mishchenko，VeraNikitovna米申科，薇拉.尼基托芙娜Mitka米特卡

MiusskySquare米烏斯克廣場Mochulsky，F.V.莫丘爾斯基MohsenShah莫森沙Morozov，N.莫洛佐夫

MountElbrus厄布魯士山Murom穆羅姆MOhlbcrg米赫爾貝格Mytishchi梅季希MVD內務部

Nastia娜斯提婭

NatGrigorov納特.格里戈羅夫NataliaArkadevna納塔莉啞.阿爾卡德芙娜NaumGrigorov納烏姆.格里高洛夫Nekrasov涅克拉索夫Nelly涅莉

NickFraser尼克.弗雷澤NickyBrown尼基·布朗Nikita尼基塔

NikitaL’vovich尼基塔·利沃維奇NikolaiBogdanov尼古拉.波戈丹諾夫NikolaiGogol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Lileev尼古拉·里歹ij耶夫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Nina尼娜

NinaGrin尼娜·格林

NinaSemashko尼娜.謝瑪什科

Ninka寧卡

Obraztsov奧布拉茲佐夫◦legPopov奧列格·波波夫Olga奧爾加Omsk鄂木斯克Orel奧廖爾Oschatz奧沙茨

PaulCox保羅考克斯Pavel帕維爾

PavelBannikov帕維爾.班尼科夫

Pechota伯朝拉

Pecholag伯朝拉勞改營

Percslavl-Zalessky佩列斯拉夫爾-扎列斯基

PetrKuzmich彼得·庫茲米奇

Pitder皮特勒

PokrovskyBarracks波克洛夫兵營PokrovskyGates波克洛夫大門Poltava波爾塔瓦

Pushkin普希金

PyotrLebedev彼得·列別捷夫Ramzin拉姆津

Roshchin（俄文P〇貝HH）羅欣Rossii羅西Rykalov雷卡洛夫

Saint-Saen5圣桑

Sakharov薩哈羅夫（AndreiSakharov）

SashaChomy薩沙\*喬爾內Semenov謝苗諾夫

Serdit〇v，IuriiZ〇tik〇Vich謝爾基托夫，尤利.佐第科維奇

SergeiLebedev謝爾蓋.列別捷夫·

SergeiRzhevkin謝爾蓋.勒熱夫金SergeiSkatov謝爾蓋.斯卡托夫

Serov謝羅夫

Seryozha謝留扎

Sevastopol塞瓦斯托波爾

SashaChomy薩沙.喬爾內

Sheba示巴女王

Shirokoe希羅科耶

ShirokoeBologovskoe希羅科耶·波洛戈夫斯科耶

Shura舒拉

Shurka舒爾卡

ShurkaAleksandraChemomordik舒爾卡·亞歷山德拉·切爾諾摩爾迪克

Sintsov辛佐夫

Slavik斯拉維克

SMERSH“處死間諜”的縮寫

Smolensk斯摩棱斯克

SokolnikiPark索科爾尼基公園

Sokolov，A.索科洛夫

StanislavYakhovich斯坦尼斯拉夫.亞霍維奇

Stephanie斯蒂芬妮

StoleshnikovPereulok斯托列什尼科夫胡同

Stoph斯托夫

Sverdlovsk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

Svet斯維特

Sveta斯維塔

Svetlana斯維特拉娜

SvetlanaAleksandrovna斯維特拉娜·阿列山德羅芙娜

SvetlanaIvanova斯維特拉娜·伊萬諾娃

SvetlanaTukhachevskaya斯維特拉娜·圖和切夫斯卡婭

Tamara塔瑪拉

TamaraAleksandrovich塔瑪拉·亞歷山德羅維奇

Tamara.Kovalenko塔瑪拉.科瓦連J可

Tanya塔尼啞

TanyaSeghatchian塔尼婭.賽格哈茜

TatianaAfanasieva塔季亞娜.阿法納西耶娃

Tblisi第比利斯

Terktsky德爾列茨基

Tkachenko特卡琴科

Tobolsk托波爾斯克

Tobys托貝斯

Tolik托利克

Tsydzik濟德齊克

Tukhachevskaya圖哈切夫斯卡啞

Tukhachevsky圖哈切夫斯基

Tupolev圖波列夫

Turkmen土庫曼

Tuva圖瓦

Tver特維爾

Ukhta烏赫塔

UncleKesha科薩叔叔

UncleSeryozha謝留扎叔叔

Urals烏拉爾

Ust-Usa烏薩河

Vadim瓦季姆

Vagankovskoecemetery瓦甘卡公墓

Vagzhanov瓦格扎諾夫

ValentinaAlekseevna瓦連京娜·阿列克謝耶芙娜

Valya瓦麗婭

VasilyTrifonycb瓦西里·特里豐內奇

VaskaGusev瓦斯卡·古謝夫

Vera薇拉

VeraInber薇拉·英宿爾

VeraIvanovna薇拉.伊萬諾芙娜

Vetrov維特洛夫

Viazma維亞濟馬

VictorChikin維克托·齊津

Vinnytsa文尼察

VitalyEpshtein維塔里.愛普施坦

VitalyIvanovichKuzora維塔里·伊凡諾維奇·庫佐拉

Vladimir弗拉基米爾

VladimirAleksandrovich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

VladimirNovikov弗拉基米爾.諾維科夫

Volga伏爾加河、伏爾加市

Volodarsky沃羅達爾斯基

Vologda沃洛格達

Vorkuta沃爾庫塔

Voronezh沃羅涅日

Voroshilov伏羅希洛夫

VuzovskyLane烏佐夫胡同

Weimar魏瑪

Yakhovich，AliaStepanovna亞霍維奇，阿莉婭·斯捷潘諾芙娜

Yakutia雅庫特共和國

Yara亞拉

Yaroslavl雅羅斯拉夫爾Yasenevo亞謝涅沃YuryRumer尤里·魯梅爾

ZhenkaBukke任卡.布克Zhitomir日托米爾

ZotikovSerditov佐季科夫·謝爾迪托夫

注釋

[[←1](#1)]

①黑宮廣昭教授是日本東京大學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哈佛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現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教授。國際知名的蘇聯、俄羅斯、烏克蘭、亞洲史權威，著作頗豐，先后出版多部歷史專著，其中包括名著《死者的聲音》（2007)——譯注

[[←2](#2)]

[1]“紀念碑”是俄羅斯“紀念碑”歷史教育與人權組織的簡稱，也稱“國際紀念碑”，它負責調查、揭露“斯大林向人民宣戰”（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語）而實施的鎮壓和迫害。2014年12月俄羅斯政府宣布將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碑。——譯注

[[←3](#3)]

[1]俄國人名，分全名和昵稱兩種，親朋好友之間用昵稱，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昵稱斯維特拉娜（Svetlana)的昵稱是斯維塔（Sveta),此外還有Svetochka、Svetik、Svetlanka等。列夫在勞改營給她寫信時經常叫她斯維特（Svet)或者斯維特洛耶（Svedoe),這兩個詞意思是“光明”。這種雙關語，列夫很喜歡。本書幾乎通篇都是用斯維塔這個昵稱。——原注

[[←4](#4)]

[1]孟什維克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但反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原注

[[←5](#5)]

[1]實際上她是卡佳姨媽第一任丈夫鮑里斯·托爾馬切夫（BonsTolrmchev）的私生女。——原注

[[←6](#6)]

[1]羅西指意大利建筑師卡洛·羅西（CarloRossi），在尼古拉一世年間（1825—1855），他設計建造了很多樓房和建筑組合。——原注

[[←7](#7)]

[1]Dug是德文Durchgangslager的簡寫，意思是臨時過境/中轉的集中營。——譯注

[[←8](#8)]

[1]卡廷森林在俄羅斯斯摩棱斯克以西十九公里處，即卡廷大屠殺所在地。1939年8月23日，納粹德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所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條約附有一個雙方共同瓜分東歐的密約。根據該項密約，1939年9月1日德軍閃電戰占領波蘭西部，9月17日蘇聯出動四十六萬多人的部隊占領波蘭東部。因為當時波蘭軍隊正全力抵抗西來的德軍，奉命不與蘇軍交戰，致使蘇軍輕易占領成功，并俘虜了數十萬波蘭軍人。9月17日蘇德兩軍在布列斯特會師，9月25日，蘇德兩軍舉行聯合閱兵式，慶祝兩國對波蘭的共同占領。根據波蘭征兵法，每個大學畢業生都必須成為后備役軍官，所以蘇軍俘虜的大批波蘭軍官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精英。蘇聯秘密警察審問了三十多萬名波蘭戰俘，挑出兩萬五千七百名精英人士，決定處死。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蘇聯秘密警察在各地進行秘密殺害。1943年4月13日，納粹德國廣播電臺向世界宣布，德軍在卡廷森林發現萬人坑，死者均為被蘇聯殺害的波蘭俘虜：“二十八米長，十六米寬，里面埋了三千具波蘭人的尸體，尸體堆放了十二層。”蘇聯政府一直否認是蘇聯所為，直到蘇聯解體才供認不諱。1990年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向波蘭政府正式移交蘇聯屠殺波蘭人的政府文件，其中包括當年蘇聯克格勃頭子謝列平呈送赫魯曉夫的文件，里面提到蘇聯秘密警察部隊共屠殺了兩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名被俘的波蘭人。謝列平還建議銷毀死者個人檔案，以免大屠殺將來被發現。據“維基百科”介紹，蘇聯在卡廷森林秘密處死的波蘭人包括：一名海軍上將，兩名陸軍上將，二十四名上校，七十九名中校，二百五十八名少校，六百五十四名上尉，十七名海軍艦長，三千四百二十名士官，七名隨軍牧師，三名土地所有者，數百名律師、工程師、教師，一百多名作家、記者，還有大約二百名飛行員。——譯注

[[←9](#9)]

[1]Andrei Sakhamv，蘇聯核物理學家，未來的蘇聯“氫彈之父”，1975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后來成為蘇聯著名的異見人士，因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被蘇聯政府流放到高爾基城。1988年歐洲議會設立“薩哈羅夫獎”。——譯注

[[←10](#10)]

[1]塔尼婭是迫于軍方壓力當的“志愿軍”，軍方急需前線護士。如果不去，不但塔尼婭自己有被捕的危險，家人也很有可能被抓。——原注

[[←11](#11)]

[1]R代表俄國。德文“俄國”是Russland，縮寫R。——譯注

[[←12](#12)]

[2]《日內瓦公約》規定保護戰俘。因為蘇聯拒不加入該公約，所以蘇聯戰俘得不到保護。德國納粹集中營本應遵守《日內瓦公約》，但是用橡膠棍抽打不留鞭痕，所以査無實據。納粹用這個伎倆是為了繞過《日內瓦公約》。——譯注

[[←13](#13)]

[1]德國地名。是德國基督教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故鄉，在德國中北部偏東。人口兩萬多，——譯注

[[←14](#14)]

[1]在原東德境內，東德是蘇軍占領區，一譯注

[[←15](#15)]

[2]這幾個字母是縮寫，全稱意思是“處死內奸”。一譯注

[[←16](#16)]

[1]在俄國西北，全長一千八百零九公里，向北流入北冰洋，——譯注

[[←17](#17)]

[2]發源于烏拉爾北部山區，長五百六十五公里，水流湍急，在伍斯特一烏薩（Ust-Usa）這個地方注入伯朝拉河。——譯注

[[←18](#18)]

[1]利沃夫這座城市，原是波蘭領土，地處波蘭東南部。根據斯大林和納粹德國簽訂的密約，1939年9月納粹德國和蘇聯東西夾擊，共同占領了波蘭。這個城市在蘇聯占領區。當時這個城市有二十萬猶太人，從波蘭的德國占領區逃過來十萬猶太難民。1941年納粹德國進攻蘇聯，這個城市隨后也被德國占領，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屠殺。戰后，根據《雅爾塔協議》，該市并入蘇聯的烏克蘭。根據《波茨坦協議》，原來住在這里的波蘭市民大部分被驅趕到從德國新割讓出來的地方去了。于是這個城市成為蘇聯烏克蘭西部的主要城市，居民主要換成了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占少數，但人數也不少。——譯注

[[←19](#19)]

[1]冬天穿的棉鞋，為了加強保暖，鞋的內面襯有皮毛。——譯注

[[←20](#20)]

[1]科雷馬是西伯利亞東部一大片最北邊的區域，瀕臨北冰洋。斯大林時期的勞改營遍布蘇聯各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在科雷馬：數十萬人凍死、餓死、累死、病死于此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古拉格群島》作者索爾仁尼琴說，科雷馬是“寒冷和殘忍的極點”。——譯注

[[←21](#21)]

[1]1936年7月31日，列夫在伊斯特拉河游泳被人救起，差點淹死。——原注

[[←22](#22)]

[1]斯維特比起斯維塔更是親昵的稱呼。——譯注

[[←23](#23)]

[1]蘇聯就是根據刑法第58-Ⅰ（b）條款將列夫判刑的。——原注

[[←24](#24)]

[1]普希金1830年創作的詩劇。——譯注

[[←25](#25)]

[1]列維坦（1860—1900）和庫因芝（1842—1910），均為著名的俄國風景畫畫家。——原注

[[←26](#26)]

[1]這是暗語，指勞改營。——原注

[[←27](#27)]

[1]VeraInber（1880—1972），俄國詩人、作家、托洛茨基的表妹。——譯注

[[←28](#28)]

[1]顯然，這里說的是我愛你。——譯注

[[←29](#29)]

[1]這是雙關語。在俄語里，斯維塔（Sveta)本來就是昵稱，詞根是是斯維特（Svet)。斯維特又是一個獨立的詞，意思是光明——譯注

[[←30](#30)]

[1]引自果戈理《伊凡•伊萬諾維奇是怎樣與伊凡•尼基福羅維奇吵架的》。——原注

[[←31](#31)]

[1]《特轄區主管》是柴可夫斯基創作的一歌劇名。一一原注

“特轄區主管”是沙皇“恐怖伊凡”時期建立的特務組織成員，類似現代的秘密警察，他們對沙皇的敵人，進行偵緝、拷問、謀殺，以心黑手辣著名。——譯注

[[←32](#32)]

[2]新西伯利亞是俄國西伯利亞地區最大的城市，人口近一百五十萬，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一譯注

[[←33](#33)]

[3】莫斯科MalyTheater，與附近的莫斯科大劇院即Bolshoi，并稱莫斯科大小劇院。——譯注

[[←34](#34)]

[1]Alik,是Alika（阿利卡）的昵稱，斯維塔的侄兒。——譯注

[[←35](#35)]

[1]此處指自由工人。——譯注

[[←36](#36)]

[1]今名是圣彼得堡國立理工大學，俄國頂尖的理工科大學之一，有俄國的“麻省理工”之稱。——譯注

[[←37](#37)]

[2]當時正是斯大林大恐怖時期。——譯注

[[←38](#38)]

[1]波蘭第二大城市，在波蘭中部。羅茲在波蘭語中意思是“小船”。——譯注

[[←39](#39)]

[2]俄國城市，在莫斯科南邊，距莫斯科大約三百六十公里，人口三十多萬，蘇聯解體后發展較為滯后。奧廖爾在俄語里是鷹的意思。該市出了很多名人，如小說家屠格涅夫、沙俄總理斯托雷平、契卡頭子捷爾任斯基。——譯注

[[←40](#40)]

[1]當時莫斯科工廠工人平均月工資是七百五十盧布左右。——原注

[[←41](#41)]

[1]安德烈•圖波列夫（1888—1972），蘇聯飛機設計師，1937年被逮捕，在內務部一個秘密的研究與開發實驗室勞改，1943年獲得斯大林獎金。列昂尼德•拉姆津（1887—1948），蘇聯熱工工程師，1930—1936年被囚于勞改營，他也于1943年獲得斯大林獎金。——原注

[[←42](#42)]

[1]Yakutia，在俄國大東北，幅員遼闊，延伸到北冰洋。——譯注

[[←43](#43)]

[2]Komi，在俄國大西北，臨近北冰洋。——譯注

[[←44](#44)]

[1]俄羅斯民歌，哀婉而清麗，歌詞簡直唱到列夫和斯維塔心里去了，引起—種特殊的共鳴。

苗條的山梨樹啊，

你站著為何搖擺？

看你脈脈低下頭

向著樹根垂下來。

在那寬闊的河邊，

在這馬路的對面，

一裸高大的橡樹，

也是一祥的孤單。

我也是一裸山梨樹啊，

怎樣才能往橡樹身邊靠？

我也不愿意如此折腰，

我也不喜歡這般動搖。

帶著我那窈窕的枝蔓，

翩然棲身于橡樹里面，

我要和橡樹的樹葉啊，

日日夜夜輕輕地呢喃。

山梨樹卻永遠過不來，

與這高大的橡樹相會。

可憐它命中注定了啊，

永遠孤單地搖曳低垂。一原注

[[←45](#45)]

[1]這一條是背叛祖國罪——和列夫的58-1（b）（軍人背叛祖國罪）差不多。——原注

[[←46](#46)]

[1]安東•弗蘭釆維奇•加甫羅夫斯基，伯朝拉囚犯，1938年開始服刑，在斯特列里科夫實驗室里當助理。——原注

[[←47](#47)]

[1]H2O是水，這里當然是指淚水。——譯注

[[←48](#48)]

[1]這是暗語，指的是一位自由工人，此人已經同意把斯維塔藏在工業區。——原注

[[←49](#49)]

[1]伊薩克·列維坦（IsaakLevitan，1860—1900）的風景名畫復制品，斯維塔帶來的禮物。——原注

[[←50](#50)]

[1]簡稱血沉。——譯注

[[←51](#51)]

[2]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附近的學院，1943年斯維塔在那兒上過學。——原注

[[←52](#52)]

[1]一輛卡車在身邊駛過，車側面凸出來的鐵器把他的胃劃開了。——原注

[[←53](#53)]

[1]這里的“地理”指的是國界的重新劃分，每次人為的更改國界，都對當地居民造成巨大創傷。——譯注

[[←54](#54)]

[2]指失去新郎的新娘。俄國民俗，先前契約談成了，就用草作為象征性的補償。——原注

[[←55](#55)]

[1]Obraztsov（1901—1992），蘇俄木偶藝術家，《大英百科全書》說他“在蘇聯把木偶確立為藝術”。——譯注

[[←56](#56)]

[2]這是中央兒童劇院上演的兒童劇，根據蘇聯兒童詩人薩米爾•馬薩克的故事改編。——原注

[[←57](#57)]

[1]這也是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里的主題之一。——原注

[[←58](#58)]

[1]以色列第六任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michemBegin），1940—1942年也被囚禁在伯朝拉的勞改營。關于這段經歷，他寫了一本回憶錄《白夜》。他在書中引述了一位難友的話：伯朝拉的蚊子是“北方的蚊子”，比一般的蚊子厲害得多，“這種蚊子看管犯人，比帶槍的哨兵嚴厲多了。嚴厲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一個勞改犯偷偷出了營區，撒腿就跑。哨兵舉槍射擊，追他，帶著獵犬搜捕，還是沒有抓著。那個勞改犯跑得無影無蹤……三天以后，那個逃跑的人自己回來了……面目全非，都認不出來了。他們把他關到隔離牢房里單獨囚禁。但是，他發誓，以后再也不想逃跑了。北方的蚊子教訓不淺”。見《白夜》，第160—161頁。——原注

[[←59](#59)]

[1]可能列夫心里想的是“特種”勞改營。這種勞改營，1948年春天成立了十個，專門單獨監禁“最危險的”政治犯（間謀，異端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孟什維克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分子，移民國外參加其他反蘇組織的白俄分子）。這些“特種”勞改營都是在最為嚴酷的地區，其中好幾個都接近北極圈，有的還在北極圈里（因塔、沃爾庫塔、諾里爾斯克和科雷馬）。囚犯的皮膚上都烙印著編號，穿著條紋囚服只被允許與外界有最低限度的接觸”。參見阿普爾鮑姆《古拉格：一部歷史》英文版，第419頁。——原注

[[←60](#60)]

[1]俄國人不說“蹲”監獄，說“坐”監獄。——原注

[[←61](#61)]

[1]斯維塔這里沒說姓名，只說“他們”，是指刑滿釋放后留在勞改營就地就業的工人：鮑里斯•阿爾萬尼托普洛夫婦。斯維塔要和他們聯系上，他們夫婦倆給她提供住處，就住在工業區里面的勞改村里。——原注

[[←62](#62)]

[1]N.A.是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的縮寫。她一定是給列夫出過主意，叫他不要拍電報。——原注

[[←63](#63)]

[1]柳布卡被轉押到因塔勞改營的時候，十年刑期只剩十一個月了。——原注

[[←64](#64)]

[1]指公元前示巴王國的女王。《圣經》記載該女王愛慕以色列王所羅門。——譯注

[[←65](#65)]

[1]謝苗諾夫是電力組的頭頭，也是政治犯，1944年被判了十年勞改。——原注

[[←66](#66)]

[1J這兩部書都是俄國作家亞歷山大•格林（1880—1932）的長篇小說，格林的真名叫格林涅夫斯基。——原注

[[←67](#67)]

[1]斯維塔的這句話出自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大帝。據說，1773年，蘇沃洛夫將軍違背魯緬采夫元帥的命令，擅自攻下多瑙河上的土耳其要塞。蘇沃洛夫將軍被告上軍事法庭。葉卡捷琳娜大帝聽說以后，就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此言一出，遂成名言。——原注

[[←68](#68)]

[2]俄語伏特加這個詞的第一個字母是字母表上的第三個字母。——原注

[[←69](#69)]

[1]斯維塔來訪期間，一定得到過他這樣那樣的幫助，一原注

[[←70](#70)]

[1]阿穆爾河是俄國名，中國名黑龍江。——譯注

[[←71](#71)]

[1]波羅的海諸國指的是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國。——譯注

[[←72](#72)]

[1]相比之下，1950年木材廠的志愿工人平均每月掙工資八百盧布，管理人員每月掙一千二百盧布左右（詳見：GURKNARK，f.l73，op.I，d.I，1.2）。——原注

[[←73](#73)]

[1]塊狀咖啡是速溶咖啡，小方塊形狀，里面已經摻好了奶粉和糖一原注

[[←74](#74)]

[1]列夫這么想沒有任何理由，但是他自己沒有被送到嚴酷的第三營區，心里覺得有愧似的。—原注

[[←75](#75)]

[1]1945年2月，盟軍在雅爾塔達成協議，德國占領致使蘇聯損失慘重。蘇聯軍隊占領德國后，蘇軍將沒收德國工業物資，作為賠償。這里說的發電機就是蘇聯沒收的工業物資的一部分。——原注

[[←76](#76)]

[1]暗指內務部頭頭們——原注

[[←77](#77)]

[1]這是1940年代蘇聯流行電影里的兩首抒情歌曲。——原注

[[←78](#78)]

[1]圖瓦位于外蒙西北邊界外，原是清朝唐努烏梁海地區的一部分。清末，大批俄國移民進入該地。1911年外蒙“獨立”后，圖瓦也為俄國控制，1921年布爾什維克在此建立“圖瓦人民共和國”，1944年并入蘇聯版圖。——譯注

[[←79](#79)]

[1]指科農·西多羅維奇.特卡琴科（KononSidorovichTkachenko），列夫的難友，在一起服刑的工程師，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助手。他負責發電站鍋爐里的水化學成分不出錯。——原注

[[←80](#80)]

[1]據認為，綠色卷心菜能治肝病、肝炎和潰瘍。——原注

[[←81](#81)]

[1]指俄國詩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1821—1878）。列夫此處指的是他的詩《俄國女性》，這詩贊頌的是兩位公主：瑪利姬·沃爾康斯卡婭（MariaVolkonskaya）和葉卡捷琳娜·特魯別茨卡啞（EkaterinaTrubetskaya）。她們的丈夫因參加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她們不棄不離，毅然隨行。在這里，列夫把斯維塔比作這兩位著名的巾幗英雄。——原注

[[←82](#82)]

[1]現在莫斯科有九個主要的火車站，這個站旅客流量最大。一譯注

[[←83](#83)]

[1]北極的白夜太亮，看不到星星。——原注

[[←84](#84)]

[1]這是列夫和斯維塔用的暗語，和雨有關的字指的是古拉格，例如“雨傘”和“雨衣”——原注

[[←85](#85)]

[1]伊萬諾娃家即是斯維塔的娘家——譯注

[[←86](#86)]

[1]也稱麻雀山，1935—1999年間一度改稱列寧山，在莫斯科市西南處，是莫斯科最高的地方，地處莫斯科河南岸。山頂有觀景臺，可以俯瞰全城，莫斯科大學就在山頂，這個觀景臺成了莫斯科大學門前的大廣場。——譯注

[[←87](#87)]

[1]列夫宿舍的室友。1950年，伊萬在敖德薩造船學院上學時被逮捕，判了十年勞改，在伯朝拉服刑。——原注

[[←88](#88)]

[1]1949年的時候，列夫的刑期還有六年。——原注

[[←89](#89)]

[1]暗指列夫檔案里有勞改這一條，被社會歧視，應該爭取平反昭雪，把勞改這段歷史甄別過來。——譯注

[[←90](#90)]

[1]中東人煮咖啡，用剩下的咖啡渣算命，這是中東的習俗。——譯注

[[←91](#91)]

[1]此處的護照，指的是蘇聯國內的允許居住和工作的護照。——原注

1933年，蘇聯開始實行“國內護照及戶口制度”。護照及戶口只發給年滿十六歲的城市居民，不給農民。蘇聯的戶口（Propiska）實為居住許可，基本上分永久性戶口和臨時戶口兩種。戶口是用蓋印的形式印在國內護照上的，上面注明了此人的居住地址。沒有當地戶口，禁止在當地居住、就業。農民既沒有護照，當然也沒有城市戶口，未經集體農莊主席批準，不準遷入城市。違反該項規定屬于犯罪行為。農村人口離開農村原居住地不許超過三十天。即使是這三十天，也必須事先得到當地蘇維埃的批準，否則禁止外出。蘇聯政府宣稱，實行護照和城市戶口制度是“為了把不從事工業及其他對社會有益活動的人從城里清除出去，把暗藏在城里的富農分子、犯罪分子和其他反社會分子清除出去”。所謂“暗藏在城里的富農分子”是指為了躲避農業集體化而逃亡在外的農民。一旦遭到“清除”，結果常常就是勞改。二戰以后，農村當局通常也可以簽發護照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最高法院廢除了戶口制度。——譯注

[[←92](#92)]

[1]“通往以馬忤斯之路”是一個基督教的典故。以馬忤斯是古耶路撒冷西北的一個鎮，距離耶路撒冷大約十一公里。根據圣經《新約》的記載，耶穌基督復活后的當天晚上，他的兩位弟子正走在通往以馬忤斯的路上，邊走邊聊，忽然耶穌基督出現在他們面前。但是耶穌沒讓他倆認出自己，他倆以為是陌生人。耶穌問他倆在談什么，他們說，耶穌的墓空了，里面并沒有耶穌。但他們不信，認為耶穌不會死而復生。等他們三人走到以馬忤斯以后，他倆邀請耶穌一起去吃晚飯。耶穌把面包一掰開，他倆的眼睛就張開了，立刻認出了復活的耶穌。耶穌隨即飄然而去，不見了蹤影。于是他倆急忙去耶路撒冷，向其他各位弟子通報：耶穌果然已經復活了。此處暗喻：這個村像以馬忤斯一樣，去了也會遇到救世主的。一譯注

[[←93](#93)]

[1]這是另外一家紡織廠，以瓦格扎諾夫（Vagzhanov，蘇共在特維爾地區的一名干部）的名字命名的。——原注

[[←94](#94)]

[1]這個印章就是propiska，即居住許可，也稱戶口。—譯注

[[←95](#95)]

[1]Pereulok是俄文，意思是胡同、小巷。——譯注

[[←96](#96)]

[1]即今圣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俄文縮寫為criBrny，——譯注

[[←97](#97)]

[1]維生素D暗指錢。俄文里，錢這個詞是dengi，第一個字母是D。——譯注

[[←98](#98)]

[1]郵件不投遞給收件人，由收件人自己去郵局取，這種郵遞方式叫“留郵局待取”，國際 郵政通用的表示法是法文詞：poste restante。——譯注

[[←99](#99)]

[1]俄國詩人，諷刺作家，猶太人。沙俄限制猶太人上學， 他小時候因為沒有爭取到猶太人的入學名額而上不了學。為了上學，不得已接受基督教 洗禮。他的詩風行天下，據說，學生、醫生、律師，都會背誦他的詩，沒有不會的。十 月革命后，他移民國外，先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后去德國，最后在法國定居。1932 年在救火時心臟病發作而死。傳說他的狗躺在他身上，也和他一起死了。納博科夫贊揚 他說：“他留下的只有幾本書，和一個美麗安詳的身影。”肖斯塔科維奇曾為他的詩譜 曲。——譯注

[[←100](#100)]

[1]David Oistrakh （ 1908—1974），世界著名猶太裔蘇聯古典音樂小提琴家。1954年獲"蘇聯人民藝術家"稱號，1957年來中國作訪問交流演出。——譯注

